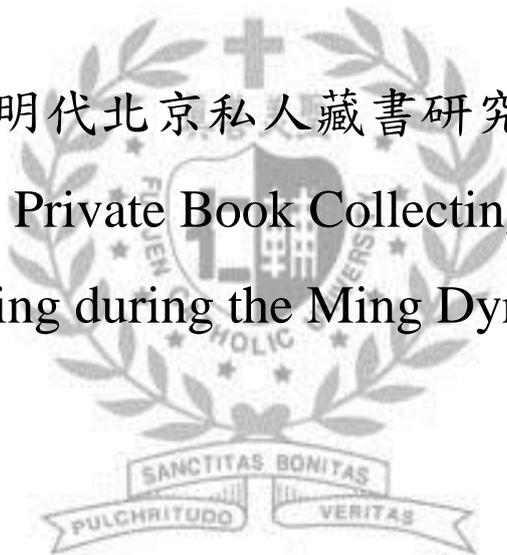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陳冠至博士

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

The Study on Private Book Collecting Activiti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研究生：黃敬程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



私立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黃敬程 先生之碩士學位論文

明代北京私人藏書研究
The Study on Private Book Collecting Activiti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經本委員會審議合格，特此證明。

論文口試委員

鄭恒雄（召集人）

鄭恒雄

藍文欽

藍文欽

指導老師

陳冠至

陳冠至

系主任

黃元鶴

黃元鶴

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謝辭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眼間研究所生涯即將邁入尾聲，雖然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將論文完成，但在這求學的階段中確實學到很多，也紮實的充實了自己。很感謝求學期間有老師、助教、學長姐、同學、學弟妹以及家人的幫助，讓我才能很順利的完成這項任務。

首先要深深的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冠至老師，給予我機會作為老師門下的學生，指導期間知道我想做古籍文獻方面的研究，不僅沒有拒絕，還非常細心且有耐心的帶我一步步的入門，用心的提點我研究該有的精神與態度，並在我論文撰寫的過程中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與指導。論文口試期間，也要十分感謝鄭恆雄教授與藍文欽教授所給予的寶貴意見與指正，讓此篇碩士論文更臻於完善。真的很感謝老師們的用心，讓我可以順利的將論文完成。

求學的過程中，還要感謝系上的教授，黃元鶴老師、林麗娟老師、吳政叡老師、張淳淳老師、李正吉老師、陳舜德老師、林呈潢老師、彭于萍老師、陳世娟老師等諸位老師，給予我在理論以及實務上的指導，真的讓我受益良多。同時也要感謝系上的助教靜宜、小童、懷綸，總是適時的給予我必要的協助，減少我在事務上的負擔。還有感謝一起打拚論文的好夥伴們，佩娟、Log、品融、彥宏、姿穎、詩婷、暖欣、維承、李雱、鈺媛、宜臻、承諺、麗華姐、彥銘學長、漢威、培娟以及維恩等人，很榮幸可以跟你們一起學習，並互相督促砥礪，因為有你們的陪伴，讓我在學習的過程中總是充滿著歡笑與樂趣。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謝謝你們在這些年給予我支持鼓勵與悉心關懷，讓我在求學生涯無後顧之憂，才得以順利的完成學業。僅以本文獻給我敬愛的家人及所有關心我的人，謝謝你們在我人生旅途中給予我的所有感動與關懷，感謝你們。

黃敬程 謹誌於輔仁大學

2016年7月



摘要

中國古代典籍文獻歷史的發展源遠流長，藏書事業興起甚早，且十分發達。北京藏書事業自古以來一直是以宮廷藏書為主流，官府藏書次之，直到明、清時期私人藏書事業才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自明成祖遷都後，北京儼然成為明代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經濟高度繁華，加上為全國科舉最高層級考試的所在地，士人們讀書問學和藏書活動的文化氛圍，於此都表現的十分興盛。此外，明代政府對刻印書籍的限制不多，以致官刻、私刻與坊刻都非常活絡。加上中央政府經常性的賜書政策，以及北京各衙門與官員之間的贈書習俗，使得北京成為當時全國圖書相關事業的重點區域之一，無形中，也帶動了本地圖書收藏與流通事業的發達。

另一方面，明代北京的圖書市場馳名全國，為士人收購書籍的重鎮。北京刻書雖然不如南方，但因是全國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交通又十分便利，所以透過商賈，大批書籍便由各地運送至此，為本地藏書家在圖書徵集上，提供了主要的來源。對於私家藏書來說，明代北京是人文薈萃的菁華地區，再加上圖書營銷事業的繁榮，使得這裡的藏書風氣非常興盛。

本文試圖以生活文化的角度為出發點，進行區域文化的認識，試圖以爬梳析理史料的方式，探討明代北京私家藏書發展的歷史脈絡，進而歸納出明代北京藏書家集團與其生活文化特徵。具體內容，包括：對明代北京藏書家的掌握、藏書家的社群特徵與交往、藏書收藏內容的類型與特色、藏書活動與生活文化內涵，以及藏書事業對當時與後世的貢獻與影響等。期盼能為明代北京私人藏書活動與文化的總體發展，提出更為深入的觀點和認知。

關鍵詞：明代；北京；私人藏書；藏書家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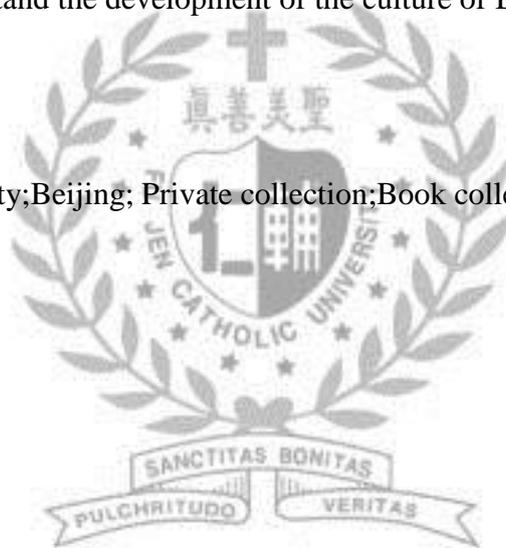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has a long history; the rise of the business of book collection started early and is well- developed. In Beijing, the collection by the courts has long been the cause of the mainstream in the book-collection business, followed by officials. Not until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the private collection greatly developed. Since Yongle Emperor moved the capital to Bei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has becom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with a high degree of economic prosperity; coupled with being the location of the nation's highest level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eijing had a strong cultural atmosphere: scholars actively engaged in study, discussion about knowledge and book collection. In addition, the Ming government did not put much restrictions on book production; as a result, engraving books by the government sector, private sectors or book publishers were all very prosperou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egular book-giving policies, coupled with the custom of giving books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Yamen) and courtiers in Beijing, made Beijing become one of the key national regions of the book related business; virtually, this has also led to the development the colle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book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s book markets were nationally known. Beijing was a key city where scholars acquired books; although its engraved books could not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South, Beijing wa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with very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rough merchants, a great number of books were shipped from any parts the country. This transporation provided the main source for the local bibliophiles to collect books. For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was the cultural blend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er; along with prosperous book marketing, book collection extremely flourish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ives,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culture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combing and analyzing historical data, and to conclude the depictions of Beijing bibliophile group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ir cultural lives. The depictions particularly include: a understanding of Beijing bibliophiles in the Ming Dynasty, features of the bibliophile communities an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m, the typ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ected books,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lives, and the influence as well a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book collection at that time and o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It is hop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Beijing book coll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 : Ming dynasty;Beijing; Private collection;Book collector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6
第二章 文獻分析	11
第一節 藏書的定義與類別.....	11
第二節 私家藏書概述.....	13
第三節 明代私家藏書概述.....	16
第四節 明代北京私人藏書事業發展的因素.....	2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7
第一節 研究步驟.....	37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9
第四章 明代北京的藏書家	41
第一節 順天、永平二府的藏書家.....	42
第二節 保定、河間二府的藏書家.....	59
第三節 真定、順德二府的藏書家.....	73
第四節 廣平、大名二府的藏書家.....	83
第五章 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社群生活	97
第一節 明代北京的士大夫.....	97
第二節 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社群關係.....	108

第六章 明代北京藏書家的藏書生活	125
第一節 藏書的徵集	125
第二節 藏書的貯存	131
第三節 藏書的利用	135
第四節 藏書的流通	148
第五節 明代北京藏書家的專業貢獻	170
第七章 結論	177
附錄	187
附錄一：明代北京藏書家知見表	187
附錄二：明代北京藏書樓（處）簡表	200
參考書目	205



圖目次

- 圖一：明京師（北直隸）地圖 9
- 圖二：明·佚名，《皇都積勝圖》（局部） 31
- 圖三：國家圖書館館藏《法藏碎金錄》，明嘉靖開州晁璠寶文堂刊本 157
- 圖四：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晁氏寶文堂書目》，明藍格鈔本 176



表目次

表 4-1：明代北京轄下順天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56
表 4-2：明代北京轄下永平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59
表 4-3：明代北京轄下保定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65
表 4-4：明代北京轄下河間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73
表 4-5：明代北京轄下真定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80
表 4-6：明代北京轄下順德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82
表 4-7：明代北京轄下廣平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86
表 4-8：明代北京轄下大名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92
表 4-9：明代北京轄下八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93
表 6-1：國家圖書館館藏明代北京私人刻書.....	158

第一章 緒論

中國古代典籍文獻歷史的發展源遠流長，藏書事業興起甚早，且十分發達。書籍之所以被重視珍藏，主要是因為書記載了人類過往活動的紀錄、智慧思想的結晶和發明創造的成果。而這些寶貴資產，如果不能形諸於筆墨記錄，僅靠頭腦記憶，終不免訛誤脫落，而難以完整保存，供後人研究參考。¹因此，自古以來收藏圖書文獻的各式活動就不斷的進行著，儘管較早期的圖書收藏因為各種主、客觀的因素（諸如，只限於統治階層掌握、文獻載體技術的侷限等），而呈現出一種局部且被動的態勢。但是，等到這些不利因素隨著時代慢慢演變，並將社會環境塑造成了一個適合藏書的溫床後，收藏書籍的風氣便快速瀰漫，而中國古代各階層人士，也就成了所謂的收藏圖書活動中的歷史主角與學術受益者了。於是，藏書家的視野與能力，一方面因圖書而更加開展進步；而另一方面，圖書收藏的環境，也漸漸地由藏書家的熱烈追求而愈加興盛，最後呈現出一種兩者相互影響、彼此激盪的局面。²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包含中國古代圖書的傳承、典藏、整理和研究，與古代學術文化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³吳晗先生（1909-1969）稱其：「有裨於時代文化、鄉邦徵獻，士夫學者之博古篤學者，至大且鉅。」⁴

¹ 李家駒，《中國古代藏書管理》（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12月初版），頁2。

² 張家榮，《孫從添《藏書紀要》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8年3月初版），頁1。

³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頁1。

⁴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月第1版），頁1-2。

一般而言，藏書是指典籍圖書的收藏活動，在歷史中國，藏書特指皇室、私人、寺觀、書院等典籍圖書的收藏。同時，藏書不僅專指收藏圖書一事而已，還包括與之有關的購置、鑒別、校勘、裝治、典藏、鈔補、傳錄、刊布、題跋、用印、保護等等一系列的活動。⁵而私家藏書歷來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千百年來「家藏萬卷書，門傍千顆樹。」一直是士人藏書與讀書的寫照，⁶與此相應的藏書文化，更是源遠流長而博大精深。因此，在聚書、抄書、校書、刻書、輯書、編目、題識等活動上，一直不乏其人。⁷近年來，文化界、圖書館界對藏書活動的探討逐漸升溫，已經成為學術界一個重要的課題。

從中國古代藏書的發展歷程來考察，明代是中國古代藏書事業史上的興盛期與繁榮期，其藏書事業的發展與成就，超過了歷史上以往的任何時期。⁸公元 1368 年，朱元璋（1328-1398）推翻蒙古異族統治下的元朝政權，建立了大明王朝。他吸取元代滅亡的教訓，為鞏固自己的統治，緩和階級矛盾，從明初伊始，便採取一系列恢復社會經濟、輕徭薄賦的政策，並且在文教事業方面，有著相當不錯的發展。⁹自此以後，明代便進入中國封建社會的成熟期，文化教育事業普遍受到社會的重視，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因而相當普及，圖書的編纂與出版也顯得十分旺盛，為明代私家藏書事業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¹⁰在明代 276 年的歷史當中，藏書名家輩出，藏書活動繁榮。明代藏書家數量之多，為明以前歷代之冠。清葉昌熾（1849-1917）《藏書紀事詩》就載錄了明代藏書家 427 人，其中不少藏書家，包括山陰祁承燦（1563-1628）、常熟毛晉（1599-1659）、南京黃居中（1562-1644）等，藏書皆超過五萬卷。¹¹明代藏書家在藏書理論、藏書保護、目錄編製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建樹，為推動當時的學術文化，作出很大的貢獻。

⁵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出版，2006 年 10 月初版），頁 1。

⁶ 黃曉霞，〈私家藏書文化論〉（《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0 年 12 月第 4 期），頁 35。

⁷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6 月第 1 版），頁 1。

⁸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1 版），頁 253。

⁹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1 版），頁 165。

¹⁰ 牛紅亮，〈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當代圖書館》，2009 年第 1 期），頁 33。

¹¹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53。

藏書是古代上層社會文化活動的一部份，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往往隨著社會的經濟發展而盛衰。由於全國各省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文化基礎也互有差異，因此，影響的程度也各不相同。¹²正因如此，明代私家藏書便具有很明顯的地域特徵，在區域分布上，往往呈現相當不均的情形。一般來說，北方地區少，南方地區多，而南方的私家藏書又多集中於江、浙一帶。雖然如此，明代江西、山東、河北、福建，仍出現過不少著名的藏書家，只是沒有江浙地區那麼繁盛。¹³

另一方面，明代北京（或稱京師）既為科舉會試與殿試的重鎮，又為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的所在地，士人們讀書問學和藏書活動的文化氛圍，必然十分濃烈。根據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所載，明代北京產出的進士人數高達 2,419 人之眾，居明代各省進士分布的第四名，¹⁴其中順天府（明代北京）就佔了 524 人，¹⁵佔著全國非常高的比例。而一地科舉活動的盛衰和進士人數的多寡，往往也被視為該地文風與教育水準高低，一項基本、客觀的衡量指標。¹⁶此外，由於明代政府對刻書事業的限制不多，加上工價低廉，使得私人與書坊刻書皆臻鼎盛，書籍市場遍佈全國各地，南京、北京、蘇州、徽州、建陽、湖州等地，更是重點區域，這對藏書事業來說，無疑是有利的條件，意謂喜歡藏書者皆有書可藏。¹⁷明代北京的圖書市場馳名全國，為士人收購書籍的重鎮。浙江藏書家胡應麟（1551-1602）便曾說道：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閩闔也、臨安也。……楚、蜀、交、廣，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橐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¹⁸

燕市，即指北京的書籍市場，由於其刻書與圖書流通業的發達，所以成為當地藏

¹²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頁 680。

¹³ 牛紅亮，〈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頁 35。

¹⁴ 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 2 月初版），頁 59。

¹⁵ 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頁 68。

¹⁶ 劉希傳，〈明代山東進士的區域分布研究〉（《教育與考試》，2007 年第 6 期），頁 41。

¹⁷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年 2 月第 1 版），頁 520。

¹⁸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10 月第 1 版），卷 4，〈甲部·經籍會通四〉，頁 55。

書事業得以繁榮的必要條件之一。明代北京的刻書事業雖不若江南興盛，然官商雲集、人文薈萃，讓書籍市場顯得十分活絡。北京自明朝永樂 19 年（1421）定為首都以後，便成為全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各省士子參加會試、殿試的目的地。當時北京的達官貴人比比皆是，當中不乏喜歡藏書者；再者，來自各地的士商名流紛紜眾多，全國科舉精英亦畢集於此，對於圖書的需求量十分可觀，所以書商極多。¹⁹綜上所述，由於明代北京刻書業的普及，使得京師地區喜好藏書的士人們，不難飽其所欲，加上當地圖書流通業的繁榮，使得人們在書籍的取得上，變得更加容易、便捷。凡此種種，都對明代北京地區藏書事業的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重要歷史作用。²⁰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考諸現存史料，針對明代北京政治活動的記載向來都是主流，反觀藝文之事，卻顯得零落闕如，較之江南地區，相形見绌。明代北京地區既為政治都會，北方區域文化自然也就傾向較具政治意味，使得藏書事蹟的記載不多。然而，明代北京既為科舉重鎮，且是全國重要的書籍市場之一，再加上刻書事業之興盛，相信明代北京地區曾經出現的藏書家，必定不在少數。

本研究主旨在於明代北京藏書家和藏書文化所引發的諸多議題，目的是探索明代北京私人藏書事業的發展狀況和文化特色，以及藏書家對本地學術文化、古籍保存與流通傳播等方面的貢獻與影響。透過對於現存明人文集、明清地方志、筆記小說、藏書專著等相關歷史文獻的爬梳整理，冀求能夠發掘出較諸現存研究

¹⁹ 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7月），頁8。

²⁰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260。

成果更多、且更為完整之明代北京藏書家史料，進而全面體認本地藏書文化的區域發展面向。誠如前文所述，歷來研究者多認為明代的藏書風氣乃南勝於北，此由目前的明代藏書史研究多偏重南方可以得知。所以，為了瞭解明代北方藏書風氣的真實樣貌，筆者選擇當時扮演北方的政治、文化、經濟、交通、教育等中心角色的北京，作為本文的區域研究對象，除了補全目前藏書史研究輕北重南的現象外，並可作為明代南北藏書風氣參同攷較的依據。有鑑於此，本研究的設計重點著重在：

- 一、透過現存歷史文獻的檢索，發掘更多明代京師地區的藏書家，以瞭解明代北京地區藏書風氣。
- 二、掌握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生活內涵，以及他們的區域社會關係。
- 三、探討明代北京藏書家在學術文化及其他方面的貢獻與影響。

為了完成上列的研究旨要，目前仍待釐清的一些問題，約略如下：

- 一、現存史料當中，具有明確藏書事實記載之明代北京藏書家人數為何？
- 二、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社群特徵與交往情形為何？
- 三、明代北京藏書家收藏內容的類型與特色為何？
- 四、明代北京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生活文化內涵為何？
- 五、明代北京私人藏書事業對當時與後世區域生活文化成形的影響為何？

凡此種種，都仍有待筆者從浩如煙海的相關歷史文獻當中，細心地一一篩檢出有用的素材，然後進行客觀的裁剪與串聯，最終再逐步地分別給予適當的歷史解釋與評價。筆者相信，惟有透過地毯式的史料蒐集，以勤補拙，孜孜不息且計日功程，最後一定可以將歷史真相盡可能地還原與描繪出來，解決問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明代北京的私人藏書文化所涵蓋的範圍甚廣，使得研究領域也比顯得比較複雜，若要深入探究，往往需要跨越文學、史學、社會學、圖書資訊學等領域。因此，在研究過程中，針對主題的範圍與限制，必須先加以釐清。茲說明如下：

- 一、在時間斷限上，本文所指的明代，主要係自洪武元年（1368）開始，至崇禎17年（1644）為止，共計276年的這一段時間裡。不過，為求文化發展歷程的完整性，有時仍必須涵蓋元末與清初時期，俾便觀察到文化史的全貌。
- 二、誠如前述，區域私人藏書文化的成形，往往具有連續性，為求完整，本文所指的藏書家，筆者遂參照業師陳冠至先生於〈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一文中所做的結論：由於明代對「藏書家」一詞的定義較不受限制，舉凡著述家及其後代、書畫收藏者、碑刻古器收藏者，以及古今書籍（包含軸、卷、冊、抄本等非今日所認為書籍的載體形式）的收藏者，不論其收藏量的多寡，藏書目錄之有無，只要其人癖好藏書、熱愛圖書，均可按史料上的記載，視當時藏書活動與文獻徵集的關聯程度，將之視為明代的「藏書家」。²¹基於上述，本文原則上收錄明代276年間，於北京確有藏書事實記載於史料上之藏書家為主；然對生於元末，卒於明初，或生於明末，卒於清初的藏書家，只要於北京具有明顯藏書行為紀錄者，也都在本文的收錄範圍以內。
- 三、在區域的斷限上，本研究是以《明史·地理志》所劃之北京地區為範圍，包括：順天府（包括：大興縣、宛平縣、良鄉縣、固安縣、永清縣、東安縣、香河縣、三河縣、武清縣、寶坻縣、灤縣、順義縣、密雲縣、懷柔縣、房山縣、文安縣、大城縣、保定縣、玉田縣、豐潤縣、遵化縣、平谷縣、薊州、

²¹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48卷第1期，2010年），頁132。

霸州、涿州、昌平州、通州等 22 縣 5 州)、保定府(包括：清苑縣、滿城縣、安肅縣、定興縣、新城縣、雄縣、容城縣、唐縣、慶都縣、博野縣、蠡縣、完縣、深澤縣、束鹿縣、高陽縣、新安縣、涞水縣、祁州、安州、易州等 17 縣 3 州)、河間府(包括：河間縣、獻縣、阜城縣、肅寧縣、任丘縣、交河縣、青縣、興濟縣、靜海縣、寧津縣、吳橋縣、東光縣、故城縣、南皮縣、鹽山縣、慶雲縣、景州、滄州等 16 縣 2 州)、真定府(包括：真定縣、井陘縣、獲鹿縣、元氏縣、靈壽縣、藁城縣、欒城縣、無極縣、平山縣、阜平縣、行唐縣、新樂縣、曲陽縣、南宮縣、新河縣、棗強縣、武邑縣、安平縣、饒陽縣、武強縣、柏鄉縣、隆平縣、高邑縣、臨城縣、贊皇縣、寧晉縣、衡水縣、定州、冀州、晉州、趙州、深州等 27 縣 5 州)、順德府(包括：邢臺縣、沙河縣、南和縣、任縣、內丘縣、唐山縣、平鄉縣、鉅鹿縣、廣宗縣等 9 縣)、廣平府(包括：永年縣、曲周縣、肥鄉縣、雞澤縣、廣平縣、成安縣、威縣、邯鄲縣、清河縣等 9 縣)、大名府(元城縣、大名縣、魏縣、南樂縣、清豐縣、內黃縣、濬縣、滑縣、長垣縣、東明縣、開州等 10 縣 1 州)、永平府(盧龍縣、遷安縣、撫寧縣、昌黎縣、樂亭縣、灤州等 5 縣 1 州)、延慶州(包括：永寧縣)以及保安州直隸州等 8 府，2 直隸州，17 屬州，116 縣等京師地區，²²如圖一所示。所以，本文所探討的對象，係以在此地區進行藏書活動的人士為主。

四、為了全面掌握本籍的藏書人數與狀況，前項所稱之在此地區進行藏書活動的人士，實際上包括了：本籍人士(設籍於上述北京轄下之各府、州、縣)或外籍僑寓於此者，只要確實有藏書事實可考者，便都在本文探究的範圍之內。

五、本研究需要檢索的史料，主要為正史、明人文集、清人文集、傳記資料、明

²²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7月初版)，卷40，〈志·地理一·京師〉，頁884-902。

清地方志、明清筆記小說、明清藏書理論或專著等。其中，凡有明顯藏書紀錄者，即加以收錄整理，並延伸發掘其藏書事業、藏書生活與藏書社群等相關資料。





圖一：明京師（北直隸）地圖。²³

²³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7冊，〈元、明時期〉，頁44-45。



第二章 文獻分析

中國古代的藏書文化，歷史悠遠流長，自殷商時代的甲骨藏室算起，迄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累積和發展，無論是官府藏書、私家藏書、還是寺觀藏書、書院藏書，在中國的文明史上，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藏書相關之探討，不僅可以瞭解各個歷史時期圖書的收集、整理與利用，還能從各個時代的藏書文化，瞭解當時的政治、經濟、學術等因素對整體文化發展的影響。因此，研究中國歷史藏書文化的整體發展及其所涵蓋的內容，對全面瞭解歷史社會生活和認識文化學術史面貌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本研究聚焦於明代北京私家藏書，除了對明代私家藏書事業與生活做整體的探討外，更著重於有關北京私家藏書諸多面向的整理與分析。本章根據以上幾個命題，分節論述，期盼對明代北京私家藏書的許多層面，能有進一步的瞭解認識，並藉以掌握相關的研究趨勢。



第一節 藏書的定義與類別

人類社會的發展，促使圖書收藏成為社會管理、國家統治、生產參考的需要。正因如此，藏書活動開始出現於歷史舞台上，並且不斷的在人類文化發展中，放出異彩。²⁴書籍的概念古今有別，隨著時間的流轉，人類紀錄知識的載體也不斷地演變，使得不同時期人們對書籍的認知，各有不同。一般而言，最早的圖書主要是指法令、戶籍、地圖及印章等檔案或物品之類，載體包括甲骨、簡帛、金石、器物……等。如今則是泛指圖冊和書籍，即有一定尺寸和一定厚度，並以文字、圖形、符號等方式紀錄的知識載體。總言之，不論古今，圖書都是人們表達思想、

²⁴ 謝灼華等，《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臺北：天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4月初版），頁8。

保留經驗、傳播知識、記載事物的重要工具。²⁵

「藏書」，顧名思義就是指典籍的收藏活動。在中國歷史上，藏書特指中央、私家、寺觀、書院等的典籍圖書的收藏。其概念往往不僅僅是專指藏書一事而已，還包括與之有關的購置、鑒別、校勘、裝治、典藏、鈔補、傳錄、刊布、題跋、用印、保護等一系列活動。²⁶藏書的概念隨著時代不同、人們紀錄知識的媒體不同，而有所變化。傳統「藏書」，指歷史上曾經收藏各類記載人類知識的紙質或非紙質的載體，直到近現代，又擴展為其他印刷和非印刷的文獻。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藏書」的範圍又擴展為聲像型、縮微型和計算機可讀型、數位多媒體等文獻。²⁷因此，「藏書」作為一項文化事業，也是社會文明的進步的標誌。同時，「藏書」亦為一種文化生活，反映出時代的精神與特色。而「藏書」也可說是一種個人行為，體現人們綜合素質的社會文化表徵。古往今來，藏書活動籍由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形式，在中外歷史上，發揮著極大的作用。²⁸

中國古代的藏書事業，大致可以分為公藏和私藏。其中公藏包括皇室藏書、中央政府藏書和地方官府藏書，私藏則是指私人藏書；此外，還有介於公藏和私藏兩者之間的書院和寺廟藏書，總共由此四大體系所組成。²⁹各個系統的先後培育與發展，又與一定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密切關聯。其中官藏系統是以皇家藏書為主的政府藏書，也是我國最早的古代藏書體系，相當於現在國家圖書館或檔案館的雛形。³⁰而私家藏書的出現，則稍晚於官府藏書，伴隨著學術文化發展而產生的讀書風氣，使得私人藏書事業也開始漸漸地發展起來。

在中國古代藏書的四大體系裡，私家藏書比起其他類型而言較為興盛，也更具有文化上的影響力和研究的價值。雖然官府藏書發展的很完整，但是畢竟不能

²⁵ 王余光等，《中國讀書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頁398。

²⁶ 王余光等，《中國讀書大辭典》，頁440。

²⁷ 黃顯功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頁1。

²⁸ 黃顯功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頁1。

²⁹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4。

³⁰ 蕭東發，〈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與資訊學刊》，第32期，2000年），頁46。

像私家藏書一樣生動，可以在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豐富的文化內涵。但官府藏書仍有其重要性，官府和私家藏書領域間，也常有互相交流、影響的情況出現。

第二節 私家藏書概述

一、私家藏書的興起與特徵

就定義而言，私家藏書乃指私人對典籍進行收藏、整理、研究，並藉以傳播的一種文化活動。在中國的歷史上，私家藏書源遠流長，影響甚鉅。關於私藏的起源，略比公藏稍晚一些，始於春秋戰國時期。³¹春秋戰國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是一個激進動盪的變革時代，社會生產力已有相當的發展，書寫工具也大為改善，圖書的製作除竹木簡策外，開始使用更為簡便的縑帛。特別是「士」階層的興起，突破了統治階級對文化的壟斷，改變了王官之學的局面，造就了一群哲人、思想家。首先，孔子（前 552-前 479）倡導儒家之學，繼而支派蜂起，各創異說，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³²為早期私人藏書的滋生，提供了合適的環境。孔子、惠施（前 370-前 310）、墨子、蘇秦（?-前 384）等人，都是藏書家早期的代表。³³這些學者著書立說時，必有一定文獻圖書作為參考；同時，他們又編著了大量的圖書文獻，流傳於社會。於是，圖書事業開始由官府著述、壟斷，發展到公私並存，進而官府與知識份子俱有的局面，促成了私家藏書的興起。

從私家藏書系統的發展來看，呈現以下幾個明顯的特徵：³⁴首先，私家藏書是

³¹ 黃顯功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頁 21。

³²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頁 2。

³³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 月第 1 版），頁 12。

³⁴ 蕭東發，〈略論中國古代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情報知識》，1999 年第 1 期），頁 5。

所有藏書系統中發展最快、規模最大的系統，尤其時代越後，藏書家數量則越多，藏書規模也越大。而藏書家的身份，也由早期以名宦貴族為主，逐漸下移至士庶之家，藏書總量與朝廷藏書相比，卻更為豐富，使得私家藏書，構成了我國古代藏書的基礎。其二，私家藏書的發達，與地域的經濟、文化發展水準、出版業發達程度密切相關，而與國家的政治中心關係，卻相對薄弱，這種現象在唐代以後尤為明顯。漢以來，私家藏書活動的中心，逐漸由西向東南轉移，慢慢地遠離政治中心。例如明清時期，因為江南地區並非政治中心，加上經濟發達，使得私家藏書事業空前繁榮，就能說明這一點。其三，從藏書樓來看，古代私家藏書樓的壽限普遍較短，少則十數年，多則數十年，鮮有超過百年者。主要是天災人禍，特別是子孫很少能夠守成，因為藏書樓的經營，需要許多的條件。著名的范氏「天一閣」，是極少數能夠保存下來，超過數百年的藏書樓。但宏觀而言，私家藏書系統的生存延續一直持續著，具有堅強韌性及廣泛的可適性。其四，私家藏書因其立足民間，為數不少的藏書家具有開明識見，使其較之官府藏書，更具有開放性和公益性。當然，不願意出借與人共享的藏書家，一直是歷代以來的普遍情形。

二、私家藏書在文化上的功能及重要性

文化，是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稱。中國古代私家藏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藏書活動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圖書、藏書樓等實體文化，以及在長期藏書活動中，形成的學術風氣與習俗等行為文化，還有藏書家們主體的心態文化。擁有這許多型態的文化因素，也決定了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成為中國文化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課題。³⁵

從私家藏書的文化功能面來看，藏書發揮著重要的知識功能，透過書籍的保存、傳抄與刊刻，為同時代的人們提供認知世界的豐富資料，也為後人要進一步認識和改造世界，奠定了基礎。其次，私家藏書在中國社會中，起著穩定傳統價

³⁵ 羅竹蓮，〈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文化淺析〉（《時代文學》，2008年第4期），頁87。

值觀的作用。在任何社會中，人們都必須遵從一定的社會規範，守法遵章，循約從俗。人類創造的文化，就是對價值觀念、社會規範的系統化；而私家藏書的規範，表現在於能穩定維持傳統文人士子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治學方法。其三，私家藏書在中國社會中，發揮很強的滿足需要的功能。文學家認為，文化的功能就是直接或間接的滿足人類的需要，而透過傳統私家藏書的收藏、組織與整理，使書籍成為系統的知識，甚至產生出更多的知識。³⁶

從精神層面來看，私家藏書與官府藏書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包括國家藏書、地方藏書、書院藏書、佛寺道觀藏書等各類藏書系統，經常是以國家、地方上的文化設施或者集體的共有財產等形式而存在，藏書只有收藏管理的責任，而不是真正擁有。且公家藏書，往往不能與典籍收藏的過程，即訪求、收購、鑑別、校勘、整序、編目、保管等諸環節相始終，也不能像私家藏書一樣用情於書，在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豐厚的文化內涵。³⁷這也就是為什麼私家藏書，能在各種藏書類型的發展中一支獨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來，從文化學角度考察與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藏書活動而形成的藏書文化，在中國學術界相當熱門。由於藏書是有關圖書收集、保存與典藏、研究、流傳、散佚等活動的總稱，藏書活動本身即具有文化性，與社會文化發展，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藏書文化研究的重點，在於藏書活動本身，以及藏書活動有關的各種生活行為或現象。而藏書與當時社會環境的關係密切，對社會文化發展造成影響，也是研究的重點。³⁸私家藏書活動，正是人類文化經過長期演進之後，才產生出的一種具有高度文明的文化事業，並且融入了社會上的知識階級以及部份工商階層的生活當中，成為一種社會群體現象。所以，在研究中國文化史時，私家藏書的歷史，自然也是其中一門非常重要的課題。

此外，藏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為文化學、文化史的研究所借鑒，甚至具有

³⁶ 郭麗萍，〈論傳統私家藏書的文化功能〉（《山西師大學報》，1999年4月第2期），頁52-54。

³⁷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頁1。

³⁸ 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頁3。

更直接的意義。簡而言之，研究中國古代藏書歷史發達與地域興盛的事實，將為文化學的研究提供強而有力的實證。³⁹歷史上的私家藏書事業，是民族文化學術事業的重要組成部份，欲深入瞭解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現象的種種特異之處，以及藏書家們思想行為的根源，必須從「文化」這一層面入手而加以剖析。私家藏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藏書家作為文化圈中的一份子，也不可避免地受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因此，藏書和文化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兩者互為表裡。

研究中國歷史藏書，對於全面瞭解歷史社會的生活、完整認識文化學術史面貌、總結愛書讀書治學精神、光大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編撰中國藏書通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近期藏書的課題，包括廣泛開展專題性的藏書研究、區域性藏書研究、中國歷史藏書資料索引或匯編的編輯、編撰歷史藏書事業大事年表，以及編著中國藏書斷代研究和區域研究專著等目標。⁴⁰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私家藏書，對於全面瞭解中國歷史和社會，發揚和光大中國文化的光榮傳統，提倡愛書、讀書和用書的治學精神，都有其重要的意義。⁴¹而明代是中國古代私家藏書事業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從藏書規模、數量、質量、價值等方面來看，都進入了高度繁榮的時代，在圖書收藏與整理方面，都有很大的建樹。

第三節 明代私家藏書概述

一、明代私家藏書興盛的背景條件

³⁹ 徐雁，〈我國古代藏書實踐和藏書思想的歷史總結〉（《四川圖書館學報》，1986 年第 1 期），頁 60。

⁴⁰ 程煥文，〈中國圖書文化的演變及其意義〉，收入程煥文，《中國圖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 8 月第 1 版），頁 1。

⁴¹ 陳曙，〈論私家藏書〉（《四川圖書館學報》，1992 年第 1 期），頁 68。

明代藏書活動與文化之所以如此興盛，實際上是因為深遠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背景條件的成熟。尤其是文化教育的發展，與刻書業、圖書流通業的興盛，都為明代藏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有利藏書發展的特殊社會文化背景下，藏書的規模不斷地擴大，官藏、私藏與佛道藏書盛極一時，對於藏書的整理、利用、保護等方面的精進，都有很大的貢獻，也形成明代藏書獨特的文化。⁴²

太祖朱元璋建國之初，國是繁劇。在政治上，面對元末群雄割據後的分裂局面；在經濟上，面對重新整建的難題；在社會民生上，則必先採取肅貪嚴懲的鐵腕政策；而在教育文化上，人才的選拔與圖書蒐集等，都有待重整，⁴³因此明朝 276 年的藏書文化，與政治、社會經濟及學術文化等各種因素，都有密切的關係。

(一) 經濟方面：明太祖登基後，為了安撫戰亂之後的殘破現象，首先與民休息，以安定人民生活、發展社會生產為主。⁴⁴其中採取了一系列的懲治與獎勵措施，像是嚴懲貪汙、興修水利、提倡墾荒、移民屯田等，使社會的生產勞動逐漸恢復與提昇，進而帶動經濟成長與復甦。尤其特別重視農業生產，不但鼓勵農民遷移屯田，開墾荒地還有提供獎勵，並免除三年徭役或賦稅…等，⁴⁵期使改善整個農業生產環境，促進墾田的人口數量不斷增加。此外，朱元璋還特別著重經濟作物的增產，主要是桑、麻、木棉和棗、柿、栗、胡桃……等，⁴⁶只要農民多種桑、麻、木棉等作物，就能享有減免賦稅的優惠，並要求地方里甲嚴格監督。⁴⁷透過如此賞罰並行的方式，來發展明初的農業經濟，太祖曾頒發〈教民榜文〉，內云：

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納糧當差之外，別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

⁴²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54。

⁴³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7 月），頁 40。

⁴⁴ 鄒信勝，《明代的福建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頁 9。

⁴⁵ 鄒信勝，《明代的福建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頁 44-45。

⁴⁶ 吳晗，《朱元璋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年 8 月第 1 版），頁 236。

⁴⁷ 吳晗，《朱元璋傳》，頁 236。

衣食；每戶務要照依號令，如法栽種桑株、棗、柿、綿花。每歲養蠶所得絲棉，可供衣服；棗柿豐年，可以賣鈔使用，遇儉年，可當糧食，此事有益爾民。里、甲、老人如常提督點視，敢有違者，家遷化外。⁴⁸

其目的就是要促進農業生產的復甦，滿足人民糧食方面的需求，進而帶動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

根據文獻記載，明代中葉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規模擴大，技術方面的提高，促成了商品經濟的繁榮。以棉布而論，江蘇的松江和浙江的嘉善，都是盛產棉布的地方，市場非常活躍。浙江湖州府和江蘇蘇州府、山西潞安府，形成全國三大絲織業的中心。⁴⁹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明朝中後期全國都有出現大批商業發達的城市，北京、南京作為全國首善之區，非常的繁榮。其餘如蘇州、浙江、杭州……等等，都是經濟富庶、文化鼎盛之地。⁵⁰而明代經濟發展中，以棉紡、礦產、造船、製糖、榨油、製茶、造紙、印刷等手工業的發展最值得注意，⁵¹其中印刷和造紙技術的提高，帶動印刷業和造紙業的發達，連帶推動了整個圖書事業的發展，使書籍成為一種商品，進入流通市場和一般百姓之家，甚至可以遠銷海外。⁵²

綜合以上所述，從明代許多文獻中，可以發現經濟繁榮的一些大城市，像是浙江、福建、江蘇各行省的大城市，都是著名的藏書集中地，由此亦可見經濟富庶地區和藏書活動，確實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有了良好的經濟環境，才能促進人文的發展；而造紙和印刷技術的進步，更是催化藏書事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二） 文化方面：明太祖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對教育和文化，卻十分重視。他指出：

⁴⁸ 明·張鹵，《皇明制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78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明萬曆 7 年張鹵刻本影印），卷 9，頁 13 下-14 上。

⁴⁹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 514。

⁵⁰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54-255。

⁵¹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55。

⁵²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1999 年第 2 期），頁 98。

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⁵³

由這些相關的文獻記載，都可以看出太祖主張聘請知識淵博的人擔任老師。歷史上很多學子之所以開始向學，正因為統治者具有這樣的認知，且往往可對後世產生重大的影響。此外，《明史》記載：「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⁵⁴太祖於立國之後，即大力興辦學校，洪武 8 年（1375），「命丞相往國子學，考校老成端正、學博經通者，分校天下，令郡縣廣其生徒而立學焉。又命御史臺精選，以分教北方。」⁵⁵且在首都南京，創辦國子學（後改名為國子監），並設立專門的教師來講授《四書》、《五經》及《大明律令》。在地方上，明太祖規定各府、州、縣都要設立府學、州學、縣學，在鄉村則要辦社學，⁵⁶讓明代的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的進步。此外，明代仍沿襲唐宋的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同時採取一系列鼓勵讀書的政策，讓百姓知道只有讀書才有當官的機會。基於上述的種種作為，明代社會開始有了濃厚的讀書風氣，⁵⁷讀書人都希望可以透過科舉，得到當官的機會，導致當時書籍的需要量大增。另一方面，明太祖也相當重視圖書典籍的收集和出版，首先於「洪武元年八月，詔除書籍稅。」⁵⁸免除書籍的賦稅，對刻書事業影響甚大，刻書業因此也快速的繁盛起來，內府、中央各衙署、藩府、地方政府、各種教育機構、私人、書坊等，很多都有從事刻書事業，刻書地域因而空前的發達，進一步地帶動了藏書事業，終使藏書成為一種全國的社會風氣，推動著整個明代藏書文化的不斷拓展與提升。

（三） 刻書和圖書流通方面：由於明初以來文化政策的影響，使得社會上對於書籍的需求量大幅地增加，對刻書業和圖書流通業，自然都產生重大的影響。一

⁵³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69，〈志·選舉一〉，頁 1686。

⁵⁴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69，〈志·選舉一〉，頁 1686。

⁵⁵ 明·黃佐，《南雍志》（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年 9 月第 1 版），卷 2，頁 59-60。

⁵⁶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 516。

⁵⁷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56。

⁵⁸ 清·龍文彬，《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1 月第 1 版），卷 26，頁 418。

般而言，明代刻書形成的系統，分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部份，⁵⁹介紹如下：

1. 官刻：包括由司禮監掌管的內府刻書、國子監刻書，以及各省布政司、按察司、藩府等等。官刻直接豐富了私人藏書，所刻書籍都有一定的學術水準，且帶動藏書與刻書事業。
2. 私刻：明代的私家刻書技術高，比重大，刻書質量優，因而貢獻突出。正德、嘉靖年間，私家刻書非常的風行，翻宋、仿宋刻書之風尤其興盛，並直接影響官刻及坊刻。
3. 坊刻：坊刻的歷史最為悠久，分布廣，刻書量較大。明代的南京、北京、蘇州、徽州、建陽、湖州等地，皆是坊刻事業的重點地區。⁶⁰明代著名藏書家胡應麟指稱：

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⁶¹

總之，由於政策的鼓勵，以及經濟的復甦與快速成長，加上社會穩定、交通便利、文化教育事業鼎盛等諸多條件的成熟，使得社會對書籍的需求大增，為圖書事業的發展，提供積極的推動作用。明代各類型的刻書事業，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了明代整體圖書事業的發展，尤其是私刻，更是直接為私人藏書活動，發揮著推動與揚興的作用。

二、明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及特徵

在明代 276 年的歷史裡，私家藏書風氣，主要是延續宋、元兩朝的藏書風氣，

⁵⁹ 劉喜伸，《家庭藏書指南》（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頁99。

⁶⁰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520。

⁶¹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甲部·經籍會通四〉，頁59。

初期的藏書家並不多，直到明代中葉起，私家藏書風氣及藏書數量，才有顯著的增加，其發展階段，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 洪武到天順年間(1368-1464)

這一時期的藏書風氣，受到宋元時期藏書風氣的影響。太祖即位後，便開始整頓政治、發展經濟，對圖書蒐集也表現的非常積極。因此，在政府大力蒐購的情況下，民間藏書多半被政府收藏，以致私家藏書並不興盛。此一時期，著名的私家藏書，以浙江宋濂(1310-1381)、江西楊士奇(1364-1444)、江蘇葉盛(1420-1474)等最為有名。⁶²值得注意的是，多數藏書家都具有官職身份，或為官宦的後代子孫，只有極少數不具有官職身份。可見明代初期的藏書家，以達官顯貴為主，而民間的藏書數量並不多。⁶³

(二) 成化至正德年間(1465-1521)

這一段時期，明代社會逐漸步入繁榮與發展的軌道。此時的私家藏書漸漸脫離官方的色彩，開始出現向民間擴大的傾向，逐漸興盛。藏書家人數增多，不像前期大多集中在高官顯貴，開始普及到民間的文人，不但在藏書數量上豐富可觀，在種類上，更是隨著藏書家興趣的廣泛而呈現多元的特色。此一時期較知名的藏書家，主要為蘇州的朱存理(1444-1513)、楊循吉(1456-1544)、都穆(1459-1525)、文徵明(1470-1559)等人。⁶⁴

(三) 嘉靖到萬曆年間(1522-1620)

⁶² 牛紅亮，〈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頁 33。

⁶³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頁 146。

⁶⁴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 558-559。

此一階段，為私人藏書風氣的全盛時期。坊間刻書業蓬勃，書籍市場活絡，使得藏書風氣也非常興盛。這時的私家藏書數量，不僅超出前面兩個時期甚多，同時也出現明代最著名的一群藏書家。由於這段期間長達近百年，正值明代經濟最繁榮的時候，社會上顯現一片富庶的氣象，個人的經濟能力增強，藏書人數也日益增多。這一時期的藏書家，遍及朝野，不論是在朝的官員，還是民間的知識份子，其數量大抵呈現均衡的發展；藏書家的身份，上至東閣大學士、刑部尚書、翰林學士等官員士紳，下含文人、畫家、隱逸處士、富商、書賈等平民百姓，各階層皆有。著名的藏書家有山東的李廷相（1485-1544）、李開先（1502-1568），河南的晁瑛（1511-1575）、河北的高儒等輩。⁶⁵

（四） 天啓到崇禎末年（1621-1644）：

為時間最短的一個時期。本期承襲嘉靖、萬曆年間的藏書風氣，藏書事業仍然持續地發展。然而，受到明末政治紛亂、社會經濟衰退的影響，藏書家人數已不再如前期增加的那麼快速。不過，多數的藏書家仍難以割捨其藏書事業，足見私家藏書風氣的盛行和影響，不但從明初延續到明末，甚至到清初，都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⁶⁶至於明代私家藏書的特徵，大致有以下幾點：

1. 藏書家數量眾多。

因明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使得著書、刻書事業發達，引起整個明代的著作和圖書流通劇增。加上明人對藏書事業的重視，使得明代私家藏書規模與數量，都冠於前代。⁶⁷誠如前述《藏書紀事詩》的記載，明代藏書家總數就高達 427 人。

⁶⁵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頁 148。

⁶⁶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頁 150。

⁶⁷ 牛紅亮，《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頁 34。

2. 藏書規模不斷增加。

明代私家藏書規模空前，數量巨大，種類繁多，其規模大大的超越了唐宋時期，也超越了同時代的官府藏書。例如寧波范欽（1506-1585）的「天一閣」，藏書最多時達七萬餘卷；浙江山陰祁承燾的「澹生堂」，藏書也達九萬餘卷等，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收藏範圍很廣。明代藏書家都有自己的收藏重點及特色，不僅提升了私家藏書的品味與價值，同時也促進了歷史文化的保存與流傳。

3. 藏書分布呈現地域不平衡狀況。

明代私人藏書具有很強的地域特徵，在地域分布上相當不平衡。一般來說，北方地區少、南方地區多；而南方的私家藏書，又多集中分布於江蘇、浙江一帶。

68

4. 版本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私家藏書珍本秘笈的數量越來越多。宋、元刻本，在明朝已經很難見到，加上文物價值很高，文字差錯也較少，因而倍受藏書家們青睞。基於這些因素，使得書賈中的不法之徒，想盡種種方法來製造假的宋元板刻。藏書家也開始對作偽現象進行研究，並歸納整理宋元板的特點，掌握板本鑑定的方法，使得明代中期以後的板本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⁶⁹

⁶⁸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江西圖書館學刊》，2001年第4期），頁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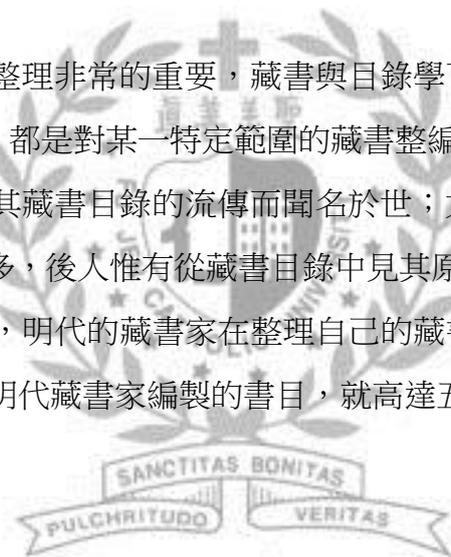
⁶⁹ 劉大軍等，《中國私家藏書（上）-先秦至明代》（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頁144。

5. 重視藏書的整理。

明代藏書家大都不是為了藏書而藏書，他們主張藏以致用，力圖透過閱讀藏書來提高自己的修養與學識。不少藏書家還把藏書連同自己的學術研究、刻書活動結合起來，自己抄書、刻書、著書，不僅讓自己的藏書得到擴充，而且擴大了書籍的流傳與範圍。⁷⁰

6. 重視私家藏書書目編製。

書目編製，對圖書整理非常的重要，藏書與目錄學可說是互為因果：其一，很多目錄學著作的產生，都是對某一特定範圍的藏書整編以後的結果；另一方面，凡是著名的藏書，皆因其藏書目錄的流傳而聞名於世；尤其在時代更替或世事變故時，藏書往往聚少散多，後人惟有從藏書目錄中見其原貌。⁷¹為了便於圖書的保管、檢索、流通及閱覽，明代的藏書家在整理自己的藏書時，大多積極地編製私人藏書目錄。據統計，明代藏書家編製的書目，就高達五十餘種。⁷²



7. 藏書保護的經驗與理論取得重大發展。

明代的藏書家吸取前人的經驗與教訓，以藏書樓的構造和書籍紙張防蛀為重心，對藏書的自然條件進行研究，並據以作為藏書保存環境之應用，藏書保護成為重要的課題。⁷³

⁷⁰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頁 64。

⁷¹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頁 184-185。

⁷² 牛紅亮，〈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頁 35。

⁷³ 劉大軍等，〈中國私家藏書（上）-先秦至明代〉，頁 144。

8. 藏書學的理论有了重大發展。

明代的私人藏書致力於藏書實踐，於大力推動私人藏書事業的同時，也十分重視藏書理論建設。不少藏書家，對當時的藏書活動進行了歸納和總結，並提出了自己的購書、鑒別、收藏理論，使明代的藏書理論有了重大的突破。例如祁承燾根據自己在長期藏書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撰寫了《澹生堂藏書約》一書，對如何收集、鑒別圖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⁷⁴

三、 明代文人的藏書風尚

私家藏書活動對於社會風氣的改善，也大有助益。在喜好藏書的讀書人引導下，創造出相當優質的生活文化；而其藏書活動和當時文人的生活，亦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文人大多喜好藏書，以故藏書家輩出，代有其人。藏書家既為文人，則藏書家的生活，正是明代文人生活文化的縮影。所以，藉由藏書家所樹立的生活方式，來觀察明代北京文人的地方生活文化，是非常有意義的，尤其是藏書家在當地的文人社群中，通常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⁷⁵

歷史上所謂的文人可以包括從事一切文化實踐及知識活動的人。從這種意義上說，文人亦即知識分子的代名詞，或者可以稱之為「斯文」一脈。而明代文人固然是知識階層的一部分，具有知識階層所具有的一切共性，卻又是獨具特點的一個社會階層。⁷⁶明代文人相異於過去以往的知識份子所具有的獨特風格，包括文人群體的擴大、具有明顯世俗化的傾向，以及書畫文學等清雅之事的追求等。也就是說，他們與傳統士人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對於制舉文字以外的文藝之愛好與認同，並創造出一種具有美學意義的生活方式，營造獨特的生命情調，構成

⁷⁴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頁 64。

⁷⁵ 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出版，2002年2月初版），頁 232。

⁷⁶ 陳寶良，〈明代文人辨析〉（《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90。

深具明代社會文化特色的文人文化。⁷⁷

明代文人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北京自然也不例外。他們的生活崇尚既多又奇，喜好以能喚引美感及興趣的事物與心態，來裝點悠閒無擾的日常起居生活。他們或遊山玩水、尋花品泉、採石試茗；或焚香對月、洗硯弄墨、鼓琴蓄鶴；或摩挲古玩、擺設書齋、佈置園林。無論品鑑書畫鼎彝、山水茆亭，或是欣慕美的情態，乃至對懶、狂、癖、痴、拙、傲等各種偏執人格的激賞，均被明代文人列入美感趣味的物類範疇當中，用以成就其閒賞審美的生活。⁷⁸當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與審美趣味有關。所謂審美趣味或審美情趣，是主體對各種對象相對穩定的主觀審美興味、愛好、態度與鑒賞力，也是審美意識的組成部份，為審美情感與審美理想的一種表現。審美趣味是人的思想、情感、能力在審美上的體現，反映出人們在審美中的自我發現與自我實現的需要。一方面，它是由個體的後天生活經驗與心理感受，共同參與後所獲得的。⁷⁹明代文人們日復一日地經營著「審美生活」這個大型的藝術品，或是點化周遭為美事美物的環境，或是品味著古董書畫器物，藉展現文人特有的風姿與自命清高的價值崇尚。⁸⁰

明代文人們對藏書活動的品味與美感，都表現在他們於藏書生活方式的細膩感受之上。文人莫不愛書，明代文人亦普遍喜好藏書，有的極力蒐羅成癖，惟限於財力，珍藏善本之大藏書家實在不多。即使對自己的藏書非常珍視，但子孫往往不能守之，而轉入他人之手。雖然也有收藏雜俗濫板與龜羹鴉炙於一室者，但是明代藏書實已蔚為一種風氣。⁸¹同時，他們也將藏書活動與其他的休閒活動加以融合。首先，他們非常重視居家休閒的安排，閒適生活格言所稱比比皆是，也正好反映一個時代的共性生活。⁸²圖籍、吟詠、書畫、鑒賞等雅事，對於幽曠逸居的

⁷⁷ 王韶蕊，《雅興與健康：明代文人養生文化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6月），頁4。

⁷⁸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4月初版），頁1。

⁷⁹ 朱義祿，《逝去的啟蒙-明清之際啟蒙學者的文化心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頁258。

⁸⁰ 毛文芳，〈花、美女、癖人與遊舫-晚明文人之美感境界與美感經營〉（《中國學術年刊》，第19期，1998年3月），頁402。

⁸¹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頁90-91。

⁸² 吳智和，〈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以居家休閒生活為例〉，收入吳智和，《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年12月初版），頁143。

他們，成為重要的休閒娛情要項之一，猶如園藝休閒一般，視其為日常居家怡情悅志生活的一個環節。尤其是圖籍的部份，明人本來就視讀書、著書、藏書、抄書，為居家生活不可或缺的要項，而當時學界也以讀書、著書、藏書等，來衡量士人的文化素養與社會地位，因此，文士多以廣貯圖籍相互標榜。⁸³藏書、讀書、著書與抄書，雖皆為明代文人本業，但必須注意的是不論四面縹緲、悠然翻閱、晝抄夜校、讀之殆遍等事，都是天性偏勝，屬於居家自娛的行為，絕不以此名山之業，而改變休閒的本色。⁸⁴

另一方面，明代文人在居處生活細節的佈置上，處處充滿對古代的崇敬。「古」在文人心中，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也是美感對象的轉化過程，賦予物象的人文文化象徵意義，亦由文人濃厚的古典情懷所興發。⁸⁵尤其表現在讀書環境上，明代文人階層不論在野或仕宦，皆非常重視讀書的環境，只要能力所及，就會營建「書屋」、「舍」、「齋」、「軒」、「菴」，成為時尚。明人認為，舉凡士志於學，必有藏脩之所與讀書之室，這是居家生活最基本的日課空間，⁸⁶對他們來說，「書屋」不僅是私人家居實體生活空間，同時也是在他們遭遇現實困窘之後，讓心靈獲得休息撫慰的心理空間。因此，文人對「書屋」裡的家具佈置、器物陳設、書籍選藏、文物典放，都是極為考究的。至於身份和文化階層歸屬的考慮，是裝點書屋的首要原則，士人階層憑藉著對這樣一種日常生活空間的刻意設計，試圖與庶民階層拉開文化上的差距。⁸⁷這些抽象的古代情境與歷史感，透過現存的古董書畫器物傳遞而來，每當文人摩挲撫觸著這些器物，同時將「書屋」營造出古代的風情，便能同時體驗到古典所含蘊的美感，分辨自己與市俗的高下。經過抉擇解釋後的古典，是完美無瑕的，文人透過重新體驗古典，詮釋古典，以期達到主體充足的美感體驗，同時寓懷古典情愫的美感追求，實際上也是對完美生命形式的追求。⁸⁸

⁸³ 吳智和，〈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以居家休閒生活為例〉，頁 153。

⁸⁴ 吳智和，〈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以居家休閒生活為例〉，頁 154。

⁸⁵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頁 280。

⁸⁶ 吳智和，〈明人居室生活流變〉（《華岡文科學報》，第 24 期，2001 年 3 月），頁 229。

⁸⁷ 韓雪巖，〈明中後期蘇州文人的書齋清玩與仿古風尚〉（《藝術設計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87。

⁸⁸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頁 283。

傳統中國的文人生活內涵極為豐富，尤其是文會生活，成為文士們日常生活中詩酒風流、書畫賞析、品騫典籍、談藝論文的交流媒介。明代的文人，大都風流自賞，重藝文而不重學術，彼此相會，或佐聲伎之好，或品書評畫，此唱彼酬，風流一時。更有許多達官顯貴，也好事風雅，往往於里居之日，以高年碩德主盟文壇，怡老崇雅，兼而有之，成為人生一種樂趣。⁸⁹此外，文人們舟遊可以讀書，宦遊亦足以購書、訪書；而訪舊參禪，更是與品味校讐、文會過從的文人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對於明代文人們這種高尚的審美情感，即使是在今日學人對於當時的文人生活方式毀譽參半的情況之下，只要一提到文人的藏書生活，通常都會給予相當高的評價。⁹⁰



第四節 明代北京私人藏書事業發展的因素

北京古代藏書事業一直以宮廷藏書為主流，官府藏書次之。然而，私人藏書在明、清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雖然藏書家大多集中在江、浙一帶，北京的藏書家較少，但自明成祖朱棣（1360-1424）遷都北京後，儼然成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經濟高度繁華，加上為全國科舉最高層級考試的所在地，士人們讀書問學和藏書活動的文化氛圍，於此十分興盛。另一方面，明代政府對刻印書籍的限制不多，以致官刻、私刻與坊刻都非常旺盛。加上中央政府經常性的賜書政策，以及北京各衙門與官宦間的贈書習俗，使得北京當時成為全國圖書相關事業的重點區域之一，無形中也帶動了圖書收藏與流通的發達，讓本地人們對於書的取得更容易、更便捷。凡此種種，都對明代北京地區藏書事業的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⁸⁹ 吳智和，〈明代蘇州社區鄉土生活史舉隅-以文人集團為例〉，收入吳智和，《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5月初版），頁24。

⁹⁰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頁370。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承襲了中國歷代統治者在建元之初訪求圖書的優良傳統，本身也非常重視政府的圖書政策與藏書事業。早在元末至正 26 年（1366）6 月，朱元璋於激烈反抗元朝統治之餘，便已有感於各地戰爭紛亂，天下之書籍恐怕佚損嚴重，日後將蒐羅不易，曾命令部下訪求古今圖籍。⁹¹《明史紀事本末》載：

（元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⁹²

洪武元年，朱元璋興師北伐。八月，大將徐達（1332-1385）攻入元大都後，即封閉宮廷府庫裡的圖籍、寶物，嚴守宮門，禁止士卒侵入，將曾經接收過宋、金遺書的秘書監等重要藏書機構所藏之圖書、儀器、版籍等物品，全都收歸明朝。《國史經籍志·序》載：「我太祖高皇帝伐燕，首命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即定燕，復詔求四方遺書。」⁹³同時，將「奎章閣」、「崇文院」之圖籍，全部運往金陵，多為宋元刻本及舊抄，此舉使明朝皇室藏書有了很好的起點。⁹⁴

太祖定都南京後，偃武修文，除接收元室藏書外，為了充實明代宮廷藏書，於洪武元年又下詔徵求民間遺書。由於政府的政令，百姓中許多愛好藏書者，紛紛獻書給朝廷。以後，中央又陸續設置「大本堂」、「弘文館」、「秘書監」、「文淵閣」、「東閣」及「華蓋殿」等機構，用來庋藏圖書。⁹⁵

太祖之後，明成祖也十分重視中央政府的藏書事業。永樂 4 年（1406），成祖曾問大學士解縉當時「文淵閣」的藏書情況。《典故紀聞》載：

成祖於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成祖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1408），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庶

⁹¹ 蕭東發，《中國官府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1 版），頁 12。

⁹²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2 月第 1 版），卷 14，頁 190。

⁹³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 12 月第 1 版），頁 1。

⁹⁴ 蕭東發，《中國官府藏書》，頁 134。

⁹⁵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 528。

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欲遺子孫，朕積書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⁹⁶

遂遣使四處購求圖書。凡有價值的，不惜重金收購，所得甚多，並將徵集到的書，都集中到了「文淵閣。」經過成祖的努力，明代中央政府的藏書已相當豐富，這從後來楊士奇編的《文淵閣書目》，可以得到印證。⁹⁷

永樂 19 年（1421）遷都北京後，成祖命「取『文淵閣』所藏古今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⁹⁸總共有一百櫃，先運至北京，稍後藏於新建的『文淵閣』。據《萬曆野獲編》載：

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貯書，每本以一部入北，時永樂十九年（1421）也。初貯在左順門北廊，至正統六年（1441）而移入「文淵閣」中。⁹⁹

當時北京「文淵閣」匯集了宋、金、元、明四代藏書，太祖、成祖所徵集的民間精藏，畢集於北京。由於帝王的重視，經過多次的徵集，明初宮廷藏書不斷豐富拓展，為保存古代典籍之精華，起了積極的作用。

古代藏書事業的各個系統之間，有著必然的、或多或少的關聯與相互影響，尤其兩大藏書系統——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之間。在藏書來源方面，官藏與私藏互相從對方獲得補充和支持。歷代戰亂或政權更迭後，大傷元氣的皇家藏書體系，往往倚賴民間眾多藏書家聚沙成塔般的支持，纔得以重振聲勢。而私家藏書，則透過獲得朝廷賜書，或借抄皇家秘閣藏書等途徑，不斷地豐富內容，擴大規模。¹⁰⁰就在皇帝及政府的積極推動下，民間開始形成了適宜藏書事業發展的社會文化氛圍。首先，經濟的發展就為藏書事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明朝自立國以後，重農

⁹⁶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卷6，頁116。

⁹⁷ 蕭東發，《中國官府藏書》，頁138。

⁹⁸ 清·龍文彬，《明會要》，卷26，頁419。

⁹⁹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月第1版），卷1，頁4。

¹⁰⁰ 蕭東發，《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頁49。

務本，修養生息，經濟持續的發展，百姓得以安居樂業。¹⁰¹尤其在中後期，社會生產獲得充份的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全國出現許多工商業繁榮的城市。作為明帝國都城的北京，更是盛況空前。從現存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典藏之《皇都積勝圖》所描繪的廣闊畫面，便可以知道明代中後期北京豐富多采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生活的面貌。¹⁰²



圖二：明·佚名，《皇都積勝圖》(局部)。¹⁰³

北京是大明帝國的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經濟十分繁榮。在《皇都積勝圖》中，大明門前的朝前市，房屋櫛比，街巷縱橫，作坊、酒樓、茶肆、店鋪、攤子點綴其間。棋盤街處處高張布棚，縱橫夾道，許許多多的買賣，萬曆進士董應舉（1557-1639）之名作〈皇都賦〉，就源於他觀賞了《皇都積勝圖》有感而發，裡面提到：

列肆霧織，蹂轂摩肩。沓沓璘璘，橫貫層駒。則有游士飄纓，任俠說劍。擊筑快心，市駿流羨。月滿青樓，仙游奇甸。角刺僧廬，浮屠隱見。五方輳集，萬貨波薦。炫目薰心，貞夫志變。¹⁰⁴

此段概括描寫成排的店肆，許多旗子迎風招展，車輛交錯，人群往來側肩而過，

¹⁰¹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54。

¹⁰² 劉蘭霞，〈明代北京盛況的真實反映-皇都積勝圖〉（《歷史教學》，1996 年第 11 期），頁 49。

¹⁰³ 圖片轉引自：翁燕珍，〈董應舉《皇都賦》與《皇都積勝圖》圖文關係研究兼《皇都積勝圖題跋》考〉（《書畫藝術學刊》，第 1 期，2010 年 12 月），頁 255。

¹⁰⁴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2 月第 1 版），卷 35，頁 7 下。

是五方買賣集散地，各地貨物如浪潮般地湧入，繁華至極。此外，賦中也提到「應接不暇，往來繽紛」，都真實的反映了明代北京的盛況。¹⁰⁵綜觀明代藏書文化歷史的發展，經濟的繁榮與藏書的興旺，有著密切的關係，一些繁華的城市和商業發達的集鎮，往往都是藏書發達的地方。所以，明代北京經濟的高度發展，正好為藏書事業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

此外，前文曾經述及朱元璋雖為農民出身，但對於全國的學校教育和文化事業，卻十分重視。他指出：「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于學校」，¹⁰⁶於是大力倡導辦學。他首先在南京創辦國子學（後改名為國子監），廣招勳臣子弟與生員人等入學，至洪武 26 年（1393）時，南京國子監已有學生 8,124 名，規模可謂不小。

到了永樂元年（1403），成祖先以原北平府學為北京國子監。遷都北京後，南京成了陪都，規制照舊，時國子監稱為「南京國子監」，北京的國子監則是真正首都的國子監。¹⁰⁷此外，明代也規定地方政府，在各地都要廣設儒學（府學、州學、縣學），鄉村也必須興辦私學、社學。整個教育就在明初皇帝的積極推動下，有了很大的發展。同時，明朝又沿襲了唐宋時期的科舉制度，以科舉取士，考試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為了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朝廷還組織專人編纂了《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標準教材，並規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¹⁰⁸意即只有透過科舉考試，才有當官的機會。由於當時每位讀書人，都希望透過科舉得到當官的機會，便使得明代的社會裡頭，散發著濃厚的讀書風氣。尤其北京為明代科舉辦理會試與殿試的重鎮，又是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的所在地，造成本地士人們讀書問學與藏書活動的文化氛圍，顯得格外濃烈。必須注意的是，一地區科舉活動的盛衰和進士人數的多寡，往往被視為該地文風與教育水準高低，一個基本而客觀的衡量指標。

¹⁰⁵ 翁燕珍，〈董應舉《皇都賦》與《皇都積勝圖》圖文關係研究兼《皇都積勝圖題跋》考〉，頁 258。

¹⁰⁶ 明·夏原吉等，《太祖實錄》（《明實錄》3，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不注出版年），卷 46，〈洪武二年冬十月辛卯條〉，頁 925。

¹⁰⁷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頁 936。

¹⁰⁸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70，〈志·選舉二〉，頁 1696。

由於明代政府對教育文化的重視，使得社會對書籍的需求大增，為圖書事業的發展，提供積極的推動作用。為充實皇家藏書和政治上的需要，太祖大力提倡刻書，鼓勵出版事業，以增加天下圖籍的數量。他除了免除書籍的賦稅，又下詔刊印四方遺書，這一類政策，對刻書事業發展影響甚大，促使刻書事業快速繁興，自然也刺激了圖書事業的發展，私人著述大幅增加，因而擴大了藏書家們的收藏範圍，使人們更容易獲取所需的圖書。同時，文化教育的發展，又引起了社會對圖書、典籍的重視，讓社會上更多的人熱衷藏書，從而擴大了藏書家隊伍。這些政策，對圖書事業都帶來極大的刺激，導致明代上上下下都以藏書為貴、刻書為榮，而賣書的坊肆，也因而隨之遍布全國。¹⁰⁹

隨著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明代刻書業日益的繁盛，刻書地區十分廣闊，胡應麟曾經說明這個現象：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¹¹⁰

依胡氏所云，明代刻書業遍布全國各地，東起浙閩，西至秦楚，南至閩粵，北至燕地，刻書之盛，「類自可觀」。¹¹¹尤其明代刻書沒有太多的政令限制，加上工價低廉，故家刻、坊刻都非常興盛，當時南京、北京、蘇州、建陽、徽州、湖州、杭州等地，皆是刻書風氣較盛的區域，當然也是家刻、坊刻事業的集中地。至於北方地區，書坊最多的地方就屬北京，對於北方的私人藏書事業來說，無疑是極為有利的條件，舉凡喜歡藏書者，皆有書可藏。¹¹²刻書家們刊刻大量的圖書典籍，除了部分用作藏書外，大部份是為了進行交流和銷售。透過縝密發達的水陸交通，以及繁華鼎盛的市場通路，各地經濟往來日益頻繁，遂使北京販書業迅速的興旺

¹⁰⁹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57。

¹¹⁰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4，〈甲部·經籍會通四〉，頁 56-57。

¹¹¹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 月第 1 版），頁 356。

¹¹²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 520。

起來。¹¹³

南、北二京，是明代書市最發達的地方。前述胡應麟曾經指出：「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閩闔也、臨安也。」明代北京地區的刻書事業雖然不如南方興盛，但因是全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交通又十分便利，透過商賈，大批的書籍便由各地運送至此，為本地藏書家在圖書徵集上，提供了主要的來源。胡應麟同時指出：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瀚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¹¹⁴

依胡氏所稱，明代北京書肆的地點多在大明門之右，禮部門外，及拱宸門之西。每當會試期間，全國舉子聚集京城，此時是書賈大量銷售圖書的極好機會，於是紛紛將書肆開列於考場之前，或是設立流動書攤。一個月後，科舉試畢，就會回歸原店。此外，京師的書肆還有一種習俗，即每年二月花朝¹¹⁵後三天，書市多移至燈市；每月初一、十五及二十五這三天，則在城隍廟設攤賣書。北京自永樂 19 年定為首都後，成為全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也是各地士子參加會試、殿試的目的地。當時北京的達官顯貴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喜歡藏書者。加上來自各地的士商名流，紛紜眾多，全國科舉精英，亦畢集於此，他們對於圖書的需求量，的確相當可觀，所以書商極多。¹¹⁶

刻書業與圖書流通業的發展，是藏書事業得以繁榮的必要條件之一。明代的私人藏書事業，與刻書、販書活動密不可分。由於明代刻書業的茂盛，使得藏書

¹¹³ 張民服，〈明清時期的私人刻書、販書及藏書活動〉（《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 年第 5 期），頁 101-102。

¹¹⁴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 4，〈甲部·經籍會通四〉，頁 56。

¹¹⁵ 明時以農曆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日為百花生日，稱花朝。見申士垚等，《中國風俗大辭典》（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1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23。

¹¹⁶ 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頁 8。

家們有書可藏，加上圖書流通業的興旺，文人學士得書更加容易、便捷，這些因素，對於明代北京藏書事業的發展，都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

另一方面，抄錄書籍亦是古代藏書家增益藏書最常用的方法，且不因雕版印刷的普遍而廢止。袁同禮（1895-1965）指出：「明人好抄書，頗重手抄本，藏書家均手自繕錄，至老不厭。」¹¹⁷藏書是抄書賴以進行的底本，而藏書家是抄書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所以，一個地區藏書家的多寡，與抄書活動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誠如前文所述，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與經濟中心，尤其當明朝都城從南京遷至北京後，歷代統治者就先後在北京修建「文淵閣」、「內閣」等藏書處所，並將南京「文淵閣」的藏書北遷。朝廷非常重視書籍，廣為搜求，加上個人進獻，藏書規模甚是巨大。同時，在京城聚集著大量的文人雅士，以及擁有一定財力和社會地位的官員和追求功名的學子，這些條件，都使得北京成為抄書活動比較繁榮的地方。¹¹⁸

北京地區的抄書活動，首先是有能力的人抄寫內閣中的藏書。內閣中藏有大量世間罕見的秘本、珍本，這些書都是藏書者競相追求的物件，想要獲得這類書，唯一的方法就是抄書。於是，一些官員像內閣大學士、中書舍人等，經常利用職務之便，進入內閣中去抄寫想要之書，甚至帶抄手或傭書進入抄寫，使得朝廷的藏書得以流布於外。例如大藏書家趙琦美（1563-1624）、錢謙益（1582-1664）、焦竑（1540-1620）等輩，都曾從官府中抄書。事實上，許多歷代的重要典籍，都是透過大量的私人手抄，才得以流傳於民間的。¹¹⁹

其次是私人之間的傳抄活動。內閣秘書一旦流傳出來，許多人便千方百計借來抄寫，使得內府藏書出現在京城的可能性更大，只要是愛書之人，遇到好書必想盡方法弄到。同時，在北京聚集了大量的文士，當中許多人也擁有豐富的藏書，慕名而來抄寫所需亦不乏其人。而在京城的文人之間，往往也喜歡交換有無，彼

¹¹⁷ 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學季刊》，第2卷第1期，1927年），頁8。

¹¹⁸ 陳佼，〈明代私人抄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5月），頁12。

¹¹⁹ 王建國，〈明代北京的民間抄書活動〉（《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頁42-43。

此互抄。¹²⁰例如明代知名藏書家楊士奇擔任翰林院編修官時，便常常到「文淵閣」去翻閱圖書，並從同僚處抄錄圖書。從楊士奇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從朝中官員手中借到大量的圖書進行抄錄，特別是在北京所抄的書籍，在其所有抄書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可以看出他對抄書的重視，也可以知道北京可抄的書非常多，抄書盛行也成為北京書籍流通的一個重要特色。¹²¹作為擁有歷代重要古籍圖書的京城，正是透過大量的私人手抄才能得以廣泛流傳。因此，明朝的圖書印刷事業雖然已經相當發達，但是許多珍貴書籍仍然得之不易，藏書家非常重視抄書，往往是以抄書作為充實藏書的重要手段。

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是一個與歷史、社會經濟、學術等各面向息息相關的文化領域。研究私家藏書史時，除了必須深入探討藏書家及其藏書活動外，尚需分析歷史的沿革與發展，以及社會經濟和科技進步、學術風氣的興盛等要素，方能掌握到藏書文化的全貌，並進一步的深入所要探討的明代北京之下有關藏書文化的諸多課題。



¹²⁰ 陳佼，《明代私人抄本研究》，頁 13。

¹²¹ 王建國，〈明代北京的民間抄書活動〉，頁 4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作為一個歷史與圖書文獻方面的課題，本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縝密的檢索歷史資料以及相關研究的各種文獻，因此，文獻的收集與分析，是本研究的重心所在。為此，本研究採用一般的歷史研究法，藉由史料的蒐集加以舉證，再利用歸納法推衍出合理的解釋與結論，相關細節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步驟

一、文獻資料的收集

本研究在資料的參考上，乃以正史、明代文集、元明清筆記史料、明清地方志、明清書目與題跋，以及古代藏書學相關論著為主。而在近人的研究成果上，舉凡有關明代的私人藏書活動、文人集團研究與文人生活文化等領域的研究文獻資料，本研究皆擬加以蒐集閱讀，作為本研究概念的啟發與參考的依據。

明人文集，是指明人集部中的別集類而言，乃文人個人畢生活動的紀錄，同時也記載當代人物往來的生活史，是研究歷史人物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在研究藏書家事蹟時，可以藉由藏書家或其友人的文集，來發掘他們的藏書事蹟、藏書心態與觀念，以及藏書活動、藏書生活等紀錄，¹²²對於本研究資料的取得，將有重要的幫助。

至於明清地方志，就掌握地方藏書家人數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史料，許多本地藏書家的藏書掌故，可在地方志中發掘出來。此外，一些傳記資料無從考查的藏書家，在方志上有時也能找到蛛絲馬跡，這對於藏書家身份的確認，起著

¹²²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頁 11-12。

很大的作用。總之，在風俗文化和地域視野的敘述當中，地方志的作用頗為重要。地方志與正史的不同之處，在更多方面地反映當地的社會生活，突出的記述地域性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¹²³這些正是地方志在社會生活史和文化史上的可貴之處，亦即從地方志上，可以探索到更多關於藏書家在藏書生活和文化上的資料。

而藏書史，是研究歷史上中國藏書現象、藏書事業以及與之有關的學術活動的學問，它發端於十九世紀後期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編輯之時，並且是在前人長期的史實記錄、史料編纂和藏書經驗總結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就明代的藏書研究而論，元、明、清的筆記小說、文集、方志、藝文志、經籍志、人物傳記、序跋、書目、藏書志與藏書記、明清以來學者撰著的藏書專著或專論等，都是研究中國古代藏書史的珍貴材料，¹²⁴對本研究來說，亦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藏書史的研究，還必須吸取多方面如中國書史、目錄學史、古代板本、分類、科學技術，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¹²⁵今人有關北京藏書史通論類的，約略有：范鳳書的《中國私家藏書史》、傅璇琮與謝灼華合著的《中國藏書通史》、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等；或是專門研究藏書家傳記資料的，如汪閻《明清蟬林輯傳》¹²⁶、楊立誠、金步瀛合著的《中國藏書家考略》¹²⁷、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劉大軍等《中國私家藏書（上）-先秦至明代》、鄭偉章與李萬健合著《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¹²⁸、李玉安與陳傳藝合著的《中國藏書家辭典》¹²⁹、梁戰與郭群一合著的《歷代藏書家辭典》¹³⁰、王河《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¹³¹等皆是。至於期刊論文部份，主要有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牛紅亮〈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王建國〈明代北京的民間抄書活動〉等。學位論文方面，主要有陳昭

¹²³ 韓養民，〈中國風俗文化與地域視野〉（《歷史研究》，1991年第5期），頁93。

¹²⁴ 王余光，《藏書四記》（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頁335。

¹²⁵ 徐雁，〈我國古代藏書實踐和藏書思想的歷史總結〉，頁60。

¹²⁶ 汪閻，《明清蟬林輯傳》（九龍：中山圖書公司，1972年12月港初版）。

¹²⁷ 楊立誠等，《中國藏書家考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10月初版）。

¹²⁸ 鄭偉章等，《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¹²⁹ 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¹³⁰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¹³¹ 王河，《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珍，《明代書坊之研究》、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等。以上所述，都是研究明代北京地區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必須參考的重要資料。

二、文獻分析歸納整理

本研究需要接觸與蒐集大量文獻史料，因此，必須計畫合適的文獻資料之整理與歸納方法。本研究收錄的史料將以藏書家為中心，首先必須整理出北京地區藏書家的數量，接著掌握每位藏書家的生存年代、活動地區、藏書事蹟、建立的藏書樓、藏書相關著作、交友情形等資料，依其內容和性質，予以分類、分析、整理與解釋。尤其是藏書家的橫向關聯，即北京藏書家之間的交遊關係，以及析論他們的集團性與社群類型。經過適當的整理歸納後，從資料中梳理出藏書家彼此之間的關係，進而瞭解明代北京藏書風氣與藏書文化成形的真實面貌。有系統的資料歸納與分類，將有助於史料分析與導出結論，是不可忽視的環節之一。

如前所述，目前有關明代藏書家的介紹，有些專著或專論已經作出條列整理，本研究將以這些資料為參考基礎，再從史料中進一步嘗試增添明代北京藏書家的人數以及藏書典故。不過，有關明代北京藏書家的專門研究十分缺乏，且羅列之明代北京藏書家的人數相當稀少。為免有所遺漏，本文擬採取地毯式的蒐集方式，逐字閱讀相關史料，仔細查驗明代北京文士當中有無藏書事蹟的記載。歷史研究與一般社會研究相比，許多時候無法取得實際調查數據，因此，更加需要研究者細心的從眾多資料的字裡行間中，尋找與主題相關的重要線索。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本研究藉由史料的蒐集加以舉證，再利用歸納法推衍出合理的結論。誠如唐逸所言，如果將人的行為視為一系列語言陳述所表達的取捨抉擇，並視此為文本，則已設定一種可觀察、可驗證的文化研究之對象。而觀察、研究之方法，便是分析與詮釋。分析詮釋的方法，並非唯一，亦不必為最佳之研究文化的方法，但卻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方式。其邏輯之自律，方法之嚴縝，並不逮於自然科學，但並不以預測、控制對象為目的。¹³²這說明了文獻資料的蒐集、歸類與整理，固然需要細心，然於進行歷史研究，要從資料中加以詮釋時，更不可因較接觸不到科學實驗或調查方法得出的數據資料，而對資料詮釋粗心大意。反而是更需要冷靜的觀察與理性的思考，才能連貫眾多的史料，找出研究課題的解答。

二、文獻分析法

將論文蒐集得來的文獻資料，依其資料內容及性質，予以分類、解析及整理。從古代典籍產生，以至明代圖書的盛行，舉凡與書籍典藏相關的概念、成因、背景，或板刻、藏書管理，以及傳布流通等命題，皆在探討範圍之列。最後，再將論文相關資料，按明代主要藏書體系類分之。先就資料彙整，再針對藏書活動的發展狀況加以整理，最後將明代北京私人藏書情況，提出系統性的論述。

此外，在藏書家的資料中，亦有一些量化的資料，例如北京藏書家人數的統計、北京藏書家的藏書量、北京轄下各州縣藏書家的分佈狀況、藏書家的家世或出身背景調查統計等。這些資料經過分析，就能透過統計方法進行處理，從而導出一些新發現。所以，在研究進行中，筆者不排除將搭配使用一些統計的方法，並依照抽樣調查的原則，對北京地區藏書家各種文化現象的量化資料，進行觀察、分析、總結與推論，再以這些方式得出的結果，作為本研究中解釋歷史現象的依據。

¹³² 唐逸，〈文化研究方法論〉（《學術月刊》，1998年第2期），頁80。

第四章 明代北京的藏書家

明太祖建國之初，百廢待舉。在政治上，面對元末群雄割據後的分裂局面，人心未定；在經濟上，面對農業凋敝，工商衰頹，以及重新整建的難題；在吏治上，面對官僚腐敗，民不聊生，必須先進行組織改造，並採取肅貪嚴懲的鐵腕政策；而在教育文化上，人才的選拔與圖書事業的促進等，都有待重整。¹³³因此，在太祖的全盤規劃與推行之下，明朝 276 年的藏書文化，其實與政治、社會經濟及學術文化等各種因素，都有密切的關係。而在新政府一連串政策的鼓勵，以及經濟的復甦與快速成長，加上社會日趨穩定、交通便利、文化教育事業的持續推廣等諸多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使得私家藏書事業得以在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的兩大社會背景支持下，迅速地發展起來。¹³⁴

然而，北方因為年年戰事，歷來又多政治與軍事的重鎮，使得藏書家的數量，無法與經濟、文化繁榮，科舉發達，名宦輩出，又有濃厚的讀書、著書與藏書風氣的南方相比，於整個圖書事業上，出現了南北差異的現象。雖然如此，由於明成祖的遷都北京，進而也帶動了北京的政治、文化、經濟、教育等各方面事業與活動的繁榮，使得明初南北差異的現象獲得改善，當然，也包括了圖書事業。根據筆者從史料中仔細的檢出，明代北京八府具有藏書事蹟的記載者，約略有 130 位。如前文所述，為求區域藏書文化的完整呈現，當中收錄的藏書家包含生於元末卒於明初，以及生於明末卒於清初者；同時，還包含一些兼及癖好書畫、金石碑拓的收藏家，此乃基於明人對於「藏書」的內涵與界定相當模糊，考諸明代史料所載，很多例子其實都涵蓋了同時收藏典籍、金石遺文、法書名畫，甚至其他不同類型的文獻載體，卻都被總稱為收藏「圖籍」。¹³⁵正是因為明代不少酷愛藏書的藏書家們，也喜愛收藏書畫、古董，使得藏書家兼收其他文物的行為，成為一時的風尚，這是明代藏書活動的一大特色。¹³⁶因此，只要與此相關的藏書事蹟，

¹³³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頁 40。

¹³⁴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頁 165。

¹³⁵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頁 124。

¹³⁶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頁 668-669。

筆者都一併列入。

至於本章藏書家的排列方式，首先按八府加以區分羅列，然後再依卒年先後為序，由遠而近，涵蓋元末清初。若卒年無考，再按生年為序；若生卒年均不知，則依科舉年代先後排列，先進士，次舉人，再次為監生、貢生、生員、薦舉等。而若是科舉年代亦不詳，則再按生平約略的活動時間，訂定先後。最後，如其生卒年、科舉、活動時間均無從探知者，則置於各府的最後。

第一節 順天、永平二府的藏書家



1. 徐本（生卒年不詳）

字以道，姑蘇人，居京師，寓順天府。嘗出入楊榮（1371-1440）之門，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年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¹³⁷

2. 賈信（1361 -1430）

字中采，永清縣人。賈用季子也。元至正中，師事固安王騏，有志聖賢之學，凡禮樂、名數、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皆熟究之。「好書，每事他出，

¹³⁷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人物志 24，〈徐本〉，頁 5506。

必以書冊自隨，遇佳山水，輒徘徊終日。善詩，尤工書法。宣德 5 年（1430）卒，年七十歲。兄子琳。」¹³⁸

3. 杜宥（1415-1469）

字叔寬，江陰縣籍，僑寓霸州。登景泰 5 年（1454）進士，授監察御史，謫海南典史。英宗復辟，遷英德知縣，仕至韶州通判，謝病歸，卒年五十五。¹³⁹其友常熟縣文人錢籍（1500-1585），曾經作詩形容其齋居藏書而贈之，詩云：「小齋揭取慎為名，一顧九迴成戒勗，端居兀坐常惺惺，盤盂戶牖皆箴銘，囂塵穢莽總萬變，不使纖埃染性靈，規行矩步有常處，勿以近思遺遠慮，遊神千古希彥曾，三省四勿如面語，言須顧行行顧言，忠信篤敬參吾前，靈臺不出腔子外，坐令萬籟皆翛然，齋兮齋兮虛且白，近取諸身自題額，操存在我在不人，方信吾心是安宅，焚香閱道如有臨，會得先賢清獻心，閑中今古付吟弄，內養工夫在靜深，慎齋之中何所有，琴書圖冊列前後，左經右史百牙籤，時與聖賢相聚首，慎齋之外何所見，周蓮陶菊清芬薦。」¹⁴⁰



4. 費閻（1436-1493）

字廷言，號補菴，丹徒籍，僑寓順天府。成化 5 年（1469）會試第一，授編修，遷國子司業，官至禮部右侍郎，卒年五十八。¹⁴¹「歲丁酉（成化 13 年，1477）春，京口費先生，由翰林編脩遷國子司業。惟時，會重脩國子監，殿當門廡，煥然改觀。而堂之背，為司業署者舊矣，先生因葺而新之，為書屋若干楹，南方臨

¹³⁸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7，〈賈信〉，頁 4605。

¹³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188。

¹⁴⁰ 劉延昌等，《霸縣新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13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據民國 23 年鉛印本印），卷 8，〈慎齋行贈杜江陰〉，頁 46 上。

¹⁴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668。

諸生，已則委蛇其中焉。屋之位南，南方在先天，卦位為乾，在後天之卦位為離，蓋陽位也，故其屋以『向陽』之名也，而日者陽之宗，君之象，向平陽，即向乎君矣，此向陽之所以名也。不曰：『向君』，而曰：『向陽』者，何也？君之清光，不得非時密邇，而日則往來於屋，朝夕與之，俱有忠受之誠者，而乎曰：『必能心乎，君也。』屋之中無尤物焉，聚書千餘卷，先生於是書，譬之河海然，既已涉其流，而探其源。」¹⁴²

5. 邱濬（1421-1495）

字仲深，瓊山縣人，僑寓順天府。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 5 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習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¹⁴³時人傳云：「弘治 8 年（1495）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於位。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准（1441-？）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袞袞不休。……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¹⁴⁴

6. 頓銳（生卒年不詳）

字叔養，號鷗汀，涿州人。生而好閑靜，愛林泉水石之處，嘗遊范城西溪，

¹⁴² 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 34 年吳遵之刻本影印），卷 8，〈向陽書屋記〉，頁 2 下-4 上。

¹⁴³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181，〈列傳·邱濬〉，頁 4808。

¹⁴⁴ 明·黃瑜，《雙槐歲鈔》（《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1 版），頁 221。

見群鷗於洲渚之上，而心悅之，遂曰：「鷗汀世為六安人」。公性不好居市廛，幼即終日持書帙。正德 5 年（1510），舉鄉試第七人，明年（1511），賜進士第，時年二十有三，聲望傾動都下。初授高淳令，蒞政廉直，聲稱鬱然，官至戶部主事。公雅性山林，不樂仕進，以疾乞歸，卜築於郡西之懷玉山，罕及城市，杜門謝客，益大肆力於學，嗜學之心，老而不倦。晚年林下，聲望轉重，凡縉紳過涿者，無論識與不識，咸訪視之。所著有《鷗汀集》、《別集》、《漁嘯集》、《頓詩》、《涿鹿先賢傳》凡五，刻行於世。致仕「家居，山水、圖書，日坐其中。」¹⁴⁵

7. 高儒（生卒年不詳）

字子醇，自號百川子，涿州人。嘉靖間，為兵部下屬武官。喜文翰，嗜詩文，富藏書，以六年之功，整理編次家中藏書，終於在嘉靖 19 年，撰成《百川書志》20 卷，¹⁴⁶以是《居易錄》載：「涿州高儒者，武弁也，家多藏書，有《百川書目》。」¹⁴⁷高儒自稱：「昔有萬軸之藏，於今奚乏崇文博古之流也。聖朝積書高士、名賢，一時非富而好禮、貴而志道，莫能也。予遭際文明之運，叨承祖蔭，致身武弁，素餐無補，日恐流於污下，蓋聞至樂莫逾讀書。典籍流散，見遇人間者，不校乏力，故雖贏賣之厚聚非一日，雖有萬軸之儲，讀可一時乎？此重積書之功，書目所由作也。書無目，猶兵無統馭，政無教令，聚散無稽矣。閒居，啓先世之藏，發數年之積，不啻萬卷，各以類從，少著大意，條目昭明。一覽之餘，仰見千載，聖賢用心之確，非擅虛名，實資自勵。庶慰先人教子之心，以逭聚散不常之誥也。」

148

¹⁴⁵ 宋大章等，《涿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13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據民國 25 年鉛印本影印），卷 1，〈中憲大夫代府右長史前戶部員外郎頓公墓誌銘〉，頁 49 上-頁 50 下。

¹⁴⁶ 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高儒〉，頁 128。

¹⁴⁷ 清·王士禎等，《居易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6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卷 16，頁 18 下。

¹⁴⁸ 明·高儒，《百川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19，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初版，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序，〈百川書志序〉，頁 1 上-下。

8. 王希烈（?-1577）

江西南昌籍，寓居密雲縣。中嘉靖 32 年進士，歷官侍讀學士、國子監祭酒，官至禮部侍郎。¹⁴⁹任官國子監時，於「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昔所有者，擴而新之。名宦鄉賢之祠，宿省牲之所，藏書置器之庫，昔所無者，增而創之。」¹⁵⁰

9. 李景登（生卒年不詳）

字瀛洲，遼東廣寧縣籍，僑寓寶坻縣。中萬曆 20 年進士，官寶坻縣知縣時，「捐俸購書，造『尊經閣』，開登瀛書院，一時才雋畢出。後修城隍廟，祝云：『予無瀆於神，神尚祐民。』在治數年，其節介。陞戶部，行李蕭然，父老借寇，無繇建祠，肖像祀之，崇禎 9 年，民思舊德，懇入名宦，去任蓋四十年矣。子永昌，歲貢，適為縣教諭，著聲，署縣事，屢禽刻盜，威惠大行。」¹⁵¹

10. 袁黃（1533-1606）

一字了凡，吳江縣籍，僑寓寶坻縣。萬曆 14 年（1586）成進士，知寶坻縣，有善政，累官至兵部主事。¹⁵²清介自持，致仕歸里，「其囊橐一空，而書則不止五車。」¹⁵³

¹⁴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34。

¹⁵⁰ 臧理臣等，《密雲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北京府縣志輯 6，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卷 7 之 1，〈王希烈〉，頁 14 上。

¹⁵¹ 清·萬青黎，《順天府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第 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卷 73，〈李景登〉，頁 40 下。

¹⁵²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426。

¹⁵³ 清·洪肇楙等，《寶坻縣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第 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1. 張維 (1534-1613)

號範吾，霸州人。宦官，嘉靖 38 年 (1559) 選人，隸秉筆高忠名下。幼博學好書，萬曆初，官至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役局印。時內臣諸人頗妬其才，然維處之泰然，「遂益哀法書、秘笈，書不釋手，夜自篝燈咿唔，少倦，仍默看至丙夜方寢；雞甫鳴，則復興矣。晚年兩目盲，尚能寫行草。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年。至萬曆 41 年夏卒，年八十。著有《皇華集》、《歸來篇》、《莫金山人集》、《蒼雪齋集》等書。」¹⁵⁴

12. 王圖永 (生卒年不詳)

字甯寰，大城縣人。父紹堯，隆慶 3 年 (1569) 拔貢生，知汶上縣，有惠政。圖永幼英敏，補弟子員，每試必冠軍，數赴秋闈，幾售而復落者屢，官至南尉民縣訓導，畢生講誦不輟。¹⁵⁵「一味澹泊，出其俸金，羅古今書籍。日事遊詠，下筆千萬言，宏博奧衍，見之者以為漢人文章，六朝以下不及也，恆為輦下諸名公所獎籍，比之服虔文中之流。無何，以耆老未得大展其蘊，抱惜哉。」¹⁵⁶

13. 秦士奇 (生卒年不詳)

字公庸，山東金鄉縣籍，僑寓固安縣。天啓 5 年 (1625) 進士，初任崑山縣

2002 年第 1 版，)，卷 17，〈袁侯德政碑〉，頁 49 下。

¹⁵⁴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15，〈張維〉，頁 5092-5093。

¹⁵⁵ 清·趙炳文等，《大城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2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光緒 23 年刻本影印，卷 9 上，〈王圖永傳〉，頁 1 下。

¹⁵⁶ 清·趙炳文等，《大城縣志》，卷 9 上，〈王甯寰傳〉，頁 57 上。

令，改獲鹿縣，仕終順天府固安知縣。致仕歸時，「囊橐蕭然，止圖書盈篋而已。」

157

14. 米萬鍾 (1570-1628)

字仲詔，宛平縣人。萬曆 23 年 (1595) 進士，授永寧縣知縣，改銅梁縣，調六合縣，旋入為大理評事，累由戶部郎，歷陞至江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工書，與董其昌齊名，時稱「南董北米」。崇禎初，官至太僕少卿，卒於任。¹⁵⁸「其父癖于好石，富于藏書，工書與畫，仲詔無不相當。」¹⁵⁹

15. 田太監 (?-1644)

佚其名，籍貫不詳，寓居順天府。《甲申傳信錄》載：「田太監，亡其名，住白塔寺後。三月十九日自縊，命僕卷其橐以逃，餘書籍、花盆在焉。後楊士聰 (1567-1648) 居之，覽其中，書多寫冊，亦有手錄者。」¹⁶⁰

16. 李碩 (生卒年不詳)

大興縣人。子李經國 (1607-1658)，字彝卿，號頤庵，「為兒童時，放逸好弄，

¹⁵⁷ 清·錢仲仁等，《固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2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民國 31 年鉛印本影印)，卷 3，〈秦士奇〉，頁 28 下-29 上。

¹⁵⁸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8，〈米萬鍾〉，頁 4680-4681。

¹⁵⁹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5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 39 年刻本(卷十卷八十一卷九十三配鈔本)影印)，卷 21，〈米仲詔詩序〉，頁 12 上。

¹⁶⁰ 清·朱一新等，《京師坊巷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21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年，據民國 7 年南林劉氏求恕齋刊本影印)，卷 5，〈阜成門大街〉，頁 18 上-19 下。

其父碩困之樓中，累日夜不得出，乃玩其樓所藏書，漸為文，有奇患。碩異之，授以經、史、左、國，秦、漢諸大家文。……甲申（崇禎 17 年），寇陷京師，携家人蘇門，與孫奇逢講宋、明之學，潛心性理諸書，手抄成帙。」¹⁶¹

17. 鞏永固（?-1644）

字洪圖，大興縣人。尚樂安公主，爵駙馬都督。善騎射，好詩，工書。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游，慷慨多大節。「性喜讀書，御史李清（1602-1683）過書肆，見《皇明泳化篇》，命易歸。書客故高其價，李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曰：『鞏駙馬易去矣。』李心識之，曰：『駙馬皆豪華自喜，渠所好乃爾耶？』」¹⁶²明亡時，「盡取所賜物，古玩書畫，環繞（公主）殯宮」，¹⁶³自縊殉國。

18. 紀元（生卒年不詳）

字季愷，號子湘，文安縣人。順治 12 年（1655）進士，初任杭州推官，移江南徐州河防同知，陞湖廣漢陽府知府，改陝西鞏昌府知府。「元招徠有法，始漸次復業，修整學宮，講明祀典，博求遺籍，其士人彬彬多文學之風焉。元平生慷慨好施予，遇事敢言，無所迴互，批詳導窾，動中機宜，以故所至，上臺加器重。然亦以才為人所忌，又性疏直，不能闞媚趨時，故蹙而起，起而復蹙以卒。有《卧游山房稿》。」¹⁶⁴

¹⁶¹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清代傳記叢刊》199，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10，〈李經國〉，頁 14 下-15 下。

¹⁶²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15，〈鞏永固〉，頁 4703。

¹⁶³ 清·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明代傳記叢刊》54，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初版），卷 93，〈都尉鞏貞愷公永固〉，頁 3 下。

¹⁶⁴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10，〈紀元〉，頁 4799-4801。

19. 陳協 (1608-1663)

字念盡，文安縣人。順治 3 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戶科給事中，遷禮科，陞工科都給事中，官至戶部右侍郎。¹⁶⁵究心當代掌故，「篤愛墳典，有皇甫士安癖，每念先世積書萬軸多散佚，乃自六籍百家，及醫藥、卜算、山劓碑篆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冰，樂此不為疲也。」¹⁶⁶

20. 孫承澤 (1592-1676)

字北海，號退谷，大興縣人。崇禎 4 年 (1631) 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耄而好學，讀書日有程課。著述滿家，於史事多所論述，而有明一代典故，尤瞭如指掌。所著《五經翼》，考正朱子晚年定論諸書，皆有功於正學。「至於精博古鑒，一時圖書之富，比之宋田氏雲。康熙十五年 (1676) 卒，賜祭葬如例。」¹⁶⁷時人王弘 (1622-1702) 指稱：「京師收藏之富，無有過於孫少宰退谷者。蓋大內之物，經亂後皆散逸民間。退谷家京師，又善鑒，故奇蹟祕翫咸歸焉。予每詣之，退谷必出示數物，留坐竟日。肴蔬不過丕簋，酒不過三四巡，所用皆前代器，頗有古人真率之風。凡予所談論，退谷輒喜，以為與己合。唯於王文成已甚之詞，予不然之。時方構『秋水軒』，以著述自娛，其扁聯皆屬予書。年已七十有八，手不釋卷，窮經博古，老而彌篤，近今以來，所未有也。」¹⁶⁸

¹⁶⁵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3，〈陳協〉，頁 14 下-16 上。

¹⁶⁶ 清·李蘭增等，《文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29，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民國 11 年(1922)鉛印本影印），卷 9，〈邢紫淵孝行叙〉，頁 4 下-5 上。

¹⁶⁷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15，〈孫承澤〉，頁 5096-5097。

¹⁶⁸ 明·王弘，《山志》（《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1 版），卷 1，〈孫少宰〉，頁 21-22。

21. 王崇簡 (1602-1678)

字敬哉，卒諡文貞，宛平縣人。崇禎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著有《青箱堂集》。家藏秘本甚多，藏書室名「青箱堂」，有「宛平王氏家藏」等藏書印記。¹⁶⁹《善本書室藏書志》載：「《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成化刊本，宛平王氏藏本。……有『宛平王氏家藏』、『慕齋監定』，及『重遠書樓』、『鳴野山房』諸印。宛平王氏者，王文貞公藏書印記也。文貞諱崇簡，字敬哉，宛平人，官至禮部尚書，有《青箱堂集》。子熙（1628-1703），字子雍，號胥庭，順治四年（1647）進士，歷官保和殿大學士加少傅，諡文靖。父子同官尚書，古今所少，海內榮之。家藏秘本甚多。」¹⁷⁰

22. 王熙 (1628-1703)

字子雍，一字胥庭，號慕齋，宛平縣人。王崇簡子，中順治4年進士，選授國史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累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熙承繼其父藏書，家藏秘本甚多，多鈐有「宛平王氏家藏」，有藏書室名「慕齋」。¹⁷¹《善本書室藏書志》載：「《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成化刊本，宛平王氏藏本。……有『宛平王氏家藏』、『慕齋監定』，及『重遠書樓』、『鳴野山房』諸印。宛平王氏者，王文貞公藏書印記也。文貞諱崇簡，字敬哉，宛平人，官至禮部尚書，有《青箱堂集》。子熙（1628-1703），字子雍，號胥庭，順治四年進士，歷官保和殿大學士加少傅，諡文靖。父子同官尚書，古今所少，海內榮之。家藏秘本甚多。」

¹⁶⁹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王崇簡〉，頁44。

¹⁷⁰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初版），卷26，〈王崇簡〉，頁19下。

¹⁷¹ 王河，《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王熙〉，頁19。

23. 魏編 (1621-1720)

字君處，豐潤縣人。「逾九十不釋卷，抄古書細字，日猶數幅，夙興夜臥有常候。子濬，年七十一，工色養，父子肩隨，倚杖臨風，望若圖畫。年正百齡，康熙五十九年（1720）瞑而逝。」¹⁷²

24. 崔周田 (生卒年不詳)

字錫齡，寶坻縣人。順治歲貢。「性嗜書，嘗建一樓，聚古本及金石刻萬卷藏之，終日吟蕭其中。」¹⁷³

25. 郝鴻猷 (生卒年不詳)

字勳甫，霸州人。其先由晉徙霸，遂成鼎族。父智菴公，樂善好施，不深識文義。先生有夙慧，成童即能古文辭，每試有司，輒臣其曹伍，江北制舉之業，率問津帖括蹄祝逢年，自詡已足。「先生日取先秦兩漢，以及唐末名家金匱、石渠之文，謀野藏山之記，無不手自抄寫，沉酣枕籍於其中。……所著《俗訓摘義》等書。」¹⁷⁴

26. 張儒 (生卒年不詳)

¹⁷² 清·牛昶煦等，《豐潤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15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清光緒 17 年修民國 10 年重印本影印），卷 3，〈魏編〉，頁 453-454。

¹⁷³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10，〈崔周田〉，頁 4794。

¹⁷⁴ 清·朱廷梅，《霸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26，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康熙 13 年刻本影印），卷 9，〈郝鴻猷〉，頁 22 下-25 下。

字采臣，號九峰，玉田縣人。生而穎異，能為古文詞。「家貧不能得書，遍借親友藝文，旋抄旋記，寒暑不輟。登庚午鄉書，判衛輝府，教民諄切俗用。……居家孝友，誨迪不倦，鄉里重之，所著有《九峰集》。」¹⁷⁵

27. 陶圻（生卒年不詳）

江西彭澤縣籍，僑寓大城縣。生有雋才，讀書淹貫古今，不拘拘於俗學，道學文章，兼擅其美，一時人多矜式之。弘治中，訓導大城，日以正己率人為先，務絕請託，杜夤緣。「置書數萬卷，浸灌其中，終日不釋卷，凡有所得，必身體而力行之。論議高古，氣度宏遠，雖居冷宦，衣食不豐，泊如也。」¹⁷⁶

28. 魯雲程（生卒年不詳）

號仁我，豐潤縣人。勸儉治家，慷慨好義。「積書萬卷，教子文龍、文鵬有成，後嗣均能世守其教，稱邑大家焉。」¹⁷⁷

29. 李紳（生卒年不詳）

¹⁷⁵ 清·王光謨，《玉田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21，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20年刻本影印），卷6，〈張儒〉，頁6下。

¹⁷⁶ 清·趙炳文等，《大城縣志》，卷7，〈陶圻傳〉，頁24下-25上。

¹⁷⁷ 清·牛昶煦等，《豐潤縣志》，不著卷數，〈魯雲程〉，頁470。

字晉卿，順天府人。官行人，數奉使，足跡遍天下，聞見益博。考最，遷戶部員外郎，陞光祿寺少卿，會考核京官，為忌者所中，調外。三疏引歸。嗜讀書，「閒多蓄道書，手錄至盈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¹⁷⁸

30. 郭文輔（生卒年不詳）

字共臣，宛平縣人。舉進士，授行人，改授御史，仕至戶部主事。罷歸後，「家更貧困，至不聊生，徒自肆於學，無所不窺。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¹⁷⁹

31. 陳良瑛（生卒年不詳）

字孟修，文安縣人。隱德君子也，少補博士弟子，性聰敏。「家有樓三楹，皆貯書，日取讀之，每日積帙至寸乃罷。既成誦，遂不復收拾，多為人取去，故人謂公受訟四年，萬金之產盡；讀書三十年，萬卷之書亦盡云。……年八十二，無疾卒。」¹⁸⁰



32. 馮滄州（生卒年不詳）

字仲纓，順天府人。《士禮居題跋記》載《東國史略》，云蘇州藏書家趙琦美稱：「錄於燕京馮滄洲仲纓家，必是舊本。」¹⁸¹

¹⁷⁸ 王養濂等，《宛平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北京府縣志輯 5，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卷 15，〈李紳〉，頁 51 下-52 上。

¹⁷⁹ 明·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 34，〈郭文輔〉，頁 471。

¹⁸⁰ 清·李蘭增等，《文安縣志》，卷 9，〈陳封君傳〉，頁 15 下-16 下。

¹⁸¹ 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古書題跋叢刊》8，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 1 版，據光緒十年吳縣潘祖蔭滂喜齋朱印本影印），跋，〈東國史略六卷〉，頁 31 上。

33. 李維柱（生卒年不詳）

字本石，順天府人。好藏書，嘗曰：「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¹⁸²

34. 紀克揚（生卒年不詳）

字令聞，號六息，文安縣人。嗜讀書，善屬文，棋藝登逸品，諸陰陽象緯、卜筮占風、岐黃之術，無不諳究，以至釋典道家之言，多所訓詁。「構別業三楹，陳列圖書，與三子坐卧其中。……著述甚富，兵燹散佚。所存《麗軒文集論稿》、《四書易經注解》。」¹⁸³曰「唯携圖書數千卷，……恬然自處，益肆力墳籍，琴歌娛志，契參同，追琢於建安、元嘉之間；與瓦橋馬東航、新城王申之詩文往來。」

184

35. 秦宣（生卒年不詳）

字克正，號崇古山人，涿州人。家武清河西務，厭其地多舶販，乃移家於涿，門臨塘水，蓬戶竹籬，宅不盈畝，而禽魚樹石俱佳。「圖書几榻，環列其間，……殷宮保謙（1417-1504）家居，不接俗人，惟日與宣弄琴、啜茗、品鑒書畫。……宣古貌長髯，清臞有骨力，詩文書畫，靡弗精詣，高韻簡致，人爭重之。年至九

¹⁸² 清·于敏中等，《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2，頁6上。

¹⁸³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15，〈紀克揚〉，頁4695-4696。

¹⁸⁴ 陳楨等，《文安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5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民國11年鉛印本影印），卷9，〈贈中憲紀六息傳〉，頁706。

十而終。」¹⁸⁵

36. 方九敘

字承天，籍貫不詳，僑寓順天府。少慕於古，冀託不朽；長與海內諸名家倡和，甚有稱。「多購羣書，勤為士子講析；比行，羣下泣送載路。官至承天太守，天性毅直，屢忤鉅璫，罷歸，益討故業。易綺麗人，沖雅為人，高朗善論事；才不究用，咸惜之。所著有《方承天遺稿》。」¹⁸⁶

37. 孜化民（生卒年不詳）

順天府人。累官至太常寺卿。致仕歸里時，「囊橐蕭然，惟圖書數車。」¹⁸⁷

表 4-1：《明代北京轄下順天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順天府	9
宛平縣	4
文安縣	4
豐潤縣	2
涿州	3
寶坻縣	3
大興縣	3
霸州	3
大城縣	2

¹⁸⁵ 宋大章等，《涿縣志》，卷 3，〈秦宣〉，頁 589。

¹⁸⁶ 明·聶心湯，《錢塘縣志》（《叢書集成續編》史部 4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7 月臺一版，據武林叢書本影印），卷 10，〈紀獻〉，頁 22 上。

¹⁸⁷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官師志 2，〈孜化民〉，頁 2661。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固安縣	1
玉田縣	1
永清縣	1
密雲縣	1
總計	37

二、永平府

1. 趙得祐（生卒年不詳）

字元吉，盧龍縣人。嘉靖 2 年（1523）進士，授御史，巡按應天，糾劾輔臣，群黨側目。陞貴州僉事，調遼東，官至陝西行太僕寺卿，以丁內艱致仕，得祐歷官二十七年，「以清介終始焉，年七十三卒。」¹⁸⁸「林居泊然如書生時，其勤，仍下帷枕席皆典籍也。」¹⁸⁹



2. 韓應庚（生卒年不詳）

字希白，盧龍縣人。萬曆 5 年（1577）進士，授彰德府推官，官至福建道御史，年四十七，即引疾歸，日與親故徜徉山水間。「於南二十里石磯上築室，名：『釣台』，以圖書、花鳥自娛。」¹⁹⁰

¹⁸⁸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33。

¹⁸⁹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114，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初版），卷 104，〈陝西行太僕寺卿趙得祐傳〉，頁 1 下。

¹⁹⁰ 董天華，《盧龍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20，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民國 20 年鉛印本影印），卷 18，〈韓應庚〉，頁 4 上。

3. 王好問 (1517-1582)

字裕卿，號西塘，樂亭縣人。嘉靖 29 年進士，除太常博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萬曆 10 年 (1582) 卒，年六十六。著有《眷煦齋集》。¹⁹¹居官清廉，「卒之日，衣才數襲，書千餘卷而已。」¹⁹²

4. 倫浹 (生卒年不詳)

字元谷，灤州縣人。州廩生，澹永凝秀，規步昌黎 (韓愈，768-824)、次山 (元結，719-772)。應試，八躋棘闈，以諸生卒，貶封御史。所著有《元谷子》一冊，祀鄉賢。「癖嗜典籍，寢饋沈酣，尤精濂洛性理之學，為詞賦古文。」¹⁹³

5. 邵可立 (1556-1626)

陝西商州籍，寓居永平府。進士，萬曆 36 年 (1608) 時，官山海兵部分司，廉直剛斷，加意人文。「建文昌書院，購古今遺書充之，俊彥鼓篋其中，一時稱盛。」¹⁹⁴

¹⁹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31。

¹⁹²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 63，〈王司徒家傳〉，頁 33 上。

¹⁹³ 清·楊文鼎等，《灤州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22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年臺 1 版，據清光緒 24 年刊本影印)，卷 16，〈倫浹〉，頁 12 下。

¹⁹⁴ 清·史夢蘭，《永平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19，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光緒 5 年敬勝書院刻本影印)，卷 52，〈邵可立〉，頁 25 下。

表 4-2：《明代北京轄下永平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盧龍縣	2
永平府	1
樂亭縣	1
灤州	1
總計	5

第二節 保定、河間二府的藏書家

一、保定府

1. 邵錫（生卒年不詳）

字天佑，號石峰，安州人。正德 3 年（1508）進士，授行人，擢吏科給事中，歷任浙江參政，山東布政史等職。居官三十年，清介自持，始終不論。「家無中人之產，祇有圖書數箱而已，卒祀本府及本州。」¹⁹⁵時人謂其：「富有盈箱書五車，里人至今傳誦。……生平性耽經史，手不釋卷，所著有《石峰文集》、《綱目總類》、《大學衍義補摘抄》諸書，以及《諫垣實台疏稿》若干卷，藏于家。」¹⁹⁶

¹⁹⁵ 清·彭定澤，《安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34，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天津圖書館藏清道光 26 年修抄本影印），卷 8，〈邵錫〉，頁 5 上。

¹⁹⁶ 清·彭定澤，《安州志》，卷 18，〈明都御史邵公傳〉，頁 10 下-11 上。

2. 宋登（生卒年不詳）

字子瀛，定興縣人。年十二，通《春秋》胡傳，登嘉靖 29 年（1550）進士，擢兵部主事，累遷數職。致仕時，瀕行，羸俸百金，盡付學宮，曰：「興學造子，予素心也。」「歸裝僅圖書萬卷而已，年三十，卒於官邸。」¹⁹⁷

3. 張立愛（生卒年不詳）

字伯元，深澤縣人。萬曆元年（1573）舉於鄉，8 年（1580）成進士，授太平府司理，官至山西司郎中。「年四十有四，卒之日，囊無餘貲，惟圖書滿架而已。……嘗築『萬卷樓』，藏書甚富，以遺子孫。」¹⁹⁸

4. 孟化鯉（1545-1597）

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縣人。萬曆 8 年（1580）進士，歷戶部主事、文選郎中，清白自持，不苟權貴。卒年五十二，著有《孟叔龍集》。¹⁹⁹「寒暑風雨之序，即種竹移花，呼朋招友，詩酒交懽，流連光景，如文人曠士所戀戀而不能釋者，亦水淡而雲輕。每坐一室，取六經、四子、諸氏百家朗咏，沉思而隨閱隨契隨筆，若不知老之將至。其他過客之造訪，姍黨之宴會，世情以為必不能已也。」

200

¹⁹⁷ 清·李培祐等，《保定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3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光緒 7 年修 12 年刻本影印），卷 53，〈宋登〉，頁 28 下。

¹⁹⁸ 清·張衍壽等，《深澤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咸豐 10 年修，同治元年刻本影印），卷 8，〈張立愛〉，頁 13 下-14 下。

¹⁹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 年元月初版），頁 282。

²⁰⁰ 明·王以悟，《王愷所先生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間（1621-1627）洛陽王氏重刊本），卷 7，〈祭雲浦先師〉，頁 18 上-下。

5. 邢雲路（生卒年不詳）

字士登，安肅縣人。萬曆 8 年（1580）年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有《古今律曆考》、《戊申立春考證》、《邢澤宇詩集》、《山寨吟》。²⁰¹「生平獎善匿瑕，好以詩酒自娛。及歿，四壁圖書而已」²⁰²

6. 馬維禎（1568-?）

字開美，號西室，雄縣人。鴻臚署丞出圖伯子也，為人近古好學，甘於貧困。年十三入邑庠，萬曆 26 年（1598），年三十一，選貢於廷，游太學，期滿不而筮仕。「其後，姻家郭存謙為文選副郎，掌選事，或謂維禎謁部可得美官，答曰：『吾成進士，而後入官，子何小我也！』廣讀異書，深搜內典，構精舍，顏曰：『印可堂』。」²⁰³

7. 許倜（生卒年不詳）

字符适，高陽縣人。天啓元年（1621）舉人，三任邑令，擢徽州府同知。順治初（1644），補山西繁峙縣，官至刑部主事，未任歸，年八十卒於家。「公故里遺書數十種，板藏學宮，歲久多殘闕，君捐俸重梓。」²⁰⁴

8. 王維誠（生卒年不詳）

²⁰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34。

²⁰² 清·李培祐等，《保定府志》，卷 43，〈邢雲路墓在安肅縣東八里雲路官按察使〉，頁 21 上。

²⁰³ 秦廷秀等，《雄縣新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218，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年，據民國 18 年鉛字本影印），第 5 冊，〈馬維禎〉，頁 54 下-55 上。

²⁰⁴ 李曉冷等，《高陽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3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民國 22 年鉛印本影印），卷 4，〈許倜〉，頁 9 上。

號悔菴，新城縣人，崇禎 3 年（1630）舉人，由任縣教諭，官至湖廣辰常兵備道，未任致仕，年八十卒。「維誠性聰俊，家貧，常鬻藏書於市，或問之，曰：『讀過矣，不鬻何用？』客試之，輒對，無少爽者。」著《艮山堂詩文集》。²⁰⁵

9. 王琦（生卒年不詳）

字韓如，深澤縣人。天資聰敏，忠孝，愛讀書，通武備，崇禎 8 年（1635）以恩貢選，授山東青城縣令。任兩月，以憂歸；崇禎 12 年（1639），官至河南虞城縣令。「建置書院，增貯經籍，皆損俸為之。」²⁰⁶

10. 汪元范（生卒年不詳）

字明生，冀縣人。諸生，博學耆古，於書無所不讀，嘗至長安與南思受、呂桓伯、董思白（董其昌，1555-1636）等游歷名山大川，慨然慕司馬遷之為人，足迹幾遍天下，文益進。晚年尤善趙南星、石九奏，卜居冀城，號祝雞翁。「築『散木齋』以自娛，建『不二軒』、『陸地舟』，貯古今書籍其中。所著有《以南草》、《景波樓草》、《名山評語》、《樗林稿》等集。」²⁰⁷

11. 鹿善繼（1575-1636）

²⁰⁵ 清·李培祐等，《保定府志》，卷 60，〈王維誠〉，頁 10 下-11 上。

²⁰⁶ 清·王肇晉等，《深澤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511，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據清咸豐 11 年刊本影印），卷 8，〈王琦〉，頁 2 下。

²⁰⁷ 王樹枏，《冀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17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據民國 18 年鉛印本影印），卷 19，〈汪元范〉，頁 8 上-下。

字伯順，定興縣人。萬曆 41 年（1613）進士，授戶部主事，以事謫官。起兵部軍贊畫，歷員外、郎中，告歸。崇禎初，起尚寶卿，官至太常少卿，再請歸。大清兵下定興，死之。贈大理卿，謚忠節。有《無欲齋詩鈔》。²⁰⁸「伯順先生生平有三變，為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不呼之常不應。」²⁰⁹鹿善平有詩云：「北海亭依野水渠，數椽茅屋幾區蔬。瀟瀟夜雨懸孤榻，落落西風集古書。百口不辭張儉難，于秋爭羨孔融居。長留夢景乾坤內，往過高賢必式廬」²¹⁰

12. 樊尚文（生卒年不詳）

字完樸，冀縣人。工部守愚從姪孫也，學博才敏，為文如宿構，尤長於詩。性恬退，寡言笑，喜讀《彭澤集》。崇禎 9 年（1636）應歲薦，官至望江訓導。「明末學宮荒廢，捐俸葺之，購經史，建文昌祠、敬一亭，聚諸生講習其中。壬午（崇禎 15 年，1642），晉安樂縣教諭。任未幾，遇變，歸里鄉居。迹不入市城，教子讀書，從游者尤眾。更名貞默，字遯叟，別號天山云。」²¹¹

13. 范士楫（生卒年不詳）

字箕生，號放樵，定興縣人。崇禎 10 年（1637）進士，官山西陽曲洪洞知縣。入清後，起禮部儀制司主事，典陝西鄉試。調文選司，仕至郎中，順治 18 年（1661）告歸，遂未再起，著《橘洲詩集》六卷。²¹²「獨好與古人交，傾囊購異書萬卷，冥心探索，恆夜達旦，著作故博通。少與同邑鹿化麟交善，商榷古今學業，伸紙

²⁰⁸ 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1 版），頁 2838。

²⁰⁹ 陳田，《明詩紀事》，頁 2838-2839。

²¹⁰ 清·張主敬等，《定興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32，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光緒 16 年修，21 年刻本影印），卷 14，〈鹿善繼〉，頁 8 下。

²¹¹ 王樹枬，《冀縣志》，卷 19，〈樊尚文〉，頁 8 下。

²¹²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清代傳記叢刊》20，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5 月初版），傳 19，〈范士楫〉，頁 1 上-下。

操筆，彼此互勘訂。閒或呼酒，抵掌論天下」²¹³鹿化麟曾說：「『樾舫』者，范子箕生讀書所也。箕生賦才奇，寄趣亦奇，畏俗子若膩，獨好與古人交，不惜捐囊購異書，沉酣萬卷。」²¹⁴

14. 孫承宗（1563-1638）

字稚繩，號愷陽，高陽縣人。中萬曆 32 年（1604）進士，沈毅有智略，尤曉暢邊事。官至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年七十六卒，謚文忠，改謚文正、忠定。²¹⁵「家居列書為幄，訓課子弟，嬉笑咳唾，皆成文章。偶一落筆，典奧闕衍，前無古人。」²¹⁶「舊傳稿甚富，珍藏於家。」²¹⁷

15. 黃宗元（生卒年不詳）

黃宗元，籍貫不詳。官蠡縣主簿，時議修建蠡縣儒學「尊經閣」，命黃宗元董其事，「五閱月而閣告竣，高棟倚雲，彩文煥斗，前有懸臺凌空，後有重門洞關。且『也月臺』、『甬道』，偉然奇觀，乃舉六籍羣書，悉貯其中，淵然一道德文章府，示人以希聖希賢階梯，即『青藜』、『石渠』，奚讓焉！」²¹⁸

16. 孫銓（生卒年不詳）

²¹³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19，〈范士楫〉，頁 1 上-下。

²¹⁴ 清·張主敬等，《定興縣志》，卷 15，〈范士楫〉，頁 51 下-52 上。

²¹⁵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435。

²¹⁶ 李曉冷等，《高陽縣志》，卷 3，〈孫承宗〉，頁 20 上-21 上。

²¹⁷ 李曉冷等，《高陽縣志》，卷 8，〈孫高陽文集一百卷〉，頁 5 上。

²¹⁸ 清·韓志超等，《蠡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21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年，據清光緒 2 年刊本影印），卷 9，〈創建尊經閣記〉，頁 12 上。

字次公，高陽縣人。少傅文正公（孫承宗）冢嗣也，由恩選，授高苑令，廉能有聲，仕至福建操補都司。「為人豪爽，負氣重然諾，少傅文集百卷，鏤板南中。」

219

17. 郭名揚（生卒年不詳）

字賓實，清苑縣人。「性嗜學，博極羣籍。善飲酒，能詩、文，工諸家書法，遠近皆從之學。積書百卷，皆手錄。年四十卒。」²²⁰

18. 劉昌祚（生卒年不詳）

字延熙，清苑縣人。官至按察使，不盈（劉不盈）子，幼穎悟，年十六補邑弟子員，慨然曰：「八股頭，門瓦子也！」遂棄去。「沉酣古籍，寒暑無間。闢一室，督子弟誦習之，積書萬餘卷，郡邑有大典禮，就討故實焉。」²²¹

表 4-3：《明代北京轄下保定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定興縣	3
高陽縣	3
冀縣	2
清苑縣	2
深澤縣	2

²¹⁹ 李大本，《高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15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據民國 20 年鉛字本影印），卷 4，〈孫銓〉，頁 6 上-下。

²²⁰ 金良驥等，《清苑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29，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民國 20 年修，23 年鉛印本影印），卷 4，〈郭名揚〉，頁 86 下。

²²¹ 清·唐執玉等，《畿輔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0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79，〈劉昌祚〉，頁 11 下。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雄縣	1
蠡縣	1
安州	1
新安縣	1
安肅縣	1
新城縣	1
總計	18

二、河間府

1. 傅英玄（元末明初）

滄州人。以明經貢大廷，「藏書甚富，手盡丹黃，年九十餘齡，猶孳孳不倦，鄉人趨之，有伏生再見之歡。」²²²

2. 張茂蘭（1471-1535）

字德馨，濟南章邱縣人，寓居任邱縣。少有至性，一介必慎取，與顧署飲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中弘治 11 年（1498）舉人，18 年（1505）成進士，授知鉅鹿縣，為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闋，起知任邱縣，官至給事中。「多市書籍，以勸學者。」²²³

²²² 清·莊日榮等，《滄州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49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年，據清乾隆 8 年刊本影印），卷 14，〈傅王燦傳〉，頁 63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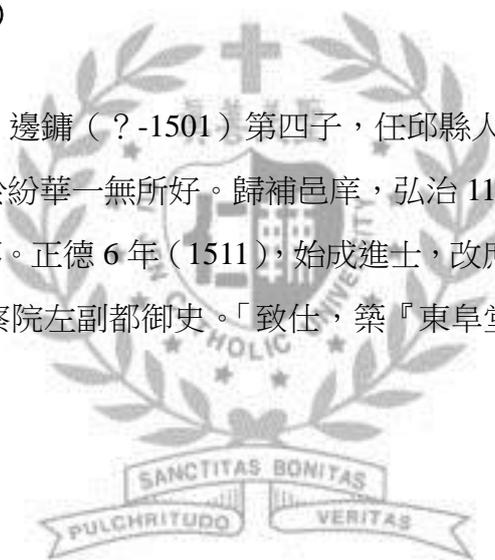
²²³ 清·劉統等，《任邱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521，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據清乾隆 27 年刊本影印），卷 11，〈張東谷先生傳〉，頁 67 上-69 上。

3. 范光大（生卒年不詳）

字應元，吳橋縣人。弱冠，即負大志，自取號曰：「崇崗」，承父志也。既而累試有司，不第，以歲貢卒業成均，謁選吏部，官至聊城簿職。有子春元，「春元童時，親授經義，多集古書，俾讀之，以故春元博洽多聞。」²²⁴

4. 邊憲（1464-1524）

字汝明，號東阜，邊鏞（？-1501）第四子，任邱縣人。隨父任金陵，讀書於雞鳴山，約己積學，於紛華一無所好。歸補邑庠，弘治 11 年（1498）舉於鄉，丁外艱，四試禮部而不第。正德 6 年（1511），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九載，官至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築『東阜堂』，日坐其中，游情書史。」²²⁵



5. 劉正（生卒年不詳）

字方若，號振之，任邱縣人。曾祖陽，嘉靖 16 年（1537）舉人，仕至戶部郎中。祖分桂，萬曆元年（1573）舉人，任亳州知州。父季焯以正貴，贈奉直大夫，正為贈公第四子。年幼時，五經冠童試，補諸生。順治元年（1644），恩貢第一，官至山西代州知州。「購書甚富，南游江淮與諸名士集，文名藉甚。」²²⁶

²²⁴ 清·倪昌燮等，《吳橋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22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年，據清光緒元年刊本影印），卷 12，〈明故聊城主簿范君墓誌銘〉，頁 20 下-22 上。

²²⁵ 清·劉統等，《任邱縣志》，卷 9，〈邊憲〉，頁 14 下-15 下。

²²⁶ 清·劉統等，《任邱縣志》，卷 9，〈劉正〉，頁 37 上。

6. 李懿（生卒年不詳）

字美卿，號省齋，吳橋縣人。嘉靖 23 年（1544）進士，授泰州知州，歷戶部郎中，出知漢中府，官至陝西副使，有《擊缶集》、《省齋文集》。²²⁷「致仕歸，以詩文自娛，若未常顯仕者。搜里中故事，編成縣志；購書數千卷，送貯學宮，為寒士誦讀。資立鄉社，勸諭鄉俗，眾望歸之。」²²⁸

7. 孫緒（1474-1547）

字誠甫，號沙溪，故城縣人。弘治 12 年（1499）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吏部郎中。中官張雄（1442-？）請託不從，中傷褫職。終官至太僕寺卿，致仕，卒年七十四。有《沙溪集》。²²⁹「蒐羅四方，得詩、賦、序、記、雜文各若干卷，手錄成帙。」²³⁰



8. 劉分桂（生卒年不詳）

字思南，號同芳，任邱縣人。萬曆元年（1573）舉人，初授青州通判，轉濟南通判，潔已奉公，以廉守著，官至亳州牧，一意愛民。「歸里後，書籍滿室，餘無長物。」²³¹

²²⁷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30。

²²⁸ 清·劉統等，《任邱縣志》，卷 7，〈李懿〉，頁 59 下。

²²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442。

²³⁰ 明·周世選，《衛陽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36，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周承芳刻本影印），卷 9，〈孫沙溪文集序〉，頁 14 下。

²³¹ 清·劉統等，《任邱縣志》，卷 9，〈劉分桂〉，頁 60 下。

9. 閔煦 (1507-1580)

字和卿，號水東，任邱縣人，閔楷從子。中嘉靖 14 年（1535）進士，授開封府推官，擢御史，改翰林院編修，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仕至刑部尚書。煦居官三十年，所至有聲績，致仕卒，年七十四。²³²「公敏達，博古通今，嘗肆力于文童，旁及星曆、角占、陰陽讖緯之學。既謝政居里，斥地築圃，鳩書史，群賓客優游于其中，談世務，挖揚菡林，亶亶琅琅，能令人解頤傾耳，若飛玉屑建饒水也。為文，渾雄似昌黎；為歌詩新逸，兼□鮑之長。所著有《正祀孝》行于世，餘藏于家。」²³³

10. 李希白 (生卒年不詳)

字夢庚，景縣人。萬曆 31 年（1603）登賢書，初授河南偃師令，調嵩縣，官至山西永寧知縣，歷任三邑，皆有惠政。「致仕，家居左圖右史，足跡不入城市。巡撫張公其平，偃師人也，感公惠政，常詣廬諮訪，其繫人思慕若此。」²³⁴

11. 李汶 (1536-1609)

字宗齊，號次溪，任邱縣人。嘉靖 41 年（1562）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右都

²³²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640。

²³³ 明·吳中行，《賜餘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5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吳亮吳奕等刻本影印），卷 11，〈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閔公神道碑〉，頁 3 下。

²³⁴ 耿兆棟，《景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50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據民國 21 年鉛印本影印），卷 8，〈李希白〉，頁 4 下-5 上。

御史總督陝西，官至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卒年七十四。²³⁵「建書樓，公取裴晉公意，題之曰：『書種』。臨沒，猶以讀書為遺命也。所著有《南遊三紀》、《出塞詩》、《督陝奏議》若干卷。」²³⁶

12. 張文熙（生卒年不詳）

字燦衡，號孕白，景縣人。祖守用，代州大使；父應彥，庠生。文熙登萬曆 41 年進士，歷任樂安、東阿兩縣令，有惠政，民咸德之。擢拜監察御史，奉命巡南直隸，執法不撓。還，稽察光祿，官至太僕寺卿。致仕「歸里後，築室郊外，扃戶兀坐，陳古今經史圖籍，朝夕吟咏。……卒年五十，所著有《如是言》、《平情錄》。崇祀鄉賢，學者稱為雪菴先生。」²³⁷

13. 李楨辰（生卒年不詳）

號華麓，任邱縣人。萬曆 46 年（1618）舉人，胸次磊潤，器識清遠，平昔專攻古文，九八闡始售。「於書無所不讀，牙籤萬卷，為邑第一。所著有《書經講義》。」

²³⁸

14. 沈嘉（生卒年不詳）

²³⁵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197。

²³⁶ 明·葉向高，《蒼霞續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2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初版，明萬曆刻本），卷 2，〈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贈太師次溪李公墓志銘〉，頁 16 上。

²³⁷ 耿兆棟，《景縣志》，卷 7，〈張文熙〉，頁 18 下-19 上。

²³⁸ 清·劉統等，《任邱縣志》，卷 9，〈李楨辰〉，頁 4 下。

字嘉客，號無謀，故城縣人。因世家西溪之上，又自號西溪生。明天啓元年（1621）拔貢，入清朝，或勸之應試，笑謝之，自署讀書之室曰：「食豕山房」。「少食貧，家無書，嘗走藏書家借讀，手自抄之，遂博通諸籍。……年八十三卒。……嘉人品夔，所為文字，別具町畦；詩好學陶，晚尤嗜讀書韋詩。……所著《西溪集》，年久漫漶無傳。」²³⁹

15. 范景文（1587-1644）

字夢章，吳橋縣人。萬曆 41 年進士，除東昌推官，改吏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移疾歸。崇禎初（1628），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擢兵部侍郎，以憂歸。復起南都御史，官至兵部尚書，參贊機務。²⁴⁰嘗為詩云：「夜裏刪詩日看山，縱然忙殺也清閒。從教花落休開徑，除却僧來即閉關。性好積書終是癖，身無小病怕成頑。幽棲未盡聲聞累，鶴舞□□鳥語蠻。」²⁴¹足見其對藏書之喜好。

16. 邊舉（1595-1692）

字伯高，任邱縣人。祖杏，萬曆 19 年（1591）舉人，萊蕪尹；父同，封中憲大夫，子四人，舉其長。舉生而穎異，應童子試輒冠軍，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天啓 7 年（1627）舉于鄉，四上公車不第，遂就選，授徽郡之祁門令，官至安慶府知府。「性好抄書，至老不輟，康熙 31 年（1692）卒，壽九十八。」²⁴²

²³⁹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7，〈沈嘉〉，頁 1 上-下。

²⁴⁰ 陳田，《明詩紀事》，頁 2855。

²⁴¹ 陳田，《明詩紀事》，頁 2857。

²⁴² 清·劉統等，《任邱縣志》，卷 9，〈邊舉〉，頁 34 下-36 下。

17. 張永譽（生卒年不詳）

字印白，南皮縣人。生而負雋才，工文章，倜儻敦大節，門內之行尤著。嘗赴試，內艱訃至，哭踊氣絕，星夜徒跣奔喪，哀感行路。官至四川保寧府經歷。兄弟「析產時，惟取祖遺書籍，財貨悉以讓弟。」²⁴³

18. 王光先（生卒年不詳）

號念初，景縣人，子崇德。光先嗜書，「藏書千卷，課子孫。」²⁴⁴

19. 金璞（生卒年不詳）

字太樸，號素谿，任邱縣人。康熙 26 年（1687）領鄉薦，28 年（1688）成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文名重京師。後淡於進取，告病歸，以圖史自娛，所著有《自省錄》等書。「性穎異，藏書甚富，涉目輒不忘。」²⁴⁵

20. 張都憲（生卒年不詳）

名字不詳，吳橋縣人，累官至都御史。「張公家積書甚富，得肆力涉獵，人稱為經筵。」²⁴⁶

²⁴³ 王德乾等，《南皮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14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據民國 21 年鉛印本影印），卷 8，〈張永譽〉，頁 40 下。

²⁴⁴ 耿兆棟，《景縣志》，卷 7，〈王光先〉，頁 21 上。

²⁴⁵ 清·鮑承燾，《任邱縣志續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4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道光 17 年刻本影印），卷 9，〈金璞〉，頁 12 下-13 上。

²⁴⁶ 周嘉露等，《河間府新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41，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乾隆 25 年刻本影印），卷 12，〈李尚綱〉，頁 29 下。

21. 戈繼皋（生卒年不詳）

字邁之，獻縣人。其先吳人，世傳司天業，子弟俊者，咸習算數。「時經明末亂後，老師宿儒都盡，地僻陋，無書可讀。繼皋遠近搜假，手抄盈篋，汎覽精思，日夜忘寢饋，久之，得咯血疾。……繼皋有子曰英，博學能文章。繼皋曰：『此子功名中人，吾當終尋吾樂矣，遂以疾謝去諸生。及英第進士，選庶常，繼皋布袍芒履，無異寒素，獨居一室，危坐終日，冬不爐，夏不扇，非為子弟講授，未嘗一開口，如是三十餘年卒。……所著有《清軒學譜》，學者稱為清軒先生。』²⁴⁷

表 4-4：《明代北京轄下河間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任邱縣	9
吳橋縣	4
景縣	3
故城縣	2
滄州	1
南皮縣	1
獻縣	1
總計	21

第三節 真定、順德二府的藏書家

一、真定府

²⁴⁷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14，〈戈繼皋〉，頁 8 下-9 下。

1. 張照（生卒年不詳）

號獻廷，江西南豐縣籍，僑寓靈壽縣。「靈壽舊無書院，建自邑侯獻廷張公始也。侯視篆之明年，實萬曆 4 年（1576）。歲時，政平訟理，百務惟新，禮樂熙洽之會也。侯嘆曰：『邑無書院，胡以養蒙而造士哉？』適聚星門左，有社學舊址一區，久屬宦業，即捐俸贖之，而建書屋於上，扁其門曰：『松陽書院。』蓋將聚松陽一河清淑之氣，而鍾之人傑也，取義旨哉。前堂三楹，扁曰：『敬業』，左右兩翼為室者，俾小子有造也。後堂三楹，扁：『尚論』，俾成人有德也。堂之東二楹，藏書史豫器用；西二楹面城，城之池，畜水而清，種蓮數莖，以備游息。」²⁴⁸

2. 宋登春（約 1517-1584）

字應元，號海翁，新河縣人。少能詩，善畫。年三十一歲中，妻子相繼亡，遂棄家遠遊。晚依其兄子，居江陵之天鵝池，自號鵝池生。徐學謨（1521-1593）守荊州，深敬禮之；後學謨致仕歸，登春訪之吳中，買舟浮錢塘，徑躍入江死。所著詩稱《宋布衣集》。²⁴⁹「居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²⁵⁰

3. 傅鳴會（1525-1605）

字汝嘉，靈壽縣人。「中嘉靖 29 年進士，官給事中，有直聲，彈射不避權貴，

²⁴⁸ 清·劉賡年，《靈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506，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據清同治 13 年刊本影印），卷 9，〈松陽書院記〉，頁 6 下-7 上。

²⁴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183。

²⁵⁰ 明·徐學謨，《徐氏海隅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2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影印），卷 15，〈鵝池生傳〉，頁 11 上。

權貴惡之，擠出，守平陽，遂致仕。積書至數十萬卷。」²⁵¹

4. 邢侗 (1551-1612)

字子愿，臨清縣籍，寓居南宮縣，如默從子。登萬曆 2 年 (1574) 進士，官至陝西行太僕卿。善畫，能詩文，書為海內所珍，與董其昌、米萬鍾、張瑞，稱「邢張米董」。家貲鉅萬，築「來禽館」於古犁丘，卒年六十二。著有《來禽館集》，墨蹟刻石曰：《來禽館帖》。²⁵²「居里塾，好購諸古今書讀之。……月俸捐少贖緩，為置經、史、子、集，及國朝制典諸書若干部，度之學宮。」²⁵³

5. 許國鼎 (生卒年不詳)

真定縣人。天啓元年 (1621) 舉人，性孝友，深遠有識，不事生產。「居業喜積書，博學工詩文，訓悔子弟有方。」²⁵⁴

6. 李維喬 (生卒年不詳)

棗強縣人。性嗜古，不與俗為伍，天啓元年 (1621)，以選貢試大廷，雅志恬退，不樂仕進。「歸居一室，左圖右史，恬如也。」²⁵⁵

²⁵¹ 傅維麟，《明書》（《中國野史集成》21，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卷170，〈敘傳一〉，頁1下-2上。

²⁵²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233。

²⁵³ 賈恩紱，《南宮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1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民國25年刊本影印），卷23，〈明故聊城主簿范君墓誌銘〉，頁45下-46上。

²⁵⁴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光緒元年刻本影印），卷39，〈許國鼎〉，頁5下。

²⁵⁵ 張宗載，《棗強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2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民

7. 趙南星（1550-1627）

字夢白，號濟鶴，高邑縣人。中萬曆 2 年（1574）進士，歷文選員外郎，方嚴疾惡，上疏陳四大害，觸時忌乞歸。再起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貶斥殆盡。被嚴旨落職，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1550-1612），海內擬之三君。光宗立，累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為己任，官至吏部尚書，卒年七十八，崇禎元年（1628）諡忠毅。著有《史韻》、《學庸正說》，《忠毅公集》。²⁵⁶「先生築一室郊垞，擁書閉戶，非其人不與見也。性善飲酒，為小詞，多寓憂世之懷。酒酣，令人歌而和之。」²⁵⁷「閉門讀書，彼蒼不終，憤憤也。至代，僦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土宣，顏曰：『味藜』，日夕開卷，或弄筆為適。」²⁵⁸

8. 傅維鱗（?-1666）

字掌雷，一字歉齋，初名維楨，靈壽縣人。登順治 3 年（1646）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出為東昌兵備道，遷左副都御史，官至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精研史學，藏書極多。²⁵⁹「維鱗以所纂二十餘年《類編實錄》，鮮及他書，乃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家乘、文集、碑志，得三百餘部，九千餘卷，參互考訂，撰述〈本紀〉、〈宮闈〉、〈紀表〉、〈志〉、〈記〉、〈世家〉、〈列傳〉，凡七十七目，一百七十一卷，題曰：《明書》。其後，徵其書入史館，論者雖議其體例，然亦不能

國 20 年天津協成印刷局鉛印本影印），卷 5，〈李維喬〉，頁 12 下。

²⁵⁶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759。

²⁵⁷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臺北：明崇禎壬申（1632）嘉善錢士升等刊本；），卷 10，〈濟鶴趙先生小傳〉，頁 11 上。

²⁵⁸ 清·鄒漪，《啓禎野乘》（《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 4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明崇禎十七年柳園草堂刻清康熙五年重修本），卷 1，〈趙忠毅傳〉，頁 49 下。

²⁵⁹ 楊立誠等，《中國藏書家考略》，頁 162。

服其勤博也。」²⁶⁰

9. 梁志（生卒年不詳）

真定縣人。性質敏慧，眉目如畫，試諸生輒高等。喜讀書，「博覽自墳典、邱索，以及百家雜言，無所不窺。好法書、名畫，古彝、佳玩。宅後構小園，高木修篁，蔚然深秀，臺閣池館，不事藻繪，曲折盡致。從西山搜奇石數種，森列園中；日拭琴几，置圖史器物，葛巾羽屨，吟咏自娛。或邀朋友，杯酒話舊，與與如也。」²⁶¹

10. 梁清遠（1606-1683）

真定縣人，字邇之，一作離之，號葵石。順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坐事，左遷光祿寺少卿，丁憂歸，服除，遷通政使司參議。明萬曆刊本《松雪齋集》二卷，卷內有「真定梁氏清遠書屋」、「葵石子述甫印」、「和室老人梁離之印」諸圖記。著有《祓園文集》、《雕邱雜錄》。家有書樓，名：「清遠書屋」、「和室」、「祓園」等。²⁶²「生而穎異，總角時，趙南星一見輒器重之；十六補諸生，為學使左光斗所賞拔。崇禎 15 年（1642）舉於鄉，16 年（1643）公車罷歸，益肆力於古學，博極羣書，經史及古今文籍，靡不淹貫成誦。所為古文詞，尤稱爾雅，郡邑求文者，戶外屐常滿。順治 3 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性好觀書，所居處墳籍環列，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²⁶³

²⁶⁰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傳維麟〉，頁 18 下-19 上。

²⁶¹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卷 3，〈梁志〉，頁 5 上。

²⁶²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梁清遠〉，頁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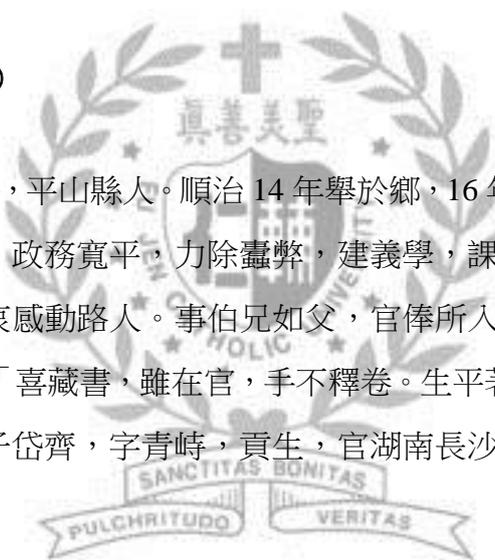
²⁶³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卷 36，〈梁清遠〉，頁 10 下-11 上。

11. 梁清標 (1620-1691)

字玉立，號棠村，一號蕉林，真定縣人。中明崇禎 16 年進士，入清後，官至大學士。²⁶⁴清儒翁方綱 (1733-1818) 題《蕉林書屋圖》時，嘗謂：「項家蕉窗梁蕉林，圖書之富甲古今。」²⁶⁵「『蕉林』者，今戶部尚書梁先生讀書之屋也，先生生平好學，喜積書，多至數十萬卷，日流覽其下。」²⁶⁶

12. 崔華 (1632-1693)

字蓮生，一字西岳，平山縣人。順治 14 年舉於鄉，16 年己亥 (1659) 成進士，初授浙江開化縣知縣。政務寬平，力除蠹弊，建義學，課文藝，士爭向學。華性孝友，七歲喪父，舉哀感動路人。事伯兄如父，官俸所入，悉分之昆弟，不私一錢，官至兩淮鹽運使。「喜藏書，雖在官，手不釋卷。生平著有《公餘詩畧》及《四書課兒講藝》諸書。子岱齊，字青峙，貢生，官湖南長沙府知府，著有《坐嘯軒瑣言》。」²⁶⁷



13. 王兆泰 (生卒年不詳)

真定縣人。布政使藻 (1544-?) 之子，庠生，天資英敏。「於書無所不讀，經史而外，旁及百家，凡奇門、兵法、天文、術數之學，無不殫精研思，窮其奧妙。

²⁶⁴ 楊立誠等，《中國藏書家考略》，頁 217。

²⁶⁵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4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初版，據清刻本影印)，卷 44，頁 3 上。

²⁶⁶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 17 年梁允植刻本影印)，〈汪序〉，頁 1 上。

²⁶⁷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30，〈崔華〉，頁 1 上-下。

每遇異書，必購求手錄，吟哦不輟。」²⁶⁸

14. 魏大成（生卒年不詳）

字時夫，號樂吾，柏鄉縣人。衡山令謙光子，十五補諸生，肄業成均為上舍，七試棘闈，竟不第，遂自太學歸。仲子純粹（約 1619-？），成進士，為永城令。大成著《養生弗佛二論》，年七十五卒，累贈宮保大學士。家居惟「靜坐擁書，杜門不出。」²⁶⁹

15. 王昌（生卒年不詳）

字德公，隆平縣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為文「自關蹊，欲成一家；於書，無所不備。」²⁷⁰



16. 嚴文（生卒年不詳）

無極縣人。官至延安府推官，理刑欽恤，陝人德之，六年考滿，乞致仕歸。「家居三十餘年，閉門謝客，檢閱古書。」²⁷¹

²⁶⁸ 清·趙文瀛等，《正定縣志》，卷 39，〈王兆泰〉，頁 5 下。

²⁶⁹ 牛寶善，《柏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67，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民國 21 年鉛印本影印），卷 6，〈魏大成〉，頁 193 上-下。

²⁷⁰ 清·袁文煥，《隆平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6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上海圖書館藏抄本影印），卷 8，〈王昌〉，頁 17 下。

²⁷¹ 王重民等，《無極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51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據民國 25 年天津文竹齋鉛印本影印），卷 9，〈嚴文〉，頁 17 下-18 上。

表 4-5：《明代北京轄下真定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真定縣	5
靈壽縣	3
無極縣	1
柏鄉縣	1
新河縣	1
南宮縣	1
棗強縣	1
高邑縣	1
隆平縣	1
平山縣	1
總計	16



二、順德府

1. 崔恭 (1409-1479)

字克讓，廣宗縣人。正統元年（1436）進士，歷官有政績，天順 2 年（1458）以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浚治諸水，民賴其利。召為吏部右侍郎，置「勸懲簿」，有聞皆識之。官至吏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歸，卒年七十，謚莊敏。²⁷²「抵家，靜坐一室，不事生產，惟訓子讀書。足跡不入城市，治『清樂園』，嘗手一編自怡，後學者拜而問藝，悉一一指畫不倦。以廣宗地僻，不見全書，遂購歷代史、《文獻通考》、《通志畧》、《玉海》，並五經、四書，暨四方古今名儒議論，以遺儒學。」

273

²⁷²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612。

²⁷³ 姜楹榮等，《廣宗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7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民國 22 年鉛印本影印），廣宗文徵·下編，〈崔莊敏公祠記〉，頁 3 上-下。

2. 常熟（生卒年不詳）

字康宇，廣宗縣人。幼孤貧好學，及長，博覽羣書。能詩，工古文詞，隆慶4年（1570），舉於鄉。「滿戶藏書甚富，幾同鄴架，惜遺稿鮮有存者。」²⁷⁴

3. 王愜（?-1676）

字純生，號點蒼，廣宗縣人。順治14年（1657），舉於鄉。嗜書，藏書萬卷。²⁷⁵康熙9年（1670）官至知縣，又六年卒，年五十三。著有《逸休齋雜著》，《天放居詩草》，《子素文》。「於書，愜尤好之，多方購求，期必得，以故藏書甲一邑。文澹古，惜墨如金，有父風。工行草，善詞賦，尤長於詩。」²⁷⁶

4. 孟若蘭（生卒年不詳）

任縣人。幼而穎異秀出，未弱冠，應童子試輒冠軍，謂科第可操券得，竟數奇為諸生。「家居蒔花竹，藏古圖書器玩甚夥，能詩，工書畫，有手摹《蘭亭》及《網川圖》，當其得意，雖拱璧不啻也。又豪爽，嘉客無少長，皆樂從之遊。行年六十餘，無龍鍾態，卒之日，里人皆相與。」²⁷⁷

²⁷⁴ 韓敏修等，《廣宗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9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據民國22年鉛印本影印），卷14，〈常熟〉，頁3下。

²⁷⁵ 汪閻，《明清蟬林輯傳》，頁19。

²⁷⁶ 韓敏修等，《廣宗縣志》，卷14，〈王愜〉，頁5上。

²⁷⁷ 王億年，《任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宣統2年修民國4年續修鉛印本影印），卷5，〈孟若蘭〉，頁20下-21下。

5. 苗而成（生卒年不詳）

字鳳亭，任縣人。生而岐嶷，嶄然異羣童。既就塾，卓犖不凡，讀書日數行下，里中父老，皆歎以為班孟堅（班固，32-92）、陸雲公（511-547）之流。自大父以來，世擅儒雅，秉潛德而成，益恢大之。「窮搜經史，掇厥精華墳典、邱索。」

278

6. 王震（生卒年不詳）

字威遠，邢臺縣人。中進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出納錢穀稱職，陞鄖陽知府，當道累薦卓異，陞河南參政，官至應天府尹。「致政歸，圖書千餘卷送府庠，資士子誦讀。其孝思，至老不衰，建『永感堂』，以志不忘。」²⁷⁹

表 4-6：《明代北京轄下順德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廣宗縣	3
任縣	2
邢臺縣	1
總計	6

²⁷⁸ 王億年，《任縣志》，卷 5，〈苗而成〉，頁 32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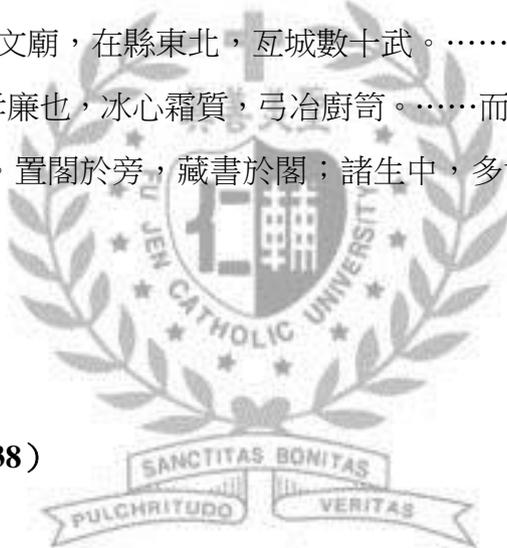
²⁷⁹ 清·徐景曾，《順德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67，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乾隆 15 年刻本影印），卷 12，〈王震〉，頁 7 下-8 上。

第四節 廣平、大名二府的藏書家

一、廣平府

1. 惠承芳（生卒年不詳）

號靜所，陝西清澗縣籍，僑寓曲周縣。萬曆 41 年，官曲周縣知縣，後遷南京國子監助教。治曲周縣時，興建儒學，購置藏書，諸生感念，而為建生祠。時人記云：「曲周縣儒學之文廟，在縣東北，瓦城數十武。……萬曆癸丑（41 年），署鐸先生惠公者，清澗孝廉也，冰心霜質，弓冶廚笥。……而建亭臨水，誦詩讀書，想見曾皙之在沂上焉。置閣於旁，藏書於閣；諸生中，多博物洽聞者，以先生興也。」²⁸⁰



2. 劉榮嗣（1570-1638）

字敬仲，號簡齋，別號半舫，曲周縣人。博極群書，肆力於古文詞。官至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喜購書畫，不惜傾囊，親知諧弗顧也，一時文名籍甚。」²⁸¹

3. 劉九成（生卒年不詳）

²⁸⁰ 清·吳中彥，《廣平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56，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光緒 20 年刻本影印），卷 39，〈惠公祠〉，頁 5 上。

²⁸¹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61，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 13 年刻本影印），卷 3〈總河大司空劉公榮嗣傳〉，頁 12 下-14 上。

字子韶，號虞亭，曲周縣人。公長身潤面，神觀偉如。好覽史、漢，文雄暢而澤于古。入庠，每試輒冠，官至山西太原府岢嵐州知州。「闢一小齋，架書連屋，時勤披閱。……卒年七十有九。」²⁸²

4. 聶明璉（生卒年不詳）

字公器，別號大僕，曲周縣人。博極群書，思以古文詞自見。性孝友，撫二弟有恩。中年留情詩酒，頗事聲伎。以明經貢於朝，自此，益無仕進意。喜觀釋氏書，參禪禮佛，蒲團習靜，門庭蕭然。然雅不廢吟詩，取材漢、魏，遠法盛唐。篤嗜藏書，「性好古，家饒千貲，不惜重價購之，一室之內，縹緗爛然，古鼎奇石，羅列左右。嘗于京師，拜客過門前，覩一雲林小畫，回邸，遺僕買之。」²⁸³

5. 王家瑞（生卒年不詳）

字凝貞，成安縣人。「性好奇，凡凡有異者，即片楮、拳石，必盡意搜羅購買，縱傾囊不吝也。家貧而積書甚多，日夜諷誦無倦。」²⁸⁴

6. 張懋勤（生卒年不詳）

字廣惟，肥鄉縣人。學顏、孫，家貧好讀書，絕意仕進。「藏書樓上，羅列如

²⁸²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3〈刺史劉公九成傳〉，頁25下-27下。

²⁸³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3〈明經聶公明璉傳〉，頁31下-32上。

²⁸⁴ 張應麟，《成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0年鉛印本影印），卷12，〈王家瑞〉，頁4下。

城，晝夜諷吟，寒暑不輟，著述甚多。」²⁸⁵

7. 劉逢源（生卒年不詳）

字津逮，曲周縣人。貢生，究心經、史、星數、河洛之學，談書擊劍，落落不與流俗伍。「嘗手鈔二十一史，讐對精確；他書亦數千卷，名士大夫，多樂與之遊。喜吟詩，著有詩集行世。」²⁸⁶

8. 聶雲羽包（生卒年不詳）

字燦羽，號懷山，曲周縣人。幼聰慧絕人，「家有藏書千卷，繙閱殆遍。文流既溢之，下筆有神矣，入庠，大小試每居高等，俯視一第，猶掇之。」²⁸⁷

9. 聶繪于（生卒年不詳）

以字行，曲周縣人。世業農，有隱德。其父嗜古能文，邑令常奉檄徵之，不應。繪于體質豐厚，少負磊落才，好讀書，不事生產。既為諸生，益肆力於古學。「築書樓，珍襲萬卷。每披閱，盥手正襟，矻矻不少倦。叔父著《聖學心脈》等書，繪于旁參異同，刻意搜討。叔沒時，以書授之曰：『子吾家學傳人也，其為我廣之。……好為詩歌文辭，病革，猶檢篋中書，偃卧讀之。語兒輩曰：『吾家世為

²⁸⁵ 張仁侃等，《肥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65，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9年鉛印本影印），卷21，〈張懋〉，頁6下。

²⁸⁶ 清·吳中彥，《廣平府志》，卷51，〈劉逢源〉，頁33下。

²⁸⁷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3〈文學聶公雲羽包傳〉，頁30上-下。

諸生，恃此長物也，其善守之。」年五十六卒。」²⁸⁸

表 4-7：《明代北京轄下廣平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曲周縣	7
成安縣	1
肥鄉縣	1
總計	9



1. 宋訥（1311-1390）

字仲敏，號西隱，滑縣人。性持重，學問該博，舉元至正 23 年（1363）進士，任鹽山尹，棄官歸。洪武 13 年（1380），徵儒士 18 人，編禮樂諸書，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久之，以杜敷薦，授國子助教，說經為學者所宗。歷官翰林學士、文淵閣大學士，遷祭酒，年八十卒，謚文恪，有《西隱集》傳世。²⁸⁹「所居別業曰：『白雲茅屋』，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鉅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紀隱，不減少時。」²⁹⁰

2. 王三顧（生卒年不詳）

²⁸⁸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7，〈聶繪于〉，頁 20 上-下。

²⁸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181-182

²⁹⁰ 明·宋訥，《西隱文稿》（明萬曆戊寅（1578）滑縣知事劉師魯校刊本），附錄，〈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宋先生墓誌銘〉，頁 47 下。

字來聘，魏縣人。嘉靖 10 年（1531）舉鄉試，幼有異質，說經史，往往出人意表，下筆為文辭，滾滾數千言，一時從游者甚眾。家素貧，復不事生產，卜居西郭外，自號西郭，人稱西郭先生。「遇異書，不惜傾囊購之。與人交，樂易真實，談笑傾倒；有不合，即揚然引去不顧。人或以此病之，然天性真率，相知者不以為忤。六上春官，不第；勸之士，不應。卒年五十六。」²⁹¹

3. 張師伊（生卒年不詳）

大名縣人。少與考功申旆，司業晁璫齊名，勸學禔行，相期，遠大，俱中嘉靖 19 年（1540）舉人，後申、晁成進士，師伊益發憤，竟不第。歷知浮山、項城、浙川三縣，官至黃州府判，致政歸。「居張家潭，構室陳書，朝夕游咏，絕迹城市。當道高其風，時就見之，師伊祇一刺報答。嘗撰注縣志，有《筭記》若干藏於家，吏部郎元城董復亨，涇水李養正（1559-1630）為刻《張黃州詩集》行世。」²⁹²

4. 晁璫（生卒年不詳）

字君石，號春陵，開州人。宋太子太傅迥（晁迥，948-1031）之後，嘉靖 20 年（1541）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子東吳，字叔權，嘉靖 32 年（1553）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父子皆喜儲藏，嘗刊行諸書，有『飲月圃』、『百忍堂』諸板。」

293

²⁹¹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59，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民國 23 年鉛印本影印），卷 18，〈王三顧〉，頁 8 上-下。

²⁹²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 18，〈張師伊〉，頁 8 上-下。

²⁹³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 年 10 月初版），卷 87，〈寶文堂分類書目〉，頁 3 下-4 上。

5. 申旌（生卒年不詳）

字儀卿，魏縣人。登嘉靖 23 年（1544）進士，授固始縣令，以治聞，遷刑部主事。「申君家藏書萬卷，所著文字稱是。」²⁹⁴

6. 晁東吳（生卒年不詳）

字叔泰，一作叔權，開州人，璫次子。嘉靖 32 年進士，仕至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為文法秦漢，尤摹拓古碑，喜藏書。年二十二移疾歸，遂卒。其父璫，手錄其遺文總四卷，墨迹一卷，名曰：《誠痛錄》。」²⁹⁵「父子皆喜儲藏，嘗刊行諸書，有『飲月圃』、『百忍堂』諸板。」

7. 王重光（生卒年不詳）

號敷菴，魏縣人。以府學登鄉薦，授稷山知縣，歷汾州府通判，皆有能聲，官至慶陽府同知，未任而卒。生平喜「購異書讀之，如天文、內典、堪輿、奇門、醫卜等類。」²⁹⁶

8. 張佳胤（1527-1588）

字尚甫，號居來山人，本籍四川銅梁人，僑寓滑縣。嘉靖 29 年進士，授滑縣

²⁹⁴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 27，〈申旌〉，頁 7 下-8 上。

²⁹⁵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馮滄州〉，頁 61。

²⁹⁶ 清·馬襄，《魏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5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雍正 5 年刻本影印），卷 3，〈王重光〉，頁 18 上。

知縣。萬曆間，官浙江巡撫，官至太子太保總督薊遼尚書兼都御史，年六十二卒，諡襄憲。「佳胤嘗與王世貞（1526-1590）諸人唱酬，為嘉靖七子之一，有《嵒岷山房集》。」²⁹⁷「羣集、史冊，凡關滑者，則手自抄錄。」²⁹⁸

9. 穆文熙（1528-1591）

字敬甫，號少春，東明縣人。嘉靖 41 年（1562）進士，授行人，歷吏部員外郎，以擁護石星（1537-1599），廷杖罷官歸。後起郎中，官至廣東副使，卒年六十四。著有《七雄策纂》、《四史鴻裁》、《閱古隨筆續》及《逍遙園集》。²⁹⁹「築『逍遙園』居之，左圖右史，朝披夕諷。所交游盡海內名士，郵筒遍致，束脩之間，歲時不絕。……酷嗜書史，自墳典而下，諸子百家言，亡所不窺，積卷帙至十餘萬，朱墨點竄盡，為重覆所刪書數十種。」³⁰⁰後來，他竟然將畢生珍藏圖書，全部放火焚之，《棗林雜俎》載：「東明穆文熙小春憲副，購書十餘萬卷，盡舉所積，焚之。」³⁰¹觀其藏書心態，實在令人費解。

10. 董復亨（生卒年不詳）

字見心，號太初，元城縣人。漢江都相仲舒（董仲舒，前 179-前 104）之後，少有異質，讀書一再，終身不忘。萬曆 20 年（1592）舉進士，官至稽勳郎中。致仕後，即舊居『繁露園』，構屋以棲，年五十一卒。「宦遊十餘年，家無長物。嘗

²⁹⁷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528。

²⁹⁸ 王蒲園等，《重修滑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11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據民國 21 年鉛字本影印），卷 10，〈嘉靖 34 年（1555）滑縣知縣張佳胤德政碑〉，頁 38 下。

²⁹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873。

³⁰⁰ 明·李廷機，《李文節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1628-1644）刊本），卷 20，〈憲副小春穆先生墓志銘〉，頁 40 下-41 上。

³⁰¹ 清·談遷，《棗林雜俎》（《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1 版），聖集·藝簣，〈穆文熙焚書〉，頁 247。

語諸子曰：『吾生平棄產營書，積貯萬卷，人皆以為痴。然剖其腹以藏珠，豈雋物哉？吾亦笑其癡也。所著有《繁露園集》、《補忘齋稿》、《章邱縣志》行於世。』³⁰²

11. 李養正（1559-1630）

字若蒙，號玄白，魏縣人。中萬曆 26 年（1598）進士，授聞喜令，天啓中，累官至刑部尚書，以忤魏璫告歸，卒年七十二。³⁰³「生平無他嗜，獨嗜書，墳典、丘索、六經、子史，及近代名公集，度而藏之，比于鄴架。每指以示諸孫，曰：『能讀我萬卷書，始為佳兒。』至于手自披閱，則鉛丹殆遍，不徒以飽蠹魚也。著作之盛，甲于吾黨。」³⁰⁴

12. 李允樟（?-1644）

字若梗，東明縣人。建和子，武英殿中書舍人，官至憲副。性沉靜，杜門謝客，戶外罕出。性嗜圖書，尤「珍愛古本冊籍，暨唐宋諸名公書畫。」³⁰⁵

13. 孫奇逢（1584-1675）

字啓泰，一字鍾元，容城縣人。萬曆舉人，與左光斗（1575-1625）、魏大中（1575-1625）、周顯昌等，以氣節相尚。晚歲移居蘇門之夏峰，學者因稱夏峰先生。

³⁰²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 18，〈董復亨〉，頁 17 上-下。

³⁰³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21。

³⁰⁴ 明·成靖之，《雲石堂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1628-1644)刊本），卷 21，〈明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玄白李公墓誌銘〉，頁 64 下。

³⁰⁵ 清·儲元升，《東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 51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年，據民國 22 年鉛印本影印），卷 6，〈李允樟〉，頁 18 下。

康熙 14 年（1675）卒，年九十二。³⁰⁶「構一室，陳公之冠履、圖書，顏曰：『棲神』。堂東南隅，又結草屋，如斗南北對向。四壁茅籬，塗以泥土。西向者二：一待客，一貯家禮、子史諸經典。」³⁰⁷

14. 趙士麟（1629-1698）

字麟伯，號玉峰，雲南河陽人，寓居容城縣。康熙 3 年（1664）進士，授貴州平遠推官，四年後，遷直隸容城知縣，在任六年，曾創辦正學書院。後在京師歷任各種官職，官至吏部左侍郎。³⁰⁸「鈴閣間，咸若靜舍，簾垂篆裊，左圖右書，間植花竹自娛。或步行，坐楹門外，與父老子弟相話。」³⁰⁹

15. 趙虞保（生卒年不詳）

字方菱，本籍涇陽縣人，僑寓元城縣。由恩貢司訓元城，喜為詞賦，與門士談文，孜孜不倦。「所獲俸薪，盡購書，首蓓盤中，別具氣味焉。」³¹⁰

16. 栗維垣（生卒年不詳）

³⁰⁶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486。

³⁰⁷ 清·湯斌等，《孫夏峯先生年譜二卷》（《百部叢書集成》94，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初版），卷上，〈孫奇逢〉，頁 5 下。

³⁰⁸ 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略》（青海市：青海人人出版社，1990 年 2 月第 1 版），頁 472。

³⁰⁹ 王蓮堂，《容城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3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 9 年刻本影印），卷 7，〈趙公去思碑〉，頁 39 上-40 上。

³¹⁰ 清·陳偉等，《元城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60，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康熙 15 年刻本影印），卷 4 〈趙虞保〉，頁 8 下。

字汝甲，魏縣人。聰慧有丰采，為諸生，與時傑長桓李化龍（1554-1611）、元城董復亨，南樂魏允貞（1542-1606）兄弟齊名。維垣獨厄於數，以貢，任保定府訓導，次任濟南府訓導，遠近名士，就講席者七十餘人。轉歸順德府教授，所造之士，如李璠等，皆擢高科、登顯。官至羅山知縣。「家居積書教子，施藥、施棺，為里人推重。」³¹¹

17. 王廷諫（生卒年不詳）

大名府人。家有「湛思堂」，自稱：「余之為是堂也，制無取麗，勢無取廣，澹然數楹，窗明几淨，圖書四壁，琴劍一榻。予以時趺坐其中，收視返聽，覺四大幻而五蘊空。有興，或檢《楞嚴》、《叅同》諸書，一再閱即置案上，不以溺心而喪志也。」³¹²

18. 張紹烈（生卒年不詳）

字孟晦，號希古，容城縣人。為諸生，志行高古，父母歿，皆廬墓三年；業師卒，亦結廬負土除。「生平藏書，不火自焚，遠近歎異。」³¹³

表 4-8：《明代北京轄下大名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魏縣	5
容城縣	3
開州	2

³¹¹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 18，〈栗維垣〉，頁 15 上。

³¹² 清·朱煥等，《大名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 5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據清咸豐三年(1853)刻本影印），卷 18，〈湛思堂記〉，頁 23 下。

³¹³ 王蓮堂，《容城縣志》，卷 6 上，〈張紹烈〉，頁 2 下。

府、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滑縣	2
元城縣	2
東明縣	2
大名府	1
大名縣	1
總計	18

根據筆者從史料中仔細查找，過濾篩選出明代北京的藏書家共 130 位。依史料記載，明代北京藏書家的藏書事實發生地，大多為藏書家的居住地，其中不乏是在當地做官者，而非本籍人士。於茲，筆者僅將 130 位藏書家的藏書發生地，根據其在明代北京轄下八府的分布數目，表列如下。

表 4-9：《明代北京轄下八府藏書家數量分布表》

府	州或縣	藏書家人數	總計	北京藏書家總計
順天府	順天府	9	37	130
	宛平縣	4		
	文安縣	4		
	豐潤縣	2		
	涿州	3		
	寶坻縣	3		
	大興縣	3		
	霸州	3		
	大城縣	2		
	固安縣	1		
	玉田縣	1		
	永清縣	1		
	密雲縣	1		
永平府	盧龍縣	2	5	130
	永平府	1		
	樂亭縣	1		

	灤州	1	
保定府	定興縣	3	18
	高陽縣	3	
	冀縣	2	
	清苑縣	2	
	深澤縣	2	
	雄縣	1	
	蠡縣	1	
	安州	1	
	新安縣	1	
	安肅縣	1	
	新城縣	1	
河間府	任邱縣	9	21
	吳橋縣	4	
	景縣	3	
	故城縣	2	
	滄州	1	
	南皮縣	1	
	獻縣	1	
真定府	真定縣	5	16
	靈壽縣	3	
	無極縣	1	
	柏鄉縣	1	
	新河縣	1	
	南宮縣	1	
	棗強縣	1	
	高邑縣	1	
	隆平縣	1	
	平山縣	1	
順德府	廣宗縣	3	6
	任縣	2	
	邢臺縣	1	
廣平府	曲周縣	7	9
	成安縣	1	
	肥鄉縣	1	
	魏縣	5	

大名府	容城縣	3	18	
	開州	2		
	滑縣	2		
	元城縣	2		
	東明縣	2		
	大名府	1		
	大名縣	1		

由上表可知，明代北京轄下八府當中，實以順天府，也就是北京城一帶的藏書家為最多，此當與明代北京為科舉會試與殿試的重鎮，又為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的所在地，具有密切的關係。再者，書籍市場的發達，喜好藏書的北京士人們，都不難飽其所欲，更使得藏書風氣達到了鼎盛。自北京城以下，藏書家數量由多而少，依次是河間府、保定府、大名府及真定府，各府藏書家人數平均約在 16 至 21 人左右，而最少的為順德府及永平府，人數都不到 10 人。至於藏書家的資料來源對照，可參考附錄一：「明代北京藏書家知見表」。





第五章 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社群生活

第一節 明代北京的士大夫

區域文化活動，總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正如藏書活動一樣，也離不開一定地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因素。累觀歷朝歷代，大凡京畿之地，皆是政治與文化中心，為全國首善之區，官僚和士大夫們畢集於此，而藏書家也往往群聚，³¹⁴與全國各地以及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有著多方面的文化聯繫與交流，這是同一時代的其他城市與地區，所無法比擬的。可以說，全國政治首府的特殊地位，是形成京師文化的關鍵，進而決定了他的首要特點，即京師文化是多方位文化的薈萃。³¹⁵

隨著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確定了其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地位，北京也逐漸具備了文化中心的必要元素。這裡是文化政策令之所出，包括有利於文化發展的各種決策，當然也包括許多損害文化發展的文化專制及「文字獄」政策。在「中心」的確立過程中，國子監、翰林院等國立的文化機構逐漸形成規範，由禮部主持三年一次的會試、殿試，彙集天下之英才於京師，重要的文化觀念，遂體現在各種活動之中，並向整個華北地區蔓延與擴散，使六朝以後的文化典範由江南而北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北方地區文化落後的狀況。且不論自由多元，抑或是文化專制，都在觀念上強化了京師文化的中心性質。³¹⁶對於私家藏書來說，最大的特點就在於這裡是人才薈萃的地方，許多京籍或寓京的士大夫和學人，匯聚於此，再加上明代北京是圖書營銷的繁榮地方，便使得此地私人藏書風氣逐漸地興盛起來。

³¹⁴ 邱曉輝，〈古代藏書文化漫談〉（《圖書情報論壇》，2009年第4期），頁68。

³¹⁵ 李淑蘭，〈略論遼金至明清時期京師文化的特點〉（《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2期），頁40。

³¹⁶ 王南，〈明代北京審美文化的生成〉（《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頁152。

一、明代北京士大夫的文化氛圍

古代的士大夫，一般泛指具有較高文化知識的文人，他們主要的生涯規劃是讀書並入仕做官。至於多數走下政壇、隱居不仕或未能入仕的士大夫們，則主要從事教授生徒、著述立說或教化鄉里的工作，也有部分改營他業，或農或工商。士大夫階層是官員、文人、教師和地方紳士的複合體，而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傳統，則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由士大夫階層所形成的政治理論、政治價值、政治習俗和政治意識的統稱。³¹⁷士大夫作為一個社會集體，展現其特有的風貌。從漢、唐至後來的元、明、清，士大夫作為一個政治文化階層，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治文化，兼指政治與文化兩個互別而又相關的活動領域，且不論是任何一朝，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都是政治與文化兩系列發展互動的最後產品。³¹⁸

誠如前文所述，北京是知識份子雲集的地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裡是全國最高學府與選才考試之所在地。為了培養人才，從中央至府、州、縣皆立官學，又遍設村塾、社學，且以儒家經典教授學生。即使是由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他們的統治者也多崇儒尚學，以儒教治國。其次，北京也是中央政府科舉考試和順天鄉試之所在地。遼、金、元三代，均仿照漢人興辦科舉，至明清時期，更定期在北京城舉行鄉試、會試，且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永樂年間，首先在崇文門裡建造貢院，³¹⁹作為考場；幾經改建，清代貢院號房已近萬間。當時，大批文人十年寒窗苦讀，無一不是冀望有朝得以進京趕考，一舉成名。³²⁰

在科舉制度下，初學的士子們都希望擠進地方儒學，成為生員。而國家更是刻意栽培，或免其徭役，或地方官以禮相待，或廩生並得以食廩餼，或貧寒者給予學租養贍。一旦生員們選貢或中舉，即可以入仕。如果再會試中試，通過殿試，便可成為進士，或進入翰林，或分派官職，尤為士子的榮顯之階。所以，在科舉

³¹⁷ 袁德良，〈中國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傳統管窺〉（《原道》，2008年第0期），頁173-174。

³¹⁸ 蒙美蓮，〈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與蘇伯衡的文學創作〉（青島：青島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5月），頁1。

³¹⁹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年第1版），卷48，頁747。

³²⁰ 李淑蘭，〈略論遼金至明清時期京師文化的特點〉，頁40。

制度下，讀書人自始便旨在讀書、應試，於是就在社會上造成一個以入仕為專業的特權階級，供政府日後之用。³²¹所以，自唐初創立科舉制度以來，歷朝的士大夫階層，都可以說是科舉制度下成長起來的知識份子。尤其到了明清兩代，北京不但是全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其科舉制度之盛，更是伴隨著兩王個朝的終始。總之，在各種時代與社會背景條件的輻輳與輻射的過程中，形成的京師文化，正代表著明代文化的發展趨向和總體水平。明代北京城中冠蓋雲集，士大夫階層人數之多，達到了空前的境界，使得京城士大夫的活動，也在全國各地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力，形成了真正的京城士大夫階層。³²²

此外，京師還有著特殊的政治地位與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為知識份子從事各類學術研究和文化活動，提供了許多有利的條件。其一，在中央各種文化機構中，有不少專家學者從事科學文化活動。譬如，中央政府專門設立掌管天文氣象觀測，推算節氣，制訂曆法的官署。又如，歷代中央設立太醫院，分科精細，對病理研究和醫學、本草學的推進，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其二，中央政府還組織人力，進行大型學術活動。歷代王朝均專門設立史館，為前代修史，除了中央專設人員外，還從各地調集名流學者來參加此項工作。這些工作，不僅保護了文化精粹，同時也刺激了京師民間古舊圖書業的發展。雖然封建統治者組織各種科技文化活動，其根本目的或在於壟斷文化，或在於籠絡知識份子，或是為了鞏固其政權，但在客觀上來說，都促進了京師文化事業的發展。³²³

綜上所述，明代北京在學校教育政策與科舉制度的帶動下，使得全國各地的人才菁英都聚集於此，從事各類的學術研究及文化活動，在在表明京師是人文會萃的文化中心。誠如朱彝尊（1629-1709）所言：「京師居北辰之所，惟人文之藪，觀其山川，覽其形勢，四境九衢，甲於省郡。況士大夫退食之暇，登臨憑眺，考古證今，是以代有紀載，時有述作」，³²⁴大概就是如此。

³²¹ 蔣潔，〈科舉制度下的民風〉（《知識經濟》，2009年第13期），頁162。

³²² 方彪，《北京士大夫》（北京：京華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頁7。

³²³ 李淑蘭，〈略論遼金至明清時期京師文化的特點〉，頁40-41。

³²⁴ 明·孫承澤，《天府廣記》，序，頁1。

二、文人的嗜癖

所謂「嗜癖」，原指人們對生活中某些事物或行為愛好的表現，而當它逐漸變成社會上某個階層或某些階層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時，這些嗜癖，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傳統的文人階層，是一群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他們對於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覺和判斷。然而，當現實生活中的煩瑣與困頓，無法隨自己的意志擺脫時，便只能透過各自的認知和修養，從「嗜癖」中尋找精神寄託，忘卻憂煩，追尋快樂，於是屬於古代文人生活型態的特殊面向，遂油然而生了。³²⁵

「嗜」，若從字面上判斷原意，應是指「口欲」，本是指人對食物喜好的極致程度。宋人顧文薦在《負暄雜錄》中曰：

世之嗜欲，一行殊性。前聞楚王嗜芹，文王嗜昌歎，屈到嗜芰，曾皙(前 546-?)嗜羊棗，此見之于傳記多矣。近讀唐溫飛卿(溫庭筠，812-870)《乾子》載：宋劉雍嗜瘡痂，雍往詣吳興太守盧休，休脫襪，粘痂落地，雍俯取而食之；宋明帝嗜蜜鯪，一食數升。故劍南節度鮮于叔明(?-787)，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于微熱水上以洩其氣，候氣盡，以酥及五味熬卷餅而食之，云其味甚佳。……前佑福建院權長孺，……有嗜人爪之癖，乃于健步及諸傭保處得爪甚多，……爪奉上，長孺視之欣然，如獲千金，饑涎流吻，連撮啖之，其厭愜思欲，神色自得，閣座大驚。蓋性之所嗜，自不覺其穢污也。³²⁶

顧文薦舉了古人所喜好的各種事物，從嗜芹、昌歎、芰、羊棗等植物，到嗜瘡痂、臭蟲、人爪等穢物，這些東西，有些甚至已經超出常人自然口欲的範圍，足見古人之「嗜」，原本就帶點非理性考慮的成份在內。³²⁷至於「癖」，即專指人的嗜好，意即人們在生活中，對某些事物或行為的愛好，已達到沉溺陶醉的程度。這一現象自古有之，在古代文人的世界裡，「癖」有著獨特的文化內涵，是個性與深情的

³²⁵ 張忠良，〈晚明文人的嗜癖言行〉(《臺南女院學報》，第 23 期，2004 年 10 月)，頁 405。

³²⁶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筆記小說大觀》25，臺北：新興書局，1979 年初版)，卷 18，〈性嗜〉，頁 15 上-下。

³²⁷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頁 23-24。

表現。但從總體來看，古代懷「癖」之士畢竟還是少數，他們在當時多被視為怪人、畸人，且往往會與清高、孤傲相聯繫，著重在對世俗品味的精神超越。到了明代，「癖」則逐漸演變為文人階層普遍追求與認可的生活品貌及價值觀，進而促使明代文人的癖好，呈現出世俗化、感官化、生活化等特點。³²⁸

明代的文人特別重視嗜癖這件事，山陰文人張岱（1597-1689）曾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鞠癖，有鼓鉞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³²⁹湖廣名士袁宏道（1568-1610）也說過：「余觀世上語言無古，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癖，將沈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³³⁰清初著名的文學家張潮（1650-1707）也說：「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³³¹可見古人與嗜癖的關係，正有如花與蝶、山與泉、石與苔、水與藻，是相互依存，互相彰顯其存在價值與美感的關係，做人有癖，才不致流於庸俗，也才能展現其真性情。

文人的嗜癖，可說皆緣於對某一種事物的專情態度，凡是值得用以對待值得付出深情的一切美好事物，都可成為古代文人們的嗜癖。明人袁宏道更進一步地指出，對於嗜癖，抱持專一至以性命相許的狀態，視之為「溺」，他說：

舉世皆以為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於酒者，至於荷鍤，溺於書者，至於伐塚，溺於禪者，至於斷臂，溺山水者，亦然。……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可與見媵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奧宅也。宋之康節（邵雍，1011-1077），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於棄人間事，以山水為殉，一也。³³²

³²⁸ 曾婷婷，〈「以癖為美」：晚明生活美學樣態的畸變〉（《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頁144。

³²⁹ 明·張岱，《陶庵夢憶》（《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第1版），卷4，〈祁止祥癖〉，頁數55。

³³⁰ 明·袁宏道，《瓶史》（《叢書集成新編》5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初版），卷下，〈好事〉，頁353。

³³¹ 清·張潮，《新譯幽夢影》（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4月初版），頁11。

³³²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7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武林佩蘭居刻本影印），卷10，〈遊蘇門百泉

因為對癖的認同與珍視，故有詩癖、書癖、茶癖、琴癖、硯癖、石癖、花癖、山水癖、煙霞癖、園林癖、花鳥癖……等。³³³宋代的孫奕也認為，嗜癖的不同，就如同人的個性一樣，有著或大或小的差異。據《示兒編》載：

性癖之不同如人面焉，阮籍（210-263）有酒癖，陸羽（733-804）有茶癖，和嶠有錢癖，王濟有馬癖，李愷有地癖，杜牧（803-852）有睡癖，王福峙有譽兒癖，蔡師魯有勇癖，張遼（169-222）養勇銳成癖，皆無足貴者。惟杜預（222-285）有《左傳》癖，簡文帝（320-372）有詩癖，楊欽有文癖，白樂天（白居易，772-846）云：「我癖在章句。」杜子美（杜甫，712-770）云：「為人性癖耽佳句。」李建中云：「我亦生來有書癖」，至於今稱之。³³⁴

所以，明代北京的文人士大夫們，當然也各自有不少的特殊癖好。就藏書癖而言，譬如宛平縣藏書家米萬鍾曾自稱「其父癖于好石，富于藏書，工書與畫，仲詔（米萬鍾）無不相當。」定興縣藏書家鹿善繼也自述：「為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不呼之常不應。」灤州藏書家倫浹也自謂：「癖嗜典籍，寢饋沈酣。」在如此相同的藏書癖好中，明代北京的藏書家們，充份享受著藉由藏書活動引發之有形或無形的樂趣。

文人的癖好，可說與世俗的生活密不可分，能使生活和心靈得到寄託。明代文學家李贄（1527-1602）說：「第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為樂者，以酒為生，如某是也；以色為樂者，以色為命，如某是也。至如種種，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³³⁵湖廣名士袁宏道說得甚好：

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奕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

記》，頁22下-23上。

³³³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頁384。

³³⁴ 宋·孫奕，《示兒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17，〈癖〉，頁9下-10上。

³³⁵ 明·李贄，《焚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1年2月初版），〈答周友山〉，頁31。

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³³⁶

可見，唯有癖好，才能在生活中有所寄託，在人生中找到支撐的力量；而無所寄託之人，即便終日繁忙，也會若有所失，活得不快樂。

明代文人的癖好不勝枚舉，但其「癖」又是分層次的，並不是所有癖好都是具有美感的，也有高雅和低俗之分。明末福建知名文人謝肇淛（1567-1624）就曾將文人的嗜癖分為幾個層次，曰：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謝靈運，385-433）好遊涉山水，李衛公（李靖，571-649）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為病。右軍（王羲之，303-361）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849-889）好有鬥牛，米元章（米芾，1051-1107）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礙。至於海上之逐臭之嗜，足紂也，甚矣！³³⁷

謝肇淛有感而發，時人皆以「癖」為風尚，但有些不過是附庸風雅，非真性情者；有些癖嗜，則不僅於己無益，且妨礙旁人；至若逐臭、嗜足紂等，則極粗俗不堪，不僅毫無美感，甚至可以說是畸形的怪癖了。錢塘文人沈守正（1572-1623）指出：

人各有嗜，嗜金玉、子女、狗馬者，庸人也。嗜泉石、花鳥、絲竹者，韻人也。進而為金石篆籀之嗜，清矣！然非博雅，不得稱鑑賞家，書其可已矣。且書之以為寶也，剖玄黃之精，傳聖賢之髓，造物亦若秘之惜之，往往難聚而易散。……若夫沉篤淵湛之士，家衰戶襲，代不乏人。欲如阮孝緒（479-536）之七乘，張華（232-300）之三十車者，概不多見，難可知矣。³³⁸

藉由嗜癖的主體與對象，可以判定癖好是否高雅，唯有選擇嗜癖之雅尚者，才屬高致之流，為世人所崇慕和景仰；但若選擇低俗的嗜好，就會令人鄙視或反感。譬如詩癖、書癖、茶癖、琴癖、硯癖、石癖、花癖、山水癖、煙霞癖、園林癖、

³³⁶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20，〈李子髯〉，頁18下。

³³⁷ 明·謝肇淛，《五雜俎》（《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1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明萬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韋館刻本影印），卷7，頁33下。

³³⁸ 明·沈守正，《雪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7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明崇禎沈尤含等刻本），卷4，〈吳德聚爽閣書目序〉，頁33上-34上。

花鳥癖等，便屬高雅。此乃因為所癖之對象所能引發之美感與趣味，使得癖的行為本身，亦可能成為一種值得欣賞的對象。³³⁹

此外，明代文人除了「嗜癖」的性格外，受到明代多次文學復古運動的影響，藉由文人的鼓吹與推廣，復古意識瀰漫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使得世人也都競相表現出一種「好古」的精神意識。元末明初的文學家楊維禎（1296-1370）嘗論好古，云：

古之不諧於今者久矣！敦以古為好耶？三代下嗜好百出，好酒而鍾以隨，好傳墓而牧以亡，好勇而舉鼎以說臚，好獵而隊車以隕首，好游而賈害以利，好談諧而售辱以戲，好書而污髮以為顛，好畫而竊封以為神，好鍛而倨以取禍，好石而拜以取喪，好鶴而乘軒以取滅國，所好不同，而所失亦隨以異，惟好古為聖賢之學，愈好愈高而入于聖人之域，而凡世之所好者不一，足以動其志，此好古効也。今之人不古好，覆以好古為也譏髀，無任恣淫不道，逮至毀綱裂常，自謂行于今者橫如也，不知步踏者在戶限外，吁！亦足省矣！

340

這是元末明初的文人對於好古的看法，他們認為嗜好古典文學是很好的，不過在休閒生活領域崇尚古人就不值得鼓勵。然而，這樣的想法終究持續不久，他們認為休閒與生活崇尚古人的質樸，是今人嚮往的意境，當有助於文人跳脫世俗的煩惱，進入理中的世界。³⁴¹山陰文人張岱也說：「余謂博洽好古，猶是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黜曹瞞，賞鑒之家，尚存秋壑。詩文書畫未嘗不擡舉古人，恒恐子孫效尤，以袖攫石、攫金銀以賺田宅，豪奪巧取，未免有累盛德。」³⁴²所以，「古」對於明代文人而言，有著很高的價值，從他們對生活細節的佈置，以及對古董文物的鑒藏，都表現出他們對古人的崇敬。

曲周縣藏書家聶明璉就是如此，「性好古，家饒千貲不惜重價購之，一室之內

³³⁹ 曾婷婷，〈「以癖為美」：晚明生活美學樣態的畸變〉，頁 145。

³⁴⁰ 元·楊維禎《東維子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5，〈好古齋記〉，頁12上-13上。

³⁴¹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頁127。

³⁴²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6，〈朱氏收藏〉，頁77。

縹緗爛然，古鼎奇石羅列左右。」同縣的藏書家劉榮嗣，亦「多蓄古敦彝、法書名畫，以寄其上下千古之致。」³⁴³他們都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充滿著古人的風格與趣味。棗強縣藏書家李維喬同樣崇尚古典風範，他說：「性嗜古，不與俗為伍。」³⁴⁴至於錢塘縣藏書家高濂（1573-1620），則更在《遵生八牋》論道：

余嗜閒，雅好古，稽古之學，唐虞之訓；好古敏求，宣尼之教也。好之，稽之，敏以求之，若曲阜之鳥，歧陽之鼓，藏劍淪鼎，兌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義存焉者也，豈直別異搜奇，為耳目玩好寄哉？故余自閒日，遍考鐘鼎、貞彝、書畫、法帖，窰玉、古玩、文房器具，纖悉究心。更校古今，鑒藻是非，辯正悉為取裁。若耳目所及，真知確見，每事參訂補遺，似得慧眼觀法。他如焚香鼓琴，栽花種竹，靡不受正方家，考成老圃，備注條列，用助清歡。時乎坐陳鐘鼎，幾列琴書，搦字松窗之下，圖展蘭室之中，簾櫳香靄，欄檻花研，雖咽水餐雲，亦足以忘飢永日，冰玉吾齋，一洗人間氛垢矣。清心樂志，孰過於此。³⁴⁵

高濂好古、稽古，仿校古人品藻、校訂和鑒別之學，遍考鐘鼎、貞彝、書畫、法帖，窰玉、古玩文房器具等古董文物，讓自己好似古人一樣對文物有所考究，並進一步在生活中仿效古人坐陳鐘鼎，几列琴書，帖拓松窗之下，圖展蘭室之中的古典生活意境。收藏古董文物，可說不只是擁有其外形樣貌而已，更蘊藏該器物後面的古典情趣，文人不時透過他們，重新體會古代的氛圍與歷史感。³⁴⁶

從典籍文化的角度來看，好古是明代文人的特性，明人認為古代文獻是傳統精神的延續，閱讀古籍，就好似尚友前賢，與古人交談一般，因此，他們喜好收藏古書名畫，代表自己博古通今。譬如冀縣藏書家汪元范，「博學嗜古，於書無所不讀。」³⁴⁷曲周縣藏書家聶繪于，「其父嗜古能文，邑令常奉檄徵之，不應。繪于體質豐厚，少負磊落才，好讀書，不事生產。既為諸生，益肆力於古學。」其父

³⁴³ 明·劉榮嗣，《簡齋先生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4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

³⁴⁴ 張宗載，《棗強縣志》，卷 5，〈李維喬〉，頁 12 下。

³⁴⁵ 明·高濂，《遵生八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7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4，〈燕閒清賞牋上〉，頁 1 下-2 上。

³⁴⁶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頁 283。

³⁴⁷ 王樹枏，《冀縣志》，卷 19，〈汪元范〉，頁 8 上-下。

子皆嗜好古學。定興縣藏書家范士楫，獨好與古人交流，為此而傾購古書達萬卷之多。真定縣藏書家梁清遠，「肆力於古學，博極羣書經史，及古今文籍，靡不淹貫成誦。」宛平縣藏書家郭文輔，則透過閱讀古籍與古人交流，而樂此不疲，據《天府廣記》載：

（郭文輔）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得甚歡。雖居朝市，門堵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稱之曰：共臣之為人，虛不逆物，卑不失己，依依自遠，雖亦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軌轍於古人，冥心析理，不膠結於胸臆。養恬致知，實宗廟瑚璉，幽冀之旄角也。人以為知言。³⁴⁸

他們深信「經史子集以辭相傳，而碑刻則并古人手蹟以存。故好古尚友之士，相與共訪而傳之。」³⁴⁹因崇尚古人的風範，而表現在圖書的閱讀與收藏上。³⁵⁰此外，在明人好古的時代文化背景下，有些藏書家不只言行舉止效法古人，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也處處遵循古法。譬如宛平縣藏書家王崇簡，「年七十，尤嗜學不倦，欲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為夏課。」³⁵¹仿效古人在夏天的讀書習慣來閱讀古書。

對於書籍愛好者來說，書可以說是他們一生感情的寄託，對於書，當然可以說是傾注了他們畢生的心血。每當得到一本好書時，便不覺喜形於色，呵護備至，甚至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而一旦失之，就不禁泣下數行、痛不欲生。明代藏書家祁承燦在談到文人對書的癖好時，說道：

夫所謂精神欲注者，正以人非大豪傑，安能澹無嗜好？倘嗜好一著於博飲、狹邪、馳馬、試劍，傷生敗業，固不必言；即染翰臨池，鼎彝金石，非不稱清事。然右軍（王羲之）竟以書概其品，而閻立本（601-673）且悔恨流汗，戒子孫勿復工繪事。至於玩古之癖，令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移此種種嗜好，注於嗜書，余亦不遽望爾輩以冥心窮討，苦志編摩。惟姑以此書，

³⁴⁸ 明·孫承澤，《天府廣記》，卷 34，〈郭文輔〉，頁 471。

³⁴⁹ 明·陳繼儒，《巖棲幽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11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繡水沈氏刻寶顧堂祕笈本影印），頁 16 上。

³⁵⁰ 陳冠至，〈明代南京的書籍市場〉（《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14 年 12 月），頁 154。

³⁵¹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1，〈王崇簡〉，頁 3 下。

日置幾席間，視同玩器，裝潢校讎，朝斯夕斯，隨意所喜，閱其一端；一端偶會，此卷自不忍不竟。一卷既洽，眾卷復然。此書未了，恨不能復及一書。方讀其已見，恨不能讀其所未見，自然飲食寢處，口所囁嚅，目所營注，無非是者。如阮之屐，嵇之鍛，劉伶之飲，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如此則物聚于所好，奇書秘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而古今絕世之技，專門之業，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³⁵²

他說凡人不可能恬淡而無所嗜好，如果嗜好偏重於豪飲淫邪，馳馬試劍，不僅有傷身體，而且敗壞家業。即便沉溺於書法繪畫，金石古玩，雖然是雅事，但東晉書法名家王羲之，竟然因為書法的名氣而減損了他的風度和節操，而唐代的著名畫家閻立本，也因為被人當作畫工而悔恨不已。至於沉溺古玩的癖好，又使人憔悴不堪。因此，他在訓戒子孫時，提倡將嗜好專注於書籍上，並強調唯有性情專注，才能事業有成；專門之業，沒有不是因為嗜好成癖而達成的。對這些「書癡」、「書癖」的好書者，誠如《遂初堂書目》後序所說：「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³⁵³因為書籍是一種既普通又特殊的文化產品，蘊含著無窮無盡的文化內涵。³⁵⁴

藏書家對於藏書可以有著特殊的癖好，藏書癖是一種對於書籍專注的情感，使得染上這樣癖好的人們，願意把自己的興趣、精力、情感及金錢等，全部都投入給外行人看似沒有用途的書籍。他們對書的珍貴之情，往往超乎圖書本身的價值，對於一般人來說，書只是他們用來閱讀利用而已，可是對於有著藏書癖好的藏書家來說，常常以神聖到不可理喻的態度來對待書籍，甚至賦予書籍生命。長期以來，這種專注的情感，一直深深的影響著舊時代的知識階層。³⁵⁵

³⁵² 明·祁承燾，《澹生堂藏書約》（《叢書集成新編》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初版），〈藏書訓略〉，頁748。

³⁵³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後序，頁2上-下。

³⁵⁴ 黃曉霞，〈私家藏書文化論〉，頁37。

³⁵⁵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3期），頁22。

第二節 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社群關係

一、 家族藏書

中國古代文獻中經常留下了許多古人愛書，矢志藏書，透過書籍追尋文化傳統、承繼文化傳統的記載。藏書家們不但意識到書籍的使用價值，還體認到書為人們所帶來的精神上的享受和樂趣，將之視為民族文化的精粹，也是民族精神的指標。每一部書的收藏，可以說都是經歷藏書家的艱苦訪求；每一部書的流傳，也都有一段感人的書林佳話。他們用情於書，幾成癡迷；他們認為積財以貽子孫，不如賦予他們求知長進的書籍。所以，古代的藏書家們，多祈求自己的藏書能子孫代代相傳，萬世永保，經常告誡子孫必須固守藏書的家訓、族訓等。³⁵⁶清人孫樹禮（1845-1936）在《善本書室記》曰：

積財以貫計，積書以卷計。積財十萬貫，子孫日夕取求焉，不數年而用已罄。積書十萬卷，子孫日夕取求焉，終其身用之不盡，更傳諸子若孫，數十世亦不能盡也。故昔人有積財十一，積書十九之語。³⁵⁷

清人王昶（1724-1806）也說：「願後人，勤講肆，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置。」³⁵⁸明代魏縣藏書家李養正亦嘗云：「生平無他嗜，獨嗜書，墳典、丘索、六經、子史及近代名公集，度而藏之，比于鄴架。每指以示諸孫，曰：『能讀我萬卷書，始為佳兒。』」藏書家們都懷抱著能將所藏一脈相傳，恩澤後代的願望。對於明代北京的藏書家來說，當然也是如此。

明代的北京，因家風影響而從事藏書活動的家族例子很多。譬如元末明初的滄州藏書家傅英玄，藏書豐富，且孜孜不倦的閱讀。其子孫傅王燦，也受其家風的影響而力學求進。據《滄州志》載：

³⁵⁶ 曾健敏，〈古代私家藏書對文化典籍傳承的貢獻〉（《蘭台世界》，2007年第24期），頁50。

³⁵⁷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附錄，〈善本書室記〉，頁6上。

³⁵⁸ 清·蔣光煦，《東湖叢記》（《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1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九年繆氏刻雲自在齋叢書本影印），東記6，〈藏書印記〉，頁30下。

文學傳姓，王燦名，九生字，悔齋號者。壯時學有進，名其讀書處以自箴也。其先浙之山陰人，明永樂初，遷實壯畿，籍滄州。後為衣冠望族，父、太父皆蜚聲譽序，曾太父英玄先生，以明經貢大庭，藏書甚富，手盡丹黃，年九十餘齡，猶孳孳不倦，鄉人韙之，有伏生再見之歡。³⁵⁹

曲周縣藏書家聶繪于，也是如此。其叔父著書時，繪于一同參與搜討，叔父也不藏私的給予指導，更另築藏書樓，廣事蒐羅。「每披閱，盥手正襟，矻矻不少倦。叔父著聖學心脈等書，繪于旁參異同，刻意搜討。」文安縣藏書家陳協，嗜好典籍，常想將先祖的散佚的豐富藏書蒐訪回來，「每念先世積書萬軸多散佚，乃自六籍百家，及醫藥、卜算、山劔碑篆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冰，樂此不為疲也。」陳協可謂善於守藏先人圖籍的孝子賢孫。至於宛平縣藏書家王崇簡父子，兩人同官至尚書，皆喜好藏書，「父子同官尚書，古今所少，海內榮之，家藏秘本甚多。」

靈壽縣的藏書家傅維鱗，順治 3 年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累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精研史學，藏書極多。³⁶⁰其先祖傅鳴會，也是著名的藏書家，藏書甚至多達數十萬卷。鳴會「中嘉靖庚戌（29 年）進士，官給事中。有直聲，彈射不避權貴。權貴惡之，擠出守平陽，遂致仕。積書至數十萬卷。」傅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傅氏以耕讀為業，重視家庭教育，以故人才輩出。明、清兩代，傅家就出過五位進士、十名舉人，且在朝廷和地方為官者，前後就多達四十餘人，多有著述。³⁶¹傅氏一脈，可以說是明代北京喜好藏書與讀書的文化世族。至於開州藏書家晁璠父子，也都喜好藏書，所藏書的種類非常豐富，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載：

璠字君石，號春陵，開州人，宋太子太傅迥（晁迥，948-1031）之後。嘉靖辛丑（20 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其子東吳，字叔權，嘉靖癸丑（32 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父子皆喜儲藏，嘗刊行諸書，有「飲月圃」、「百忍

³⁵⁹ 清·莊日榮等，《滄州志》，卷 14，〈傅王燦傳〉，頁 63 上。

³⁶⁰ 楊立誠等，《中國藏書家考略》，頁 162。

³⁶¹ 武玉梅，《傅維鱗與《明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 1 版），頁 11。

堂」諸板。。³⁶²

此外，說到藏書家族，不得不提到收藏大家梁清標的家族。早在其叔祖梁志，就是知名的藏書家兼收藏家。他收藏許多的法書、名畫、圖史，以及各式各樣的佳玩藏品和西山奇石。據載：「(梁志)好法書名畫，古彝佳玩，……從西山搜奇石數種，森列園中，日拭斐几，置圖史器物，葛巾羽氈。」他的兄長梁清遠，中順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嗜讀書也好藏書，尤其在古學及古文詞方面，有很大的成就。

關於梁清遠的藏書活動及生活故實，梁清標也曾述及，曰：

余兄性好讀書，於古今載籍無所不窺。少即留意聲韻之學，出入三唐，發為歌詠，氣格雄渾，有大家之風。通籍而後，乃好宋人之詩。……晚歲澹於仕進，里居日多，時乘牛車，棲於村墅，翛然自得，有出塵之想。風和日麗，每汛小艇，携筇杖，流連溪壑間。或招黃冠與語丹砂，輒有所作，率皆簡澹古質達意而止。顧按其旨趣，實有合乎先民之矩，成一家言，較之今人浮夸剽竊者，抑□遠矣。生平所著頗富。³⁶³

觀此，可以了解梁氏家族自先祖伊始，就頗有濃厚的書香氣息。可以說收藏大家梁清標能精於鑒賞，長於書法，且收藏豐富的法書、名畫，都是深受其家族的影響，緣其叔祖梁志收藏的許多書畫、古董和各式佳玩藏品，有不少都留給梁清標，教導梁清標許多這方面的知識。而梁氏兄弟的藏書之風，也為後世所津津樂道。

高陽縣藏書家孫承宗，舉萬曆 32 年進士，累官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位高權顯。然「家居列書為幄，訓課子弟，嬉笑咳唾，皆成文章。偶一落筆，典奧閎衍，前無古人。」總之，明代不少藏書家藏書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教導子孫，讓子孫得以入仕為官，光大家業，或保持世族名閥的地位，也成為明代北京藏書家庭的一類典型。

³⁶²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87，頁 3 下-4 上。

³⁶³ 清·梁清遠，《被園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 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 24 年刻本影印），跋，〈被園集書後〉，頁 1 上-2 上。

孔子「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一直是傳統儒學中價值取向的具體體現。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的中國封建社會，透過它的教育制度和官吏制度，把這一觀念作為傳統，利用行政手段固定下來。尤其是隋唐以後沿襲千年的科舉制度，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為了登上仕途的臺階，為了獲得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殊榮，大多數的古代士人，莫不選擇讀書做官的道路，這就形成了中國士人特有的讀書取仕的文化心態。在此心態的影響下，藏書活動與功利目標，也就聯繫了起來。³⁶⁴譬如景縣藏書家王光先，藏書千卷，只為了教導後世子孫，史載：「王崇德，號抱一；父光先，號念初，藏書千卷，課子孫。」而魏縣藏書家栗維垣，「家居積書教子，施藥施棺，為里人推重。」容城縣藏書家孫奇逢，萬曆舉人，其子望雅深受父親的影響，嗜讀書也入朝為仕，「康熙二十一年（1682）進士，授內閣中書，旋謝歸。淦淹貫六經，博覽漢、魏以來諸史，浸淫百家，而尤精于性道，四方學者多宗之。」³⁶⁵豐潤縣藏書家魯雲程，興前衛人，積書教子有成，後世均能世守，「勸儉治家，慷慨好義，積書萬卷，教子文龍、文鵬有成，後嗣均能世守，其教稱邑大家焉。」³⁶⁶

至於大興縣藏書家李碩，在其子李經國幼小時，就經常利用家中書樓的藏書，教導他唸書，使得李經國深受父親的影響，而廣讀異書，後來亦得以中舉。李經國「為兒童時放逸好弄，其父碩困之樓中，累日夜不得出。乃玩其樓所藏書，漸為文。……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文安縣藏書家陳良瑛，篤嗜讀書，也好藏書，晚年於京邸課子孫讀書為樂。「家有樓三楹，皆貯書。……迎養於京邸，以課諸孫為樂。」其子陳儀（1670-1742）與陳偲，在耳濡目染下，亦皆喜好讀書，並皆得以入仕為官，陳儀「既魁南宮，選讀中秘書」；³⁶⁷陳偲「嗜讀書，自奉儉約，與胞姪菱友登雍正癸卯（元年，1723）賢書，謁選，授河南新野知縣。」³⁶⁸

清苑縣藏書家劉昌祚，官至按察使，藏書萬卷，以教導子弟學習。「沉酣古籍，

³⁶⁴ 于璐，〈中國歷史上私人藏書家的藏書觀念〉（《教育與教學研究》，2003年第5期），頁30。

³⁶⁵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10，〈孫奇逢〉，頁8上。

³⁶⁶ 清·牛昶煦等，《豐潤縣志》，不著卷數，〈魯雲程〉，頁470。

³⁶⁷ 清·李蘭增等，《文安縣志》，卷9，〈陳封君傳〉，頁16下。

³⁶⁸ 清·李蘭增等，《文安縣志》，卷9，〈陳封君傳〉，頁19下。

寒暑無間，闢一室，督子弟誦習之，積書萬餘卷，郡邑有大典禮，就討故實焉。」吳橋縣范光大，有子春元，為了教育其子而藏書。「春元童時，親授經義，多集古書俾讀之，以故春元博洽多聞。」邢臺縣藏書家王震，自小也深受父親王壘的教導，而喜好讀書與藏書，於弘治 6 年(1493)入朝為官，「父王壘，永樂六年(1480)舉人；有子震，教以讀書，弘治六年，震成進士，官戶部主事。……致仕歸，歷任所購書籍千餘卷，悉送府庠公諸士子。」³⁶⁹宛平縣藏書家米萬鍾，萬曆 23 年進士，由戶部郎中歷陞至江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工書，與董其昌齊名，時稱「南董北米」。米萬鍾自小即深受其父親的教導，以致能在書畫及藏書方面有所成就，「其父癖于好石，富于藏書，工書與畫，仲詔（米萬鍾）無不相當。」

觀此，我們可以了解，家族藏書的風氣，除了靠藏書家們努力傳播流傳之外，最重要的還是需要仰賴後世子孫的堅守與發揚光大，才得以綿延下去。一旦子孫們失去了興趣，無法持續下去，則藏書往往就此散佚流失，累世所藏都將化為烏有。此誠如古人所云：

先賢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能讀者少矣。不能讀者視典籍若弁髦，甚有指聖言為迂闊，甘心明悖。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能守者少矣。不能守者視先業若泥沙，總繇衣食習為侈靡，自矜豪舉。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積陰德者亦少矣，所以子孫不數年而凍餒離散也。³⁷⁰

總之，自古以來，書與讀書人本來就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讀書人買書、藏書，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古往今來，不知出現過多少耗盡平生精力，甚至是幾代人的精力，專事藏書而形成的藏書鉅族。³⁷¹他們在矢志藏書、苦心傳書的歷程中，懷著「子孫永保」和「詩書相傳」的美好願望，品嚐著得書的不易以及藏書的艱辛。此外，儒家傳統中「孝」的精神，以及「入仕」的思想，在在影響著藏書家堅定不移地進行著這一本業。³⁷²他們終身搜求、典守和悉心呵

³⁶⁹ 王億年，《任縣志》，卷 5，〈王震〉，頁 5 上-下。

³⁷⁰ 明·王弘，《山志》，卷 1，頁 2。

³⁷¹ 黃曉霞，〈私家藏書文化論〉，頁 36。

³⁷² 于璐，〈中國歷史上私人藏書家的藏書觀念〉，頁 30。

護圖書，藏書家族因而具有良好的家風傳統，進而得以綿延發展。

二、 藏書家的文會過從

明代的文人士大夫們，還有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集團性表徵，那就是喜好文會與結社。「結社」，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式，名目繁多，歷史悠久。「文人結社」，則是近古以來在特殊的社會體制、社會結構、社會文化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特定人群的特殊社會活動形式。「文人結社」發端於詩社、文會，亦以詩社、文會最為大宗，與文學有著密切的關係，隨著「文人結社」的發展，使其不僅成為一種影響文學發展的活動，更成為一種與社會經濟、政治、思想等有密切關聯的社會文化現象。³⁷³有明一代，文人們以文會友、詩酒酬唱、結聚論學、清議諷時，調為時代的風氣與社會的潮流。

文人結社最初的目的本是以文會友，即以「文」的方式，結成志同道合之友；自南北朝以來，則發展為文人們詩酒倡和的重要交流方式。但隨著唐宋科舉文化在社會中的影響，士子們結社，又轉變為探討舉業。明代中後期興起的文人結社，如文會、文社、講會等形式，都與科舉有著密切的聯繫。³⁷⁴譬如常熟縣藏書家錢謙益曾說：

余為舉子，與公安袁小修（袁中道）、丹陽賀中冷（賀世壽），卒業城西之極樂寺。課讀少閒，余與小修尊酒相對，談諧間作；而中冷覃思自如，一燈熒熒，《雪車》、《冰柱》，擊戛筆硯閒。迄今三十餘年，猶耿耿在吾目中也。³⁷⁵

其友湖廣名士袁中道，亦嘗謂云：

庚戌（萬曆 38 年，1610）計偕，予與李長蘅（李流芳，1575-1629）、韓求仲

³⁷³ 李時人，〈明代“文人結社”芻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1 期），頁 76。

³⁷⁴ 陽達，〈明代科舉文化與文人結社〉（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9 月），頁 11。

³⁷⁵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初版，據民國涵芬樓影印明崇禎瞿式耜刻本影印），卷 33，〈賀中冷淨香稿序〉，頁 17 下。

(韓敬，1580-?)、錢受之(錢謙益)諸公，結社修業，田仲與焉。時韓與錢皆收，而予等被落。及丙辰(萬曆44年，1616)，予幸叨一第，而長蘅與田仲復被落如故。予稍自幸其遭，而深為二名士抱屈，亦猶韓錢二社友，向者抱予等屈也。³⁷⁶

萬曆38年，錢謙益與袁中道諸人赴京參加考試，他們曾在考試前結社修業於極樂寺，彼此尊酒相對，談諧間作，為考試做準備。

此外，明代對會試落第士子的待遇與以往不同，士子會試未被錄取後，可直接入國子監讀書，等待下一次考試。北京國子監的士子，往往也會組成文會，彼此互相交流，做學術方面的探討。明人楊守陳(1425-1489)指出：

我朝進士之科，每會試所登，惟南北兩監之士，恒占十之七八。蓋監者，尤士之萃淵藪，琢磨石族礪之具既眾，且至非州邑庠校所能逮故也。士而游京居監。何友不可得？何道藝不可成哉？成化辛卯(7年，1471)春，監之士，有雅相善者廿有五人，胥約以文會，而主於盧解元楷之第。會則取五經群籍，相講解問難，各出所著共脩潤之，得善相勸，過失互規，充然各有得焉。一日燕懽取唐楊巨源(755-?)《東城早春》詩廿有八字，分為韻而詩之，總曰：《麗澤會詩》，易象傳有之，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二澤麗而相資朋友之會，而相資以之。然講以致知，習以力行知，行亦相資者。今諸士之解經、脩辭，講也；勸善、規過，習也，真得麗澤之象，過唐人之私試、夏課遠哉！自伐木廢，谷風興，朋友之道缺矣。而近世舉子尤相忌嫉，甚或不暇人。半章單辭，有若茲會，其近古哉之。廿五人者，皆一時之名士，會不旋踵，已多奮登于黃甲；餘雖尚屈，而黃甲之登，皆有可必觀，其詩亦足占矣。……其將颺颺而在廷，為雅為頌，以鳴國家之盛乎？尚各磨厲，無或玷瑕，庶後有傳焉之。³⁷⁷

³⁷⁶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卷11，〈徐田仲文序〉，頁517-518。

³⁷⁷ 明·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1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卷18，〈麗澤會詩序〉，頁5上-6上。

從詩序可看出，會中所展開的活動，像是「取五經羣籍相講解」，不僅有對舉業內容的學習與切磋，還有對其他史、集的探討。再來是透過類似的文會，去加強士子們之間的聯繫與交流，遵循「以文會友」的傳統道德原則。最後，則是作詩以紀事，用詩歌記載著他們此次盟會的盛況。文人們彼此積極的交流，很大程度的促進了區域學術之發展，也推動了當地文化事業的勃興。³⁷⁸

而文人所結社的場所，又叫做「社所」。作為全國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的京畿之地，總是各類文人集中的地方，往往成為歷代文人所選擇的結社地點。如洛陽，唐時有白居易之「九老會」，宋朝有文彥博（1006-1097）之「耆英會」，而明代的順天府，先後曾有「三楊」之結社、錢謙益諸人之結社、王世貞諸人之結社……等，幾歷有明一代而不絕。³⁷⁹「三楊」，即正統 5 年（1440），由江西藏書家楊士奇、楊榮及楊溥（1375-1446）等內閣重臣所組的「真率會」，《玉堂叢語》載：

正統五年，楊公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人倡「真率會」，敘略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德同志合而以自幸，於是皆老矣。……遂仿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酒各隨量，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為具簡而為歡數也。以是，歲二月六日，筆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顧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如羣玉交映，可謂盛矣。」³⁸⁰

與會人員皆是在朝為官多年者，會中簡單樸實，彼此文雅風流，道義相發明，可謂盛矣。而太倉州藏書家王世貞在北京當官之時，也曾加入王宗沐（1524-1592）、李先芳（1510-1594）、吳維岳（1514-1569）等人之詩社，而後又與李攀龍（1514-1570）、宗臣、梁有譽等人結社。「世貞好為詩古文，官京師，入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嶽（1514-1569）等詩社，又與李攀龍、宗臣（1525-1560）、梁有譽、徐中行（1517-1578）、

³⁷⁸ 陽達，《明代科舉文化與文人結社》，頁 148。

³⁷⁹ 李玉栓，〈中國古代的社、結社與文人結社〉（《社會科學》，2012 年第 3 期），頁 181。

³⁸⁰ 明·焦竑，《玉堂叢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7 月第 1 版），卷 7，頁 232。

吳國倫(1524-1593)輩相倡和，紹述何、李，名日益盛。」³⁸¹清人錢大昕(1728-1804)也曾提到王世貞與人結社的情形，曰：

(嘉靖)二十九季庚戌(1538)，二十五歲，(王世貞)在刑部任，與于鱗(李攀龍)以詩文相切劘。山人臨清謝榛(1495-1575)茂秦與于鱗善，而長興徐中行子與，南海梁有譽公實，廣陵宗臣子相，先後入社，彬彬稱同調焉。³⁸²

其中社員以謝榛最年長，在詩賦方面的成就也最大，故社中五人極為推重之。《列朝詩集小傳》載：

嘉靖間，(謝榛)挾詩卷游長安，脫黎陽盧柟于獄，諸公皆多其誼，爭與交驩。而是時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王世貞)，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茂秦，而于鱗次之。³⁸³

而後，隨著梁有譽、謝榛相繼離開北京，滑縣藏書家張佳胤與福建按察史余曰德(1527-1588)，也嘗與王世貞諸人結社。據《弇州續稿》載：

時歷下李于鱗與世貞相劘琢為古文辭，而吳興徐子與(徐中行)、南海梁公實，寔同舍郎；趙人謝茂秦自布衣，揚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吳明卿(吳國倫)自兩浙，入與朋焉。忘何，梁生死，謝生解，而公與司農郎蜀人張肖甫(張佳胤)繼入。³⁸⁴

錢大昕在《弇州山人年譜》中，又記云：「(嘉靖)三十四季乙卯(1555)，三十歲。……是歲，銅梁張佳胤肖甫入社，當時有七子之目，謂前五子及余、張二人也。」³⁸⁵至於李先芳於回京當官時，就曾與社中諸人有文會的活動，《國朝獻徵錄》載其：

及入為曹郎，居多暇日，而海內名能詩家：吏部宗子相、張助甫、兵部張肖

³⁸¹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287，〈文苑三〉，頁7379。

³⁸² 清·錢大昕，《弇州山人年譜》(《續修四庫全書》史部553，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潛研堂全書本影印)，〈二十九季庚戌二十五歲〉，頁4上。

³⁸³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頁423。

³⁸⁴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12，〈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午渠余公墓誌銘〉，頁3上。

³⁸⁵ 清·錢大昕，《弇州山人年譜》，〈二十九季庚戌二十五歲〉，頁5上-下。

甫、同部王元美、徐子與輩雲闕下，先生盡與之交，朝夕倡咏，期為復古，而諸子之名大噪長安，稱一代盛際矣。³⁸⁶

而順德藏書家梁有譽，亦好結社交友，其社友序其文集時，宣稱：「梁君比部，故所厚結社友也，援筆書之。」³⁸⁷尤其在嘉靖 32 年解官歸後，更是修復「粵山詩社」，邀請許多友人參與，一起發掘千古之事，「與歐楨伯（歐大任，1516-1596）、黎瑤石輩更倡迭和。」³⁸⁸其「修復粵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千古之事。」³⁸⁹同為社中成員的黎民表（1515-1581），所編的《清泉精舍小志》，就是粵山詩社作品中的一部份，黎民表嘗自稱：

曩予偕友人結社於粵山之麓，講德論藝，必以詩教為首。旦夕酬酢，可諷詠者至千餘篇。其後諸人宦遊四方，或伏匿巖穴，軌轍遂殊，昔日之所存者，僅什一而已。年祀浸遠，散逸逾甚，使平生之言遇佚弗彰，則予有罪焉。暇日因檢篋中，得古近體若干篇，哀而錄之，其名系於精舍者別為小志，而予兄弟屬和者亦附見焉。³⁹⁰

而黎民表的外甥黃在袞，同為社員，也在《清泉精舍小志·後序》描述當時社中的文會情形，云：

「清泉精舍」者，予舅職方公游玩之區也。……職方公伯仲棲息其間，嘗與梁比部諸公開雅社，倡清游，公則詞采縱橫，英葩茂燁，窺魏晉之間，奧涉隋唐之波流，點翰所貽祭焉。彪煥亦既，雄視當時，先登儔匹矣。故同好嚮慕，或命車過訪，或擔簦相造，輒雞黍終日，笑言暢適。³⁹¹

可以看出社中成員之開雅社、倡清游，彼此以文會友，以詩交流，成為一種文人的時尚。綜上所述，明代文人之好山水、友朋與文人相聚，可謂皆志同則道合，

³⁸⁶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77，尚寶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銘》，頁 39 上。

³⁸⁷ 明·梁有譽，《蘭汀存藁》（《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48，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初版，據湖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 24 年梁氏詒燕堂刻本影印），序，頁 2 下-3 上。

³⁸⁸ 陳田，《明詩紀事》，頁 1903。

³⁸⁹ 《蘭汀存藁》，附錄，頁 2 上-下。

³⁹⁰ 明·黎民表，《清泉精舍小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0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刻本影印），〈清泉精舍小志序〉，頁 1 上-下。

³⁹¹ 《清泉精舍小志》，〈清泉精舍小志後序〉，頁 1 上-下。

此誠如《西湖八社詩帖》序所言：

夫士必有所聚，窮則於學，達則聚於朝。及其退也，又聚於社，以託其幽閒之跡，而忌乎閒寂之懷，是蓋士之無事，而樂焉者也。古之為社者，必合道藝之士，擇山水之感，勝景光之邁，寄琴尊之樂，爰寓諸篇章，而詩作焉。³⁹²

另一方面，藏書家之間因校書、訪書、鑒別、題跋等藏書專業方面的問題，也必須結合眾人的意見，以交流知識與資訊，故亦必須有文會過從，藉以彼此互相傳達溝通與分享。因此，北京藏書家之間的文會交流活動，自明初伊始，便有記載。高陽縣藏書家孫承宗，好著述，亦好交游，「夫交遊贈答，觸燒成文，是以卷帙浩繁，幾於充棟。」³⁹³東明縣藏書家穆文熙，也是如此。所交游的對象，盡是海內名士，「築『逍遙園』居之，左圖右史，朝披夕諷；所交游盡海內名士，郵筒遍致，束脩之問，歲時不絕。」新安藏書家孟化鯉，收藏典籍廣泛，涵蓋六經、四子與諸氏百家。好交游，經常呼朋喚友，以詩酒交歡，「寒暑風雨之序，即種竹移花，呼朋招友，詩酒交權，流連光景，如文人曠士所戀戀而不能釋者，亦水淡而雲輕。每坐一室，取六經、四子、諸氏百家朗咏沉思，而隨閱隨契隨筆，若不知老之將至。其他他過客之造訪，嫺黨之宴會，世情以為必不能已也。」至於定興縣藏書家鹿善繼，與容城縣藏書家孫奇逢結為摯友，孫氏曾說：「與定興鹿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為口耳章句之學。」³⁹⁴《鹿忠節公年譜》也載：

二十五年（1597）丁酉，先生二十三歲。是年，孫啓泰先生（孫奇逢）總角遊泮，文名蔚起，嘖嘖鄉黨間；先生過容城，聞之，遂定交焉。先飲之致，勸酬歡然，春生滿座。親知迎者恐，率辭諸富貴，下北城榻以為常。³⁹⁵

當他們還年輕時，便相知相惜，結為摯友。鹿善繼交游廣闊，對待朋友都是誠心以對，一時文人名士，都與鹿善繼為莫逆之交。《鹿忠節公年譜》又載其友孫奇逢

³⁹² 明·祝時泰等，《西湖八社詩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15，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南京圖書館藏清鈔刻本影印），〈序〉，頁1上。

³⁹³ 明·孫承宗，《高陽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清初刻嘉慶補修本影印），序，頁4。

³⁹⁴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10，〈孫奇逢〉，頁1上。

³⁹⁵ 清·陳欽，《鹿忠節公年譜》（《叢書集成新編》10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初版），頁3。

所云：

公（鹿善繼）當大事不亂，即臨小事亦未不全力注之，公待小人最嚴，即於君子亦未嘗以名義寬之，如周公順昌、魏公大中、左公光斗、潘公宗顏（1582-1619）、范公景文、楊公嗣昌（1588-1641）、王公命新、張公鳳翔、姚公希孟（1579-1636）、耿公如杞（？-1631）、茅公元儀（1594-1640）諸君子，皆先生莫逆交。然卒未聞一事相比，蓋先生之於友，計道味不計世法，計公誼不計私情，皎然挺然，不隨人俯仰。³⁹⁶

此外，他還常與知名藏書家交游，除了與容城縣藏書家孫奇逢為好友外，也與吳橋縣藏書家范景文、同縣的藏書家范士楫結為好友。范景文曾說：「少與同邑鹿化麟交善，商榷古今學業，伸紙操筆，彼此互勘訂閱或呼酒抵掌論天下。」鹿善繼也曾論及范景文，曰：「樾舫者，范子箕生讀書所也。箕生賦才，其寄趣亦奇，畏俗子若膩。」兩人不時探討學業，互勘訂閱，或把酒以論天下。

而容城縣藏書家孫奇逢，除與鹿善繼相過從外，和范士楫也是好友，曾幫他撰寫的書寫序，《大清畿輔先哲傳》載：「士楫稟承祖父家學，慨友道陵夷，關乎世運隆替，乃著古人交箋以質孫奇逢，奇逢為序而傳之。」³⁹⁷三人皆喜好藏書，尤其是范士楫，時人稱其：「傾囊購異書萬卷，冥心探索，恆夜達旦。」當時，與孫奇逢為好友的，還有故城縣的藏書家沈嘉。沈氏好讀書，亦好交友，時與之交游者甚廣，尤其與孫奇逢為莫逆。據載：

（沈嘉）平生與德州盧世灌（1588-1653）、臨清汪大年以詩相唱和。游吳，交姚希孟（1579-1636）、楊彝（1583-1661）、顧夢麟（1585-1653）。游梁，交吳伯喬、徐作霖；與容城孫奇逢尤相知好。中歲作〈閉關疏〉，送客不出籬落，一畝之宮，花竹清深。著書、教士，從游者履滿戶外。³⁹⁸

至於蔚州藏書家魏象樞（1617-1687），除了是孫奇逢的好友外，與魏氏往來過

³⁹⁶ 清·陳欽，《鹿忠節公年譜》，卷下，頁 56-57。

³⁹⁷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19，〈范士楫〉，頁 1 下。

³⁹⁸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7，〈沈嘉〉，頁 1 上。

從者，尚有孫承澤、白允謙、刁包（1603-1669）、左光圖、魏裔介（1616-1686）、馮雲驤等人，他們經常彼此書信往來，探討學問之事。魏象樞自述云：

余讀書偶有所得，則返躬體認，自考得失，欲一請質高明，里中頗難其人，惟與都門之孫退谷先生諱承澤、陽城之白東谷先生諱允謙、祁州之刁蒙古先生諱包、應州之左翼宸先生諱光圖、容城之孫鍾元先生奇逢、柏鄉之魏石生先生諱裔介、溧陽之成我存諱性、代州之馮訥生諱雲驤，稱道義交，走書往來，商確學問，多所取益焉。³⁹⁹

至於大興縣藏書家孫承澤，交游更廣，多為當世名流、藏書家與收藏家。譬如他與嘉興縣藏書家兼收藏家曹溶（1613-1685），亦私交甚篤，兩人興味相投，同好收藏圖書，且經常交流彼此的藏品，或討論藝文之事。孫承澤曾經說過：

曹嘉禾（曹溶）有《山谷小字墓誌稿》二合裝一卷，董玄宰（董其昌）大書四字於後，曰：「山谷墨寶」，真墨寶也。嘉禾與余好尚相若，其應徵入京，盡以所攜卷冊送予齋，如米老卷、君謨卷及此卷（黃魯直《松風閣詩》墨蹟），俱累千百言，世不多見之珍也。⁴⁰⁰

曹溶不時將所收藏的珍品，送給孫承澤鑒賞。孫承澤也曾將自己所藏之書，回贈予曹溶，他說：「余歸山來，刻意讀經史之書，藏卷萬餘，絕不存一別乘。……宋人《應夢羅漢卷》，余贈嘉禾曹秋嶽（曹溶）。」⁴⁰¹兩人不時交會過從，關係密切。孫承澤除了與曹溶為好友外，也與同為嘉興縣的藏書家朱彝尊為好友。他們相識的過程，朱彝尊曾寫〈祭孫侍郎文〉，當中可略窺一二。朱彝尊說：

公之歷仕，記則有史；公之生平，藏則有銘，我姑略焉，詳公交情。往歲丁未（康熙6年，1667）我未公覲，公獲我詩，賓座賞擊。庚戌（康熙9年）八月，謁公之堂，我祛公攬，偕步於廊，款語未已，旋羅酒漿。自是過從，

³⁹⁹ 清·魏象樞，《魏敏果公年譜》（《百部叢書集成》94，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初版，），頁25下。

⁴⁰⁰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2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黃魯直松風閣詩墨蹟〉，頁17上。

⁴⁰¹ 清·孫承澤，《研山齋珍賞歷代名賢圖繪集覽》（《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7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董元仲集序〉，頁400-401。

月必三四，公召我趨，我歸公至，嗟世論交，不樂草茅。雖在丘園，以位自高，誰肯忘年，搗謙用勞。公以先覺，自稱同學。⁴⁰²

康熙 6 年，孫承澤還未見到朱彝尊前，是先拜讀到他的詩文，而對他所寫的詩非常讚賞。後來當朱彝尊首次拜訪孫承澤時，孫氏就非常親切的邀請他至廊下交談，兩人相談甚歡，孫承澤甚至屈駕以同學相稱，交往過從，非常熱絡。而後朱彝尊更經常拜訪孫氏，據《曝書亭集》載：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1635-1694）、吳江潘耒（1646-1708）、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鈞，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為冊，藏之「硯山書屋」。

403

會中，孫承澤與賓朋會文同樂，竟然拿出周代的季子佩劍給大家欣賞，並為此劍賦詩，而後再將眾人所寫之詩與劍上銘文記錄下來，裝訂成冊，收藏在孫氏的「硯山齋」裡，做為紀念。

真定縣藏書家梁清標，收藏典籍、書畫、鼎彝等甚富，交游也很廣泛。「清標雍容閒雅，宏獎風流，一時賢士大夫皆遊其門。每退直，日抱芸編，黃閣青燈，互相酬唱。搜藏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海內。」⁴⁰⁴因身處高位，所交游對象多為達官貴人。例如：梁清標與孫承澤亦為摯友，兩人雖相差 28 歲，但感情甚篤，關係密切，彼此之間也會經常交流。孫氏曾在《庚子銷夏記》云：

庚子夏（順治 17 年，1660），聞無錫華氏有子畏（唐寅，1470-1524）所作畫十二幅在龔合肥處，議以舊人書畫相易。真定梁玉立（梁清標）見而愛之，

⁴⁰²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31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80，〈祭孫侍郎文〉，頁19上-下。

⁴⁰³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46，〈周延陵季子劍銘跋〉，頁6下-7上。

⁴⁰⁴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卷21，〈梁清標〉，頁5下。

攜去，至五月初，余復借至「東籬書舍」藤下，每日晨起輒一披。⁴⁰⁵

說明兩人早有以書事過從的記載，也看出兩人對書畫珍品的喜愛與不藏私。梁氏在孫氏壽辰之際，也寫過一首詞〈壽退谷先生〉，向他祝壽，略云：「聖朝遺老，擁琴樽圖史，……謝客著書多歲月，小閣藤深松茂。鶴髮丹顏，憑煙雲好，供養容如舊。春風盈坐，笑看車馬馳驟。」⁴⁰⁶而當梁氏被朝廷派往外地辦差時，孫氏還特地來送他，為此還曾寫詩紀念，詩云：「擁書萬卷掩柴門，廿載唯看送兩生。……河梁此日圍其興，潭水當年逐客情。謾說青門多祖帳，感君交誼每沾纓。」⁴⁰⁷詩中提到，孫氏擁書萬卷，顯少出門，二十年來出城送別的，只有魏裔介相國跟他而已，每當想起這件事，就非常懷念孫氏和自己的友誼。而當孫氏去世時，梁氏又寫了一首〈挽孫北海先生用環溪韻〉的詩，來重敘他們之間的舊誼，詩云：「不見長安白髮翁，論交風雨更誰同，空留遺稿雞窗北，無恙藤蔭鳳闕東。齒入香山圖畫裏，名高元祐黨人中。典型寥落頻回首，廿載床前拜德公。」⁴⁰⁸從詩中不難看出他們兩人的好交情，而他們之間的交往也長達了20年之久，梁清標很珍惜這一段友誼，也非常敬重孫氏的為人。

至於靈壽縣藏書家傅維鱗，與梁氏三兄弟交情頗深，梁氏三兄弟指的是真定府的梁清寬、梁清遠與梁清標。明末之時，三人曾與傅維鱗同在「恒陽書院」讀書，同享「河北七才子」之號，關係非常好。而後又同朝為官，交情匪淺。他們甚至為了讓友誼可以世代相傳，還互相結成了親家，梁清遠把女兒嫁給了傅維鱗的長子傅燮離，而梁清寬也將女兒嫁給了傅維鱗的次子傅燮詞。雖然如此，三人當中，可以看出傅維鱗與梁清標的過從，似乎更多了些。⁴⁰⁹傅維鱗曾做〈和梁玉立司馬城邊亭飲之作〉詩一首，曰：「曲曲穿林草逕斜，亭虛旁倚兩三家。留春客到矜群玉，隔岸桃開聞落霞。聰徽黃鵬催換酒，驚將青案接飛花。莫言宦邸無清

⁴⁰⁵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3，頁29上。

⁴⁰⁶ 清·孫默，《十五家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49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5，〈壽退谷先生〉，頁14下。

⁴⁰⁷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七言律三，〈退谷先生云二十年閉戶唯送貞庵相國及余始一出耳感而賦此〉，頁1上-下。

⁴⁰⁸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七言律四，〈挽孫北海先生用環溪韻〉，頁64上。

⁴⁰⁹ 武玉梅，《傅維鱗與《明書》》，頁40。

賞，且向東風醉物華。」⁴¹⁰兩人不時一同出遊，吟詩作對，探討藝文之事。又做〈讀大司馬梁玉立詩〉，略敘兩人的深後情誼，其詩曰：「締盟總角久相親，乍睹鴻篇推服真。應是玉皇香案吏，信為塵世謫仙人。蕉林落筆驚風雨，樞府前籌動鬼神。慚愧無能酬隻字，望洋徒有嘆迷津。」⁴¹¹可以看出兩人私交之篤，以及傅維鱗對梁清標文學風采的欽佩之情。

傅維鱗除了與梁清標為好友外，亦與文安縣藏書家陳協為好友。傅維鱗嘗與梁清標、陳協一同出遊，且賦詩〈同梁玉立、劉淇瞻、司馬朱有君、陳念燼、司農何誕登夕郎飲城隅亭子〉，云：「脫却朝衣便是仙，相期聯騎踏郊原。原花光全菴虹橋，水柳色遙侵雉堞烟。六逸合成新竹野，五陵人醉舊李泉。當筵月上歡情劇，遑問燕城玉漏傳。」⁴¹²

此外，傅維鱗、梁清標與宛平縣藏書家王崇簡也是好友，梁與王兩人既同門又同年，關係非常密切。梁氏就曾寫過一首〈贛州得王敬哉同年寄來家報〉詩，就是寫給王崇簡的，曰：

老友托魚素，剖之魂欲斷。中藏吾弟字，雲自燕臺畔。奚翅照乘珠，未開心歷亂。展讀悖始寧，意周語非謾。平善喜妻孥，稚兒體亦胖。舉手謝蒼昊，顛倒復詳玩。憐余涉風濤，白髮遠過半。殷勤感故人，寄我青玉案。勿言道阻長，稍遣客慮散。一紙抵萬金，昔人云豈誕。益信行路艱，刻燭興永歎。⁴¹³

至於傅維鱗，則在《四思堂文集》中，一共寫了 21 首詩與王崇簡唱和，如：〈和王敬哉先生〉、⁴¹⁴〈冬月感懷二十首和王敬哉先生〉⁴¹⁵……等。從詩題和詩的內容，都大概可以看出傅維鱗對王崇簡的敬重，以及兩人之間深厚的交情。

⁴¹⁰ 清·傅維鱗，《四思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1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影印），卷 8，〈和梁玉立司馬城邊亭飲之作〉，頁 12 下-13 上。

⁴¹¹ 清·傅維鱗，《四思堂文集》，卷 8，〈讀大司馬梁玉立詩〉，頁 13 上。

⁴¹² 清·傅維鱗，《四思堂文集》，卷 8，〈同梁玉立、劉淇瞻、司馬朱有君、陳念燼、司農何誕登夕郎飲城隅亭子〉，頁 15 上-下。

⁴¹³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五言古二，〈贛州得王敬哉同年寄來家報〉，頁 2 下-3 上。

⁴¹⁴ 清·傅維鱗，《四思堂文集》，卷 7，〈和王敬哉先生〉，頁 14 下。

⁴¹⁵ 清·傅維鱗，《四思堂文集》，卷 7，〈冬月感懷二十首和王敬哉先生〉，頁 15 下-18 下。

綜上所述，明代北京的藏書家們，普遍喜好文會結社，並標榜文學社群。一如明朝文人的性格特徵，北京藏書家們也崇尚以文會友、詩酒酬唱、結聚論學、清議諷時，蔚為時代的風氣與社會的潮流。尤其明代北京是各省士子參與會試、殿試的地方，使得天下英才彙集於此，許多文人士大夫便也在此以文會友，號召天下，以藝文的方式，結合許多志同道合之友，特別是明代中後期在京興起的許多文人社集，如文會、文社、講會等形式，其實都與科舉有著密切的聯繫。此外，不少藏書家之間因校書、訪書、鑒別、題跋等藏書專業方面的問題，必須結合眾人的意見，以交流知識與資訊，也必須有文會過從，彼此互相傳達溝通與分享。他們經常會定期或不定期舉辦文會活動，且活動的形式或內容非常豐富，有的是呼朋喚友，以詩酒交歡；或是集會論學，議論時局；或討論板刻，品味書籍。就藏書社群而言，他們彼此借觀，探究源流，更經常攜帶珍藏的鼎、彝、器物、法書名畫，或是其他類型的古董與文物，彼此觀覽，相互賞鑒。由於古代的藏書家幾乎都是文人，所以，欲了解明代北京文人士大夫的結社文化、交游方式、文會活動與區域文化特色等，當然也可以從藏書家的社群生活切入，進行深度性的考察與討論。



第六章 明代北京藏書家的藏書生活

第一節 藏書的徵集

一、購求

中國古代藏書家書籍的主要來源非常多，一般而言，購買及抄寫是最主要的途徑。此外，也可以透過朝廷賜書、他人贈送、同好交換，乃至撿拾、乞贈、查抄、竊奪……等不同手段或管道。不過，往往會因人、因時、因地之不同，而演繹了無數的藏書徵集圖書的故實。⁴¹⁶考諸史載，其中又以錢幣購買，為歷代藏書家最主要的藏書擴增方法之一。尤其是在宋代以後，隨著全國性書籍貿易日漸普遍與發達，藏書家購買所需要的圖書比例，也隨之越來越大。⁴¹⁷誠如前文所述，明代北京的圖書市場馳名全國，為士人收購書籍的重鎮。當地官商雲集、人文薈萃，書籍市場十分活絡，書商們的足跡在城鄉之間隨處可見。⁴¹⁸明中葉松江藏書家陸深（1477-1544）就曾說：「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覩覩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⁴¹⁹明末松江縣文人陳繼儒（1558-1639）也曾描述山西降州的藏書家韓霖（1596-1649）云：

孝廉韓兩公（韓霖）自絳州來訪余，長七尺，議論英偉。兩公好遊，復好書，其遊也，亦以訪書。韓之先京兆、司空，多秘籍，鴻臚景伯繼之，合得萬餘卷。兩公悉推與景伯，而身則重購之四方。每遊都邑及委巷小市中，輒下車徒步，反覆搜詰，必窮其耳目之所未睹。或見之他所，莫能得，則忽忽悵嘆，為轉展抄錄而後已，其勤于購書如此。因建「三十乘樓」藏焉，取張茂先語

⁴¹⁶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頁 79。

⁴¹⁷ 陸漢榮、秦健民，〈淺論古代蘇州藏書家的藏書來源及藏書功績〉（《蘇州大學學報（工科版）》2004 年第 6 期），頁 103。

⁴¹⁸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60。

⁴¹⁹ 明·陸深，《儼山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55，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28，頁 5 上。

也。經史子集皆擯而度之，而不喜佛道兩藏，直謂橐金而求之南北都，立辦矣！⁴²⁰

從這裡就可了解到明代喜好藏書的士人們，在書籍的取得上已經是非常的容易與便捷，多能飽其所欲。儘管如此，圖書的徵集還是有其困難的地方，尤其藏書家收集藏書並非濫收，徵書過程都會有自己的收藏喜好及目的。但由於古書流傳甚少，特別是蒐藏一些珍本秘笈，想要得到更是困難，加上自然的、社會的種種條件限制，藏書家們往往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能羅致。清代藏書家孫從添（1692-1767）就曾嘆聚書有六難，曰：

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知有是書而無力購求，一難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難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於一時，不能複購於異日，三難也；不能搜之於書傭，不能求之於舊家，四難也；但知近求，不知遠購，五難也；不知鑑識真偽、檢點卷數、辨論字紙，貿貿購求，每多缺佚，終無善本，六難也。有此六難。雖有愛書之人，而能藏書者鮮矣。⁴²¹

這六難，說明了藏書家在訪書的過程中，所會面臨的困難有哪些。當然，要訪求珍本秘笈所將面臨的問題，會更加的艱鉅，也時時提醒藏書家們必須要注意與克服。

明代北京藏書家徵集圖書時，也是花費很大的心力。東明縣藏書家穆文熙，「購書十餘萬卷」，藏書量非常豐富。元城縣藏書家趙虞保，「由恩貢司訓元城，喜為詞賦，與門士談文孜孜不倦，所獲俸薪盡購書，首蓐盤中，別具氣味焉。」趙虞保為儒學教官，俸祿本就不多，復因喜愛購書，每月所得薪俸，都會拿來買書，自然必須忍受生活清貧的境遇，這是古代多數藏書家所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任邱縣藏書家劉正，「購書甚富，南游江淮與諸名士集，文名藉甚。」大名縣藏書家

⁴²⁰ 明·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明崇禎間華亭陳氏家刊本），卷 23，〈聚書樓記〉，頁 23 下。

⁴²¹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叢書集成新編》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初版），第 1 則，〈購求〉，頁 753。

王三顧，為了購買珍奇的書，也不惜囊橐羞澀。「遇異書，不惜傾囊購之；與人交，樂易真實，談笑傾倒；有不合，即揚然引去不顧，人或以此病之。」足見其購書之勤勞，也樂於與人交往。廣宗縣藏書家王愜，「於書，愜尤好之，多方購求期必得，以故藏書甲一邑。」喜愛藏書，只要是遇到喜愛的藏書，無論多艱難，一定多方訪求，以必得為職志。真定縣藏書家王兆泰，「每遇異書，必購求手錄，吟哦不輟。」喜愛讀書，不論各種圖書，他都愛閱讀，且只要遇到喜歡的，他都一定會買下來，然後不斷的誦讀。同屬真定縣的藏書家梁清標，也喜好買書，曾寫過一首〈燕市歌〉，來描述他在北京買書的情形，歌云：

燕市泥滑愁出門，吾兄招我開清樽。解衣盤礴夜稍霽，冰糸九皎潔珍錯陳。雄辯袞袞喜不竭，簷花飄落香氤氳。久雨淋漓多漏屋，買書無錢兼買粟。車馬雜逕塞中衢，身歎轅駒空蹇蹇。浹月不覩故鄉書，終朝畏見新除目。⁴²²

而定興縣藏書家范士楫，「獨好與古人交，傾囊購異書萬卷，冥心探索，恆夜達旦，著作故博通。」其友鹿善繼，也曾形容他「賦才奇，寄趣亦奇，畏俗子若膩，獨好與古人交，不惜捐囊購異書，沉酣萬卷。」范士楫為了購書，不惜散盡貲財，就是為了滿足自己對書籍的喜好。此外，他也會善加利用這些藏書，從事寫作工作，故其著作非常豐富。他與同縣的藏書家鹿善繼結交，彼此談藝論學，或校勘藏書，或討論聖賢。霸州藏書家張維，也是愛書之人，恣情購置。「晚年兩目盲，尚能寫行草。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年。」可見張維也是愛書之人，即使晚年失明，只要知道有新書出來，一定加以購買，並請人唸給他聽，如此持續了數年，故其愛書之情，可謂溢於言表。

至於當朝駙馬鞏永固，也是愛好購書之人。明末京官李清，曾經敘述一段在北京書肆與鞏永固爭買圖書的軼事，他說：「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泳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其價，予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問之，乃鞏駙馬永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李清於崇禎年間，先後任官北京吏、刑、工部等給事中，故由以上故事，可以瞭解到明末政局

⁴²²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七言古一，〈燕市歌〉，頁8下。

之黑暗，即便世道紛攘，流寇與滿清都嚴重地威脅著京師的安全，然而北京書市，似乎沒有受到明末亂世的影響，市場上的生意照常運作，顧客亦頻頻光臨選購，甚至連當時世人普遍認為不尚問學的皇親國戚如駙馬等，竟也癖嗜購書，由此便可以略窺明末北京藏書風氣的繁盛，以及書籍市場的榮景之一景。

此外，文人的購書行為，除了收藏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這些書籍來閱讀或著述。章邱的張茂蘭，於任邱縣知縣任內時，就經常購買書籍，據載：「先生少有志性，一介必慎取。與顧署飲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弘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知鉅鹿縣，為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闋，起知任邱縣，……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張茂蘭購書並不僅止於自己本身之學習，也會將所學傳承給子孫，或是為地方士子閱讀之用，都是為了培養更多的人才。至於北京方九敘任職京官時，亦「多購羣書，勤為士子講析。比行，羣下泣送載路。」



二、抄書

另一方面，除了購書外，抄錄書籍，仍是明代北京藏書家獲得圖書的主要方法之一。尤其是在是在訪書沒有著落、或是貲財不夠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古代藏書家，都會以抄書的方式來獲得書籍。雖然自從印刷術發明和普及以後，書籍製作的成本，較之以往，已經降低了許多，不過，抄書卻仍然是藏書家們補充藏書的重要手段，茲分析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三：⁴²³

- (一)、有些書雖已雕版印刷，但由於空間的限制，交通不發達，因此無法買到。
- (二)、有些書雖可買到，但是品質低劣，錯誤百出，只好尋求版本較好的來抄寫。
- (三)、有些書在市面上買不到，只好借書抄錄。

⁴²³ 陳冠至，〈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2009年第1期），頁117。

儘管如此，還是以經濟因素為最主要的考量。根據今人的研究指出，明萬曆年間，書價平均每冊約 0.28 兩銀左右，當時北京的豬肉價和鮮魚價，平均每斤約 0.02 兩銀。相比之下，一冊書籍可買約 14 斤豬肉或魚，對普通市民或農民來說，書籍算是相當昂貴的奢侈品。若以當時一個刻書工人每月的工資僅 1.5 兩銀來看，養家尚覺困難，根本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購買書籍。⁴²⁴因此，清寒之士，仍然只能透過借閱與抄書的方式，來滿足書籍的需求。例如玉田縣藏書家張儒，因家貧買不起書，便四處向親友借書來抄寫，寒暑不輟。」故城縣藏書家沈嘉，年少時也曾經因為貧窮，而經常向藏書家借書抄錄，獲取圖書，「遂博通諸籍。」以上諸家，都是因家貧無書，而走訪其他藏書家，或是到親朋好友的家中去借取書籍，然後透過抄錄的方式，來蒐集藏書，這是明代北京地區藏書家常用的方式之一。

此外，抄書在一般人看來，也許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但仍有不少文人嗜好抄書，重視抄本，且一生不改其抄書癖。譬如豐潤縣的魏緝，好抄書，「逾九十，不釋卷，抄古書細字，日猶數幅，夙興夜臥有常候。」任邱縣的邊舉，也是「性好抄書，至老不輟。」清苑縣的藏書家郭名揚，所收藏的書，都是自己親自抄寫回來的，其家「積書百卷，皆手錄。」上述諸家，都是喜好抄書的藏書家，自少至老，都勤奮的抄書。大興縣藏書家孫承澤，家中藏書甚富，他的藏書樓「玉鳧堂」，積書高達七萬餘卷，當中就有許多抄錄自其他藏書家的珍本秘槧。孫承澤雖身在官籍，頗不乏貲財，然於宦旅途中，仍然不免需要透過抄錄的方式，來積累他的藏書。據《五經翼》載：

時海內藏書家，稱汴中西亭王孫（朱睦㮮，1518-1587），余宦汴時，西亭已歿，與其孫永之善，因得盡窺其遺籍，約十萬餘卷，尤重經學，中多秘本，世所鮮見。余雖困頓簿書，日借其學一類，課兒輩抄錄之，携歸京師。壬午（崇禎 15 年）河決，王孫之書，盡沈洪流中，賴余家猶存其十一。至甲申之變，余家「玉鳧堂」，積書七萬餘卷，一時星散，無復片紙存者。是歲秋，僵卧城東「魚藻池」上，書賈荷書來售，多余家故本，印識宛然，泫焉欲涕，文中

⁴²⁴ 袁逸，〈中國古代的書價〉（《圖書館雜誌》1991 年第 4 期），頁 58。

秘故藏，狼藉於市。⁴²⁵

孫承澤敘述當時海內的藏書家，首稱汴中西亭王孫，即周藩子孫朱睦㮮的藏書，多達十萬餘卷。當他在汴中當官時，朱睦㮮已歿，有幸結識其孫，因得盡觀聞名天下的西亭藏書。但當時周藩並不打算出售家藏典籍，且孫承澤每天都忙於公事，只好每天向周藩借一種圖書，然後督促兒子們抄錄複製，最後再一起帶回京師皮藏。獻縣的戈繼皋也曾在明末世亂之時，見地方無書可讀，便四處徵集圖書，凡有借得之書，即親自抄錄，製作副本以藏之，日夜不曾間斷。「時經明末亂後，老師宿儒都盡，豐莊地僻陋無書，繼皋自京師所携一二經外無所有，乃於遠近搜假，得即手自抄錄，久之，所抄日多。汎覽精思，有未通，日夜忘寢饋，以此得咯血。」戈繼皋如此辛勤的抄錄書籍，甚至為此而咯血，其用意就是為了讓地方學子有書可讀，對於本地圖書的流通，以及學術文化的傳承與推動，可謂居功厥偉。

抄書既是文人獲致藏書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就像收藏圖書一樣，藏書家們都有自己偏好抄錄的書籍，並喜好將抄書融入日常生活當中，時時品味其中的樂趣。霸州的郝鴻猷，好抄書，喜好先秦兩漢及唐末諸家的文章，凡有所得，都會自己親自抄寫，並且盡心的典藏。「日取先秦兩漢，以及唐末名家金匱石渠之文，謀野藏山之記，無不手自抄寫，沉酣枕籍於其中。」順天府的李紳，則偏好收藏道家典籍，公車遷轉，累有所獲，以是「多蓄道書，手錄至盈箱篋。」張佳胤在擔任滑縣知縣的時候，也是收藏很多圖籍，且只要是有關滑縣的地方文獻，「羣集史冊，凡關滑者，則手自抄錄」

另一方面，文人喜歡抄書，亦成為學習上的一種樂趣，甚至轉變為文士們著述與創作的方式。例如大興縣的李經國，兒時就常閱讀父親李碩的藏書，潛心性理，並手抄成書，只要有所領悟，就會寫成文章以流傳。「潛心性理諸書，手抄成帙。好讀易，有得即為文發之。」古來藏書最重訪求，文人為了蒐訪心儀的圖書，常常歷盡千辛萬苦，故所羅致的書籍，自然要倍加珍愛，尤其是秘籍異書，更是寶重異常。當知識分子看淡世情，率性而絕意仕途，轉而終日與書籍為友，追求

⁴²⁵ 清·孫承澤，《五經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 15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2年刻本影印），頁105-106。

恬淡閒適的生活態度，可在訪書、購書、抄書的行動當中，表露無遺。同時，從書籍中除了可以獲得知識泉源外，還有一種相惜相伴的情感，也反映出文人雅士對書籍愛護與珍惜的情懷。⁴²⁶藏書家們努力購書、抄書與護書，豐富自己的藏書生活，為保存中國古代的學術與文化，做出重大的貢獻。

第二節 藏書的貯存

圖書的保護與典藏，一直都是藏書家們非常重視的環節。為了減輕天災人禍等因素對圖書造成的破壞，使得圖書可以「久傳後世，津逮子孫」，所以明代的藏書家們，也都很重視圖書的貯存與保護，並且在學習官府的藏書經驗，同時總結了民間智慧的基礎上，努力地探求保護圖書典籍的方法與措施，並予以採用，以確保其安全。⁴²⁷因此，在中國古代藏書保護的漫長實踐中，藏書家們逐步形成了一些有利於保護藏書的理念。其中，有些理念還逐步地演化為藏書家們的共識，進而變成藏書家活動的規範和自律的要求。他們甚至把愛護圖書，視為一種高尚的品行，提倡愛書護書，反對壞書損書。此外，他們也從藏書實踐活動中慢慢意識到，單從維護文獻載體，或是僅對文獻典籍進行保護，是很難達到永久性的保存，於是他們開始把眼光轉向對文獻典籍內容的保護和保存，也就是透過抄書的方式，將同一內容的文獻製成副本，讓同一文獻的內容，在多個載體上再生。他們這樣做，就是為了預防了「書種」的絕跡，這不僅僅是藏書保護方式的一種變革，更體現出中國古代藏書保護理念的先進。⁴²⁸

古往今來，藏書散失損毀的原因非常的多，既有政治的原因而遭焚毀，又有兵燹的原因而致散失，但除了人為的破壞之外，書籍毀於自然的因素也很多。儘

⁴²⁶ 呂允在，〈訪、購、借、抄—明人讀書生活的一個側面〉（《藝術學報》，第 85 期，2009 年 10 月），頁 512。

⁴²⁷ 林琳，〈明清私家藏書的采藏與保護〉（《圖書館學刊》2012 年第 4 期），頁 127。

⁴²⁸ 徐凌志，〈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理念及措施〉（《圖書館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58。

管古人藏書非常謹慎，但水、火、蟲等，依然吞噬了大量的古籍，受損情況非常嚴重。⁴²⁹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措施，歸納起來，大體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秘藏，即將文獻典籍藏於金匱、石室、屋壁或石洞之中，以求永久保存。二是「四防」，即採取防火、防水、防蟲、防黴的措施，保證藏書不受損害，以求文獻典籍能保存更長的時間。三是嚴管，即訂立諸如「書不出閣，代不分書」、「杜絕火種，樓不延客」之類的管理制度，以防藏書遭遇不測。⁴³⁰

明代北京藏書家輩出，對於家中典籍的保存，也是非常講究的。首先，他們經常透過特別建造，而專門用來收藏圖書的藏書樓，以隔絕日常生活中可能引起的一切災害，並保障藏書的安全。順天府藏書家紀克揚，「構別業三楹，陳列圖書」，即是透過打造專門的建築物，來保護心愛的藏書。同屬寶坻縣的藏書家崔周田，也是如此。「性嗜書，嘗建一樓，聚古本及金石刻萬卷藏之，終日吟蕭其中。」文安縣藏書家陳良瑛，「家有樓三楹，皆貯書，日取讀之，每日積帙至寸乃罷。」由上可知，明代北京的藏書家，於建立藏書樓或另闢專室以貯存書籍上，所付出的心血。同時，在他們建造專門藏書的書樓或專室時，為了表明自己的藏書心志，往往也會給藏書樓起一個或多個名字，以寄託情感、志趣、心性和情操。⁴³¹譬如一代收藏大家梁清標，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北京藏書家，他篤嗜藏書，「蕉林書屋」便是他在真定縣的一處藏書處所。關於「蕉林書屋」的構築與室名的緣起，梁清標曾經說過：

「蕉林書屋」者，予之所構以藏書，而燕息詠嘯於其中者也。予性不敏，不能博聞強記，以窺夫古人之學，顧好買書，奉錢恆苦不給，見人則求所未見書，得一帙如遇故人，輒怡然累日，然，率不能讀也。久之，所蓄益多。又特愛芭蕉青翠舒卷自如，有林下風味，於是築室布席擁其間，自謂南面百城，不以此小。畦種蕉數叢，掩映窗幾，迎風搖曳，庶幾可忘暑渴而澹塵也。蓋蕉之為物，于晴日和風、輕陰皎月，無不宜，而尤宜於雨浙瀝空階，聲響互答，孤客聞而興思，幽人為之舒抱矣。嘗聞懷素（725-799）嗜書，無紙，種

⁴²⁹ 馮淳玲，〈古代藏書之保護〉（《圖書與情報》2003年第4期），頁75。

⁴³⁰ 徐凌志，〈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理念及措施〉，頁58。

⁴³¹ 王震生，〈藏書樓趣名及興衰探微〉（《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頁102。

蕉數萬本，取葉供書，號所居曰：「綠天」。古人高致如此，予非工書者，而竊有取於蕉，當其廣敷清陰，湛然如水，吾不知於「綠天」之居何如也？⁴³²

可知書屋冠名「蕉林」，一則因主人「特愛芭蕉青翠舒卷自如，有林下風味」，二則係主人仰慕懷素之「種蕉數萬本，取葉供書」的高致情趣，以及崇尚草聖灑脫豪放的性格和書風。⁴³³梁清標還曾為其「蕉林書屋」作歌一首，歌云：

主人疏放麋鹿性，小築茆茨愛幽靚。地偏偶結陶潛廬，客至暫開蔣詡徑。種蕉陰陰如綠天，北窗長日疑小年。攢莖抽葉布清影，赤日障蔽空堂寒。倚檻數竿竹，仿佛瀟湘浦。秋晚畦流漠漠雲，夜涼簾卷聲聲雨。主人樂此長閉關，簷花如綺圖書閒。當門不種鉤衣草，入室頻移幽谷蘭。車馬九衢任雜遝，坐擁萬卷心悠然。焚香偃仰復何事，蕭颯志在滄洲間。塵瑱紛紛安所極，獨上元龍樓百尺。自笑平生與世違，且對蕉林共晨夕。出門波濤滾滾來，仰視浮雲興太息。⁴³⁴

至於東明縣藏家穆文熙，其藏書室名「逍遙園」，「積卷帙至十餘萬，朱墨點竄盡，為重覆所刪書數十種。」冀縣藏書家汪元范，也是如此，「築『散木齋』以自娛，建『不二軒』、『陸地舟』，貯古今書籍。」

藏書樓名的命取，往往也包含豐富的文化內蘊，它反映出藏書家不同的志向、情趣、修養、操行以至收藏狀況，命名也是多種且多樣。⁴³⁵例如藏書樓的命名，其中就有為了誇示藏書之富，從而帶有數字的樓名；也可從中領悟出藏書家搜訪、呵護圖書的艱辛歷程。其中，又以萬卷樓中的「萬卷」，命其樓名者的藏書家為最多。⁴³⁶譬如大興縣藏書家孫承澤，「築『萬卷樓』，藏書甚富。」⁴³⁷而深澤縣藏書家張立愛，也如同孫承澤，「嘗築『萬卷樓』，藏書甚富，以遺子孫。」儘管如此，

⁴³² 劉金庫，《「南畫北渡」：梁清標的書畫鑒藏綜合研究》（南京：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論文，2005年5月），頁141。

⁴³³ 杜平，〈正定梁氏家族古建築〉（《文物春秋》2009年第5期），頁30。

⁴³⁴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七言古一，〈蕉林書屋歌〉，頁20下-21上。

⁴³⁵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頁242。

⁴³⁶ 王震生，〈藏書樓趣名及興衰探微〉，頁103。

⁴³⁷ 錢泳，《履園叢話》（北京市：中華書局，1979），卷10，〈收藏·總論〉，頁262。

卻有更多明代北京的藏書家不喜歡標榜藏書數量，即便藏書達萬卷以上，但藏書室仍不以此為名，甚至沒有室名或樓名。⁴³⁸例如：清苑縣的藏書家劉昌祚，「沉酣古籍，寒暑無間，闢一室，督子弟誦習之，積書萬餘卷。」曲周縣藏書家聶繪于，也藏破萬卷，卻又不喜歡標榜藏書數量的明代北京藏書家。他「築書樓，珍襲萬卷。每披閱，盥手正襟，矻矻不少倦」，也沒有替自家的書樓起名字。所以，無論是標明藏書之富的「萬卷樓」，還是未標明藏書室名而藏書萬卷的明代北京藏書家，他們的目的，都是致力於搜藏大量的書籍，以豐富自己的藏書為職志而已。

此外，明代北京的私人藏書樓中，也有以主人的號來取名的。譬如宛平縣藏書家王熙，字子雍，號慕齋，卒諡文貞。其藏書樓名，就叫做「慕齋」，據載：

文貞公好遊，歲常徧歷西山諸勝，恐勞於陟，乃構「怡園」於宅之西偏，亭臺花木，歲加葺治，文貞公顧而樂之。……書屋曰：「慕齋」。⁴³⁹

任邱縣藏書家邊憲，也是以號文書室名。邊憲字汝明，號東阜，「致仕，築『東阜堂』，日坐其中，游情書史。」他們都是用自己的號，來命名自己的藏書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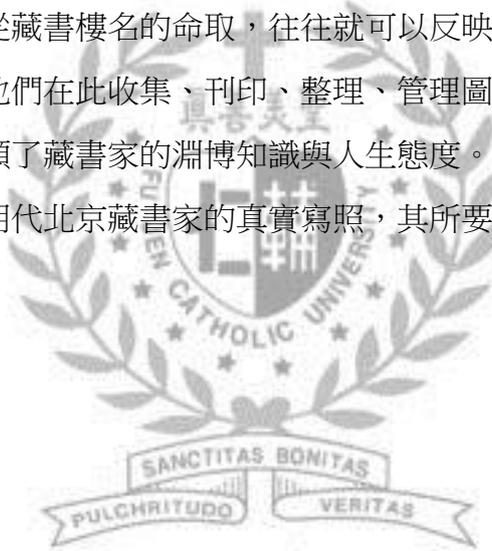
此外，也有藏書樓的命名是以自勵、自勉的方式，來描寫自己的讀書意境。例如任邱縣藏書家李汶，「建書樓，公取裴晉公意，題之曰：『書種』。臨沒，猶以讀書為遺命也。」「書種」，也就是讀書的種子，他期許自己與後世子孫，是世代相承的讀書人，而將藏書樓取名為「書種樓」。費閻，字廷言，號補菴，江蘇人，時任北京國子監司業，故藏書於北京國子監舊司業署中，而名之為「向陽書屋」，蓋因「屋之位南，南方在先天卦，位為乾；在後天之卦，位為離，蓋陽位也，故其屋以「向陽」之名也。而日者陽之宗，君之象，向平陽，即向乎君矣，此「向陽」之所以名也。不曰：「向君」，而曰：「向陽」者，何也？君之清光，不得非時密邇，而日則往來於屋，朝夕與之，俱有忠受之誠者，而乎曰：『必能心乎君也。』屋之中無尤物焉，聚書千餘卷，先生於是書，譬之河海然，既已，涉其流而探其源。」他將自己的藏書樓取名「向陽書屋」，其名就是取自樓的方位而來，並且是

⁴³⁸ 曾昭聰，〈歷代萬卷樓及其藏書〉（《華夏文化》2001年第2期），頁59。

⁴³⁹ 清·王熙，《王文靖公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1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王克昌刻本影印），行狀，〈王熙〉，頁22下。

以表明主人之讀書心志，並勉勵向學為宗旨。至於高邑縣藏書家趙南星，「閉門讀書，彼蒼不終，憤憤也。至代，僦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土室，顏曰：『味藁齋』，日夕開卷，或弄筆為適。」他築一小樓叫「吉祥樓」，喜歡在藏書樓裡看書、喝酒、寫詞，悠然自得其間，而不喜歡別人打擾。總之，明代北京的私人藏書樓之命名各式各樣，有的用來自勵自勉的，有的則是專門為自己讀書的地方取名的，均依書樓主人的志趣而定。

綜上所述，明代私人藏書家藏書、愛書，為了使自己的藏書得以永久流傳，不斷的找尋與嘗試最好的藏書保護方式，讓所藏圖書得以得到最佳貯存與保護。此外，舉凡愛書的藏書家們，通常都會建置藏書樓來收藏圖書，藏書樓可以說是藏書家精神的寄託，從藏書樓名的命取，往往就可以反映出藏書家不同的志向、情趣、修養、操行。他們在此收集、刊印、整理、管理圖書，注入收藏者的人生理想與精神風貌，彰顯了藏書家的淵博知識與人生態度。⁴⁴⁰這些藏書樓的建築與管理方式，可以說是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真實寫照，其所要表達的精神，也正為後世所效仿的典範。



第三節 藏書的利用

古代私人藏書家大多注重藏書的利用，特別是主張藏書開放流通共享的藏書家們，在其藏書利用上，所取得的成績更大。濟世、求知、修身養性，是古代藏書家的動力所在。用藏書幫助學術，以藏書經濟世道，以藏書增長見識，為總之用而藏，才是古代私家藏書的出發點和根本之目的。⁴⁴¹尤其是明代藏書家總是勤於苦讀，嗜書如命，「讀書」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份。藉著積極從事訪書、購書、借書、抄書等方法，努力地搜求，終於取得了書籍。經由訪探尋求而積累藏書，

⁴⁴⁰ 李洁，〈淺談明代私家藏書樓的文化意蘊〉（《宿州學院學報》2009年第24卷第2期），頁54。

⁴⁴¹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山東圖書館學刊》2004年第4期），頁39-40。

即便是斷簡殘篇，只要能讀，他們都不厭其煩且樂於沈溺其中。⁴⁴²此外，藏書家們不僅珍藏圖書，還會將古籍加以校勘，更不惜斥資予以刊刻印行，以利著述，以及從事學習與學術的活動。

正如前文所述，明代藏書家重視藏書的利用與整理，大多不是為了藏書而藏書。他們主張藏以致用，力圖透過閱讀藏書，來提高自己的修養與學識。不少藏書家，還會把藏書同自己的學術研究、刻書活動結合起來，藉由抄書、刻書、著書，不僅讓自己的藏書得到擴充，而且還可以擴大書籍的流通範圍。當時的藏書家們，還普遍重視對自己所藏圖書的研究與整理，他們對藏書進行校刊，比較異同，補充得失；或作為著述之參考，生產知識；或編製藏書目錄，以利閱覽、流通與保存。⁴⁴³清人洪亮吉（1746-1809）就曾把藏書家分為五種，曰：

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1724-1777）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訛，是謂校讐家，如盧學士文弢（1717-1796）、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1763-1825）、鄆鎮鮑處士廷博（1728-1814）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⁴⁴⁴

洪亮吉所說的這幾種藏書利用情形，在多數的藏書家是兼而有之的，只不過是某一藏家在某一方面或幾方面有所側重而已。除了洪氏所舉的考訂、校讐、收藏、賞鑒之外，許多人同時也是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版本目錄校勘學家。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藏書與讀書，藏書與學問，藏書與編撰，乃是不可分割

⁴⁴² 呂允在，〈藏書、校書、刻書與明人讀書生活〉（《藝術學報》，第 89 期，2011 年 10 月），頁 419。

⁴⁴³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頁 64。

⁴⁴⁴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7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據清光緒三年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本影印），卷 3，頁 1 上-下。

地組合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整體的。⁴⁴⁵正因藏書家們投入古籍的珍藏、校勘、刊刻，進而從事著述與出版，為明代保留了豐富的文化資產，也對於古籍整理與文化保存，發揮了相當大的貢獻與意義。⁴⁴⁶以下即針對明代北京的藏書家，對於其私人藏書的利用及整理情形進行觀察，然後劃分出幾個面向，並一一說明他們是如何利用自己之所藏。

一、閱讀

古代藏書家大多酷嗜讀書，懷有很深的讀書情結。藏書家窮盡一生的財力精力投身於藏書事業，探究其目的，大多是為了讀書而藏。元末明初，浙江著名藏書家楊維禎曾說：「夫書之能藏者不難，能讀者難；能讀者不難，能用者難也。書藏而不讀與無書等，讀而不用與不讀等。」⁴⁴⁷清代江蘇藏書家張金吾（1787-1829）也說：「人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者，無他，學不學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學者，必先讀書；欲讀書者，必先藏書。藏書者，誦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⁴⁴⁸同樣也是清代江蘇的藏書家江藩（1761-1831）在《石研齋書目》序中也曾說過：「夫欲讀書，所以蓄書。蓄而不讀，雖珍若驪珠，何異空談龍肉哉！」⁴⁴⁹藏書家們認為藏書就是為了要閱讀，如果只是藏而不讀，就失去了藏書的意義。而明代北京的藏書家之讀書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茲區分許多類型及特色，就其讀書類型及特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廣博閱覽型

安肅縣藏書家邢雲路，嗜讀書也愛好藏書，自經、史、子、集，以至佛教、

⁴⁴⁵ 陳公望，〈論古今藏書家的藏書與編書的活動及對於編輯工作者的啟示〉（《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頁104。

⁴⁴⁶ 呂允在，〈藏書、校書、刻書與明人讀書生活〉，頁419。

⁴⁴⁷ 元·楊維禎《東維子集》，卷21，頁7上。

⁴⁴⁸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9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年吳縣靈芬閣集字版校印本影印），藏書志序，頁2上。

⁴⁴⁹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卷5，頁563。

道家典藏，無不探究其精妙之處。「天性穎敏，問學詠洽，蓋竭力極思餘二十年，自經、史、子、集，以至釋道典藏，宜搜玄覽，無不窮其要渺，精心妙悟之。」⁴⁵⁰新安縣孟化鯉，同樣也喜好讀書，「每坐一室，取六經、四子、諸氏百家，朗咏沉思，而隨閱隨契隨筆，若不知老之將至。其他」每當在自己的書室中，便會取自己所藏閱讀，沈靜在自己的讀書生活裡，每有會意，便隨性而筆，至老不休，像孟化鯉這樣的典型，確實可謂善用自己之所藏。清苑縣藏書家郭名揚，不只愛讀書，還善飲酒，寫詩、寫書法等。「性嗜學，博極羣籍，善飲酒，能詩、文、工，諸家書法，遠近皆從之學。」曲周縣聶雲羽包，喜好讀書，「家有藏書千卷，繙閱殆遍，文流既溢之，下筆有神矣。入庠大小試，每居高等，俯視一第猶掇之。」聶雲羽包家中藏書上千卷，每卷都會親自翻閱，就是典型藏以致用的藏書家。也因為他看書很多，所以具有豐富的知識，以致於後來他無論在考試或著述方面，都有很高的成績。

東明縣藏書家穆文熙，藏書多達十餘萬卷，有藏書樓「逍遙園」。酷愛讀書，尤其偏愛書史，只要是古代的書籍，都特別喜愛閱讀，「酷嗜書史，自墳典而下，諸子百家言，亡所不窺。積卷帙至十餘萬，朱墨點竄盡，為重覆所刪書數十種。」其閱讀與校勘之勤，可見一斑。廣宗縣藏書家常熟，不只滿戶藏書，更是自幼就好學不倦，且博覽羣書。「能詩，工古文詞，明穆宗庚午科，舉於鄉。滿戶藏書甚富，幾同鄴架。」任邱縣藏書家李楨辰，同樣也是愛好讀書，尤其對古文特別喜歡。「於書無所不讀，牙籤萬卷，為邑第一。」任邱縣藏書家閔煦，同樣也博覽群書。他開墾荒地，築園林以藏書史，肆志閱讀。「公（閔煦）敏達，博古通今，嘗肆力于文，童旁及星曆、角占、陰陽讖緯之學，既謝政居里，斥地築圃鳩書史，群賓客優游于其中，談世務挖揚菡林豐豐琅琅，能令人解頤傾耳，若飛玉屑建饒水也，為文渾雄似昌黎，為歌詩新逸兼庾鮑之長，所著有《正祀孝》行于世，餘藏于家。」閔煦將園居與讀書生活相結合，且常有許多的賓客相伴，為其讀書生活，增添幾分韻味。

⁴⁵⁰ 明·邢雲路，《庚戌冬至正訛》（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原刊本），〈題庚戌冬至正訛引〉，頁1下。

至於真定縣藏書家梁清遠，在朝為官時，仍不改未仕時之書生本色，經常利用公暇博覽羣書，即便後來辭官回鄉，也一樣每日讀書。「公車罷歸，益肆力於古學，博極羣書經史，及古今文籍，靡不淹貫成誦。所為古文詞，尤稱爾雅；郡邑求文者，戶外屐常滿。……性好觀書，所居處墳籍環列，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以壽終，著有《雕邱雜錄》、《袞園詩集》、《袞園文集》。」對於梁清遠來說，讀書不僅只是為了科舉功名的功利性質而已，更重要的是，能夠為他的生活帶來無盡的樂趣。

（二） 多樣的讀書習慣

藏書家除了喜好讀書，不少藏書家也有個人偏好閱讀的典籍，許多明代北京的藏書家便是如此。雄縣藏書家馬維禎，喜好讀書，家有「印可堂」，「廣讀異書，深搜內典」，可知他不只讀很多的書，還偏愛佛家的典籍。真定縣藏書家王兆泰，也是廣事閱讀，「於書無所不讀，經史而外旁及百家，凡奇門、兵法、天文、術數之學無不殫精研，思窮其奧妙。」除了經、史之外，其他有關奇門、兵法、天文、術數之學，他都會努力去鑽研，探討書中的奧妙之處。涿州的頓銳，也喜好讀書，尤其在《詩三百篇》方面的成就，更是廣為人知。「足跡罕入城市，故能肆力典籍，得三百篇之遺響，遂名詩家。」⁴⁵¹

至於魏縣藏書家王重光，也同樣喜好讀書，「購異書讀之，如天文、內典、堪輿、奇門、醫卜等類」，都是他的個人閱讀偏好。同縣的藏書家李養正，平生的嗜好就是讀書，且偏好有關墳典、丘索、六經、子史或近代文集，只要是相關的圖籍，他都會收集典藏而讀之。「生平無他嗜，獨嗜書，墳典、丘索、六經、子史及近代名公集，度而藏之，比于鄴架。」而真定縣的梁志，亦好讀書，且所讀之書非常廣泛，「博覽自墳典、邱索，以及百家雜言，無所不窺。」霸州藏書家張維，也是愛書之人，「遂益哀法書秘笈。書不釋手，夜自篝燈呶唔，少倦，仍默看，至丙夜方寢。雞甫鳴，則復興矣。」可知張維喜愛看書，常常書不離手，一直看到

⁴⁵¹ 明·頓銳，《鷗汀漁嘯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間刊本），〈鷗汀漁嘯集序後〉，頁1上。

天亮雞鳴才結束。即使他晚年失明，只要知道新書也一定購買，並請人唸給他聽，如此持續了數年，其愛書之情，溢於言表。任邱縣的藏書家李汶，其藏書樓叫「書種樓」，一生都以讀書為使命，「建書樓，公取裴晉公意，題之曰：『書種』。臨沒，猶以讀書為遺命也」，期許自己和子孫們，世代都為讀書人。

此外，不少明代北京的藏書家，還喜好親近鄉里友人的樸實環境，享受讀書之餘的恬適生活。容城縣藏書家孫奇逢，愛好讀書，尤其偏好讀與《易經》相關的典籍，讀書之餘，也會教導弟子問學。《大清畿輔先哲傳》載：

奇逢因創「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給，學者稱夏峰先生。奇逢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立朋黨，自公卿逮布集，歡然以誠信相接，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為。⁴⁵²

可以看出，孫奇逢創了「兼山堂」，喜好在堂裡讀《易經》，閒暇之餘，便教導弟子問學，並且供給弟子生活所需。廣平府的惠承芳，喜讀詩書，也喜好藏書，所教導的學生中，亦多有與他一樣博學多聞者。「建亭臨水，誦詩讀書，想見曾皙之在沂上焉。置閣於旁，藏書於閣；諸生中，多博物洽聞者，以先生興也。」宛平縣藏書家王熙，讀書之餘，亦好遊山、文會與園居，《王文靖公集》載：

文貞公讀書處，歲必一再至西山之「香山碧雲」、「退谷法海」，春秋佳日，世交舊遊招邀過從，襄徊歡賞新進寒素，亦樂與忘年常同嘉會。栽芍藥數百畦於豐臺小築，其旁花開時，任遊者往來，不獨樂也。⁴⁵³

從王熙的讀書生活，可以見其豐富的讀書生活。他不只喜好讀書，也喜好在其讀書處園居植藝，將讀書與園居相結合，不時呼友同歡，呈現出一種廣結交遊的讀書生活方式，成為明代北京藏書家讀書生活的一種特色。

（三） 勤奮閱讀型

⁴⁵²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10，〈孫奇逢〉，頁 1 上。

⁴⁵³ 清·王熙，《王文靖公集》，行狀，〈王熙〉，頁 23 下-24 上。

明代北京藏書家之讀書，有的是以科學考試為目標，有的則是以求知取樂為其讀書導向，但他們都為了各自的目的而努力讀書。譬如順天府藏書家賈信，好讀書，只要出遊，都會隨身帶著書籍，「好書，每事他出，必以書冊自隨，遇佳山水，輒徘徊終日。」灤州藏書家倫浹，酷愛古今圖書，經常沉浸陶醉其中。「癖嗜典籍，寢饋沈酣，尤精濂洛性理之學，為詞賦古文。」成安縣藏書家王家瑞，雖然家裡貧窮，但藏書甚多，終日閱讀也不會感到疲倦。「家貧而積書甚多，日夜諷誦無倦。」文安縣藏書家陳良瑛，也勤於讀書，家有三棟樓，都用來藏書，且每日都會取其藏書閱讀，積聚到一定的程度，才會罷休。「既成誦，遂不復收拾，多為人取去。故人謂公受訟四年，萬金之產盡；讀書三十年，萬卷之書亦盡云。」

至於大城縣藏書家陶圻，有書萬卷，整天書不離手，沉浸在其中，所讀之書，從古至今都有，每有會意，就會身體力行實踐。「生有雋才，讀書淹貫古今，不拘拘於俗學，道學、文章，兼擅其美，一時人多矜式之。明宏治中，訓導大城，日以正己，率人為先，務絕請託，杜夤緣。置書數萬卷，浸灌其中，終日不釋卷，凡有所得，必身體而力行之。」定興縣藏書家鹿善繼，好讀書，於書無所不讀，尤其偏好他人言論的記錄或摘錄。「平生無書不讀，而更深心於語錄，嘗欲纂諸儒論著，彙為一書，而未竟也。」⁴⁵⁴其好朋友就常說他有嗜書之癖，常常為了讀書而廢寢忘食。「先生生平有三變，為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不呼之常不應。」其讀書處名為「北海亭」，五世孫鹿聖權曾識曰：「『北海亭』者，先高祖忠節公讀書處也。」⁴⁵⁵曲周縣藏書家聶繪于，勤奮讀書，「每披閱，盥手正襟，矻矻不少倦。……好為詩歌文辭，病革猶檢篋中書，偃卧讀之。語兒輩曰：『吾家世為諸生，恃此長物也，其善守之。』」每當翻閱書籍時，他都會先洗手，表示對書的敬重，並且認真的翻閱每一本書，即使生病在床，也會檢視家中藏書，躺臥在床也要讀書，可見其對藏書與閱讀的渴望與篤性。

此外，不少明代北京的藏書家，崇尚追求隱居高士的生活，而不喜與人交游，只喜歡自己杜門讀書或著述，享受隱居式的讀書生活。柏鄉縣藏書家魏大成就是

⁴⁵⁴ 清·陳欽，《鹿忠節公年譜》，卷下，頁 56-57。

⁴⁵⁵ 清·張主敬等，《定興縣志》，卷 14，〈鹿善繼〉，頁 7 上。

如此，「自大學歸，靜坐擁書，杜門不出。」⁴⁵⁶高邑縣藏書家趙南星，在郊外築有讀書處，閉門讀書少與人過從。「先生築一室郊垞，擁書閉戶，非其人不與見也。性善飲酒，為小詞，多寓憂世之懷。酒酣，令人歌而和之。」也有藏書家喜好教導兒孫輩讀書，或與他們談論學問。大興縣的藏書家李碩，在其子李經國小的時候，見他喜好讀書，便利用所藏之書教他唸書。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當李經國長大後，更是潛心於《易經》及性理諸書。據說李經國「為兒童時，放逸好弄，其父碩（李碩）困之樓中，累日夜不得出。乃玩其樓所藏書，漸為文，有奇思，碩異之，授以經、史、左、國，秦、漢諸大家文。……經國於書無不讀，對其面如無所有，叩其中，愈叩而愈不能窮。」

宛平縣藏書家王崇簡，也是一個勤奮讀書的人，他一生勉力為學，即便辭官後，仍然一樣嗜學不倦。他喜歡依古人的讀書方式，每年夏季會讀五經，冬天則置燈於籠中，並以口氣噓物取暖，不斷的讀書，也不時與家人如師友一般地共同論學，使讀書生活，多添一分親友的情感。「年七十，尤嗜學不倦，欲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為夏課。宅居大市西，庭宇肅穆，階前築台方丈余，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台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父遺事，旁及故舊家世之盛衰，以為勸誡。冬則篝燈擁爐，呶唔不輟，筆之為冬夜語兒箋記，時人方之《顏氏家訓》。」

綜上所述，明代北京藏書家的讀書生活，基於對雅文化的追求與塑造，強調的不僅是為了科舉功名的功利性質而已，而是逐漸發展出各種休閒、養性、怡情的態度，或者是以讀書的自得、自主與自娛等心態，形成多面向的讀書生活為特色。他們還把這些特色，更加擴展成為讀書情境的培養，以及讀書與清閒樂趣的結合、自我內在的寫意等方式，從中獲得知識外的讀書樂趣，形成典雅的生活美學。⁴⁵⁷

二、著述

⁴⁵⁶ 牛寶善，《柏鄉縣志》，卷 6，〈魏大成〉，頁 193 上-下。

⁴⁵⁷ 呂允在，〈明人讀書生活樂趣的一個側面〉（《藝術學報》，第 88 期，2011 年 4 月），頁 380。

明代北京藏書家不但勤於讀書，也喜歡著述。明代文人於閒居讀書之餘，或當仕途不順時，往往便專注於立言著書、解釋經籍，除了記錄個人的思想，也彙整前人的著作和思想。而著述除了需要大量的時間，往往也需具備知識淵博的背景，以及龐大的藏書，以便於旁徵博引之用。⁴⁵⁸冀縣藏書家汪元范，篤嗜藏書，「築『散木齋』以自娛，建『不二軒』、『陸地舟』，貯古今書籍，其中所著有以《南草》、《景波樓草》、《名山評語》、《樗林稿》等集。」不只喜好藏書，也會利用所藏之書進行撰述。平山縣藏書家崔華，亦喜好藏書，即使在朝為官也勤於讀書，經常書本不離手，學問日積月累，便發為著述，所作甚富。「喜藏書，雖在官，手不釋卷。生平著有《公餘詩畧》及《四書課兒講藝》諸書。」高陽縣藏書家孫承宗，癖嗜讀書，家中藏書滿屋，也喜好著述，據《高陽縣志》載：

所著有《孫高陽文集》一百卷、《奏議》三十卷、《督師全書》一百卷、《督師事宜》十八卷、《高陽縣志》十四卷、《車營百八扣》二卷、《歷官舊紀》四卷、《撫遼志》十卷、《前督師紀畧》十六卷、《後督師紀畧》十卷。⁴⁵⁹

對孫承宗來說，往往隨手札記，亦或與學生學術交流，就是一篇經典文章，數年來，積累了巨帙的卷稿。有時著述礙於能力所及，不能獨自完成時，他便會尋找志同道合的友人一同完成。孫承宗的交游很廣，著作多且交流亦多，除了自己著述外，他也會與友人一同合作著述，因此卷帙積累很快，幾乎佔滿了整個書樓。孫承宗「剖析名理之精微考，撰古今之典實，及夫交遊贈答，觸境成文，是以卷帙浩繁，幾於充棟。」⁴⁶⁰此外，有時為了完成著述，也會向其他藏書家求借書籍。譬如他就曾向定興縣藏書家鹿善繼的八世孫求書，據《車營百八扣合編》序載：

嘗讀高陽孫文正公（孫承宗）諸集，有「車營百八叩」者，文正創其制以妙其用，而借以嫻文武將吏之韜畧也。是時，幕府多才，定興鹿公伯順為尤著。……至定興，詣鹿忠節公，瞻公其像，求公遺書。其八世孫欣理、廣文，

⁴⁵⁸ 呂允在，〈明人讀書與編著生活〉（《藝術學報》，第91期，2012年10月），頁199。

⁴⁵⁹ 李曉冷等，〈高陽縣志〉，卷3，〈孫承宗〉，頁20上-21上。

⁴⁶⁰ 明·孫承宗，〈高陽集〉，序，頁4。

以《四書說約》及《無欲齋詩集》贈至。⁴⁶¹

至於宛平縣的米萬鍾，自小就深受父親的影響，喜好奇石、藏書、書法與繪畫，「其父癖于好石，富于藏書，工書與畫，仲詔（米萬鍾）無不相當。」他雖是知名的藏書家與書畫家，但其文學著作也非常豐富，據《順天府志》載：

所著有《澄澹堂文集》、《詩集》十二卷、《易義》四卷、《象緯兵鈐》十二卷、《石史》十六卷、《南北史宮詞》二卷、《琴史》八卷、《奕史》四卷、《篆隸考訛》二卷。⁴⁶²

所以，米萬鍾也是一位勤於著述的明代北京藏書家。而順天府的藏書家紀克揚，亦好讀書，著述也很多。他除了偏好閱讀風水命理之類的書外，對於佛家與道家經典，也多所涉略。「肆力墳籍，與瓦橋馬東航、新城玘申之詩文往來，撫藻瀉詞，不作天寶以後語。時著迴文體六十四字，縱橫讀之，可得詩三百六十首，人咸服其綜密。又構別業三楹，陳列圖書，與三子坐卧其中，將以終老。……克揚講學多年，著述甚富，兵燹散佚。所存《麗軒文集論稿》、《四書易經注解》。」紀克揚不只好讀書，也嗜藏書，所構的三棟別墅都貯存圖書，著述亦多，是典型藏以致用的藏書家，可惜因為連年戰爭，致使所存著述不多。大興縣藏書家孫承澤，亦是藏書及著述豐富之人，據《順天府志》載：

承澤既歸，築「退谷」於西山。耄而好學，讀書日有程課。著述滿家，於史事多所論述，而有明一代典故，尤瞭如指掌。嘗與王士禎言：「讀書當通經。」因言：「元人經學，非後人所及。」蓋元時天下有書院百二十，各以山長主之，教子弟以通經學。經學既明，然後得入國學。既如吳淵穎、普德德輩，其集人不知。明初人猶多經學，皆元遺逸，且言生平學問以朱子為宗。所著《五經翼》，考正朱子晚年定論諸書，皆有功於正學。至於精博古鑒，一時圖書之

⁴⁶¹ 明·孫承宗等，《車營百八扣合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9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高陽孫氏師儉堂刻本影印），序，〈車營百八扣合編序〉，頁1上-下。

⁴⁶²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8，〈米萬鍾〉，頁 4680-4681。

富，比之宋田氏云。⁴⁶³

孫承澤好學且勤於讀書，每日都會安排時間讀書，因此知識淵博，尤其對明代典故瞭若指掌，又十分善於利用自己之所藏，進行著述，以致他著作滿家。

曾在寶坻縣當官的袁黃，藏書非常多，「其囊橐一空，而書則不止五車。」好讀書，著述也很多，有《兩行齋集》、《曆法新書》、《皇都水利》、《評注八代文宗》、《群書備考》。⁴⁶⁴尤其是他將一生的體驗，寫成著名的勸善文《了凡四訓》，更是影響後世很深。宛平縣的藏書家王熙，不只好讀書，也喜好著述，已出版的書有《寶翰堂集》，至於未出版的書則仍藏於家中。他每日潛心鑽研家中藏書，探論學術源流，據《王文靖公集》載：

自少天才敏捷，又得過庭指授，然雅不欲以文學炫長，已刻者有《寶翰堂集》，其未刻者藏於家。經、史、子、集，多默識暗記，探其元本。對人輒遜謝不敏，即二氏之學，亦多參悟而絕口不談也。⁴⁶⁵

容城縣藏書家孫奇逢，也喜好著述，《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載：

字啓泰，一字鍾元，容城人。……晚歲移居蘇門之夏峰，學者稱夏峰先生。其學以慎獨為宗，初主陸、王，晚更和通諸子之說。自明及清，前後十一徵不起，康熙十四年（1675）卒，年九十二。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經書近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自養》、《乙丙記事》、《理學宗傳》。⁴⁶⁶

時稱夏峰先生，觀其著述非常豐富，可知也是典型之利用藏書著述的藏書家。涿州的藏書家頓銳，除好讀書外，著述也很多，嗜學之心，至老不倦。生平絕不喜與人交游，只喜歡自己杜門讀書著述，享受隱居式的讀書生活。「公雅性山林，不樂仕進，遂以疾乞歸，卜築於郡西之懷玉山，罕及城市。尋丁外艱，杜門謝客，

⁴⁶³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15，〈孫承澤〉，頁 5096-5097。

⁴⁶⁴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426。

⁴⁶⁵ 清·王熙，《王文靖公集》，行狀，〈王熙〉，頁 24 上。

⁴⁶⁶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486。

益大肆力於學，……嗜學之心，老而不倦。晚年林下聲望轉重，凡縉紳過涿者，識與不識，咸訪求之。所著有《鷗汀集別集》、《漁嘯集》、《頓詩》、《涿鹿先賢傳》，凡五刻行於世。」

此外，著書以流傳個人思想，更期能傳誦千古，既然是文人的重要「立言」目標，於是為此沉浸其中者皆不在少數。然而，著書立說之前，除了必須廣搜博覽外，還要能具備廣博的學問，以充實知識的涵養。⁴⁶⁷靈壽縣的傅維鱗，在完成其經典著作《明書》前，就曾廣搜典籍。「分修《明史》，維鱗以所纂二十餘年《類編實錄》鮮及他書，乃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家乘、文集、碑志，得三百餘部，九千餘卷，參互考訂，撰述〈本紀〉、〈宮闈〉、〈紀表〉、〈志〉、〈記〉、〈世家〉、〈列傳〉，凡七十七目，一百七十一卷，題曰：《明書》。其後，徵其書入史館，論者雖議其體例，然亦不能服其勤博也。」《明書》是明代史事的紀傳體史書，也是了解明朝歷史的重要歷史文獻，因此，重要的史料，都必須經過仔細地研究考證，才能撰寫。因此，傅維鱗必須蒐集大量相關的典籍圖書，再經不斷地考訂參較，才能成就此經典之作。



抄書與校讎圖書，也是明代北京藏書家最常利用藏書的方式。抄錄書籍除了是藏書家在徵集圖書時最常用的方式外，也是古代文人用來閱讀方法之一，即便是在雕版印刷普遍流行的宋、元、明、清等朝代，仍是如此。因為手工抄寫的辦法簡單易行，只要有筆墨紙硯，便可操作；且在一般的狀況之下，並不需要他人的協助。有時文人還把抄書當作讀書時幫助記憶的有效辦法，只要手抄一遍就可以印象深刻，如此更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⁴⁶⁸此外，古典文獻等圖籍，在傳抄、傳刻的過程中，時常會出現脫文、訛字、倒字、重文、疊字、缺頁、誤改甚至妄

⁴⁶⁷ 呂允在，〈明人讀書與編著生活〉，頁 203。

⁴⁶⁸ 陳冠至，〈明代江南人士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116。

刪，假托偽造等問題，須經校勘、辨偽，以更補訂，才方便閱讀。⁴⁶⁹因此，藏書家除了好抄書外，也很重視藏書的校讎，藏書家們經常一邊抄書一邊校書，或借書對校，或自讀自校，或借鑒他人之校，雖然過程繁重，但對文獻的保存深具意義，藏書家們皆願意花很大的心力在這項艱難的工作上，甚至有些人覺得這是藏書生活中的一項樂趣，樂此不疲。

順天府藏書家徐本，「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⁴⁷⁰他每得到一本書，都會仔細的閱讀翻閱校對，遇到有缺板或是字不見的，都會細心的修補整理，對自己的藏書非常的愛惜。宛平縣藏書家郭文輔好藏書也善校讎，「無所不窺，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讎。」郭文輔雖然家貧，但喜好讀書藏書，所藏之書高達萬卷以上，對於校讎的工作都是親力親為，不假他人之手。曲周縣藏書家劉逢源也是如此，他喜好讀書也喜好抄書與校讎，「嘗手鈔二十一史，讎對精確，他書亦數千卷。」他曾手抄二十一史，且親自校讎，從上述中，可看出他的校讎能力頗深，所校之書十分精確。真定縣藏書家梁清標，好藏書，也善校讎。明末清初的文學家申涵光（1618-1677）曾在《蕉林詩集》序載：

吾讀大司馬玉立先生詩，蓋真善折衷而無所偏者。先生累葉卿相，早年射策為貴近臣，可謂得志適顯矣。乃一切無所好，好讀書，牙籤萬軸，手自讎較，時時引我輩布衣為文字之。⁴⁷¹

文安縣藏書家陳協，也是如此。他「篤愛墳典，有皇甫士安癖，每念先世積書萬軸多散佚，乃自六籍百家，及醫藥、卜算、山劓碑篆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冰，樂此不為疲也。」可以看出陳協對其藏書莫不仔細的翻閱，並且用校勘書籍用的朱砂和鉛粉，仔細的校訂。由此可知，藏書家們在收到書之後，並不只是收藏而已，他們也會仔細的翻閱，並且對圖書的內容進行校勘補正，幾乎所有的藏書家都會自覺且欣然地當起校書糾誤的職責。藏書校讎，可以說是藏

⁴⁶⁹ 韓文寧，〈明清江浙藏書家的主要功績和歷史局限〉（《東南文化》1997年第2期），頁143。

⁴⁷⁰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24，〈徐本〉，頁5506。

⁴⁷¹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申序〉，頁1下。

書家最普遍、也是最艱難乏味的日常工作之一，但是他們卻樂此不疲，也在在表露他們對書籍的珍惜典藏和護書的心情。⁴⁷²這樣的護書氛圍，也正是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真實寫照。

歷代的藏書家，幾乎都有校讎的經驗。校讎工作歷經了千百年而不衰，其歷史的價值是很重大的。其具體表現在三個地方，其一是「去除疑問」，典籍在流傳過程中要正確可信，不能有錯誤疑慮，只有這樣，人們才可以讀懂書中的內容，不會因為錯誤的文字而搞不清楚書籍的記載。校讎對於典籍流傳最大的功績，就是去除疑問。通過校讎，勘正文字，校訂詞句，訂正了典籍流傳中造成疑問的字句，使典籍文從字順，起到傳播知識、宣揚文化的作用。其二是「事實呈現」，校讎的任務是還以書籍的真實面目，將錯誤的記載校訂更正，也將非真實的書籍面貌還原為真實的歷史事實，給讀者呈現出一個正確完整的書本知識，讓人們領悟到歷史的真實。經過校對的典籍，閱讀起來邏輯嚴謹，脈絡清晰，條例分明，那些難以理解的問題都一個個的解決，避免邪僻之說而貽誤後世。其三是「有益後學」，書籍是供後人閱讀學習使用的，校對精良的版本，對後人的閱讀十分有幫助；反之，錯誤百出的書籍，往往會影響人們的學習，唯有經過認真校對的書籍，才會對後人的學習有所幫助，否則就會鬧出笑話。⁴⁷³



第四節 藏書的流通

藏書流通，泛指藏書的主人所收藏的典籍圖書在社會和歷史間的傳播。在歷史中國，藏書流通主要有借讀、借抄、借校、借刊、翻刻和捐贈等多種形式。⁴⁷⁴作為人類文明的傳播工具，圖書的流通在現代人看來已是習以為常，甚至是理所當然的事；且在現代圖書館，更是把圖書的流通共享，作為圖書館的主要職責。但

⁴⁷² 姜新禹，〈淺談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歷史貢獻〉（《大科技》2010年第11期），頁393。

⁴⁷³ 康素娟，〈淺論校讎的形成及其歷史價值〉（《飛天》2010年第10期），頁92。

⁴⁷⁴ 王余光，〈藏書四記〉，頁336。

是在古代，圖書從收藏到流通，卻經歷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⁴⁷⁵尤其古代文獻典籍浩如煙海，內容繁富，價值無限，這些典籍珍品，都是我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它不但反映了中國古代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也有著非常卓越的貢獻。如此浩瀚的典籍，都是歷代文人及其動者辛勤筆耕、積累、傳播、發展的碩果，而其中文獻的流通，就是這些卷帙浩繁的古籍得以流傳、積累、繁榮發展，乃至於形成的必要手段與條件。⁴⁷⁶至於明代北京的藏書家，除了重視典籍的收藏與保存外，不少藏書家還會彼此互相交流，互通有無，甚至形成盟會社集。明代文人結社是當時的社會潮流，人們經常以文會友、詩酒酬唱、結聚論學、清議諷時等，為了這些目的而舉辦各式的活動。⁴⁷⁷當然不少藏書家就是以此做為交流的地方，相互從事借閱、借抄、借校、借刻等藏書的活動。



一、借觀、借抄與刻書

誠如前文所述，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與經濟中心，不少文人雅士聚集在京城，包括擁有一定財力和社會地位的官員和追求功名的學子，這些條件，都使得北京成為抄書活動比較繁榮的地方。凡是愛書之人，來到北京，見到好書必定想盡辦法借讀或借抄。松江縣文人顧清（？-約1527）於初第進士，停留北京待職之時，便曾大膽地寫信向不認識的北京藏書家借書，信中曰：

入京師，則聞有君子者家多書，而方竊第，未及於政務，欲稍假其副而讀之，則又以交淺，恐不察其所以來而靳焉。蓋忸怩趨趨，不敢進而請者累月。既而喟曰：「以某之聚書如此，而不知其可借與可以借人而無傷，豈理也哉！」踵門有期，先此道意，足下其裁察之。⁴⁷⁸

事實上，明代北京地區的抄書活動十分活躍與盛行，首先是有能力抄寫內閣中藏

⁴⁷⁵ 蔡煒，〈我國古代圖書流通情況述略〉（《四川圖書館學報》，2004年第5期），頁71。

⁴⁷⁶ 李傑，〈我國古代文獻流通形式初探〉（《山東圖書館季刊》，1996年第2期），頁47。

⁴⁷⁷ 何宗美，〈明代文人結社綜論〉（《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頁50。

⁴⁷⁸ 明·顧清，《東江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26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25，〈與友人借書書〉，頁3上-4下，。

書的人。明朝宮廷藏有大量的宋元秘本，為世所罕見，這些圖書成為當時士大夫極力接近與徵集的對象。明代宮廷藏書主要集中在宮中的文淵閣，舉凡內閣大學士、中書舍人、庶吉士等官員，均有機會接觸文淵閣藏書，所以，他們往往就利用這些機會來抄寫副本，甚至因為愛書而違禁私帶抄手或傭書進入抄寫，這使得朝廷的藏書得以流通至民間。例如大藏書家楊士奇、趙琦美、錢謙益等人，都曾經從宮中抄得珍本秘籍，從而使得明朝內閣之藏書，得以流布於外。除了進入文淵閣者能接觸到宮廷秘本外，還有一些宮廷秘本竟被官員借出宮外，使得那些無法進入內閣的人，也能俟機傳抄。⁴⁷⁹事實上，許多歷代的重要典籍，都是透過大量的私人手抄，才得以流傳至今的。

內閣秘書一旦流傳出來，許多人便千方百計地借來抄寫，使得內府藏書出現在京城的可能性更大，而只要是愛書之人，遇到好書，必想盡方法弄到手。⁴⁸⁰譬如僑寓順天府的瓊山縣藏書家邱濬，好讀書也喜好藏書，曾為了找一部《曲江集》，花費了很大的心力。《重編瓊臺藁》載：

《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遊太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而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5年）始得之。乃並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⁴⁸¹

可知邱濬曾經為了找這部《曲江集》，遍尋兩京的藏書家都找不到，直到他至北京文淵閣當官時，才看到這部書就列在文淵閣的書目中，但也因文淵閣書實在太多，從找到這部書一直到抄錄完成，竟然總共花了 16 年的時間，可想而知，想在內府文淵閣抄書，是非常不容易的。

江西泰和縣的藏書家楊士奇，也是個典型的例子。他曾任過翰林院編修、禮部侍郎，明王朝建都北京後，便將南京文淵閣藏書移至北京，作為翰林院編修官

⁴⁷⁹ 張升，〈明代內府抄書初探〉（《圖書館雜誌》，2003 年第 5 期），頁 78。

⁴⁸⁰ 陳佼，〈明代私人抄本研究〉，頁 13。

⁴⁸¹ 明·邱濬，《重編瓊臺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124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1986 年 3 月初版），卷 17，〈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頁 14 上-下。

的楊士奇，不僅經常到文淵閣去翻閱圖書，而且從同僚處，也抄錄了不少圖書。⁴⁸²楊士奇曾經敘述自己的抄書經驗，說：「《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婺金履祥(1232-1303)編。……刻在蘇州郡學，余家一冊，錄於中書舍人朱季寧，蓋讀之竊有感焉。」⁴⁸³又云：「中書舍人陳登思孝，好聚古今石刻，徧求博訪，志其所出之處，以成此編。余與用之皆錄一本，按此而索之，亦屢有得，惜乎其未能悉也。」⁴⁸⁴楊士奇在京為官期間，於圖書的蒐訪上多所斬獲，今藉其文集，能夠得知他抄書的約略情況。例如《東里續集》中載：

右蘇東坡冊，錄於胡祭酒若思(胡儼，1361-1443)，蓋所錄著，《東坡集》，起二十四卷至四十卷；《後集》，起八卷至十卷；《外集》，起二十五卷至九十卷。〈奏疏〉、〈內外制〉及〈詩〉，皆未得錄也。⁴⁸⁵

又載：

《歐文外集》二十五卷二冊，錄於翰林庶吉士楊勉。前有年譜，而行狀、墓表、祭文附錄在後。吾家此文及《東坡文錄》者非一手，又皆寡諳文理，故多錯謬，未得校正也。⁴⁸⁶

此外，《東里文集》也有相關的記載：

鄉郡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丙申(1416)，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之。⁴⁸⁷

從楊士奇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從朝中官員手中，借到了大量的圖書來進行抄錄。特別是在北京所抄的書籍，在其所有抄書中，即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可以看出他對抄書的重視，也可以瞭解到明代北京圖書傳抄的風氣十分興盛，所以抄書風氣

⁴⁸² 王建國，〈明代北京的民間鈔書活動〉(《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頁42-43。

⁴⁸³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卷10，〈題跋·通鑑前編舉要新書〉，頁5下。

⁴⁸⁴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23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卷20，〈碑目〉，頁9上-下。

⁴⁸⁵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卷18，〈蘇東坡文〉，頁16下。

⁴⁸⁶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卷18，〈蘇東坡文〉，頁15上。

⁴⁸⁷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0，〈文山集杜句〉，頁3下。

的盛行，也成為了北京書籍流通的一個重要特色。⁴⁸⁸

吳縣的藏書家王鏊（1451-1524），在正德年間，曾任文淵閣大學士一職，他也曾經利用職務之便，抄得內府祕本以歸。《藏園群書題記》載：「明本《樊川文集》跋載：『有王文恪鏊序，云是內閣祕本，手抄以歸者。』」⁴⁸⁹又載：

明鈔《雲臺編》跋載：「嘉靖乙未（14年），袁郡有《雲臺編》刻本，嚴介溪（嚴嵩，1480-1567）為序，云得之故少傅王文恪公，公本錄自祕閣，蓋出於宋刻也。」⁴⁹⁰

福建長樂縣藏書家謝肇淛，也是如此。他博學多聞，家富藏書，在北京當官時，也經常從文淵閣中抄錄書籍。由於他抄的書籍，很多都是內府的祕本，且是市面上所沒有刊印流通的，必須靠謝肇淛由宮內抄錄，才得以流傳出來。《藏園群書題記》載：

《論語意原》，宋東谷先生鄭汝諧（1126-1205）撰，書凡二卷，文淵閣著錄。……偶游廠肆，得明鈔殘本一冊，存下卷，棉紙，烏絲闌，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板格下有「小草齋鈔本」五字。繕楷工雅，卷中匡，桓、均缺末筆，當宋刊錄出者。按：「小草齋」為長樂謝肇淛在杭方伯齋名，在杭著有《小草齋集》。博學多聞，家富藏書，官京曹時，常從祕閣傳鈔典籍，故其鈔本，尤為世所寶貴。⁴⁹¹

此外，謝肇淛雖然在北京當過官，也曾親自檢閱過文淵閣的藏書，但以他的身份，卻仍是不可能文淵閣中久留抄書的，所以，他只好再想辦法借抄。於是，他便曾向同為福建人的葉向高（1559-1627）借抄過書籍，而當時葉擔任內閣首輔大學士，所以，他就透過葉來借抄內府藏書。⁴⁹²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

⁴⁸⁸ 王建國，〈明代北京的民間抄書活動〉，頁 43。

⁴⁸⁹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卷12，〈明本樊川文集跋〉，頁 626-627。

⁴⁹⁰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12，〈明鈔雲臺編跋〉，頁 638-639。

⁴⁹¹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1，〈明鈔本論語意原跋〉，頁 37。

⁴⁹² 張升，〈明代內府抄書初探〉，頁 78。

肇淞手跋曰：「予少時得元之詩文數篇，讀而善之，銳欲見其全集，徧覓不可得。既知有板梓於黃州，託其州人覓之，又不得。去歲，入長安（明代指北京），從相國葉進卿（葉向高）先生借得內府宋本，疾讀數過，甚快！因鈔而藏之。今學為詩者，未能窺此老藩籬，而動彈射宋人至不遺餘力，此與以耳食者何以異，悲夫！萬曆庚戌（38年）三月望日。」⁴⁹³

我們不難想像，古代藏書家為了收藏圖書，是如何不辭辛勞、千方百計地得到自己心儀的書籍。然而，事實上抄書是非常辛苦的，尤其大多數至內府抄書的士人，多為清寒之士，無資僱人代抄，所以往往必須靠自己的雙手，經年累月的抄寫和積聚藏書。謝肇淞就曾在跋《竹友集》時，說道：

幼祭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凜寒，京師傭書甚貴，需銓京邸，資用不贍，乃手自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於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⁴⁹⁴

藉由上述，可以了解其抄書之勤苦。另一方面，除了這些著名的藏書家努力流通圖書，對古代書籍的傳播有所貢獻外，還有不少的讀書人，也在為圖書的傳播，默默的付出努力。例如福建莆田縣藏書家周瑛（1430-1518），就曾為了獲得書籍，而僱人抄寫。周瑛曾說：

瑛旅食京師，林蒙菴不以瑛無狀，每勸進之；繼文會東廣陳獻章（1428-1500），學吳康齋（1391-1469）之門，蒙菴歸，必能道其事。瑛因獻章，得抄《朱子語類》書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盡在是矣。計工抄寫，今冬此書可完。⁴⁹⁵

不管是謝肇淞自己抄書，或是周瑛的雇人代抄，無形中，都為了書籍的傳播做出努力。作為擁有歷代重要古籍圖書的明代北京，正是透過大量的私人手抄，圖書

⁴⁹³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影印），卷 18，〈蘇東坡文〉，頁 16 下。

⁴⁹⁴ 清·王士禎等，《居易錄》，卷 11，頁 5 上-下。

⁴⁹⁵ 明·陳真晟，《布衣陳先生存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李畿嗣刻本影印），卷 4，〈答門人翠渠周瑛書〉，頁 46 上-下。

才能得以廣泛流傳。尤其內府圖書流傳於外的途徑本來就非常有限，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內府抄書在書籍流通上，起到了重要的、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明代文淵閣藏書，在明末基本上已多散毀，秘本更是缺損殆盡，因此這些傳抄而來的手抄副本，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彌補這種缺陷。⁴⁹⁶因此，明朝的圖書印刷事業雖然已經相當發達，但是許多珍貴的書籍卻仍然得之不易，以故藏書家非常重視抄書，並且往往是以抄書作為充實藏書的重要手段。

此外，明代北京除了不少藏書家利用職務之便以抄錄內府藏書外，藏書家彼此之間，也會利用借觀這樣的方式，來流通圖書，這是最直接、也最即時的傳播方式。古代的書籍昂貴，不少讀書人，特別是那些家境貧寒而又有志於學問，或是銳意仕進的讀書人，在治學或走向仕途的過程中，都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很多藏書家也非常樂於將藏書借給那些刻苦用功的讀書人，這樣做不但能使圖書真正的得到利用，讀書人成名之後，也往往會給他們帶來榮耀。⁴⁹⁷明代太倉縣藏書家陸容（1436-1497）嘗曰：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甌，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甌為贄，還時以一甌為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⁴⁹⁸

可見，明代部分藏書家對於書籍的流通使用，基本上是樂見其成的，只要來借的人品行純良，講信重諾，他們也願意「推己及人」。

北京藏書家邱濬，在還沒當官以前，就曾經因為家貧無書可讀，行走數百里外，只是為了借書來閱讀，以至後來成為飽學之士。《明史》載：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⁴⁹⁶ 張升，〈明代內府抄書初探〉，頁 80。

⁴⁹⁷ 黃仲舒，〈也談古代讀書人之「借書」〉（《語文建設》，2009 年第 10 期），頁 54。

⁴⁹⁸ 明·陸容，《菽園雜記》（《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 刷），卷 9，頁 116。

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⁴⁹⁹

靈壽縣的牧犢翁，也是如此。雖好學，但因家貧無書，所以只要聽到有人藏書，就會不辭千里的去拜訪借書。如是而不出數年，他就已經將經、史、墳典等書籍都看通，不少仕紳、士大夫，因此而知道牧犢翁的名字，而與其交遊。《大清畿輔先哲傳》載其事，云：

翁起于牧犢，故稱焉。翁早孤奇貧，佣為人牧，而性穎慧，聞見輒能識。既長，築瓜廬自居，聞藏書者，輒婉轉乞借，借未逾宿已成誦。不數年，經、史、墳典以及輿圖、讖緯、周髀、縱橫、醫卜諸書，靡不博洽。於是薦紳、士大夫始知牧犢翁名，邀與游，亦不拒。⁵⁰⁰

有些藏書家除了借觀圖書之外，也會用借抄的方式，來獲得圖書文獻。借抄，也是古代典籍得以流傳的一種重要的文獻流通形式，是當時豐富國家與私人藏書的一種重要方法。⁵⁰¹尤其作為知識載體的書籍，有相當多是透過眾多默默無聞的讀書人，才得以流傳下來的，因為古代的讀書人當中，很多都有一邊讀書，一邊抄錄的閱讀習慣，所以每讀完一本書，同時就抄錄了一本書。⁵⁰²玉田縣藏書家張儒，雖然天生聰穎，對古文詞很有興趣，但卻因為「家貧不能得書，遍借親友藝文旋抄旋記，寒暑不輟。」，每當遇到好的文獻，他便會用抄寫的方式記錄下來，故城縣的藏書家沈嘉，也是如此。他年少時，因為家裡貧窮沒有書籍，於是就經常「走藏書家借讀，手自抄之，遂博通諸籍。」

另一方面，藏書家們除了利用抄書來流通外，不少藏書家還會刊刻所抄之書，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藏書，一方面則是將所刻之書用以贈送、出售或與人交流。譬如高陽縣藏書家孫銓，就曾收集很多的雕刻的鏤板，專門用來印書。為人「負氣重然諾，少傳文集百卷，鏤板南中。」瓊山縣藏書家邱濬，也曾經將從內府辛苦抄得的《曲江集》，加以刊刻流傳，邱濬序云：

⁴⁹⁹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181，〈列傳·邱濬〉，頁 4808。

⁵⁰⁰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7，〈牧犢翁〉，頁 21 上-下。

⁵⁰¹ 李傑，〈我國古代文獻流通形式初探〉，頁 48。

⁵⁰² 黃顯功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頁 45。

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成化5年），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攜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暉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昆陵蘇君韜，同知莆田方君新，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為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⁵⁰³

同時併刻的書，還有許多。例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武溪集》，其中有云：「明成化間，邱文莊（邱濬）得其本於館閣，錄副以傳，屬韶郡太守刻諸郡齋。」⁵⁰⁴因為邱濬的不藏私，願意將自己辛苦所抄之書加以刊刻，使得這部經典之作，才得以廣為流傳。明代開州藏書家晁瑛，也是如此，每當晁瑛抄錄之後，便隨即將所抄書籍刊刻付印。他嗜好藏書，也喜歡刻書，當官期間，亦曾入內府抄錄不少書籍，且將所抄之書，刊刻發行於世。例如《法藏碎金錄》，便為其中的一部書，據《四庫全書總目》中《法藏碎金錄》的提要載：

宋晁迥（951-1034）撰。……其書傳本頗稀，明嘉靖乙巳（24年，1545），迥裔孫翰林院檢討瑛，始從內閣錄出，鈔版以行。改其名曰：《迦談》。⁵⁰⁵

再查《四庫全書總目》中《迦談》的提要，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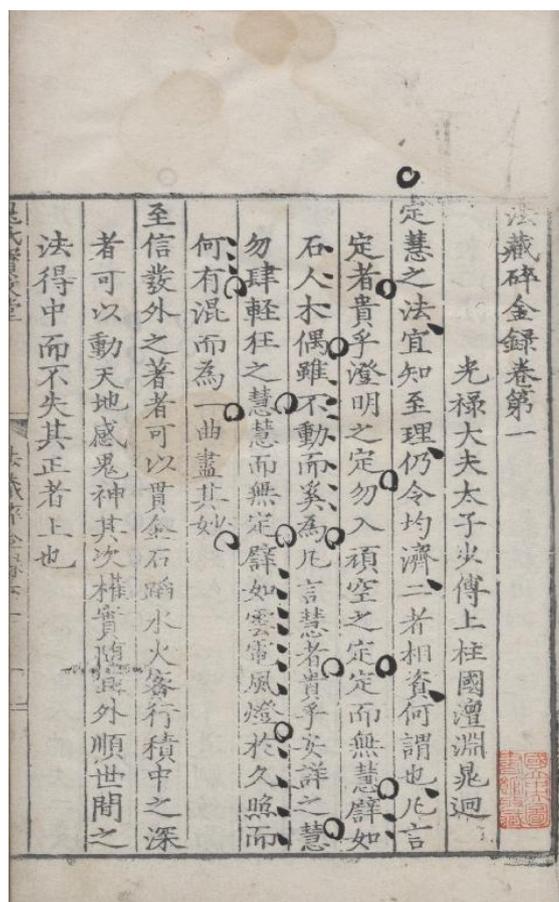
宋晁迥撰。迥有《昭德新編》，已著錄。是編即迥《法藏碎金錄》也。明代久無傳本。嘉靖乙巳，其裔孫瑛以翰林院檢討兼管誥敕，得此編於內府而刻之，改題此名。⁵⁰⁶

⁵⁰³ 張九齡，《曲江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初版），〈序〉，頁1-2。

⁵⁰⁴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20，〈武溪集二十卷〉，頁7上-下。

⁵⁰⁵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45，〈法藏碎金錄十卷〉，頁8上-9上。

⁵⁰⁶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45，〈迦談四卷〉，頁16上-下。



圖三：國家圖書館藏《法藏碎金錄》，明嘉靖開州晁璠寶文堂刊本。⁵⁰⁷

所以，《法藏碎金錄》是晁璠的祖先，宋代晁迥所著，一直以來，都沒有流傳出來。直到晁璠擔任翰林院檢討時，才有機會從內府抄得此書，並且以「寶文堂」的名義刊刻。「寶文堂」，是晁璠的藏書樓名；除了此書外，他也經常以「寶文堂」的名義來刊刻其他圖書。譬如《善本書室藏書志》中著錄的《晁文元公道院集要》，載曰：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致仕澶淵晁迥。前有治平乙巳（2年，1065）清王古序，後有雲龕李氏題跋，慶元己未（5年，1199）校官黃汝嘉刊，嘉靖甲寅（33年，1554）裔孫璠東吳重刊。⁵⁰⁸

⁵⁰⁷ 圖片轉引自：宋·晁迥，《法藏碎金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檢索於2015年11月30日，<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5e/12.html#>。

⁵⁰⁸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晁文元公道院集要三卷〉，卷22，頁5上。

此外，同樣也是其祖先晁迥所撰的《昭德新編》，亦是以「寶文堂」的名義刊刻的。

《善本書室藏書志》中又載《昭德新編》，云：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撰。前有迥自序，又景祐三年（1036），鎮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駙馬都尉上柱國李遵勗（988-1038）撰序，目錄後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嘉靖戊午（37年，1558）翰林院檢討中眷裔孫晁璫重刊、禮部鑄印局儒士侯汀騰錄三條，又卷尾木記嘉靖甲午（13年，1534）澶淵晁氏「寶文堂」刻。⁵⁰⁹

而《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中《貝茨晁先生詩集》也載：

宋晁冲之撰。……其集流傳甚少，此明晁璫以宋本重刊，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行，詩凡一百六十七首。⁵¹⁰

晁迥與晁冲之，都是晁璫的祖先，可知他所刻之書，都是有特別挑選的，尤其對於其祖先經典之作，顯得特別喜好，都會特別抄錄，並予以刊刻。其他還有不少明代北京的藏書家，都會將所藏之書或抄得之書，加以刊刻流傳。茲將國家圖書館館藏明代北京私家刻印之古籍，整理如下表所列，提供讀者參考。

表 6-1：國家圖書館館藏明代北京私人刻書

明代北京私家刻書				
項次	作者	書名	版項	刻書者
1	(宋)晁迥撰	法藏碎金錄	明嘉靖丙午(25年，1546)開州晁璫寶文堂刊本	晁璫
2	(宋)晁冲之	貝茨晁先生詩集	明嘉靖間開州晁氏寶文堂寫刊本	晁璫
3	(明)晁璫編	晁氏三先生集	明嘉靖甲寅（1554）晁氏寶文堂刊本	晁璫
4	(宋)晁迥撰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	明嘉靖甲寅（1554）晁氏寶文堂刊本	晁璫

⁵⁰⁹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昭德新編三卷〉，卷18，頁21上-下。

⁵¹⁰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20，〈貝茨晁先生詩集一卷〉，頁39上-下。

5	(宋)晁說之撰	晁氏儒言	明嘉靖甲寅(1554)晁氏寶文堂刊本	晁琛
6	(宋)晁說之撰	晁氏客語	明嘉靖甲寅(1554)晁氏寶文堂刊本	晁琛
7	(明)楊美益編	新刻古文選正	明嘉靖 35 年(1556)李懿漢中刊本	李懿
8	(漢)袁康撰	越絕書	明嘉靖 33 年(1554)白馬令張佳胤雙柏堂刊本	張佳胤
9	(明)徐中行撰	天目先生集	明萬曆甲申(12 年, 1584)張佳胤浙江刊本	張佳胤
10	(明)盧柟撰	蟻螻集	明萬曆(3 年, 1575)魏郡穆文熙刊本	穆文熙
11	(南北朝)釋曇良耶舍譯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明萬曆辛卯(19 年, 1591)嘉善袁黃刊本	袁黃
12	(明)史孟麟撰	史太常三疏	明萬曆丙辰(44 年, 1616)趙南星刊本	趙南星
13	(明)趙南星撰	趙忠毅公文集	明崇禎 11 年(1638)吳橋范景文刊本	范景文
14	(南北朝)釋月婆首那譯	僧伽吒經	明崇禎壬午(15 年, 1642)河間范景文刊本	范景文

總之，歷代的藏書家，幾乎都有借抄、互抄過圖書；尤其在古代的通訊、交通都不發達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藏書家，都有過借抄史。他們或親自動手，或雇人代勞，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不光從別人處抄寫，而且允許自己的藏書為別人抄錄，互抄互惠。當然，也許借抄的目的是為了豐富自己的著述，也許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家藏，但歷代藏書家孜孜以求、經年累月地抄寫，其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憑著無數雙抄書的手，生產出無數的抄本書，以至當許多刻本毀滅絕跡時，唯賴抄本的存在，而得以再續流傳。此外，藏書家對於典籍的刊刻、校勘，亦是古代中國的一個特色和好傳統，它對於中國歷代典籍的延續與傳播，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⁵¹¹藏書家們刊刻所抄之書，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藏書，另一方面，則是將所刻之書用來贈送、出售或與人交流。同時，基於延續傳統文化的考量，藉由本身的專業素養，參與校對考證，或是對刻工的嚴

⁵¹¹ 鄧雪峰，〈古代私人藏書與藏書家之貢獻〉（《前沿》2008 年第 10 期），頁 191。

格要求，以提高書籍的品質。由於文人參與校書、刻書的活動，使得書籍的品質獲得不少的提昇，無形中也對古代圖書的流通，起了很大的作用。⁵¹²

二、賞鑒與文會社集

綜觀中國的私家藏書史，可以發現自古以來為數甚多的藏書家，通常都有收藏不同文獻載體的習慣，這與中國文獻載體的發展以及崇古風尚的流行有很大的關係。在文獻載體方面，從古代的甲骨鐘鼎、彝器碑刻、竹簡縑帛等早期的書寫材料，一直到紙的發明以及普遍利用，印刷術的精進發展，各個時期不同的文化載體，都是當時文獻的主流。⁵¹³古代的藏書家中，固然有只專收藏典籍圖書的，但也有不少人除了藏書外，也收藏鼎彝器物、法書名畫及其他藏品。因此，實在無法將古代的藏書家與其他收藏家截然分清。⁵¹⁴例如明代的「藏書家」，在藏書的徵集中，就不只單純地僅收藏書本型式的圖書而已，其中也有不少人兼收鼎彝器物、法書名畫，或是其他類型的古董或文物的藏品。⁵¹⁵明代北京就有不少的收藏家，喜好收藏各類型的文化藏品，例如涇縣藏書家宋訥，就是如此。「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⁵¹⁶曲周縣藏書家聶明璉，除了書籍外，也喜歡兼收文物，只要是喜好的藏品，都會不惜重價買之。《曲周縣志》載其：

性好古，家饒千貲，不惜重價購之，一室之內縹緗爛然，古鼎、奇石，羅列左右。嘗于京師拜客，過門前觀一雲林小畫，回邸遺僕買之，已為好事者取去，悵惘連日。劉簡齋（劉榮嗣）嘗曰：「此人不解書畫，得即如唐靈武「告

⁵¹² 呂允在，〈藏書、校書、刻書與明人讀書生活〉，頁 419。

⁵¹³ 陳冠至，〈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的書畫收藏風尚〉（《故宮學術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2006 年），頁 2。

⁵¹⁴ 沈振輝，〈元明時期的收藏學〉（《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 年第 1 期），頁 56。

⁵¹⁵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頁 123。

⁵¹⁶ 《西隱文稿》，附錄，〈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宋先生墓誌銘〉，頁 47 下。

身付酒家博一醉」；求賞鑒家，惟吾公器耳。⁵¹⁷

同縣藏書家劉榮嗣，也是如此，「多蓄古敦彝、法書、名畫，以寄其上下千古之致。」東明縣藏書家李允樟，於個人的收藏偏好上，特愛「珍愛古本冊籍暨唐、宋諸名公書畫。」任縣藏書家孟若蘭，好藏圖書和器玩，「家居蒔花竹，藏古圖書器玩甚夥。」

諸如上述藏書家，都是兼收書畫器物，或是其他文物的明代北京藏書家。由於藏品種類眾多，難免真贗雜處，良莠不齊；即便是書，也是真假難分，所以，必須端賴藏書家的慧眼獨具，才能明辨瑕瑜，去偽存真。一般來說，藏書家在收藏的過程中，除了觀賞使用外，還特別注重藏品的鑒別，所謂鑒別，即對藏品進行考訂、校讎以探究來歷，辨明真偽，評定優劣，進而闡述自己的觀點。賞鑒家鑒定，又以法書名畫、石刻碑搨、尊彝鼎彝等古代文物之賞鑒最為常見。《客座贅語》載：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跡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壘又次之，漢玉杯珖之類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窯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窯、成化窯又次之，永樂窯、嘉靖窯又次之。⁵¹⁸

尤其明代的收藏家，特別擅長藏品的鑒別，其鑒別的精神甚至超越了宋元時期。⁵¹⁹清代的錢泳（1759-1844）有謂：

考定之與詞章，固是兩途，賞鑒之與考訂，亦截然相反。有賞鑒而不知考訂者，有考訂而不明賞鑒者。宋、元人皆不講考訂，故所見書畫題跋，殊空疎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弇州諸人，始兼考訂。⁵²⁰

足證明代文人之精於賞鑒。元末明初，松江文人曹昭也曾經指出當時收藏家的鑒賞風格，曰：「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非而後已。」

⁵¹⁷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3，〈明經聶公明璉傳〉，頁31下-32上。

⁵¹⁸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版），卷8，頁251。

⁵¹⁹ 沈振輝，〈明人的收藏活動〉（《文博》1998年第1期），頁88。

⁵²⁰ 錢泳，《履園叢話》，卷10，〈收藏·總論〉，頁261。

⁵²¹明末清初的北京藏書家孫承澤，就是個知名的收藏家和鑒賞家。孫承澤是當時北京最知名的收藏名家，收藏之富，甲於首都，且賞鑒又精。「蓋大內之物，經亂後皆散逸民間，退谷家京師，又善鑒，故奇蹟祕翫咸歸焉。」《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庚子銷夏記》亦載：

承澤晚年，思以講學自見，論者多未之許。然至於鑒賞書畫，則別有專長。是編乃順治十六年，承澤退居後所作，始自四月，迄於六月，故以銷夏為名。自一卷至三卷，皆所藏晉唐至明書畫真蹟；四卷至七卷，皆古石刻，每條先標其名，而各評驚於其下。八卷為寓日記，則皆他人所藏，而曾為承澤所見者，故別為一卷附之。大抵議論之中，間有考據。如宋之錢時，嘗為秘閣校勘，史館檢閱，終於江東帥屬，本傳所載甚明，而承澤以為隱居不仕，此類亦頗失於檢點。然其鑒裁精審，敘次雅潔，猶有米芾（1051-1107）、黃長睿（1079-1118）之遺風。視董道之文筆晦澀者，實為勝之。其人可薄，其書未可薄也。⁵²²

《庚子銷夏記》是順治 16 年孫承澤退居所做，收錄了孫氏所藏晉、唐至明書畫真跡 114 件，碑帖 108 件，另記親見他人所藏歷代書畫 54 件，分別加以品鑒評述，議論精到，要而不繁。因為撰寫的時間是在順治庚子年（16 年）夏季四月之初到六月之末，因而得名。卷 1 至卷 3，錄所藏晉、唐至明書畫真蹟；卷 4 至卷 7，錄的是古石刻；卷 8 則為寓日記，是專門記錄他人所藏而曾為孫氏所見者，其議論考據，精闢詳實。《研山齋雜記》亦評：「承澤雖人不足道，而於書畫古器，則好事、賞鑑，兩擅其長。其所收藏，至今為世所重。」⁵²³這些都說明了孫氏在收藏和賞鑒的領域中，佔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孫氏所收藏的藏品，不少是在明代滅亡後得自於故宮內府所珍藏的，也有很多是從民間收購回來的。其實，明代皇帝經常會將古器物、書畫賞賜給大臣，且於隆慶、萬曆時，因國庫空虛，更是將內府書畫充作是官員的俸祿。明末軍餉不

⁵²¹ 曹昭《格古要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7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原序，〈格古要論原序〉，頁1上。

⁵²²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13，〈庚子銷夏記〉，頁24上-下。

⁵²³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23，〈研山齋雜記〉，頁12上-下。

足時，亦曾出售內府珍物以籌措平亂所需之軍費，以致許多內府藏品，紛紛流落民間，給了私人收藏家獲取大內珍品的機會。⁵²⁴孫氏就曾多次提起自己所藏，許多都是得自於明朝內府。例如其家藏名畫《荊浩山水》，便是來自大明故宮，他說：

甲申之變，名畫滿市，獨無浩（荊浩，855-915）畫。一日，見從故內負敗楮而出者，浩畫在焉，然已破爛之甚。余使善手重裝，見絹素之內，復有重絹，亦一奇也。其山與樹，皆以秃筆細寫，形如古篆隸，蒼古之甚，非關（關仝，約 907-960）、范（范寬，約 950-1032）所能及也。令朴兒收之，貯「海雲閣。」

525

可看出經歷甲申之變後，不少名畫流傳在北京市面，孫氏經常用他賞鑒的能力，在市面上搜求名畫。荊浩的山水畫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中國五代後梁畫家，中國山水畫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孫氏見到此畫由內府流落民間，雖已破爛，但他還是細心的修復與收藏。相同的例子還有很多，再如《孫過庭書譜墨蹟》，也得自於內府，他又說：

唐初諸人無一不摹右軍，然皆有蹊徑可尋。獨孫虔禮之書譜天真瀟灑，掉臂獨行，無意求合而無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余垂髫時見文氏《停雲館帖》中有此書，愛之；後見宋人刻本，以為觀止矣。甲申忽覩此卷，驚歎欲絕，以市賈索價太昂不能收，惜惋竟日。……後越六年，復見於西川士夫家，以予愛之特甚，乃許購得。」⁵²⁶

甲申年的時候，孫氏偶然見到此書譜，但因商人索價太高無法購買，最後得之於西川士夫家。而《李伯時袁安臥雪圖》也是來自明故宮，他說：「『臥雪圖』為龍眠有名之蹟。一僮父自故內得之，以上有龍暝印，不知暝即古眠字也。余見，驚嘆欲絕。」⁵²⁷似乎是孫氏向一個不識貨之俗子購買而來的。《關仝山水》也是，他又說：「余求關仝畫不可得，忽於故內得一幀，已壞絕，而畫體不傷。」⁵²⁸關仝也

⁵²⁴ 沈振輝，〈元明時期的收藏學〉，頁 55。

⁵²⁵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 3，〈荊浩山水〉，頁 9-10。

⁵²⁶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 1，〈孫過庭書譜墨蹟〉，頁 5 上-下。

⁵²⁷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 3，〈李伯時袁安臥雪圖〉，頁 3 上。

⁵²⁸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 3，〈關仝山水〉，頁 11 上。

是中國五代後梁時期的山水畫畫家，孫氏也是一直搜求不到，最後得之於故內。

孫氏的收藏活動，是與他的宦海生涯並行的。早在退隱以前，便常利用政務之餘收集和研究書畫。他的書畫鑒藏活動雖開始得很早，但潛心賞畫、跋畫以及研究書畫，還是在離開政壇以後為主。現在所見孫承澤留在書畫作品上的題跋，大多為其隱居時期所作，有些書畫還被一次次地拿出來，反復欣賞，多次題跋。⁵²⁹《式古堂書畫彙考》載其事，云：

家有小室，入冬則居之。其中致楊補之所畫《竹枝》，趙子固《水仙》，王元章《梅花三卷》。繼得吳仲圭《古松泉石》小幅，長條，倣宣和裝法，改而為卷。余以八十之老，婆娑其間，名曰：「歲寒五友。」四賢皆奇特之士，余不得見其人，數百年後撫其遺墨以為友。嗚呼！歲寒之友，豈易得哉！退谷道人再記。⁵³⁰

誠如前文所述，藏品的賞鑒必須進行考訂、校讎，以探究來歷，辨明真偽，評定優劣，進而闡述自己的觀點。因此，要成為賞鑒家，必須多讀書，方有足夠的聞見，可供鑒賞之參考與助力。從事賞鑒活動者必須是飽學之士，這是很有道理的，文人於文會之間，出示之古器物或書畫、古籍等，在鑒定之時，往往必須考之載籍。因此，賞鑒者必須學問滿腹，才可供隨時備詢。所以，不少有名的學者、藝術家、收藏家，都扮演了這個角色。⁵³¹

孫承澤就是如此，他在鑒賞時，不時引經據典，考據古人生平和創作習慣等，做為賞鑒時的參考。譬如孫承澤曾評《郭熙樹色平遠圖》曰：

河陽（郭熙，1020-1090）畫早學李成，晚能更出己意，自成一家。……河陽嘗著有《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不同，則有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宋人往往摹之有奪真者，今人見畫中有爪樹針松，遂曰：「郭熙」，未然也。

⁵²⁹ 趙國英，〈明末清初書畫鑒藏家孫承澤〉《收藏家 1999 年第 4 期》，頁 52-54。

⁵³⁰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2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49，〈吳仲圭松泉圖弁題〉，頁 29 下-30 上。

⁵³¹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頁 282。

余在曹秋岳（曹溶）寓見一卷《山石林木》，無一筆不似河陽，乃張澹《谿山書屋圖》也。按澹畫，彼時重之，紹興間，臣下有勲績者，始賜之。重澹畫如此，則熙畫在當時可知已。⁵³²

郭熙字淳夫，世稱郭河陽，為北宋著名畫家。孫氏在賞鑒其畫時，就指出郭熙的畫風，學自中國五代宋初畫家李成（919-約 967），而後宋人在畫山水畫時，就有不少人是學自郭熙，並舉宋代畫家張澹的《谿山書屋圖》為例。可見孫氏在賞鑒時並不會憑空引述，往往是引經據典，舉例反證。他評《李伯時臨唐韋偃放牧圖》，也是如此，據載：

《放牧圖》，乃公麟（李公麟，1049-1106）奉旨臨韋偃畫。唐人極重馬政，各苑俱以百千萬計，偃蓋寫當年苑中放牧之景，而公麟以妙筆臨之，遂覺吞牛汗血之奇，備盡卷中。馬至萬餘，牧者千餘，而林木坡陀沮洳，不與焉！真奇觀也。⁵³³

這幅圖是李公麟奉旨仿唐人韋偃所畫的放牧圖。孫氏在評此畫時，一開始便提到唐人極重視馬政，之後才描述李氏如何妙筆將此畫出。

此外，孫承澤同時也是一個史學家，有專門的史學著作。因此，孫氏在鑒賞書畫的時候，除了辨其真偽、藝術價值及書畫家本身的問題以外，還會特別注意以書畫實物來補充史料記載之漏，糾正其記載之誤，這也是孫承澤所獨具之對書畫功能的新看法。⁵³⁴譬如在評論《〈閣立本十八學士圖〉》時，曾說：

沈存中（1031-1095）跋《學士圖》，謂圖稱房玄齡（579-648）字喬年，薛莊字元敬，陸元朗（550-630）字德明，姚東字思廉，而唐書稱姚思廉（557-637）字簡之，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即名也。以是證史之誤。⁵³⁵

當然，在賞鑑之時，孫氏除了重視藏品如何考訂探究來歷外，也會注重藏品本身

⁵³²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3，〈郭熙樹色平遠圖〉，頁1下-3上。

⁵³³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3，〈李伯時臨唐韋偃放牧圖〉，頁4下。

⁵³⁴ 趙國英，〈明末清初書畫鑒藏家孫承澤〉，頁54。

⁵³⁵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8，〈閣立本十八學士圖〉，頁5上。

以外的事情。譬如在評〈黃魯直松風閣詩墨蹟〉時曾說：

予於甲申後，見山谷數卷，最愛《松風閣》卷，其詩清脫，妙不可言，字乃正書勁秀，全用柳公權（778-865）法，他書所不及也。予晚年極喜柳書，復得其一二秘本，今見此卷，益知世之學柳者一味硬直，真鈍漢也。卷佳極矣！而有可恨者：嘉定間，向姓者所題不稱，一也。舊在賈似道（1213-1275）家，上有賈似道小印及悅生、秋壑長字諸印，辱于權奸之手，二也。元大長公主（祥哥刺吉），不擇人而命題，絕有可噴飯者，三也，項墨林（項元汴，1525-1590）收藏之印太多，又載所買價值，俗甚，四也。⁵³⁶

孫氏首先誇獎藏品本身價值，之後便點出了藏品之外的缺點，首先是向姓者題跋此畫不佳。再來此藏品曾被南宋賈似道（1213-1275）所收藏，此人人品不佳，藏品被其收藏頗為缺憾。第三、元朝大長公主祥哥刺吉，不擇人就為此藏品命題，使其藏品價值受損。最後，就是明末江南收藏大家項元汴在收藏此藏品時，蓋了太多收藏印，還標明購買價錢，使得藏品變的十分粗俗。可見孫氏在賞鑒過程中，除了重視藏品本身外，也會注重藏品本身以外的事物。

此外，另一個明末清初知名北京的收藏家與鑒賞家梁清標，也是如此。在中國歷代書畫收藏諸大家中，就數量而論，以項元汴最多，而以收藏質量而言，則首推梁清標。翁方綱題《蕉林書屋圖》有句云：「項家蕉窗梁蕉林，圖書之富甲古今。」⁵³⁷翁氏「蕉林書屋」古書數十萬卷，而最重要的藏品還是歷代法書名畫，其所藏自晉唐五代迄宋元明清，多是稀世之珍，⁵³⁸以致人稱其「搜藏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海內」，⁵³⁹收藏非常豐富。在梁氏家族中，早就有收藏的歷史，梁清標曾在《宋高宗乘龍江圖記》題跋中，自述梁家的收藏歷史與情況，云：

余家舊有《百靈歸順圖》一卷，先祖所珍藏者，後叔祖金吾公取以贈李于田司馬。蓋嘗聞之先君子云：「余雖不及見，然時往來於懷。」乙酉歲（1645），

⁵³⁶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1，〈黃魯直松風閣詩墨蹟〉，頁16上-下。

⁵³⁷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44，頁3上。

⁵³⁸ 故建君，〈蕉林新館舊槐風-梁清標與收藏〉（《大美術》2005年第5期），頁95。

⁵³⁹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1，〈梁清標〉，頁5下。

聞此卷在都市，亟購之。歸觀所繪人物形狀，宛然先君子曩昔所言，疑即余家舊物，合浦還珠。⁵⁴⁰

其叔祖父梁志，也是知名的藏書家兼收藏家。梁志好法書名畫，以及各式各樣的佳玩藏品、西山奇石等，「宅後構小園，高木修篁，蔚然深秀，臺閣池館不事藻繪，曲折盡致，從西山搜奇石數種，森列園中，日拭斐几，置圖史器物葛巾羽氅，吟咏自娛或邀朋友杯酒話舊，與與如也。」可知梁志收藏許多書畫、古董和各式佳玩藏品，這方面對梁清標多有教誨，其精心收藏的畫畫藏品，也大多落到了梁清標的手中。此外，梁清標還繼承了家傳的其他珍貴文物。他一生傾心書畫收藏，不惜重金購求書畫，即使因此入不敷出而債臺高築，他也樂此不疲。他的十餘萬卷藏書和書畫作品，都珍藏在河北老家正定城內的「蕉林書屋」當中。⁵⁴¹

關於梁清標的鑒賞活動，他曾在《蕉林詩集》中賦詩論及書畫鑒藏，詩云：「博物多識鑒賞精」、「諦觀審辨析毫芒」，⁵⁴²可見他對自己的鑒賞能力非常有自信。其實，後人對於梁清標的鑒賞能力，也多給予高度的評價，〈真定蒼岩梁公墓志銘〉載其「好觀古人書畫，能評其真贗。」⁵⁴³可以說，凡經梁清標收藏過，並且加以鈐印的書畫，基本上就是真跡。而他收藏過的晉、唐書畫，也是今日我們所看到晉、唐藏品的的主要來源。而經過他的題簽、鈐印和考證最多，且最能顯示他精準鑒定能力的，則是兩宋時期的書畫作品。⁵⁴⁴梁清標學識淵博，眼界開闊，加上他態度嚴謹，是做為賞鑒家最為重要的條件，因此經他鑒定的書畫失誤慎少。譬如梁氏收藏的《歷朝寶繪集冊》中第九開，有一幅何筌的《草堂客話圖》，後在李佐賢（1807-1876）《書畫鑑影》中有收錄，李氏跋曰：

此幅舊題何筌《草堂客話》，系梁蕉林相國筆蹟。按筌《名畫譜》無徵，不知此題何所據？然畫筆細入豪芒，無微不至，而不絲不亂，工雅兼長，洵屬宋

⁵⁴⁰ 劉金庫，〈「南畫北渡」：梁清標的書畫鑒藏綜合研究〉，頁 71。

⁵⁴¹ 王音，〈一代收藏大家梁清標〉（《當代》2014 年第 6 期），頁 78。

⁵⁴²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七言古三，〈和春為賦長歌〉，頁 7 下。

⁵⁴³ 劉友恒，〈正定縣梁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文物春秋》1995 年第 1 期），頁 38。

⁵⁴⁴ 王音，〈一代收藏大家梁清標〉，頁 78。

人真實本領，元以後無此畫境矣！⁵⁴⁵

在跋中提到李佐賢對梁清標所題的「何筌《草堂客話》」感到疑惑，因為在何筌《名畫譜》中並沒有收錄此畫。後來，此幅再經清末書畫鑑定家張珩（1915-1963）仔細觀察考證後，終於在畫左方松樹幹上，發現了極其細小的「辛卯何筌製」五字款，有可能是因為絹色沉黯，李佐賢沒有發覺。由此可見，梁清標對所藏書畫的觀察之細，以及鑑賞力之深厚，實在令人讚佩。⁵⁴⁶

此外，凡愛書畫之人，一定非常重視書畫的裝裱保護。明代收藏家周嘉胄（1582-1658）擅長書畫裝裱，曾在《裝潢志》云：

古迹重裝，如病延醫。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劑而斃。⁵⁴⁷

梁清標也是如此，梁清標喜愛自己的藏品，重視書畫的保護，為此，還特別找了揚州知名的裱畫工匠張黃美，來為他裝裱書畫。據《書畫記》載：「黃美善於裱褙，幼為通判王公裝演書畫，目力日隆。近日遊藝都門，得遇大司農梁公見愛，便為佳士，時戊申（康熙 7 年，1668）季冬六日。」⁵⁴⁸可看出張黃美一開始是為王通判裝潢書畫的，直到康熙 7 年與梁清標相遇，梁清標便特別請他去梁氏「秋碧堂」，為自己家藏書畫、圖籍，裝裱修復。⁵⁴⁹

凡經梁氏重裝的書畫作品，無論是裝裱形式還是用料，都有自己的風格。梁氏的書畫軸，多用碧色雲鶴斜紋綾，天地米黃色細密絹圖，有些用副隔水，有些則不用副隔水，要視畫本幅的長短而定，兩條綬帶與副隔水，或綾、絹，圈同色，包首用淡黃色絹，軸頭用紅木或紫檀製成。書畫卷則仿宣和裝，隔水、天頭都是用雲鶴斜紋綾，精選較好的舊錦做包首，白玉別子和軸心。此外，凡是經過梁氏

⁵⁴⁵ 清·李佐賢，《書畫鑑影》（《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10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初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影印），卷 10，〈何筌草堂客話〉，頁 25 下。

⁵⁴⁶ 陳耀林，〈梁清標叢談〉（《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 期，1988 年），頁 60。

⁵⁴⁷ 明·周嘉胄，《裝潢志》（《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11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初版，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昭代叢書甲集本影印），〈古迹重裝如病延醫〉，頁 2 上。

⁵⁴⁸ 清·吳其貞，《書畫記》（《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3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初版，清乾隆鈔四庫全書撤出本），卷 5，〈趙松雪寫生水草鴛鴦圖紙畫一小幅〉，頁 63 下。

⁵⁴⁹ 故建君，〈蕉林新館舊槐風-梁清標與收藏〉，頁 95。

重裱的書畫，都有自己的題跋，⁵⁵⁰可見其家書畫裝潢之細緻。

另一方面，收藏家平時除了四處收藏鑒賞藏品外，彼此之間，也會經常文會交流。譬如梁清標，就曾寫過《退谷歌》送給孫承澤，歌中云：

昌黎昔日稱盤谷，泉甘土肥繁草木。高風千載如見之，紛紛塵世誰相逐。於今再覩北海翁，巖栖獨躡西山麓。西山雲氣何冥濛，蔭蔭竹樹幽入宮。飛瀑潺湲懸素練，老松夭矯蟠虬龍。碧苔黃葉林中寺，白鳥青蘋水面風。一自上書辭鳳闕，入山長揖烟霞窟。藏書萬卷映晴窗，濁酒一樽弄華月。畫圖何讓米家船，周鼎商彝不記年。⁵⁵¹

從歌中除了可以知道兩人的交情很好之外，也可以在裡面看到孫承澤的藏書與青銅等藏品甚富，就猶如北宋書畫家米芾的「米家船」一般。有關藏品的著錄，主要也以藏書與書畫為主，青銅器方面就較少提及。

此外，收藏家們在進行藏品的鑒別時，經常會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流，對藏品進行考訂、校讎，以探究來歷，辨明真偽，評定優劣，進而闡述自己的觀點。在《清朝野史大觀》中，就曾經描述這些鑒藏家之間文會交流的軼事，據載：

清順治，張爾唯太守學曾由部郎出守蘇州，將出都，孫北海（孫承澤）、曹圃（曹溶）、龔芝麓（龔鼎孳，1615-1673）三公設宴祖餞，各攜所藏法書名畫相誇示，太守亦出舊藏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卷》真跡。三公傳觀，皆愛不釋手，曰：此卷可謂今日壓卷矣！太守意得甚，北海徐曰：「此圖以萬里名，而爾唯一人據之，無乃太貪，截作四段，四人分有之，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龔皆拊掌稱善。立呼侍者以刀尺進，太守窘甚，至長跽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絕對矣！」眾問之，則曰：「剪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二語也，一座為之絕倒。⁵⁵²

⁵⁵⁰ 王以坤，《古書畫鑒定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頁63。

⁵⁵¹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七言古一，〈退谷歌〉，頁19下。

⁵⁵²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上海書店，1981年6月，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複印），卷9，〈孫北海雅謔〉，頁52。

孫承澤、曹溶與龔鼎孳，三人皆是明末清初知名的收藏家與鑒藏家，從文中可知，鑒藏家們經常會聚集在一起，將自己所珍愛的藏品讓大家欣賞，會中氣氛融洽，凡藏品真跡，與會人員見之皆愛不釋手，並進而闡述自己對藏品的看法。梁清標也是如此，他的職位高，學問淵博，收藏豐富，又喜好廣結天下名士。當時梁氏的「蕉林書屋」，就是文人雅士、書畫家與鑒藏家文會的場所。李寅、尚晨、喬萊（1642-1694）、陸新徵等畫壇巨匠，都不時來「蕉林書屋」作過畫。⁵⁵³

總之，收藏書畫可說是盛世中的文化現象，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文人士大夫對於書畫的收藏，無非就是謀利、好事、自勵與自娛四類。謀利者，囤積珍藏名畫，以謀其利。好事者，收藏對他們來說，並不是為書畫中的藝術魅力所吸引，他們憑藉豐厚的資產去收藏，為的是爭名好勝、附庸風雅。自勵者，珍藏書畫本身，也追求其後面所具有的情操抱負，以及書畫本身所包含的風雅。自娛者，以書畫收藏賞玩來自娛，追求精神上的寄託。⁵⁵⁴對於歷代不少的文人來說，多將鑑賞與收藏視為提高其自身文化素養，以及顯示其學識、風雅的途徑，且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士大夫，莫不崇尚古玩的收藏，因此也出現了許多名聞於世的收藏家。⁵⁵⁵

第五節 明代北京藏書家的專業貢獻

明代眾多的藏書家，構成了一個陣容強大、學識淵博的特殊文化群體，他們以自己對歷史典籍的極端熱愛與珍視，搜羅尋覓，抄刻並舉，孜孜以求，勤奮執著地努力實現自己的追求，不遺餘力地推進私家藏書事業的發展。⁵⁵⁶吳晗先生就曾在《江蘇藏書家史略》中，推崇古代藏書家辛勤整理藏書的工作：

⁵⁵³ 陳耀林，〈梁清標叢談〉，頁 60。

⁵⁵⁴ 王元軍，〈唐人收藏書畫的心理探索〉（《歷史月刊》，第 83 期，1994 年 12 月），頁 83-88。

⁵⁵⁵ 王麗卿、聶高志，〈中國歷代繪畫中文人博古鑑賞活動與家具主從關係之研究〉（《設計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2。

⁵⁵⁶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99。

藏書之風氣盛，讀書之風氣亦因之而興。好學敏求之士，往往跋涉千里，登門借讀，或則輾轉請托，逐錄副本，甚或節衣縮食，恣意置書。每有室有懸磬而藏書充棟者；亦有畢生以抄誦秘籍為事，蔚成藏家者。假本既多，校讐之學因盛，績學方聞之士，多能掃去魚豕，一意補殘正缺，古書因之可讀，而自來所不能通釋之典籍，亦因之而復顯於人間。甚或比勘異文，發現前人誤失，造成學術上之疑古求真風氣。藏家之有力者，復舉以剞劂，輯為叢書，公諸天下，數百年來踵接武繼，化秘笈為億萬千身，其嘉惠來學者甚多。⁵⁵⁷

他從藏書家蒐集、保存、抄錄、校讐等藏書活動，總結了藏書家們對傳承中華博大精深文化所做的貢獻。一般來說，藏書家對藏書文化的主要貢獻，大多集中在對典籍的保存與流傳、藏書樓的建築，以及圖書的保護、藏書理論的建設與利用、藏書進行學術研究與編纂史料等方面。⁵⁵⁸以下將就明代北京藏書家重要的專業貢獻，加以論述。



一、幫助建立官府藏書

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私家藏書風氣，主要在於推崇個人私藏和藏書家庭的世守。直到近代中國，隨著圖書館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傳統的藏書觀念逐漸為藏書家所捨棄，尤其在公共藏書成為近代藏書文化發展的主流時，一些藏書家遂以出售、捐獻或寄存等方法，將私人所藏轉歸公藏。⁵⁵⁹事實上，早在明代北京，就有不少的藏書家不僅致力於建立私人的藏書樓而已，甚至是建置書院來藏書，或是將所藏之書，送給書院典藏，提供學者們利用的藏書家，幫助地方政府建立藏書。

深澤縣藏書家王琦，「建置書院，增貯經籍，皆損俸為之。」而密雲縣藏書家王希烈，「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昔所有者，擴而新之。名宦鄉賢之祠，宿省牲之

⁵⁵⁷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頁 118。

⁵⁵⁸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99-304。

⁵⁵⁹ 劉雪峰，〈中國古代藏書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貢獻〉（《經濟研究導刊》2011 年第 22 期），頁 249。

所，藏書置器之庫，昔所無者，增而創之。」王希烈見到地方儒學內沒有藏書的地方，始建藏書處所，用以藏書。順天府的李景登，同樣也損俸購書，建立書院。他「捐俸購書，造『尊經閣』，開『登瀛書院』，一時才雋畢出。」任邱縣藏書家李懿，喜歡讀書寫詩，並且幫助地方編寫縣志。「致仕歸，以詩文自娛，若未常顯仕者，搜里中故事，編成縣志，購書數千卷，送貯學宮，為寒士誦讀。」

至於南宮縣的邢侗，除了喜歡買書以外，也會捐出自己的薪俸，購買有關經、史、子、集及國朝制典等相關的書籍，典藏在地方儒學內，提供學子們閱讀。「居里塾，好購諸古今書讀之。……月俸捐少贖緩，為置經、史、子集，及國朝制典諸書若干部，皮之學宮。」邢臺縣藏書家王震，「致政歸，圖書千餘卷送府庠，資士子誦讀。」退休後，他竟將心愛的圖書捐給地方學校，讓學子們有書可讀。以上諸家，他們都捐獻自己的薪俸，購買非常多的書籍，送給地方學校，讓貧窮的學子們都有書可讀，其行可嘉。冀縣樊尚文，目睹「明末學宮荒廢，捐俸葺之，購經史，建文昌祠、敬一亭，聚諸生講習其中」，讓本地在學的生員們，都有場所可以讀書，也都有書可以讀。

文安縣藏書家紀元，同樣也是修整地方儒學，並廣搜典籍，藏於其中；而對於地方士子，更是以禮相待，見有困難者，不問其原因，一定給予協助。他「修整學宮，講明祀典，博求遺籍，其士人彬多文學之風焉。」而張照在靈壽縣當官時，也嘗因地方沒有書院，於是捐俸建樓，並設置處所藏書。「適聚星門左有社學舊址一區，久屬宦業，即捐俸贖之，而建書屋於上，扁其門曰：『松陽書院』，蓋將聚松陽一河清淑之氣，而鍾之人傑也，取義旨哉。前堂三楹，扁曰：『敬業』，左右兩翼為室者，俾小子有造也。後堂三楹，扁：『尚論』，俾成人有德也。堂之東二楹，藏書史豫器。西二楹面城，城之池，畜水而清，種蓮數莖，以備游息。」

至於廣宗縣藏書家崔恭，除了喜好編書、教子讀書外，見所住廣宗縣地方偏僻，儒學之圖籍不完整，於是斥資購買歷代史、《文獻通考》、《通志畧》、《玉海》、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與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書，送給地方學校，以教導學子們讀書。他「抵家靜坐一室，不

事生產，惟訓子讀書，足跡不入城市。治『清樂園』，嘗手一編自怡，後學者拜而問藝，悉一一指畫不倦。以廣宗地僻，不見全書，遂購歷代史、《文獻通考》、《通志畧》、《玉海》，並五經四書，暨四方古今名儒議論，以遺儒學。」而獻縣的戈繼皋，也曾在明末亂世之時，見地方無書可讀，乃徵集圖書，得到即親自抄錄，日夜不曾間斷，甚至還為此而身染重病。「時經明末亂後，老師宿儒都盡，豐莊地僻陋無書，繼皋自京師所携一二經外無所有，乃於遠近搜假，得即手自抄錄，久之，所抄日多。汎覽精思，有未通，日夜忘寢饋，以此得咯血。」

綜觀以上諸家，他們有的是在地方當官，有些則是退隱故里的致仕官員，都是見到地方學子想讀書而無書可讀，遂出錢出力的建立書院，建置書樓，增貯書籍，以期能將圖書推廣給更多的學子閱讀，或是給想看書的學者們使用。



二、編製藏書目錄

有些明代藏書家，對於所藏龐大的圖書，會予以整理編目。藏書編目不但整齊美觀，便於查閱，更可以藉由藏書編目的過程，對書籍進行全面通盤的瞭解。所以，明代藏書家除了沉浸在坐擁書城的感受外，對於書本的應用、檢索而言，編製書目亦是一生藏書生活中必須從事的工作。⁵⁶⁰而編纂藏書目錄，係指藏書家透過有系統的著錄藏書的書名、著者、出版、校勘、內容和收藏等項目，並按一定的次序編排，以揭示並反應其藏書狀況。歷代知名藏書家的藏書數量非常多，少則不下幾千卷，多則甚至上萬卷、幾十萬卷的都代有其人。對於如此龐大的藏書，如果沒有加以整理，一定會雜亂無章，無法有效利用。所以，為了藏書的有效管理，歷代藏書家都會對其藏書進行編目的工作。⁵⁶¹明代北京就有許多藏書家，都編有私人的藏書目錄。

明代涿州藏書家高儒，覺得明代時期的圖書太多，難以檢閱，所以他非常著

⁵⁶⁰ 呂允在，〈明人讀書與編著生活〉，頁 211。

⁵⁶¹ 黃顯功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頁 33。

重編目和藏書的整理。他認為「書無目，猶兵無統馭，政無教令，聚散無稽矣。」

⁵⁶²，於是編製了私人藏書目錄《百川書志》。《百川書志·序》載：

愈勵先志，銳意訪求，或傳之士大夫，或易諸市肆。數年之間，連床插架，經籍充藏，難於檢閱。閒中次第部帙，定立儲盛，又恐久長無據，淆亂逸志，故六年考索，三易成編，損益古志，大分四部，細列九十三門，裁釘二十卷。書志不備者，蓋聚多而未已也。書刻類中註陳書後，頓忘寒暑，蠹檢篇章，志略始成，襟懷方遂，珍藏芸笥，以勉成先志，玩繹身心，稽驗清聚云耳。⁵⁶³

《百川書志》是明代一本重要的私人藏書目錄。本書共 20 卷，著錄圖書 2000 種。它是按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收錄了從先秦到明代的經、史、子、集各類圖書，共 93 類。其中，前 3 卷為經志，4-6 卷為史志，7-11 卷是子志，12-20 卷為集志。經志中，收錄圖書 239 種，分為 16 門。史志中，收書 338 種，分為 21 門。子志收書 569 種，分為 30 類。集志收書 990 種，細分為 26 門。從該書的分類中，不難看出高儒編製書目主要集中在子部和集部，而經部及史部，則相對較少。⁵⁶⁴《百川書志》對後世的貢獻很多，具體表現在兩個地方：⁵⁶⁵

(一) 增加了史部的類例和子目。

史部的類例，在晉《中經》中只有 4 類，在阮孝緒的《七錄》中，增加至 12 類，《隋書·經籍志》中，則增加至 13 類，《直齋書錄解題》中，光史部的類例，就已達到了 16 種之多。《百川書志》的史部，在他們的基礎上，又新增了御記、史詩、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史部分類達到 21 種之多。史部的這種變化，反映出史部圖書數量的激增與體裁或內容的複雜，以及史部類例在不斷地系統化、完善化。

(二) 記錄了一定數量的民間俗文學，亦保存了一定數量的文學史料。

⁵⁶² 明·高儒，《百川書志》，序，〈百川書志序〉，頁 1 下。

⁵⁶³ 明·高儒，《百川書志》，序，〈百川書志序〉頁 1 上。

⁵⁶⁴ 毛芳，〈淺論明代藏書家高儒和《百川書志》〉（《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1 年第 12 期），頁 139。

⁵⁶⁵ 管仲樂，〈高儒《百川書志》史部論略〉（《邊疆經濟與文化》2014 年第 4 期），頁 174。

《百川書志》史部中的野史、外史、小史等類目下，記錄了一定數量的歷史演義小說、當代小說等民間俗文學作品，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三國志通俗演義》和《忠義水滸傳》。《百川書志》在《忠義水滸傳》的解題中寫道：「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從副百有八人。當世尚之。周草窗《癸辛雜誌》中，俱百八人混名。」⁵⁶⁶攷《水滸傳》的版本眾多，《百川書志》中所著錄的為《忠義水滸傳》的祖本，這為研究《水滸傳》的版本問題，提供了很珍貴的文學史料。

開州的晁瑛，亦是明代著名的藏書家、目錄學家。家富藏書，其藏書樓曰：「寶文堂」，並根據所藏之書，編有《晁氏寶文堂書目》3卷。⁵⁶⁷《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述評《晁氏寶文堂書目》，有云：

此本以「御製」為首，上卷分總經、五經、四書、性理、史、子、文集、詩、詞等十二目；中卷分類書、子雜、樂府、四六、經濟、舉業等六目；下卷分韻書、政書、兵書、刑書、陰陽、醫書、農圃、藝譜、算法、圖誌、年譜、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其著錄極富，雖不能盡屬古本，而每書下，間為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見明人板本源流。⁵⁶⁸

該書目一反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而大膽的設立了 33 個子目類別，在書目編撰上，作了一次有益的嘗試。其次，在中卷之子雜類與樂府類中，著錄了以往藏書家認為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元明話本、小說、雜劇和傳奇，擴大並豐富了圖書著錄的範圍。最後，在所著錄的每部書下端，均有考識文字，或說明版刻地點、版刻時間、版刻單位、版刻人員，或說明冊次，紙質，或注明批注者等。由於這本書目著錄了近八千種圖書，且都非常詳盡的記載，所以這些資料，都足以考證明代版刻源流的情況。⁵⁶⁹

從以上所舉明代北京藏書家當中，可以看出他們所編製之藏書目錄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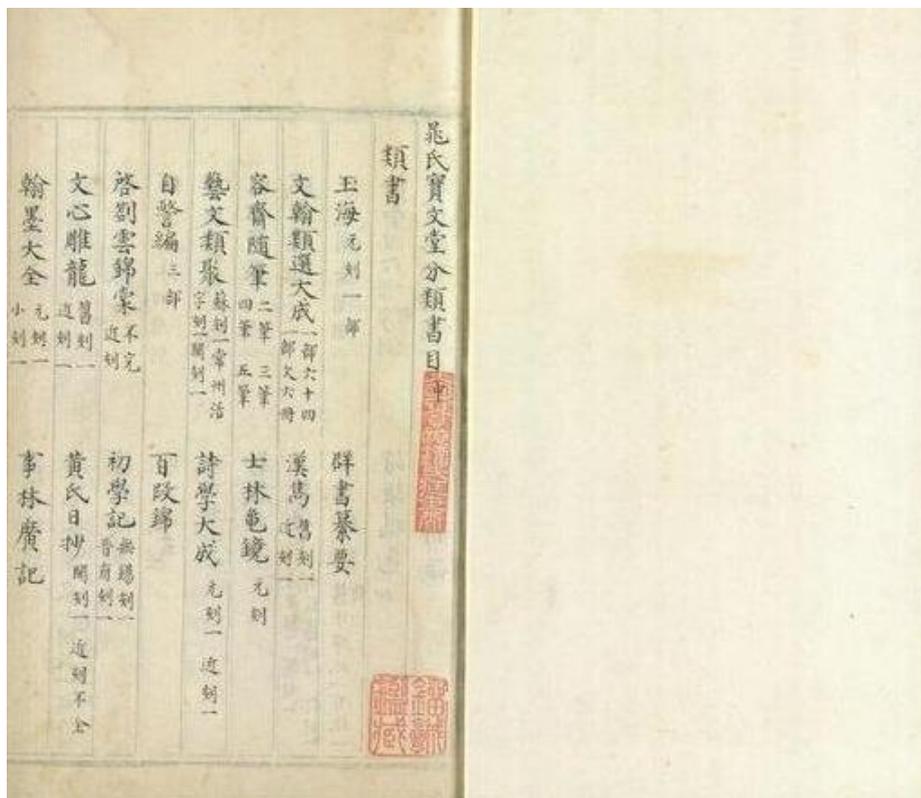
⁵⁶⁶ 明·高儒，《百川書志》，卷 6，頁 3 上。

⁵⁶⁷ 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晁瑛〉，頁 135。

⁵⁶⁸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87，頁 3 下-4 上。

⁵⁶⁹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頁 1062。

也可以明白藏書家們往往會因不同的生存環境、社會地位、學術造詣，以及個人的喜好和人生追求等因素的影響下，反映在他們各自的藏書目錄中。可以說，私家藏書目錄是藏書家們的文化修養、文化情趣和文化心態的集中體現。⁵⁷⁰



圖四：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晁氏寶文堂書目》，明藍格抄本。⁵⁷¹

總之，由以上諸藏書家們所編製的藏書目錄，可以了解到他們如何有系統地編排及管理藏書，且對於圖書版本的考據，有著很大的貢獻，其成就對於中國的目錄學及版本學來說，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明代北京藏書家不少是將畢生辛苦積聚的藏書捐贈給學校，或是為學校建造書樓，然後再出錢買書捐贈給學校，以此傳播知識，共享圖書。他們對圖書的流通共享是持開明的態度，提倡藏書開放的思想，且付諸實踐，希望透過教育的機制，例如：中央與地方官學、書院、社學、私塾等。他們將藏書推廣到社區，對後世的影響很深。

⁵⁷⁰ 李英珍，〈明清私家藏書目錄的文化風貌研究〉（《蘭台世界》2012年第6期），頁38。

⁵⁷¹ 圖片轉引自：明·晁瑛，《晁氏寶文堂書目》，「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檢索於2015年10月18日，<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2/86/eb.html>。

第七章 結論

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具有內涵豐富的文化現象。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它有著汗牛充棟的圖書，又有著屹然矗立的藏書樓，以及在長期活動中形成的措理之術和風尚、習俗等行為文化，還有藏書家主體因素潛層的心態文化。如此豐富的內容，決定了古代藏書文化的重要課題。⁵⁷²此外，私家藏書還具有多樣性特點。從藏書階層來看，有文人士大夫，有官僚豪門，有鄉紳富賈，也有一般的布衣學子。從藏書家類型看，有著述型、校勘型、收藏型、販賈型等等。不同類型的藏書家，從不同途徑發展了私家藏書，有的將藏書內容轉化為新的知識體系，有的校訂了圖書中的訛誤，有的搜采異本，精於措理，有的儲存吐納，促進了圖書的流通。私家藏書的多樣性特點，從各個管道上豐富了中國古代的藏書文化，繁榮了私家藏書的事業。⁵⁷³

明代藏書事業的興盛，具有深遠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因素。由於明代政府在皇帝政策的鼓勵下，使得社會經濟復甦與快速成長。加上社會穩定、交通便利等諸多條件的影響下，促使文化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以及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事業的普及。此外，刻書業、圖書流通業的興盛，也為明代私家藏書事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尤其是私刻，更是直接為私人藏書活動，發揮著推動與揚興的作用。⁵⁷⁴因此，就在有利藏書發展的特殊社會文化背景下，社會對書籍的需求大增，也奠定了藏書文化堅實的基礎，對於藏書的整理、利用、保護與編製書目等方面的精進，都有很大的貢獻，形成了明代藏書獨特的文化，也造就了明代成為中國古代藏書事業史上的極盛時期，藏書事業的發展與成就，超過了歷史上以往的任何時期。⁵⁷⁵

⁵⁷² 周少川，〈中國古代藏書文化研究論綱〉（《中國圖書館學報》2002年第6期），頁29。

⁵⁷³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文化芻議〉（《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頁93。

⁵⁷⁴ 牛紅亮，〈略論明代的私家藏書〉，頁33。

⁵⁷⁵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254。

自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北京儼然成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經濟高度繁華，又是科舉會試與殿試的所在地，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士大夫聚集於此，從事各類的學術研究及文化活動，讀書問學的文化氛圍十分濃烈。此外，又有許多寓京的文士和學人，因求學、購書、應舉、遷職、待轉或致仕而來到這裡，明代北京可說是全國數一數二人文薈萃的繁華盛地。另一方面，明代北京的圖書市場馳名天下，為士人收購書籍的重鎮。北京地區刻書雖然不如南方，但因是全國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交通十分便利，再透過商賈，將大批書籍由各地運送至此販售，為本地藏書家在圖書徵集上，提供了主要的來源。總之，對於私家藏書來說，明代北京是人文薈萃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再加上圖書營銷的繁榮，使得這裡的藏書風氣非常興盛。

明代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有著好古尚趣的藏書氛圍。好古是明代文人的特性，北京自然也不例外。明人認為古代文獻是傳統精神的延續，閱讀古籍，就好似尚友前賢，與古人交談一般。因此，他們喜好收藏古籍、書畫、古董等文物，代表自己博古通今。至於「嗜癖」，亦是明代文人所擁有的特性，明代藏書家對於圖書有著特殊的癖好，對於書籍有著專注的情感，對於書籍愛好者來說，書可以說是他們一生感情的寄託，並且是傾注了他們畢生心血的。每當得到一本好書時，便喜形於色，呵護備至；一旦失去了，便痛苦萬分，懊惱悔恨。使得染上這樣癖好的藏書家，都願意把自己的興趣、精力、情感及金錢等資源，全部投入給外行人看似沒有用途的書籍。他們賦予書籍生命，長期以來，這種專注的情感一直深深的影響舊時代的知識階層。⁵⁷⁶而明代北京是四方仕子雲集、人文薈萃之地，各地文人的嗜癖，想必在此都不難見到。

至於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社群生活，可從家族藏書與藏書家的友朋社群來探討。以家族藏書來說，他們認為積財以貽子孫，不如傳予他們可求知長進的書籍，同時，藏書家們也莫不祈求自己的藏書，子孫們能代代相傳、世代永保並澤被後人，所以時時提出許多告誡子孫必須固守藏書的家訓與族規。⁵⁷⁷對於明代北京的藏書

⁵⁷⁶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頁 22。

⁵⁷⁷ 曾健敏，〈古代私家藏書對文化典籍傳承的貢獻〉，頁 50。

家來說，當然也是如此。明代的北京藏書家，因家風影響而從事藏書活動的家族很多，他們藏書的目的不為別的，就是希望積書得以教導自己的子孫，有朝一日能夠登上仕途的臺階。為了獲得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殊榮，大多數古代士人選擇了走讀書做官的道路，這就形成了中國士人特有的讀書做官的文化心態。而在此心態的影響下，藏書活動與功利目標遂聯繫了起來，⁵⁷⁸深深影響著讀書人與藏書家。自古以來，書與讀書人就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讀書人買書、藏書，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古往今來，不知出現過多少耗以平生精力，甚至幾代人的精力，專事藏書而形成的藏書鉅族。⁵⁷⁹

而藏書家的友朋社群，則可以從文會結社來探討。藏書家經常因同好而結合成固定的集會，如詩社、文社等。有明一代，文人們喜好結社，他們以文會友、詩酒酬唱、結聚論學、清議諷時，謂為時代的風氣與社會的潮流。明代北京是各省士子參與會試、殿試的地方，使得天下英才彙集於京師，許多文人士大夫在此以文會友，透過「藝文」的方式，彼此結成了志同道合之友。尤其明代中後期興起的文人結社風氣，如文會、文社、講會等形式，其實都與科舉活動，有著密切的關聯。此外，不少藏書家之間因校書、訪書、鑒別、題跋等藏書專業方面的問題，也必須結合眾人的意見，來交流知識與資訊，故而必須進行文會過從，互相傳達知識與訊息，溝通分享。他們經常會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辦文會活動，活動的形式也非常豐富，有的是呼朋喚友，以詩酒交歡，或是結聚論學，或是談論藝文，或是評議時政，或是休閒清賞，或是品味書籍，探究源流。他們更是經常攜帶私藏的鼎、彝、器物、法書名畫，以及其他類型的古董或文物，彼此交流觀摩，相互賞鑒。凡此種種，都可以清楚地了解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結社文化、交游方式、文會活動，以及具有區域文化特色之文人社群生活。

關於明代北京藏書家的藏書生活，筆者已分別從藏書的徵集、貯存、利用、流通，以及藏書家的專業貢獻等角度，進行探究與論析，並歸納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藏書的徵集。歷來藏書最重訪書，藏書家書籍的主要來源非常的多，一般而

⁵⁷⁸ 于璐，〈中國歷史上私人藏書家的藏書觀念〉，頁 30。

⁵⁷⁹ 黃曉霞，〈私家藏書文化論〉，頁 36。

言，購買及抄寫，是其最主要的途徑。此外，也可以透過朝廷賜書、他人贈送、同好交換，乃至撿拾、乞贈、查抄、竊奪……等不同手段或管道。不過，往往會因人、因時、因地之不同，而演繹了無數的藏書徵集圖書的故實。誠如前文所述，明代北京的圖書市場馳名全國，為士人收購書籍的重鎮。當地官商雲集、人文薈萃，書籍市場十分活絡，書商們的足跡在城鄉之間隨處可見。⁵⁸⁰所以，喜好藏書的士人們，在書籍的取得上顯得比較容易、便捷，多能飽其所欲。

另一方面，除了購書外，抄錄書籍，仍是北京藏書家獲得圖書的主要方法之一。尤其是在是在訪書沒有著落、或是貲財不夠的情況下，不少藏書家以抄書的方式來取得書籍。雖然自從印刷術發明以後，書籍製作的成本較之以往已經降低許多，但抄書卻仍然是藏書家們補充藏書的重要手段。圖書的徵集，其困難的地方很多，尤其藏書家收集藏書並非濫收，徵書過程都會有自己收藏喜好及目的，但由於古書流傳甚少，特別是蒐藏一些珍本秘笈，想要得到更是困難。加上自然的、社會的種種條件限制，藏書家們往往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能得到心儀的書籍。明代北京藏書家為求訪書，常常歷盡千辛萬苦，所蒐羅的書籍，自然要倍加珍藏，一旦遇到祕籍異書，更是視若拱璧。且當知識分子看淡世情，率性逸隱而絕意仕途，轉而終日與書籍為友，其追求恬淡閒適的生活態度，在訪書、購書、抄書的行程中，往往顯露無遺。同時，從書籍中不但可以獲得知識外，還有一種相惜相伴的情感，也反映出文人雅士對書籍愛護與珍惜的情懷。⁵⁸¹他們努力購書、抄書與護書，豐富自己的讀書生活，只為了替保存文化典籍的工作，做出貢獻。

二、藏書的貯存，一直是藏書家很重視的環節。首先，為了減輕天災人禍等因素對圖書的破壞，使圖書得以「久傳後世，津逮子孫」，明代北京的藏書家們，都很重視對圖書的貯存保護。他們在學習官府的藏書經驗，並總結了以往民間智慧的基礎上，努力地去探求保護圖書典籍的方法與措施，並予以採用，

⁵⁸⁰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60。

⁵⁸¹ 呂允在，〈訪、購、借、抄—明人讀書生活的一個側面〉，頁 512。

以確保藏書的安全。⁵⁸²因此，在中國古代藏書保護的漫長實踐經驗過程中，藏書家們逐步地形成了一些有利於保護藏書的觀念，其中有些成為藏書家們的共識，進而成為藏書活動的規範和自律要求。⁵⁸³

其次，明代北京不少藏書家會建置藏書樓來收藏圖書，藏書樓可以說是藏書家精神的寄託，從藏書樓名的命取，往往可以反映出藏書家不同的志向、情趣、修養、操行。他們在此收集、刊印、整理、管理圖書，注入了收藏者的人生理想與精神風貌，彰顯了藏書家的淵博知識與人生態度。⁵⁸⁴這些藏書樓的建築與管理方式，可以說是明代北京藏書家的真實寫照，其所要表達的精神，也正為後世所效仿的典範。

三、藏書的利用，古代私人藏家注重藏書的利用。特別是主張開放的藏書家，在其藏書利用上取得的成績更大。濟世、求知、修身養性是古代藏書家的動力所在，藏書助學術，以藏書經世道，以藏書長見識，為用而藏，是古代私家藏書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⁵⁸⁵尤其明代文人勤於苦讀，嗜書如痴，讀書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份。藉著積極從事訪書、購書、借書、抄書等方法，努力搜求，取得書籍。經由探訪尋求積累藏書，即便僅是斷簡殘篇，只要可讀，也都不厭其煩地修補裝幀，並且樂於沈溺其中。⁵⁸⁶此外，藏書家們不僅珍藏圖書、還會將古籍加以校勘，更不惜斥資予以刊刻印行，幫助著述，以及從事學習與學術的活動。

四、藏書的流通，泛指藏書的主人所收藏的典籍圖書在社會和歷史間的傳播。在歷史中國，藏書流通主要有借讀、借抄、借校、借刊、翻刻和捐贈等多種形式。⁵⁸⁷古代文獻典籍浩如煙海，內容繁富，價值連城。這些典籍珍品是我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它不但反映了我國古代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有著非常卓越的貢獻。如此浩瀚的典籍都是歷代文

⁵⁸² 林琳，〈明清私家藏書的采藏與保護〉，頁 127。

⁵⁸³ 徐凌志，〈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理念及措施〉，頁 58。

⁵⁸⁴ 李洁，〈淺談明代私家藏書樓的文化意蘊〉，頁 54。

⁵⁸⁵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頁 39-40。

⁵⁸⁶ 呂允在，〈藏書、校書、刻書與明人讀書生活〉，頁 419。

⁵⁸⁷ 王余光，〈藏書四記〉，頁 336。

人及其動者辛勤筆耕、積累、傳播、發展的碩果，而其中文獻的流通就是這些卷帙浩繁的古籍得以流傳、積累、繁榮發展乃至於形成的必要手段與條件。

588

歷代的藏書家都有的借抄、互抄過圖書。尤其在古代的通訊、交通都不發達的時代，歷代幾乎所有的藏書家都有過借抄史。明代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與經濟中心，不少文人雅士聚集在京城，且擁有一定財力和社會地位的官員和追求功名的學子，這些條件，都使得北京成為抄書活動比較繁榮的地方，凡是愛書之人，來到北京，見到好書必定相盡辦法收藏。他們或親自動手，或雇人代勞，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不光從別人處抄寫，而且允許自己的藏書為別人抄錄，互惠互抄。當然也許借抄的目的是為了豐富自己的著述，也許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度藏，但藏書家孜孜以求、經年累月地抄寫，其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憑著無數雙抄書的手，生產出無數的抄本書，以至當許多刻本毀滅絕跡時，唯賴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續流傳。此外，藏書家對於典籍的刊刻、校勘，亦是古代中國的一個特色和好傳統，它對於我國歷代典籍的延續與傳播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⁵⁸⁹藏書家們刊刻所抄之書，一方面是增加自己藏書，另一方面則是將所刻之書用以贈送、出售或交流。同時基於延續傳統文化的考量，藉由本身的專業素養，參與校對考證或刻工要求，求以提高書籍刊的品質。由於文人參與校書、刻書的活動，使得書籍的品質獲得不少的提昇，無形中也對圖書的流通起了很大的作用。⁵⁹⁰

此外，明代北京藏書家當中固然有只收藏典籍圖書的，但也有不少人除了藏書外，也收藏鼎彝器物、法書名畫及其他藏品。⁵⁹¹收藏書畫，可說是懷古的文化現象，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文人士大夫對於書畫的收藏，無非就是謀利、好事、自勵與自娛四類，謀利者，囤積珍藏名畫，以謀其利。好事者，

⁵⁸⁸ 李傑，〈我國古代文獻流通形式初探〉，頁 47。

⁵⁸⁹ 鄧雪峰，〈古代私人藏書與藏書家之貢獻〉，頁 191。

⁵⁹⁰ 呂允在，〈藏書、校書、刻書與明人讀書生活〉，頁 419。

⁵⁹¹ 沈振輝，〈元明時期的收藏學〉，頁 56。

收藏對他們來說並不是為書畫中的藝術魅力所吸引。他們憑藉豐厚的資產去收藏，為的是爭名好勝、附庸風雅。自勵者，珍藏書畫本身，也追求其後面所具有的情操抱負與書畫本身所包含的風雅。自娛者，以書畫收藏賞玩來自娛，追求精神上的寄託。⁵⁹²對於歷代不少的文人來說，將鑑賞與收藏視為提高其自身文化素養及顯示其學識、風雅的途徑，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士大夫均尚古玩的收藏，因此也出現許多名聞於世的收藏家。⁵⁹³

五、藏書家對藏書文化的主要貢獻，集中在典籍的保存與流傳、藏書樓建築，以及圖書保護、藏書理論建設與利用藏書進行學術研究與編纂史料等方面。⁵⁹⁴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私家藏書風氣，主要推崇個人私藏和藏家世守。直到近代中國，隨著圖書館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傳統的藏書觀念逐漸為藏書家所捨棄，尤其在公共藏書成為近代藏書文化發展的主流時，一些藏書家以出售、捐獻或寄存等方法，將私人所藏轉歸公藏。⁵⁹⁵明代北京就不少藏書家不是建立私人的藏書樓，而是建置書院來藏書，或是將所藏之書送給書院收藏，或是幫助地方儒學建立書藏。他們有的是在地方當官，也有見地方學子想讀書而無書可讀的，而出錢出力的建立書院，增貯書籍，以期能將藏書給更多的學子，或是想看書的學者使用。

此外，有些明代藏書家對於自身龐大的藏書，會予以整理編目，藏書編目不但整齊美觀便於查閱，更可以藉由藏書編目的過程中，對書籍全面通盤的瞭解，所以明代藏書家除了沉浸在坐擁書城的感受裡，對於書本的應用、檢索而言，編製書目亦是一生藏書生活中必須的工作。⁵⁹⁶而編纂藏書目錄，係指藏書家透過有系統的著錄藏書的書名、著者、出版、校勘、內容和收藏等項目，並按一定的次序編排，以揭示並反應其藏書狀況。歷代知名藏書家的藏書數量非常多，少則不下幾千卷，多則甚至上萬卷、幾十萬卷的代有其

⁵⁹² 王元軍，〈唐人收藏書畫的心理探索〉，頁 83-88。

⁵⁹³ 王麗卿、聶高志，〈中國歷代繪畫中文人博古鑑賞活動與家具主從關係之研究〉，頁 2。

⁵⁹⁴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頁 299-304。

⁵⁹⁵ 劉雪峰，〈中國古代藏書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貢獻〉，頁 249。

⁵⁹⁶ 呂允在，〈明人讀書與編著生活〉，頁 211。

人。對於如此龐大的藏書，如果沒有加以整理，一定會雜亂無章，無法有效利用。所以為了藏書的有效管理，歷代藏書家都會對其藏書進行編目的工作。⁵⁹⁷明代北京就有許多藏書家，都編有私人的藏書目錄。透過這些書目，除了可以了解他們是如何有系統的編排及管理藏書外，更對圖書版本的考據，做出很大的貢獻，其成就對於中國的目錄學及版本學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明代北京藏書家，還有不少是將畢生辛苦積聚的藏書捐贈給學校，或是替學校修建書樓，然後再拿出自己的積蓄買書捐給學校，以此來傳播知識，共享圖書。他們對圖書的流通共享是持開明的態度，提倡藏書開放的思想，且付諸實踐，希望透過教育的機制，如中央與地方官學、書院、社學、私塾等，將藏書推廣到社區，對後世的影響很深。

總之，因為明代北京是經濟繁華和文化的勝地，於是形成了圖書事業的鼎盛，而藏書活動，無形中也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藏書與讀書，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開拓了視野、造就了人才，提高了人的品位。在社會生活中，知識和良好的情操素養，是人們廣泛接觸，互相交往的基礎。能認識到社會的發展趨勢，才能追求更高層次的文明，才能更快地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書在經濟生活中，是路，是明燈。縱觀天下，哪裡經濟發達，哪裡就富有藏書，哪裡注重發展藏書，那裡就經濟繁榮。⁵⁹⁸私家藏書對保存我國豐富的文獻典籍、傳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促進學術發展、文獻管理技術的開發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藏書活動又推動了印刷業的興盛和圖書市場的繁榮發展。中國有許多古代的私家藏書者提倡藏書流通開放的思想，並將其付諸實踐，創辦了初具現代公共圖書館流通性質的私家藏書樓，推動了區域的藏書風氣，漸漸地由封閉式向開放式發展，或是在國家創辦公共圖書館時，捐獻大量私家藏書，為近代公共圖書館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物質支持。⁵⁹⁹

⁵⁹⁷ 黃顯功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頁 33。

⁵⁹⁸ 桑良至，〈藏書與經濟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2 期），頁 66-72。

⁵⁹⁹ 葛立輝、甄利華，〈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及其文化貢獻〉（《邢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 年第 6 期），頁 103。

明代北京是政治與文化中心，全國的首善之區。期盼可以透過本文梳理明代北京私家藏書發展的歷史脈絡，讓讀者可以對明代北京藏書家的認識、藏書家的社群特徵與交往、藏書收藏內容的類型與特色、藏書活動與生活文化之內涵，以及藏書事業對當時與後世的貢獻與影響等面向，獲得更加深入的了解，並從中體會明代北京藏書家們所要表達的精神，相信也可以為中國古代圖書事業的發展史，再添新的一頁。





附錄

附錄一：明代北京藏書家知見表

編號	姓名	生卒年	籍貫與居住地	藏書規模	資料出處(僅舉一種為例)
1.	傅英玄	不詳	滄州	藏書甚富	清·莊日榮等,《滄州志》,卷14,〈傅王燦傳〉,頁63上
2.	宋訥	1311-1390	滑縣	所居別墅曰:「白雲茅屋」,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好	王蒲園,《重修滑縣志》,卷7,〈故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監祭酒宋先生墓誌銘〉,頁6下。
3.	賈信	1361-1430	永清	好書,每事他出,必以書冊自隨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不著卷數,〈先賢·賈信〉,頁5509。
4.	徐本	不詳	京師	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皮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	明·朱國禎,《涌幢小品(下)》,卷17,〈竹軒〉,頁399。
5.	杜宥	1415-1469	寓霸州	琴書圖冊列前後,左經右史百牙籤	劉延昌,《霸縣新志》,卷8,〈慎齋行贈杜江陰〉,頁46上。
6.	崔恭	1409-1479	廣宗	購歷代史、《文獻通考》、《通志畧》、《玉海》,並五經四書,暨四方古今名儒議論	姜楹榮,《廣宗縣志》,下編,〈崔莊敏公祠記〉,頁3下。
7.	費閻	1436-1493	寓京師	聚書千餘卷	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8,〈向陽書屋記〉,頁2下-4上。
8.	邱濬	1421-1495	寓京師	家積書萬卷	明·黃瑜,《雙槐歲鈔》,頁221。

9.	陶圻	不詳	大城	置書數萬卷，浸灌其中，終日手不釋卷	清·趙炳文等，《大城縣志》，卷7，鄧毓怡〈宦蹟·陶圻傳〉，頁24下-25上。
10.	邵錫	不詳	安州	圖書數箱	清·彭定澤等，《安州志》，〈宋登〉，頁158。
11.	頓銳	不詳	涿州	家居山水，圖書日坐其中	宋大章等，《涿縣志》，第7編，卷1，〈中憲大夫代府右長史前戶部員外郎頓公墓誌銘〉，頁50下。
12.	范光大	?-1521	吳橋	多集古書	清·倪昌燮等，《吳橋縣志》，卷12，〈明故聊城主簿范君墓誌銘〉，頁22上。
13.	趙得祐	不詳	盧龍	帷枕皆典籍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104，〈陝西行太僕寺卿趙得祐傳〉，頁1下。
14.	邊憲	1464-1524	任邱	築「東阜堂」，日坐其中，游情書史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9，〈邊憲〉，頁15下。
15.	王三顧	不詳	大名	遇異書，不惜傾囊購之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18，〈王三顧〉，頁8上。
16.	張茂蘭	1471-1535	任邱	多市書籍，以勅學者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11，〈張東谷先生傳〉，頁67上-下。
17.	張師伊	不詳	大名	故居張家潭，構室陳書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18，〈張師伊〉，頁8下。
18.	高儒	不詳	涿州	有萬軸之儲	明·高儒，《百川書志·序》，頁1下。
19.	申旆	不詳	魏縣	藏書萬卷	清·朱焜等，《大名府志》，卷27，〈湛思堂記〉，頁8上。

20.	孫緒	1474-1547	故城	蒐羅四方，得詩、賦、序、記、雜文各若干卷，手錄成帙	明·周世選，《衛陽先生集》，卷9，〈孫沙溪文集序〉，頁14下。
21.	宋登	不詳	定興	歸裝僅圖書萬卷而已	清·李培祜等，《保定府志》，卷53，〈宋登〉，頁28下。
22.	晁東吳	1532-1554	開州	喜藏書，嘗刊行諸書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87，頁3下-4上。
23.	王重光	1502-1558	魏縣志	購異書讀之	清·馬襄，《魏縣志》，卷3，〈王重光〉，頁18上。
24.	王圖永	不詳	大城	俸金羅古今書籍，浸灌其中	清·趙炳文，《大城縣志》，卷9，〈王圖永傳〉，頁2上。
25.	常熟	不詳	廣宗	藏書甚富，幾同鄴架	韓敏修等，《廣宗縣志》，卷14，〈常熟〉，頁3下。
26.	劉正	不詳	任邱	購書甚富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9，〈劉正〉，頁37上。
27.	劉分桂	不詳	任邱	書籍滿室，餘無長物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9，〈劉分桂〉，頁60下。
28.	晁璫	1511-1575	開州	喜藏書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87，頁3下-4上。
29.	張照	不詳	寓靈壽	藏書史、豫器	清·劉賡年等，《靈壽縣志》，卷9，〈松陽書院記〉，頁6下。
30.	王希烈	? -1577	寓密雲	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昔所有者，擴而新之。名宦、鄉賢之祠，齋宿省牲之	臧理臣，《密雲縣志》，卷7-1，〈明翰林院侍讀王希烈重修文廟碑記〉，頁14上。

				所，藏書置器之庫，昔所無者，增而創之	
31.	韓應庚	不詳	盧龍	築室名「釣台」，以圖書、花鳥自娛	董天華等，《盧龍縣志》，卷18，〈韓應庚〉，頁4上。
32.	張立愛	不詳	深澤	嘗築「萬卷樓」，藏書甚富	清·王肇晉等，《深澤縣志》卷8，〈張立愛〉，頁6下。
33.	閔煦	1507-1580	任邱	居里，斥地築圃，鳩書史	明·吳中行，《賜餘堂集》，卷11，〈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閔公神道碑〉，卷3下。
34.	邢雲路	不詳	保定府	好以詩酒自娛，及歿，四壁圖書而已	清·李培祐等，《保定府志》，卷43，〈邢雲路墓在安肅縣東八里雲路官官按察使〉，頁21上。
35.	王好問	1517-1582	樂亭	襲書千餘卷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63，〈王司徒家傳〉，頁33上。
36.	宋登春	1517-1584	新河	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	明·徐學謨，《徐氏海隅集》，卷15，〈鵝池生傳〉，頁11上。
37.	李懿	1515-1586	吳橋	購書數千卷	清·倪昌燮等，《吳橋縣志》，卷7，〈李懿〉，頁60上。
38.	張佳胤	1526-1588	寓滑縣	羣集史冊，凡關滑者，則手自抄錄	王蒲園，《重修滑縣志》，卷10，〈嘉靖三十四年滑縣知縣張佳胤德政碑〉，頁38下。
39.	穆文熙	1528-1591	東明	購書十餘萬卷	清·談遷，《棗林雜俎》，聖集·藝簞，〈穆文熙焚書〉，頁247。
40.	李景登	不詳	寓寶坻	捐俸購書，創	清·洪肇楸等，《寶坻

				「尊經閣」	縣志》，卷 17，〈李侯去思碑〉，頁 51 下。
41.	董復亨	不詳	元城	書積貯萬卷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 18，〈董復亨〉，頁 17 下。
42.	孟化鯉	1545-1597	新安	每坐一室，取六經四子諸氏百家，朗咏沈思	明·王以悟，《王惺所先生集》，卷 7，〈祭雲浦先師〉，頁 18 下。
43.	馬維禎	1568-?	雄縣	廣讀異書，深搜內典，構精舍，顏曰：「印可堂」	秦廷秀等，《雄縣新志》，第 5 冊，〈馬維禎〉，頁 55 上。
44.	李希白	不詳	景縣	家居左圖右史	耿兆棟，《景縣志》，卷 8，〈李希白〉，頁 4 下。
45.	傅鳴會	1525-1605	靈壽	積書至數十萬卷	清·傅維麟，《明書》，卷 170，〈敘傳一〉，頁 1 下-2 上。
46.	袁黃	1533-1606	寓寶坻	書則不止五車	清·洪肇楙等，《寶坻縣志》，卷 17，〈袁侯德政碑〉，頁 49 下。
47.	李文	1536-1609	任邱	建書樓，公取裴晉公意，題之曰：「書種」	明·葉向高，《蒼霞續草》，卷 2，〈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贈太師次溪李公墓志銘〉，頁 16 上。
48.	栗維垣	不詳	大名	家居，積書教子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 18，〈栗維垣〉，頁 15 上。
49.	邢侗	1551-1612	南宮	好購古今書，……月俸捐少贖鍰，為置經史子集，及國朝制典諸書若干	賈恩絨等，《南宮縣志》，卷 23，〈南宮縣學藏書記〉，頁 45 下。
50.	惠承芳	不詳	廣平府	置閣於旁，藏書於閣	清·吳中彥，《廣平府志》，卷 39，〈惠公祠〉，

					頁 5 上。
51.	張文熙	不詳	景縣	築室郊外，扃戶兀坐，陳古今經史圖籍	耿兆棟，《景縣志》，卷 7，〈張文熙〉，頁 18 下。
52.	張維	1534-1613	霸州	遂益衰法書、秘籍，書不釋手。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	張仁蠡等，《霸縣新志》，卷 5，〈宦者·張維〉，頁 57 上。
53.	李楨辰	不詳	任邱	牙籤數萬卷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 9，〈李楨辰〉，頁 4 下。
54.	許國鼎	不詳	正定	居業喜積書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卷 39，〈許國鼎〉，頁 4 下。
55.	李維喬	不詳	棗強	居一室，左圖右史，恬如也	清·張宗載等，《棗強縣志》，卷 5，〈李維喬〉，頁 12 下。
56.	許倜	不詳	高陽	故里遺書數十種，板藏學宮	李曉冷等，《高陽縣志》，卷 4，〈許倜〉，頁 9 上。
57.	沈嘉	不詳	故城	家無書，嘗走藏書家借讀，手自抄之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7，〈沈嘉〉，頁 1 上-下。
58.	秦士奇	不詳	固安	圖書盈篋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不著卷數，〈官師·秦士奇〉，頁 2680。
59.	邵可立	1556-1626	寓薊州	建文昌書院，購古今遺書，以教俊彥	清·史夢蘭，《永平府志》，卷 52，〈邵可立〉，頁 25 下。
60.	趙南星	1550-1627	高邑	築一室郊堦，擁書閉戶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 10，〈濟鶴趙先生小傳〉，頁 11 上。
61.	米萬鍾	1570-1628	宛平	其父癖于好石，富于藏書，工書與畫，仲詔（米萬鍾）無不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 21，〈米仲詔詩序〉，頁 12 上。

				相當。	
62.	李養正	1559-1630	魏縣	嗜書，墳典、丘索、六經、子史，及近代名公集，度而藏之，比于鄴架	明·成靖之，《雲石堂集》，卷 21，〈明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玄白李公墓誌銘〉，頁 64 下。
63.	王維誠	不詳	新城	常鬻所藏書於市	侯安瀾等，《新城縣志》，卷 10，〈王維誠〉，頁 8 上。
64.	王琦	不詳	深澤	建置書院，增貯經籍，皆損俸為之	清·王肇晉等，《深澤縣志》，卷 8，〈王琦〉，頁 2 下。
65.	鹿善繼	1575-1636	定興	落落西風集古書	清·張主敬等，《定興縣志》，卷 14，〈乾坤北海亭〉，頁 8 下。
66.	樊尚文	不詳	冀縣	購經史，建文昌祠	王樹枏等，《冀縣志》，卷 19，〈樊尚文〉，頁 8 下。
67.	汪元范	不詳	冀縣	建「不二軒」、「陸地舟」，貯古今書籍	王樹枏等，《冀縣志》，卷 19，〈汪元范〉，頁 8 上。
68.	范士楫	不詳	定興	捐囊購異書，深酣萬卷	清·張主敬等，《定興縣志》，卷 15，〈范士楫〉，頁 52 上。
69.	劉榮嗣	1570-1638	曲周	喜購書畫，不惜傾囊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 3，〈總河大司空劉公榮嗣傳〉，頁 13 上。
70.	孫承宗	1563-1638	高陽	家居列書為幄	李曉冷等，《高陽縣志》，卷 3，〈孫承宗〉，頁 21 上。
71.	李允樟	?-1644	東明	珍愛古本冊籍，暨唐、宋諸名公書畫	清·儲元升，《東明縣志》卷 6，〈李允樟〉，頁 18 下。
72.	范景文	1587-1644	吳橋	性好積書	陳田，《明詩紀事》，〈和

					友人閒居之作》，頁 2857。
73.	田太監	?-1644	寓京師	居之，覽其中，書多寫冊，亦有手錄者	清·朱一新，《京師坊巷志》，卷 5，〈阜成門大街〉，頁 19 上。
74.	鞏永固	?-1644	宛平	盡取所賜物，古玩書畫，環繞(公主)殯宮	清·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卷 93，〈都尉鞏貞愍公永固〉，頁 3 下。
75.	紀元	不詳	文安	修整學宮，講明祀典，博求遺籍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10，〈紀元〉，頁 4799-4801。
76.	李碩	不詳	大興	玩其樓所藏書	張鳳瑞等，《滄縣志》，卷 13，〈孝廉頤菴李君墓誌銘〉，頁 34 下。
77.	聶明璉	1590-1660	曲周	篤嗜藏書，性好古，家饒千貲，不惜重價購之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 3〈明經聶公明璉傳〉，頁 31 下-32 上。
78.	陳協	1608-1663	文安	念先世積書萬軸多散佚，乃目六籍、百家，以及醫藥、卜算、山劔之屬，皆抄纂序，細加丹鉛	清·李蘭增等，《文安縣志》，卷 9，〈邢紫淵孝行叙〉，頁 5 上。
79.	傅維鱗	?-1666	靈壽	乃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家乘、文集、碑志，得三百餘部，九千餘卷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傅維鱗〉，頁 18 下-19 上。
80.	孫奇逢	1584-1675	容城	貯家禮、子史諸經典	清·湯斌等，《孫夏峯先生年譜二卷》，卷上，〈孫奇逢〉，頁 5 下。
81.	孫承澤	1592-1676	大興	精博古鑒，一時圖書之富，比之宋田氏雲。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人物志 15，〈孫承澤〉，頁 5096-5097。

82.	王愜	?-1676	廣宗	於書愜尤好之，多方購求，期必得，以故藏書甲一邑	韓敏修等，《廣宗縣志》，卷 14，〈王愜〉，頁 5 上。
83.	王崇簡	1602-1678	宛平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成化刊本，宛平王氏藏。……有「宛平王氏家藏慕齋鑑定」，及「重遠書樓」、「鳴野山房」諸印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 26，〈王崇簡〉，頁 19 下。
84.	梁志	不詳	正定	好法書、名畫、古彝、佳玩，宅後構小園，……園中日拭裴几，置圖史、器物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卷 39，〈梁志〉，頁 5 上。
85.	梁清遠	1606-1683	正定	好觀書，所居處墳籍環列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卷 36，〈梁清遠〉，頁 10 下。
86.	金璞	不詳	任邱	藏書甚富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 9，〈金璞〉，頁 12 下。
87.	梁清標	1620-1691	真定	喜積書，多至數十萬卷，日流覽其下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汪序〉，頁 1 上。
88.	邊舉	1595-1692 ?	任邱	性好抄書，至老不輟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 9，〈邊舉〉，頁 36 下。
89.	趙士麟	1629-1699	寓容城	左圖右書	王蓮堂，《容城縣志》，卷 7，〈趙士麟〉，頁 39 上-40 上。
90.	王熙	1628-1703	宛平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 26，〈王崇

				集三卷，年譜一卷，明成化刊本，宛平王氏藏。……有「宛平王氏家藏慕齋鑑定」，及「重遠書樓」、「鳴野山房」諸印	簡》，頁 19 下。
91.	魏錕	1621-1720	豐潤	不釋卷，抄古書	清·牛昶煦等，《豐潤縣志》，卷 3，〈孝友·魏錕〉，不著頁數。
92.	崔華	1632-1693	平山	喜藏書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30，〈崔華〉，頁 1 上-下。
93.	張紹烈	不詳	容城	生平藏書不火自焚，遠近歎異	王蓮堂等，《容城縣志》，卷 6 上，〈張紹烈〉，頁 2 下。
94.	嚴文	不詳	無極	歸家居三十餘年，閉門謝客，檢閱古書	王重民等，《無極縣志》，卷 9，〈嚴文〉，頁 17 下-18 上。
95.	王廷諫	不詳	大名	圖書四壁	清·朱煥等，《大名府志》，卷 18，〈湛思堂記〉，頁 23 下。
96.	魏大成	不詳	柏鄉	靜坐擁書，杜門不出	牛寶善，《柏鄉縣志》，卷 6，〈魏大成〉，頁 193 上。
97.	孜化民	不詳	寶坻	惟圖書數車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不著卷數，〈官師·孜化民〉，頁 2661。
98.	聶雲羽包	不詳	曲周	家有藏書千卷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 3，〈文學聶雲羽包傳〉，頁 30 下。
99.	秦宣	不詳	涿州	圖書几榻，環列其間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不著卷數，〈僑寓·秦宣〉，頁 5509。
100.	張永譽	不詳	南皮	取祖遺書籍	王德乾等，《南皮縣

					志》，卷 8，〈張永譽〉，頁 40 下。
101.	劉九成	不詳	曲周	闢一小齋，架書連屋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 3，〈刺史劉公九成傳〉，頁 26 下。
102.	王光先	不詳	景縣	藏書千卷，課子孫	耿兆棟，《景縣志》，卷 7，〈王崇德〉，頁 21 上。
103.	孟若蘭	不詳	任縣	家居蒔花竹，藏古圖書器玩甚夥	王億年，《任縣志》，卷 5，〈孟若蘭〉，頁 21 上。
104.	紀克揚	不詳	文安	構別業三楹，陳列圖書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不著卷數，〈先賢·紀克揚〉，頁 4696。
105.	王昌	不詳	隆平	於書無所不備	清·袁文煥，《隆平縣志》，卷 8，〈王昌〉，頁 17 下。
106.	崔周田	不詳	寶坻	試建一樓，貯古本書及金石刻萬卷	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卷 27，〈李孔昭〉，頁 9 下。
107.	郝鴻猷	不詳	霸州	日取先秦、兩漢，以及唐、宋名家金匱石渠之文，謀野藏山之記，無不手自抄寫，沉酣枕籍於其中	清·朱廷梅，《霸州志》，卷 9，范士楫〈郝銘燕先生傳〉，頁 23 上。
108.	張儒	不詳	玉田	家貧不能得書，遍借親友藝文，旋抄旋記	清·王光謨，《玉田縣志》，卷 6，〈張儒〉，頁 6 下。
109.	魯雲程	不詳	豐潤	積書萬卷	清·牛昶煦等，《豐潤縣志》，卷 3，〈淑德·魯雲程〉，頁 10 下。
110.	李紳	不詳	順天	多蓄道書，手錄至盈箱篋	明·孫承澤，《天府廣記》，卷 34，〈李紳〉，頁 466。
111.	郭文輔	不詳	宛平	藏書數萬卷	明·孫承澤，《天府廣

					記》，卷 34，〈郭文輔〉，頁 471。
112.	陳良瑛	不詳	文安	家有樓三楹，皆貯書	清·李蘭增等，《文安縣志》，卷 9，〈陳封君傳〉，頁 16 下。
113.	趙虞保	不詳	元城	所獲俸薪，盡購奇書	清·陳偉等，《元城縣志》卷 4，〈趙虞保〉，頁 8 下。
114.	黃宗元 不詳	不詳	蠡縣	舉六籍羣書，悉貯其中	清·韓志超等，《蠡縣志》，卷 9，〈創建尊經閣記〉，頁 12 上。
115.	孫銓	不詳	高陽	少傅文集百卷，鏤板南中	李大本等，《高陽縣志》，卷 6，〈孫銓〉，頁 6 上。
116.	郭名揚	不詳	清苑	積書百卷，皆手錄	金良驥等，《清苑縣志》，卷 4，〈郭名揚〉，頁 86 下。
117.	王家瑞	不詳	成安	積書甚多	張應麟等，《成安縣志》，卷 13，〈王家瑞〉，頁 1 下。
118.	倫浹	不詳	灤州	癖嗜典籍，寢饋沈酣	清·楊文鼎，《灤州志》，卷 16，〈倫浹〉，頁 12 下。
119.	苗而成	不詳	任縣	窮搜經史，掇厥精華墳典	王億年，《任縣志》，卷 5，〈苗而成〉，頁 32 下。
120.	王震	不詳	邢臺	購書籍千餘卷	清·戚朝卿等，《邢臺縣志》卷 6，〈王震〉，頁 29 下。
121.	王兆泰	不詳	正定	每遇異書，必購求手錄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卷 39，〈王兆泰〉，頁 5 下。
122.	張都憲	不詳	河間府	積書甚富	杜甲等，《河間府新志》，卷 12，〈李尚綱〉，頁 29 下。
123.	戈繼皋	不詳	獻縣	遠近搜假，得即手自抄錄。久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14，〈戈繼

				之，所抄日多汎覽	皋》，頁 8 下-9 下。
124.	張懋勤	不詳	肥鄉	藏書樓上，羅列如城	張仁侃等，《肥鄉縣志》，卷 21，〈張懋〉，頁 6 下。
125.	劉逢源	不詳	曲周	手鈔二十一史，讐對精確，他書亦數千卷	清·吳中彥，《廣平府志》，卷 51，〈劉逢源〉，頁 33 下。
126.	劉昌祚	不詳	清苑	積書萬餘卷	清·唐執玉等，《畿輔通志》，卷 79，頁 11 下
127.	聶繪于	不詳	曲周	築書樓，珍襲萬卷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7，〈聶繪于〉，頁 20 上-下。
128.	方九敘	不詳	寓京師	多購羣書，勤為士子講析	明·聶心湯，《錢塘縣志》，〈紀獻〉，頁 22 上。
129.	李維柱	不詳	景山	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	清·于敏中等，《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 2，頁 6 上
130.	馮滄州	不詳	燕京	《東國史略》吳本，首有趙清常跋，謂錄于燕京馮滄州仲纓家	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跋，〈東國史略六卷〉，頁 31 上。

說明：

- 一： 本表是為了方便第四章「明代北京的藏書家」之參照而製。
- 二： 本表按藏書家之卒年，由遠至近依序排列。
- 三： 若藏書家之卒年不詳，則依生年由遠至近排列。
- 四： 若藏書家之生卒年皆不詳，則依其科舉年代（以進士優先，而後舉人、監生、貢生、生員、薦舉等）由遠至近排列。
- 五： 若生卒年、科舉年代皆無，則依其人活動之年代，或其親友、同時代人之生存年代約略加以判定，由遠至近排列。
- 六： 其生卒年、生存年代皆無法判定者，則列於最後。

附錄二：明代北京藏書樓（處）簡表

編號	藏書家	藏書處	資料出處（僅舉一種為例）
1.	宋訥	白雲茅屋	王蒲園，《重修滑縣志》，卷7，〈故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監祭酒宋先生墓誌銘〉，頁6下。
2.	杜宥	慎齋	劉延昌，《霸縣新志》，卷8，〈慎齋行贈杜江陰〉，頁46上。
3.	費閻	向陽書屋	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8，〈向陽書屋記〉，頁2下-4上。
4.	邊憲	東阜堂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9，〈邊憲〉，頁15下。
5.	張師伊	故居張家潭，構室陳書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18，〈張師伊〉，頁8下。
6.	高儒	志道堂	明·高儒，《百川書志》，序，〈百川書志序〉，頁1下。
7.	劉分桂	書籍滿室，餘無長物	清·劉統，《任邱縣志》，卷9，〈劉分桂〉，頁60下。
8.	晁璫	寶文堂	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87，頁3下-4上。
9.	韓應庚	築室名「釣台」，以圖書、花鳥自娛	董天華等，《盧龍縣志》，卷18，〈韓應庚〉，頁4上。
10.	王希烈	明倫之堂，分教之齋，昔所有者，擴而新之。名宦鄉賢之祠，宿省牲之所，藏書置器之庫，昔所無者，增而創之	臧理臣，《密雲縣志》，卷7-1，〈明翰林院侍讀王希烈重修文廟碑記〉，頁14上。
11.	張立愛	萬卷樓	清·王肇晉等，《深澤縣志》卷8，〈張立愛〉，頁6下。
12.	閔煦	居里，斥地築圃，鳩書史	明·吳中行，《賜餘堂集》，卷11，〈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閔公神道碑〉，卷3下。
13.	邢雲路	四壁圖書而已	清·李培祐等，《保定府志》，卷43，〈邢雲路墓在安肅縣東八里雲路官官按察使〉，頁21上。

14.	穆文熙	逍遙園	明·李廷機，《李文節集》，卷 20，〈憲副小春穆先生墓志銘〉，頁 40 下-41 上。
15.	孟化鯉	每坐一室，取六經、四子、諸氏百家朗咏	明·王以悟，《王惺所先生集》，卷 7，〈祭雲浦先師〉，頁 18 下。
16.	馬維禎	印可堂	秦廷秀等，《雄縣新志》，第 5 冊，〈馬維禎〉，頁 55 上。
17.	李希白	家居左圖右史	耿兆棟，《景縣志》，卷 8，〈李希白〉，頁 4 下。
18.	李文	書種樓	明·葉向高，《蒼霞續草》，卷 2，〈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贈太師次溪李公墓志銘〉，頁 16 上。
19.	栗維垣	家居，積書教子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卷 18，〈栗維垣〉，頁 15 上。
20.	邢侗	居里塾，好購諸古今書	賈恩紱等，《南宮縣志》，卷 23，〈南宮縣學藏書記〉，頁 45 下。
21.	惠承芳	置閣於旁，藏書於閣	清·吳中彥，《廣平府志》，卷 39，〈惠公祠〉，頁 5 上。
22.	張文熙	築室郊外，扃戶兀坐，陳古今經史圖籍	耿兆棟，《景縣志》，卷 7，〈張文熙〉，頁 18 下。
23.	李維喬	居一室，左圖右史，恬如也	清·張宗載等，《棗強縣志》，卷 5，〈李維喬〉，頁 12 下。
24.	邵可立	建文昌書院，購古今遺書充之	清·史夢蘭，《永平府志》，卷 52，〈邵可立〉，頁 25 下。
25.	趙南星	築一室郊垞，擁書閉戶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 10，〈儕鶴趙先生小傳〉，頁 11 上。
26.	汪元范	不二軒、陸地舟	王樹枏等，《冀縣志》，卷 19，〈汪元范〉，頁 8 上。
27.	孫承宗	家居列書為幄	李曉冷等，《高陽縣志》，卷 3，〈孫承宗〉，頁 21 上。
28.	鞏永固	盡取所賜物，古玩書畫，環繞（公主）殯宮	清·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卷 93，〈都尉鞏貞愍公永固〉，頁 3 下。
29.	孫奇逢	棲神堂	清·湯斌等，《孫夏峯先生年譜二卷》，卷上，〈孫奇逢〉，頁 5 下。
30.	孫承澤	玉覺堂	清·孫承澤，《五經翼》，頁 105-106。

31.	王崇簡	青箱堂	清·王崇簡，《青箱堂詩集》，卷 4，〈憶起齋〉，頁 14 下。
32.	梁志	構小園，……園中日拭裴几，置圖史、器物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卷 39，〈梁志〉，頁 5 上。
33.	梁清遠	所居處，墳籍環列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卷 36，〈梁清遠〉，頁 10 下。
34.	梁清標	蕉林書屋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汪序〉，頁 1 上。
35.	趙士麟	鈐閣間，咸若靜舍，簾垂篆裊，左圖右書	王蓮堂，《容城縣志》，卷 7，〈趙士麟〉，頁 39 上-40 上。
36.	王熙	幕齋	清·王熙，《王文靖公集》，行狀，〈王熙〉，頁 22 下。
37.	李碩	其子李經國，玩其樓所藏書	張鳳瑞等，《滄縣志》，卷 13，〈孝廉頤菴李君墓誌銘〉，頁 34 下。
38.	王廷諫	澹然數楹，窻明几淨，圖書四壁	清·朱煥等，《大名府志》，卷 18，〈湛思堂記〉，頁 23 下。
39.	秦宣	圖書几榻，環列其間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不著卷數，〈僑寓·秦宣〉，頁 5509。
40.	劉九成	闢一小齋，架書連屋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卷 3，〈刺史劉公九成傳〉，頁 26 下。
41.	紀克揚	構別業三楹，陳列圖書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不著卷數，〈先賢·紀克揚〉，頁 4696。
42.	崔周田	試建一樓，貯古本書及金石刻萬卷	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卷 27，〈李孔昭〉，頁 9 下。
43.	陳良瑛	家有樓三楹，皆貯書	清·李蘭增等，《文安縣志》，卷 9，〈陳封君傳〉，頁 16 下。
44.	黃宗元	舉六籍羣書，悉貯其中	清·韓志超等，《蠡縣志》，卷 9，〈創建尊經閣記〉，頁 12 上。
45.	張懋勤	藏書樓上，羅列如城	張仁侃等，《肥鄉縣志》，卷 21，〈張懋〉，頁 6 下。
46.	劉昌祚	闢一室，督子弟誦習之，積書萬餘卷	清·唐執玉等，《畿輔通志》，卷 79，頁 11 下
47.	聶繪于	築書樓，珍襲萬卷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傳 27，〈聶繪于〉，頁 20 上-下。

說明：

- 一、本表是為了方便第六章第二節「藏書之貯存」之參照而製。
- 二、本表之排列順序，與附錄一同。
- 三、若無藏書樓（處）名，則酌錄史料所記藏書場所或規模之敘述，或是文會賞鑒場之名稱，或依史載藏書家所撰文集名稱加以判定。若史料未載藏書處所狀況者，則不錄。





參考書目

一、 古籍史料

(一) 一般古籍

-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1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宋·孫奕，《示兒編》，23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1卷，《筆記小說大觀》25，臺北：新興書局，1979年初版。
- 元·楊維禎《東維子集》，30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明·王以悟，《王惺所先生集》，1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間(1621-1627)洛陽王氏重刊本。
- 明·王弘，《山志》，《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版。
- 明·成靖之，《雲石堂集》，24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1628-1644)刊本。
-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
- 明·吳中行，《賜餘堂集》，14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5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吳亮吳奕等刻本影印。
- 明·宋訥，《西隱文稿》，10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戊寅(1578)滑縣知事劉師魯校刊本。
- 明·李廷機，《李文節集》，28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1628-1644)刊本。
- 明·李清，《三垣筆記》，《元明史料筆記叢刊》3，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版。
-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134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50-15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

- 39 年刻本(卷十卷八十一卷九十三配鈔本)影印。
- 明·李贄，《李氏焚書·續焚書》，6 卷，京都：中文出版社，1971 年 2 月初版。
- 明·沈守正，《雪堂集》，10 卷，《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7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明崇禎沈尤含等刻本。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2 月第 1 版。
- 明·邢雲路，《庚戌冬至正訛》，1 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原刊本。
- 明·祁承燦，《藏書訓略》，《叢書集成新編》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初版。
- 明·邱濬，《重編瓊臺藁》，24 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124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初版。
- 明·周世選，《衛陽先生集》，14 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36，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周承芳刻本影印。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48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 明·祝時泰等，《西湖八社詩帖》，1 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15，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南京圖書館藏清鈔刻本影印。
- 明·夏原吉等，《太祖實錄》，257 卷，《明實錄》3，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不注出版年。
- 明·孫承宗，《高陽集》，20 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13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據清初刻嘉慶補修本影印。
- 明·孫承澤，《天府廣記》，44 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
- 明·徐學謨，《徐氏海隅集》，79 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2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影印。
-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25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 月第 1 版。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40 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7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武林佩蘭居刻本影印。
- 明·袁宏道，《瓶史》，1 卷，《叢書集成新編》5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初版。
- 明·高儒，《百川書志》，20 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919，上海市：上海古籍出

- 版社，2002年初版，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
- 明·高濂，《遵生八牋》，19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7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12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壬申（1632）嘉善錢士升等刊本。
- 明·張岱，《陶庵夢憶》，《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第1版。
- 明·張鹵，《皇明制書》，20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78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明萬曆7年張鹵刻本影印。
- 明·陳真晟，《布衣陳先生存稿》，9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李畿嗣刻本影印。
- 明·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60卷，臺北：中央研究院藏明崇禎間華亭陳氏家刊本。
- 明·陳繼儒，《巖棲幽事》，1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1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繡水沈氏刻寶顧堂祕笈本影印。
- 明·陸容，《菽園雜記》，《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第1版。
- 明·陸深，《儼山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55，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明·孫承宗等，《車營百八扣合編》，4卷，《續修四庫全書》子部9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高陽孫氏師儉堂刻本影印。
- 明·梁有譽，《蘭汀存藁》，8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48，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湖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24年梁氏詒燕堂刻本影印。
- 明·焦竑，《玉堂叢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
-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3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12月第1版。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119卷，《明代傳記叢刊》114，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初版。
- 明·費宏，《太保費文憲公摘稿》，20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34年吳遵之刻本影印。

- 明·黃佐，《南雍志》，24卷，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9月第1版。
- 明·黃瑜，《雙槐歲鈔》，10卷，《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版。
-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23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初版。
- 明·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30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1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
- 明·葉向高，《蒼霞續草》，22卷，《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2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明萬曆刻本。
- 明·頓銳，《鷗汀漁嘯集》，2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間刊本。
- 明·劉榮嗣，《簡齋先生集》，15卷，《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4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清康熙元年劉佑刻本。
- 明·黎民表，《清泉精舍小志》，1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0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刻本影印。
- 明·謝肇淛，《五雜俎》，16卷，《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1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明萬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韋館刻本影印。
-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版。
- 明·顧清，《東江家藏集》，42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26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40卷，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初版。
-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叢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年第1版。
- 清·于敏中等，《欽定天祿琳琅書目》，10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67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60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2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王士禎等，《居易錄》，34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6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王熙，《王文靖公集》，24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1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王克昌刻本影印。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80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31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吳其貞，《書畫記》，6卷，《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3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初版，清乾隆鈔四庫全書撤出本。
- 清·李佐賢，《書畫鑑影》，24卷，《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0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影印。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24卷，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2月第1版。
-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6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7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據清光緒三年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本影印。
-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200卷，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10月初版。
- 清·唐執玉等，《畿輔通志》，120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0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孫承澤，《五經翼》，20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15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2年刻本影印。
-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8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2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孫承澤，《研山齋珍賞歷代名賢圖繪集覽》，2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7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
-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叢書集成新編》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初版。
- 清·孫默，《十五家詞》，37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49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徐開任，《明名臣言行錄》，95卷，《明代傳記叢刊》54，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初版。
-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70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4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清刻本影印。

- 清·張廷玉等，《明史》，332卷，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7月初版。
-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36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9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年吳縣靈芬閣集字版校印本影印。
- 清·張潮，《新譯幽夢影》，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4月初版。
- 清·梁清遠，《袞園集》，9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24年刻本影印。
-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18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0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17年梁允植刻本影印。
-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160卷，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 清·陳欽，《鹿忠節公年譜》，2卷，《叢書集成新編》10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初版。
- 清·傅維麟，《四思堂文集》，8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1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6月初版，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影印。
- 清·傅維麟，《明書》，171卷，《中國野史集成》21，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 清·湯斌等，《孫夏峯先生年譜》，2卷，《百部叢書集成》94，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初版。
- 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6卷，《古書題跋叢刊》8，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據光緒十年吳縣潘祖蔭滂喜齋朱印本影印。
- 清·鄒漪，《啓禎野乘》，16卷，《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4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明崇禎十七年柳圍草堂刻清康熙五年重修本。
-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 清·蔣光煦，《東湖叢記》，6卷，《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1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九年繆氏刻雲自在龕叢書本影印。
- 清·談遷，《棗林雜俎》，《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版。
- 清·錢大昕，《弇州山人年譜》，1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553，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潛研堂全書本影印。
- 清·錢泳，《履園叢話》，24卷，北京市：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110卷，《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民國涵芬樓影印明崇禎瞿式耜刻本影印。
- 清·龍文彬，《明會要》，80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1月第1版。
-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24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9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初版，據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影印。
- 清·魏象樞，《魏敏果公年譜》，1卷，《百部叢書集成》94，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初版。
-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上海書店，1981年6月，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複印。
- 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27卷，《清代傳記叢刊》199，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 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版。
-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8卷，《清代傳記叢刊》20，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5月初版。

(二) 方志

- 明·聶心湯，《錢塘縣志》，《叢書集成續編》史部4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7月臺一版，據武林叢書本影印。
- 清·牛昶煦等，《豐潤縣志》，4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5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清光緒17年修民國10年重印本影印。
- 清·王光謨，《玉田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21，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20年刻本影印。
- 清·王肇晉等，《深澤縣志》，10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11，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清咸豐11年刊本影印。
- 清·朱一新等，《京師坊巷志》，10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21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據民國7年南林劉氏求恕齋刊本影印。
- 清·朱廷梅，《霸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26，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康熙13年刻本影印。
- 清·朱熥等，《大名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5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咸豐三年(1853)刻本影印。
- 清·吳中彥，《廣平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55，上海市：上

- 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光緒20年刻本影印。
- 清·李時茂，《曲周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1，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13年刻本影印。
- 清·李培祜等，《保定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光緒7年修，12年刻本影印。
- 清·周家楣等，《順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清·洪肇楙等，《寶坻縣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第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清·倪昌燮等，《吳橋縣志》，12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22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據清光緒元年刊本影印。
- 清·徐景曾，《順德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7，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乾隆15年刻本影印。
- 清·袁文煥，《隆平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據上海圖書館藏抄本影印。
- 清·馬襄，《魏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5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雍正5年刻本影印。
- 清·張主敬等，《定興縣志》，8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2，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光緒16年修，21年刻本影印。
- 清·張衍壽等，《深澤縣志》，10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咸豐10年修，同治元年刻本影印。
- 清·莊日榮等，《滄州志》，16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49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據清乾隆8年刊本影印。
- 清·陳偉等，《元城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0，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康熙15年刻本影印。
- 清·李蘭增等，《文安縣志》，12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29，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11年(1922)鉛印本影印。
- 清·彭定澤，《安州志》，19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4，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天津圖書館藏清道光26年修抄本影。
- 清·史夢蘭，《永平府志》，72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19，上海市：

-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光緒5年敬勝書院刻本影印。
- 清·楊文鼎等，《灤州志》，18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22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臺1版，據清光緒24年刊本影印。
- 清·萬青黎，《順天府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第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清·趙炳文等，《大城縣志》，12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2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光緒23年刻本影印。
- 清·劉統等，《任邱縣志》，12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21，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清乾隆27年刊本影印。
- 清·劉賡年，《靈壽縣志》，10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06，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清同治13年刊本影印。
- 清·趙文濂等，《正定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光緒元年刻本影印。
- 清·錢仲仁等，《固安縣志》，4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2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31年鉛印本影印。
- 清·鮑承燾，《任邱縣志續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4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道光17年刻本影印。
- 清·儲元升，《東明縣志》，8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1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據民國22年鉛印本影印。
- 清·韓志超等，《蠡縣志》，10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21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據清光緒2年刊本影印。
- 牛寶善，《柏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7，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1年鉛印本影印。
- 王重民等，《無極縣志》，20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1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民國25年天津文竹齋鉛印本影印。
- 王蒲園等，《重修滑縣志》，20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1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民國21年鉛字本影印。
- 王億年，《任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宣統2年修民國4年續修鉛印本影印。
- 王德乾等，《南皮縣志》，14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4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民國21年鉛印本影印。
- 王蓮堂，《容城縣志》，8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3，上海市：

-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9年刻本影。
- 王養廉等，《宛平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北京府縣志輯5，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王樹枏，《冀縣志》，8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7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民國18年鉛印本影印。
- 宋大章等，《涿縣志》，18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3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民國25年鉛印本影印。
- 李曉冷等，《高陽縣志》，10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38，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2年鉛印本影印。
- 李大本，《高陽縣志》，10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5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民國20年鉛字本影印。
- 周嘉露等，《河間府新志》，20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41，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清乾隆25年刻本影印。
- 金良驥等，《清苑縣志》，6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29，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0年修，23年鉛印本影印。
- 姜楹榮等，《廣宗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7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2年鉛印本影印第1版。
- 秦廷秀等，《雄縣新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218，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據民國18年鉛字本影印。
- 耿兆棟，《景縣志》，14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0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民國21年鉛印本影印。
- 張仁侃等，《肥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5，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9年鉛印本影印。
- 張宗載，《棗強縣志》，8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20，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民國20年天津協成印刷局鉛印本影印。
- 張昭芹等，《大名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59，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3年鉛印本影印。
- 張應麟，《成安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63，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0年鉛印本影印。
- 陳楨等，《文安縣志》，12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53，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民國11年鉛印本影印。

- 董天華，《盧龍縣志》，24卷，《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20，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據民國20年鉛印本影印。
- 賈恩紱，《南宮縣志》，26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51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據民國25年刊本影印。
- 臧理臣等，《密雲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北京府縣志輯6，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劉延昌等，《霸縣新志》，8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3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據民國23年鉛印本印。
- 韓敏修等，《廣宗縣志》，16卷，《中國方志叢書》華北195，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據民國22年鉛印本影印。

二、 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方彪，《北京士大夫》，北京：京華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4月初版。
- 王以坤，《古書畫鑒定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 王余光，《藏書四記》，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 朱義祿，《逝去的啓蒙-明清之際啓蒙學者的文化心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頁258。
- 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2月初版，頁59。
- 吳晗，《朱元璋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月第1版。
- 李家駒，《中國古代藏書管理》，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12月初版。
-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 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 汪閻，《明清蟬林輯傳》，九龍：中山圖書公司，1972年12月港初版。
-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 武玉梅，《傅維鱗與《明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 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略》，青海省：青海人人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 張九齡，《曲江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初版。
- 張家榮，《孫從添《藏書紀要》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8年3月初版。
- 陳冠至，《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出版，2006年10月初版。
- 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出版，2002年2月初版。
- 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 程利英，《明代北直隸財政研究—以萬曆時期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 程煥文，《中國圖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8月第1版。
- 黃顯功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 楊立誠等，《中國藏書家考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10月初版。
- 劉大軍等，《中國私家藏書（上）-先秦至明代》，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 劉喜伸，《家庭藏書指南》，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第1版。
- 鄭偉章等，《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 蕭東發，《中國官府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 謝灼華等，《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臺北：天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4月初版。
-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二）期刊、會議論文

- 于璐，〈中國歷史上私人藏書家的藏書觀念〉，《教育與教學研究》，2003年第5期，頁18；30。
-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頁98-102。

- 毛文芳，〈花、美女、癖人與遊舫-晚明文人之美感境界與美感經營〉，《中國學術年刊》，第 19 期，1998 年 3 月，頁 381-416。
- 毛芳，〈淺論明代藏書家高儒和《百川書志》〉，《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1 年第 12 期，頁 139-140。
- 王元軍，〈唐人收藏書畫的心理探索〉，《歷史月刊》，第 83 期，1994 年 12 月，頁 83-88。
- 王南，〈明代北京審美文化的生成〉，《中國文化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152-157。
- 王建國，〈明代北京的民間抄書活動〉，《北京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頁 42-46。
-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2003 年第 3 期，頁 20-24。
- 王震生，〈藏書樓趣名及興衰探微〉，《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 年第 2 期，頁 102-104。
- 王麗卿、聶高志，〈中國歷代繪畫中文人博古鑑賞活動與家具主從關係之研究〉，《設計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1-9。
- 何宗美，〈明代文人結社綜論〉，《中國文學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50-54。
- 吳智和，〈明人居室生活流變〉，《華岡文科學報》，第 24 期，2001 年 3 月，頁 221-256。
- 吳智和，〈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以居家休閒生活為例〉，收入：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 年 12 月初版，頁 135-166。
- 吳智和，〈明代蘇州社區鄉土生活史舉隅-以文人集團為例〉，收入：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編，《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 5 月初版，頁 23-47。
- 呂允在，〈明人讀書生活樂趣的一個側面〉，《藝術學報》，第 88 期，2011 年 4 月，頁 379-398。
- 呂允在，〈明人讀書與編著生活〉，《藝術學報》，第 91 期，2012 年 10 月，頁 199-223。
- 呂允在，〈訪、購、借、抄—明人讀書生活的一個側面〉，《藝術學報》，第 85 期，2009 年 10 月，頁 505-532。
- 呂允在，〈藏書、校書、刻書與明人讀書生活〉，《藝術學報》，第 89 期，2011 年 10 月，頁 419-445。
- 李玉桂，〈中國古代的社、結社與文人結社〉，《社會科學》，2012 年第 3 期，頁 174-182。
- 李英珍，〈明清私家藏書目錄的文化風貌研究〉，《蘭台世界》2012 年第 6 期，頁 38-39。

- 李時人，〈明代「文人結社」芻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頁76-85。
- 李洁，〈淺談明代私家藏書樓的文化意蘊〉，《宿州學院學報》2009年第24卷第2期，頁11；53-54。
- 李淑蘭，〈略論遼金至明清時期京師文化的特點〉，《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2期，頁40-46。
- 李傑，〈我國古代文獻流通形式初探〉，《山東圖書館季刊》，1996年第2期，頁47-51。
- 杜平，〈正定梁氏家族古建築〉，《文物春秋》，2009年第5期，頁28-31；40。
- 沈振輝，〈元明時期的收藏學〉，《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1期，頁55-61。
- 沈振輝，〈明人的收藏活動〉，《文博》，1998年第1期，頁87-90；55。
- 林琳，〈明清私家藏書的采藏與保護〉，《圖書館學刊》，2012年第4期，頁126-128。
- 邱曉輝，〈古代藏書文化漫談〉，《圖書情報論壇》，2009年第4期，頁66-70。
- 周少川，〈中國古代藏書文化研究論綱〉，《中國圖書館學報》，2002年第6期，頁29-33。
-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文化芻議〉，《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頁92-99。
- 姜新禹，〈淺談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歷史貢獻〉，《大科技》，2010年第11期，頁393。
- 故建君，〈蕉林新館舊槐風-梁清標與收藏〉，《大美術》，2005年第5期，頁95-99。
- 唐逸，〈文化研究方法論〉，《學術月刊》，1998年第2期，頁80-83。
- 徐凌志，〈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理念及措施〉，《圖書館研究》，2006年第4期，頁58-59。
- 徐雁，〈我國古代藏書實踐和藏書思想的歷史總結〉，《四川圖書館學報》，1986年第1期，頁55-60。
- 徐壽芝，〈古代私家藏書與利用〉，《山東圖書館學刊》，2004年第4期，頁39-42；53。
- 翁燕珍，〈董應舉《皇都賦》與《皇都積勝圖》圖文關係研究兼《皇都積勝圖題跋》考〉，《書畫藝術學刊》，第1期，2010年12月，頁253-282。
- 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學季刊》，第2卷第1期，1927年，頁1-8。
- 袁逸，〈中國古代的書價〉，《圖書館雜誌》，1991年第4期，頁58。
- 袁德良，〈中國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傳統管窺〉，《原道》，2008年第0期，頁173-195。
- 郭麗萍，〈論傳統私家藏書的文化功能〉，《山西師大學報》，1999年4月第2期，

頁 52-54。

桑良至，〈藏書與經濟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2 期），頁 72。

陳公望，〈論古今藏書家的藏書與編書的活動及對於編輯工作者的啟示〉，《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1 期，頁 104-107。

陳冠至，〈明代江南人士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98 卷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115-143。

陳冠至，〈明代南京的書籍市場〉，《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14 年 12 月，頁 153-172。

陳冠至，〈論中國古代「藏書家」的定義：以明代為例〉，《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 48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119-144。

陳冠至，〈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的書畫收藏風尚〉，《故宮學術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2006 年，頁 1-39。

陳曙，〈論私家藏書〉，《四川圖書館學報》，1992 年第 1 期，頁 67-70。

陳寶良，〈明代文人辨析〉，《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87-218。

陳耀林，〈梁清標叢談〉，《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 期，1988 年，頁 56-69。

陸漢榮、秦健民，〈淺論古代蘇州藏書家的藏書來源及藏書功績〉，《蘇州大學學報（工科版）》，2004 年第 6 期，頁 103-105。

康芬，〈明代私家藏書特點試析〉，《江西圖書館學刊》，2001 年第 4 期，頁 63-64。

康素娟，〈淺論校讎的形成及其歷史價值〉，《飛天》，2010 年第 10 期，頁 90-92。

張升，〈明代內府抄書初探〉，《圖書館雜誌》，2003 年第 5 期，頁 78-80；77。

張民服，〈明清時期的私人刻書、販書及藏書活動〉，《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 年第 5 期，頁 100-103。

張忠良，〈晚明文人的嗜癖言行〉，《臺南女院學報》，第 23 期，2004 年 10 月，頁 403-428。

曾昭聰，〈歷代萬卷樓及其藏書〉，《華夏文化》，2001 年第 2 期，頁 58-59。

曾健敏，〈古代私家藏書對文化典籍傳承的貢獻〉，《蘭台世界》，2007 年第 24 期，頁 50-51。

曾婷婷，〈「以癖為美」：晚明生活美學樣態的畸變〉，《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4 期，頁 144-148。

馮淳玲，〈古代藏書之保護〉，《圖書與情報》，2003 年第 4 期，頁 75-76；78。

黃仲舒，〈也談古代讀書人之「借書」〉，《語文建設》，2009 年第 10 期，頁 54-55。

- 鄧雪峰，〈古代私人藏書與藏書家之貢獻〉，《前沿》，2008年第10期，頁189-191。
- 葛立輝、甄利華，〈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發展及其文化貢獻〉，《邢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頁100-104。
- 管仲樂，〈高儒《百川書志》史部論略〉，《邊疆經濟與文化》，2014年第4期，頁173-174。
- 劉友恒，〈正定縣梁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文物春秋》，1995年第1期，頁31-41。
- 劉希傳，〈明代山東進士的區域分布研究〉，《教育與考試》，2007年第6期，頁41-46。
- 劉雪峰，〈中國古代藏書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貢獻〉，《經濟研究導刊》，2011年第22期，頁247-249。
- 劉蘭霞，〈明代北京盛況的真實反映-皇都積勝圖〉，《歷史教學》，1996年第11期，頁49。
- 蔣潔，〈科舉制度下的民風〉，《知識經濟》，2009年第13期，頁162。
- 蔡煒，〈我國古代圖書流通情況述略〉，《四川圖書館學報》，2004年第5期，頁71-73。
- 蕭東發，〈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與資訊學刊》，第32期，2000年），頁45-54。
- 蕭東發，〈略論中國古代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圖書情報知識》，1999年第1期），頁2-6。
- 韓文寧，〈明清江浙藏書家的主要功績和歷史局限〉（《東南文化》1997年第2期），頁143。
- 韓雪巖，〈明中後期蘇州文人的書齋清玩與仿古風尚〉，《藝術設計研究》，2009年第3期，頁87-90。
- 韓養民，〈中國風俗文化與地域視野〉，《歷史研究》，1991年第5期，頁91-105。
- 羅竹蓮，〈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文化淺析〉，《時代文學》，2008年第4期，頁87-88。

（三）學位論文

- 王韶蕊，《雅興與健康：明代文人養生文化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6月。
-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7月。
- 陳佼，《明代私人抄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5月。
- 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 7 月。

陽達，《明代科學文化與文人結社》，廣州：中山大學中古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9 月。

鄒信勝，《明代的福建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蒙美蓮，《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與蘇伯衡的文學創作》，青島：青島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5 月。

劉金庫，《「南畫北渡」：梁清標的書畫鑒藏綜合研究》，南京：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論文，2005 年 5 月。

三、 參考工具書

王余光等，《中國讀書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5 月第 1 版。

王河，《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1 年 4 月第 1 版。

申士焄等，《中國風俗大辭典》，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9 月第 1 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 年元月初版。

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四、 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